

重塑香港天主教會領袖之搖籃

香港中文大學 天主教研究中心

目錄

序言	I
1930 年代：落實本地化	3
華南總修院的創立	4
1940 年代：戰火中的生活	7
導言	8
口述歷史：林志遠神父	9
1950 年代：修生大熔爐	15
導言	16
口述歷史：溫以政神父。彭保祿神父。潘瓊輝神父。 李毓明神父。曾慶文神父。尹雅白神父。姚崇傑神父	17
從小修院直奔羅馬聖城：余福綿神父。夏其龍神父。 關俊棠神父	50
1960 年代：來自教內外的動盪	72
導言	73
口述歷史：社會事件促成的一群留羅學子：徐錦堯神父。 梁達材神父。鄭生來神父。駱鏗祥神父	74
從華南總修院過渡至聖神修院：劉德光神父。蔡子敬神父。 薛君浩神父。范錦棠神父。鍾志堅神父。李亮神父	102
1970 年代：現代修院雛型漸成	156
導言	157
口述歷史：關傑棠神父。陳志明神父。閻德龍神父。 羅國輝神父。曾偉雄神父。周景勳神父。劉富根神父。 伍國寶神父。孫英峰神父。林祖明神父	158

1980 年代：修院及學院穩步發展	237
導言	238
口述歷史：蔡惠民神父。陳德雄神父。李志源神父	239
院長神師篇	263
口述歷史：田義神父。余福綿神父。曾慶文神父。 姚崇傑神父。關俊棠神父。林祖明神父	264
本地女修會的培育	288
寶血女修會創立的歷史。修女入會後的培育。 如何培育入會的修女。見證時代轉變。結語	289
總論	312

序言

「華南總修院 / 聖神修院口述歷史研究計劃」是在世紀疫情之下展開的一項工作，成果分為兩部分，其一是本書《重塑香港天主教會領袖之搖籃》，主要由三十五位在華南總修院或聖神修院接受培育的神父的口述歷史所組成；其二是小冊子《華南總修院 / 聖神修院的人事物》，可視為口述歷史之外的敘事資料，以補充未能透過訪問展現的內容。

《重塑香港天主教會領袖之搖籃》一書以三十至八十年代為主結構。此外，還有〈院長神師篇〉，是從修院管理者的視角作出回憶，他們大部分早年都是接受陶成的修生，後來成為栽培後輩的培育牧者；以及關於耶穌寶血女修會初學培訓的篇章〈本地女修會的培育〉，作為對照全男班的華南總修院 / 聖神修院的聖召培育。

聖召，在天主教會內，是指接受召喚成為神父、修士或修女；而所謂聖召培育，顧名思義是栽培那些回應耶穌基督的召叫、決意終身追隨而把自己奉獻給教會的人。修道院 (seminary) 或簡稱修院，拉丁文為 *seminarium*，意指苗圃，也就是培育男青年教友——聖召種子——成為神職人員的地方。在聖秩制度下，他們將來就是帶領天主教團體的主要領袖；這是上至羅馬教廷的教宗，下至地方教會的主教、堂區的神父都必須經歷的階段。雖然近年已開始多了女性擔任教會內的要職，但只由男性組成的神職班仍是天主教羅馬禮的未變傳統。

香港教會的修院最早可追溯至 1841 年本地天主教開教之初。時至二十世紀上葉，培育本地神父主要由兩間修院負責，一間是隸屬香港教會的修院¹，另一間則是隸屬教廷傳信部的華南總修院，專門為華南地區多個代牧區及監牧區聯合設立的大修院。1964 年，華南總修院停辦，原址交由香港教區接管，成為教區的大修院，而薄扶林的小修院又同時遷入，成為集大小修院於一身的「聖神修院」。雖然本研究計劃的目標是香港仔的華南總修院和聖神修院，但四五十年代先後在西貢和薄扶林落成的小修院，與以上兩者有著密切關係，在本研究中也有一定的角色。

¹ 本地教會在傳教區時期已設有聖母無原罪修院，但因師資有限，小修生多於畢業時送往澳門或檳城的大修院。華南總修院成立後，當時位於堅道主教座堂旁邊的修院，即變成小修院。1941 年日佔時期被迫解散，戰後也因建築物有倒塌危險，香港教區於 1949 年在西貢建成新的小修院「聖神修院」Holy Ghost Seminary。小修院可說是培育神父的前期準備，因為小修生年紀尚輕，主要是為他們提供中學課程，以及學習拉丁文及《聖經》以應付未來在大修院的神哲學課程。西貢小修院地理位置不佳，於 1957 年遷往薄扶林太古樓村，中文仍是聖神修院，英文則改稱為 Holy Spirit Seminary。為免與香港仔的聖神修院產生混淆，西貢及薄扶林的聖神修院，在本研究中統稱為「聖神小修院」，以作區別。

早年的修院一直採用封閉式生活，嚴格限制與外界的接觸。即使現在，修院團體仍非一般教友經常能輕易觸及。教友多只能在修生到堂區實習時認識他們，更深入的認識就要等他們祝聖為神父被派遣到各個堂區工作之後。這些修生每天的生活是苦是樂？學了甚麼？在七十年代一般教友也開始有機會修讀神哲學以前，可說是鮮少人知。但這些修生學成之後，搖身一變卻成為堂區團體或教會機構的主要領導人。正如教區秘書長李亮神父在訪問時憶述：「李宏基主教多次提及，『教區修院是教區的心臟』。心臟如有問題，人便有問題。修院是教區的中心地點，是中樞，如果培育修士²得宜，將來就有好神父，教區也會興旺，但如果修士出了問題，晉鐸後便會把自己的問題帶到牧民工作中。」香港教區由一個約千人的傳教區演變成如今約六十萬信友、全球最大華人教區。華南總修院三十三年間共有二百三十位畢業生晉鐸，而聖神修院至 2020 年共有七十八位畢業生晉鐸。本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以眾多神父追隨聖召的故事來重塑他們在修院共同培育的經歷，繼而勾勒出本地教會華人牧者的培育，並且探討天主教會在本地化的過程中，與普世教會和社會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的總體時段分可分為三個階段，1931-1964 年，由華南總修院創院之初至結束，其中包括脫利騰大公會議的舊有培育模式、修院在戰亂和戰後的發展；1964-1973 年，聖神修院成立後，經歷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革新、小修院逐步停辦、神哲學院的成立及升格；1973-1980 年以後，修院現代培育框架成形，以及神哲學課程普及至平信徒。不論神父或修女，他們的培育因身處不同時代、普世及地方教會不同的培育特點，牽引出不同的面貌。每位神父的故事都是獨特的，著眼於自身的經歷回顧，在同一時期的各篇獨立小歷史未必能說盡修院的一切。然而，當我們把三十至八十年代的眾多故事貫穿起來，卻能織出一段由華南總修院及聖神修院緊緊擁抱教會、社會和世界的大歷史，既可看到修院如何培育出一批一批的本地天主教會領袖，也可看到背後的社會政治脈絡，教會本地化的進程，以至這些領袖與教會及社會的互動關係，他們所受的教育又如何影響他們牧養教友。

據原在聖神研究中心長期擔任執行秘書的林瑞琪博士指出，迄今研究華南總修院的中文著作可說絕無僅有。外文書籍中並不多見談論華南總修院所承擔的重任，而中文書籍方面，除了數本修院年慶特刊，其他專論到目前為止仍付闕如，至為可惜。《公教報》早年有關華南總修院的報道也不是一般教友能輕易看到；而且上述的年慶特刊，印刷量少，能廣為流通的如鳳毛麟角。我們在研究初期亦發現，即使有關

² 由於受訪者的習慣，在本研究中「修生」與「修士」兩詞互通使用。

於修院的著述，內容還是比較零散。在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成立後，對聖神修院的角色及記載就更少提及，多聚焦於神哲學院的發展及其人事。幸而，2020年華南總修院／聖神修院慶祝建院九十周年暨神哲學院五十周年之際，將現存的九本新舊年慶特刊電子化，存於年慶特刊《召叫與回應》一書附送的USB記憶體中，使有興趣的人士有機會窺探修院前期的情況。本研究則藉著當年的修生講述他們在修院的陶成生活，反托出對華南總修院／聖神修院歷史研究的價值。

此外，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國籍神職班的資料匱乏，有受訪者曾指出，香港教區的特點就是低調。個別神父可能因工作關係多在教會媒體上出現，或在互聯網興起後活躍於社交平台，或本身喜愛寫作，而為人熟悉；然而，更多的神父都是一直在自己的職務上默默耕耘，沒有太多關於他們的文字流傳。這突顯了是次研究的另一個價值，卻並非我們在計劃之初所預期。

本研究採用口述歷史方式，由受訪者講出他們當時的經歷，減少第三者記敘的主觀成分，同時降低史學中「很強的解釋學」傳統。³不過，我們必須指出，口述歷史有助「了解歷史事件的具體過程與更為豐富的歷史細節」之餘，仍需要「立足文獻為基礎」。⁴最明顯的原因是，受訪者的記憶有可能因時代久遠而受到影響，把時、地、人混淆或忘記。雖然我們對受訪內容伸引出的問題或疑問，已努力與受訪者澄清，但讀者和其他有意參考本書的研究者仍需對比相關文獻和實物遺跡等其他史料。此外，本研究亦發現，當遇到可能有損教會形象之事，又或涉及到其他鐸兄弟或已還俗神父之時，部分受訪者會有所避忌，在在說明口述歷史與其他史學研究方法一樣，需要互為參照。

在受訪者排序方面，基本上依照他們進入大修院開始修讀哲學的年份先後，以十年為一個時代分六章陳述，但有數位受訪神父情況特殊，從小修院逕赴羅馬，又或他們不是連續在大小修院修讀，便以與他們進入小修院的年代為基礎。所有受訪神父主要可歸為四類：在華南總修院接受培育者；從小修院轉入本地大修院（華南總修院／聖神修院）接受培育者；有本地小修院或大修院背景，但在羅馬接受培育者；在聖神修院接受培育者。每個年代的特殊之處在每章的導言，以及最後的總論已清晰點出，這裡就不作贅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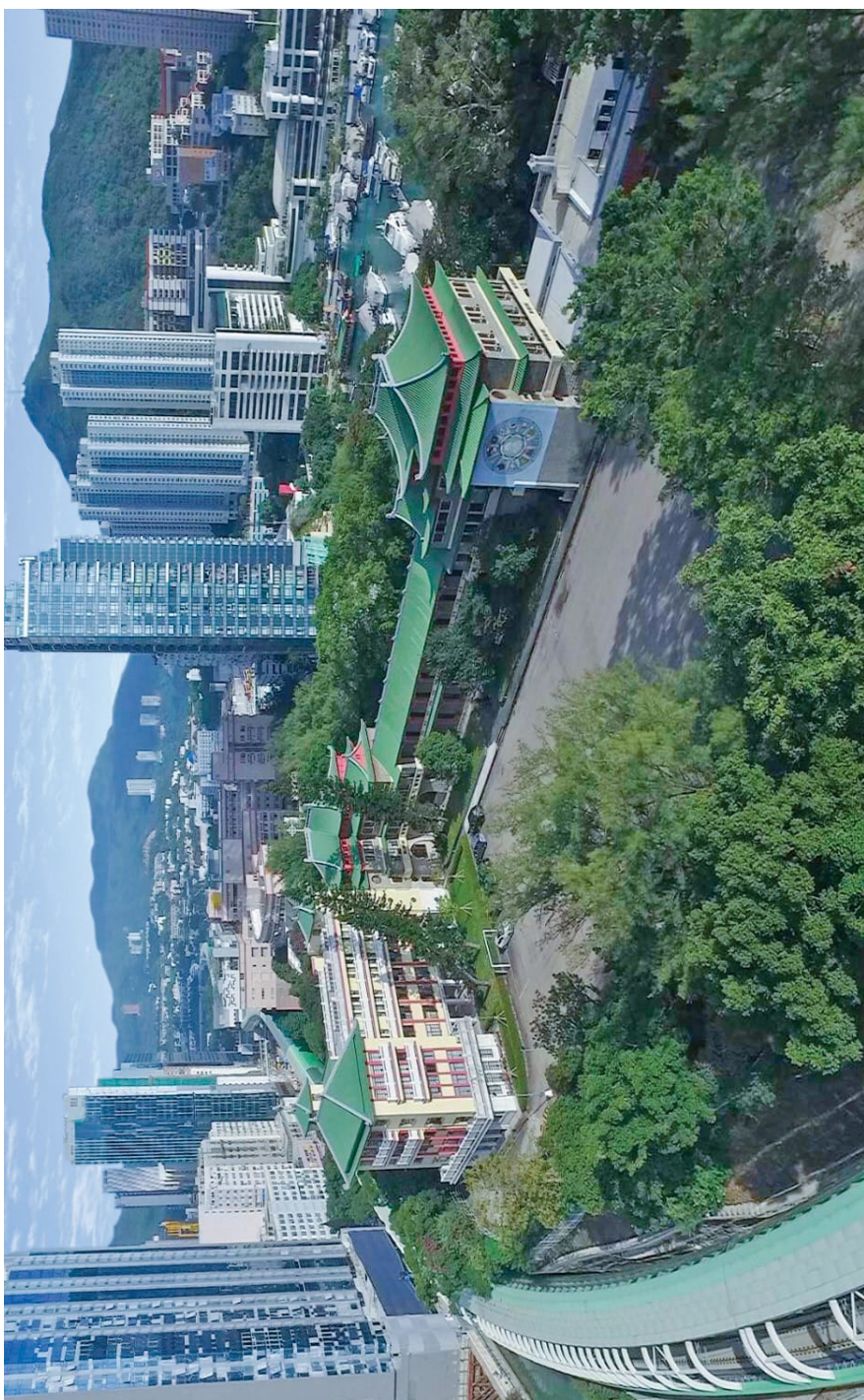
³ 馮建輝：〈口述史：歷史與人民的互動——對《過去的聲音——口述史》的歷史哲學解讀〉，載《四川民族學院學報》，2013年8月第22卷第4期：頁31。

⁴ 朱楊：〈口述歷史中方法問題探析〉，《淮南師範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總第86期：頁87-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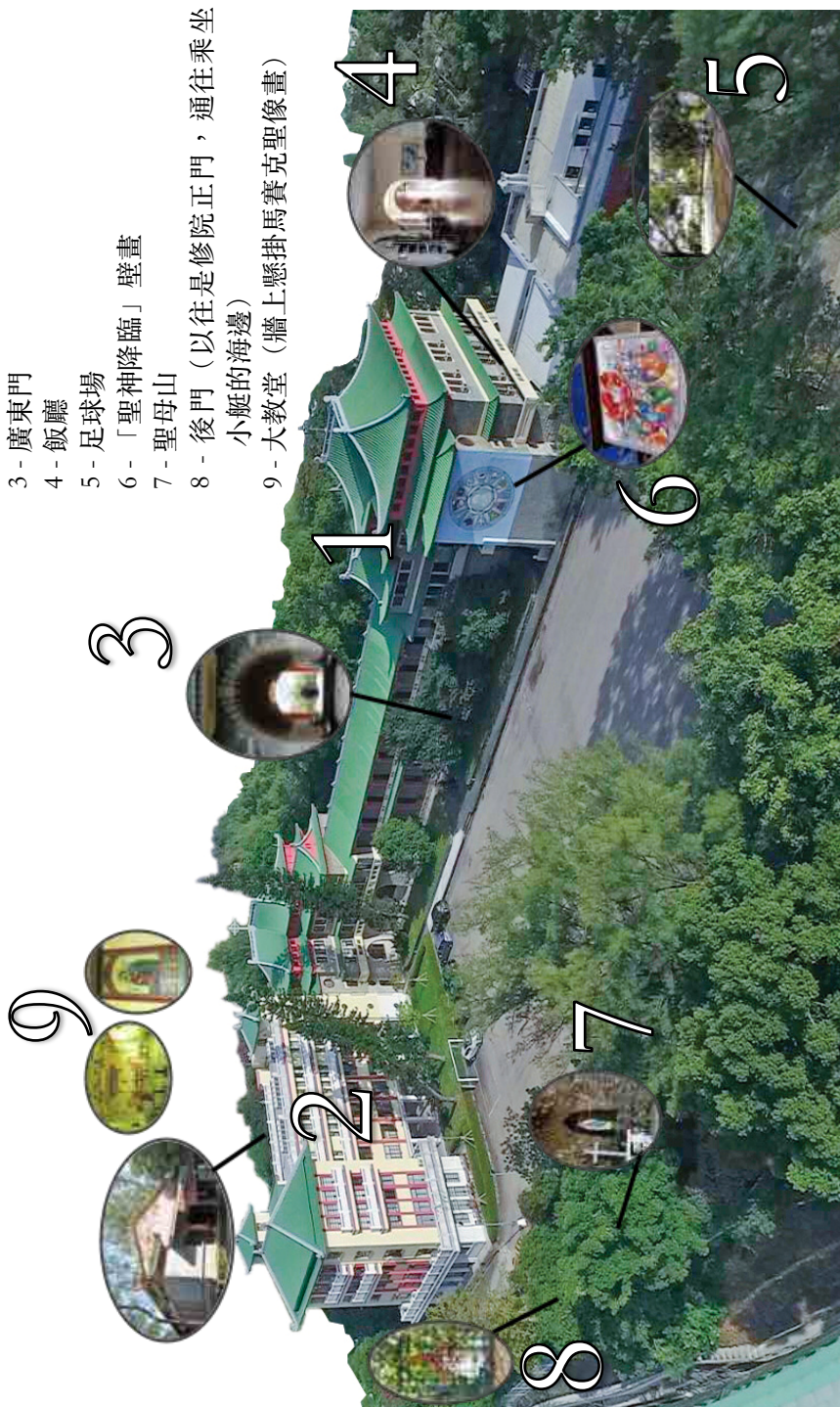
這項研究在世紀疫情之下進行，我們面對了許多不能預計的困難，活動受到了很大限制，未能訪問所有神父，即使親訪神父的次數也受到限制，有部分訪問更只能以線上形式進行，亦有個別神父的訪問內容，是得到有關人士同意之下，引用他們的回憶錄或其他的個人專訪。此外，由於本研究是重塑天主教會領袖的陶成，故受訪者都已經成為神父，內容傾向正面，並不完全代表修院歷史的全部；因種種原因而離開修院的前修生並不包含在本研究之中，因而未能對照兩者的差異。我們深明本研究難說完美，仍希望借此拋磚引玉，引發其他研究人士對此範疇作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最後，我們想藉此機會衷心感謝各位受訪神父和修女、聖神修院、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及各個堂區，使本研究能順利完成。另外，我們亦感謝林瑞琪博士和馮勝利先生為本研究提供不少珍貴史料、照片和意見，同時感謝香港公教真理學會榮休主編余似懿女士為本書作前期校閱工作。

香港中文大學 天主教研究中心
主任 林榮鈞
研究助理 張小蘭、黃家欣



- 1 - 聖神修院主樓
- 2 - 新翼 (神哲學院教學樓)
- 3 - 廣東門
- 4 - 飯廳
- 5 - 足球場
- 6 - 「聖神降臨」壁畫
- 7 - 聖母山
- 8 - 後門 (以往是修院正門，通往乘坐小艇的海邊)
- 9 - 大教堂 (牆上懸掛馬賽克聖像畫)



1930s

教宗比約十一世（任期 1922 - 39）

教宗比約十二世（任期 1939 - 58）

香港宗座代牧恩理覺主教（**Bishop Enrico Valtorta, PIME**，
任期 1926 - 46）

華南總修院院長

首任院長古端敏神父（**Fr. Thomas Cooney, SJ**，任期 1931 - 37）

第二任院長馬良神父（**Fr. John O'Meara, SJ**，任期 1937 - 47）

1930.10.3 華南總修院奠基

1931.11.1 華南總修院祝聖啟用——收錄廣東、廣西、福建三省的
青年修生

1937 福建總修院成立，華南總修院原有福建籍修生改入福建
總修院

1937.7 中日戰爭爆發

華南總修院的創立

想了解華南總修院（又稱「中華之后聖母總修院」）的創立，不得不追溯到1924年，首任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Archbishop Celso Costantini）在上海召開了第一屆全國教務會議。該會決議在中國成立十四所地區性「總修院」，即服務多個代牧區及監牧區的聯合大修院。當時在香港代牧區成立的「華南總修院」就是其中一員，主要培育來自粵、閩兩省內十多個代牧區和監牧區的修生。

華南總修院成立的意義，清晰銘刻在總修院的奠基石上：

「教宗必約第十一位關懷教務……
賜款建築藉以善
德聖道栽培中華志士造
就司鐸尊位俾易於化導
本籍國民皈依基利斯督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三十年十月三日」

教宗必約第十一位（Pope Pius XI），或稱作比約十一世、庇護十一世，人稱「中國教宗」，「力言盼望中國教會，可多還諸中國籍主教神父管領」。¹ 因此，為華南各教區培育國籍神職班，成為華南總修院至為重要的任務。可見華南總修院的誕生，是回應中國教會本地化的重要一步。

總修院在1931年10月開始招生，11月1日諸聖瞻禮正式開幕，學制是三年哲學，四年神學。因直屬教廷傳信部（現稱萬民福音傳播部），所以修院財政由其負擔，院規和院長亦由其批准及委任。華南總修院歷六任院長，均由愛爾蘭籍耶穌會士擔任。古端敏神父（Fr. Thomas Cooney, SJ）是第一任院長。據1956年《香港鴨巴甸華南總修院》對開幕日的英文內容記載，修院第一年有二十位修生，其中十人來自香港佔首。² 第二年有二十五名，第三年修生人數大增至五十四名，他們

¹ 〈建設中華修院公函〉，載《公教報》，1931年6月1日，<<https://bit.ly/33KrZuL>>，[29-12-2020]。

² “Opening Day,” Silver Jubilee Record of Seminary of Our Lady Queen of China, (Hong Kong: South China Regional Seminary, 1956), 16. 然而，1934年華南總修院首屆畢業生馮德堯在同一書中撰文，則指第一年共有二十四位修生，十人來自香港。見馮德堯：〈華南總修院的初期生活〉，《香港鴨巴甸華南總修院》（香港：華南總修院，1956），頁97。卓正賢1941年的文章則指創辦之年修生人數只有十七名。見卓正賢：〈華南總修院史略〉，《華南總修院拾週

來自廣州、江門、香港及福建等地。1934年，馮德堯、葉蔭芸及劉榮耀等，成為華南總修院首批畢業生，並且晉鐸成為神父的香港修生。1937年，福建總修院成立，華南總修院原有福建籍修生便全體轉往該修院。不過，這沒有削弱華南總修院的規模。在1934至1941年間，華南總修院修生人數常在六十至七十之間，收生的範圍更拓展到海南、廣西梧州等地，甚至遠至馬來西亞的北婆羅洲及沙撈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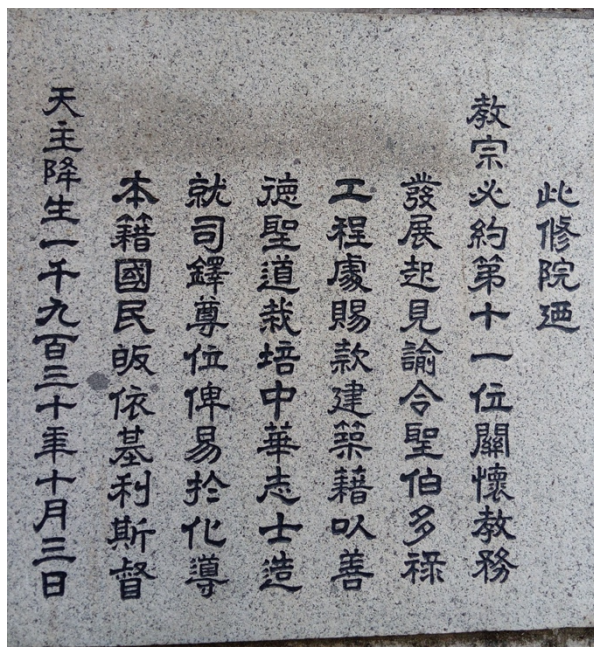
1934年古神父因公務回到愛爾蘭，由馬良神父（Fr. John O'Meara, SJ）擔任代理院長。古神父重返香港的時候，從倫敦購置了許多化、理儀器，並且從愛爾蘭運來赤道儀（天文望遠鏡）及彗星探鏡這兩種觀象器械到修院，原因是「教宗屢屢囑令傳教區的長上，務要使本籍修生，在俗學和聖學上均有清晰的合法的知識」³。華南總修院於1936年成立私人測候所，每天由修生記錄觀測各項，所得記錄，按月寄發天文台，用作香港南面測候的參考。

古神父回港後不久，即獲委任為香港耶穌會的會長，他揀選馬良神父為副院長。馬良神父於1937年冬天正式成為華南總修院第二任院長。⁴當時日本已向中國展開全面戰爭，戰事的陰霾亦逐漸迫近香港。

年特刊》，載《公教報》，1941年12月1日。據“Opening Day”同頁的照片，以及劉繼智：〈香港天主教中文聖樂的發展：劉榮耀神父的貢獻〉一文，第四十四頁附有的照片（配圖文字：「華南總修院開幕之後，第一批員生合照」）皆顯示二十位修生。由於沒有相關原始資料足以斷定誰是正確，故此處以兩張不同照片為基礎，採用開幕日文章中的數字。

³ 卓正賢：〈華南總修院史略〉。

⁴ 卓正賢：〈華南總修院史略〉。



01

01 華南總修院奠基石

02 以拉丁文刻鑿的奠基石遺留了日軍槍擊痕跡



02

1940s

教宗比約十二世（任期 1939 - 58）

香港宗座代牧恩理覺主教（**Bishop Enrico Valtorta, PIME**，
任期 1926 - 46）

香港教區主教恩理覺主教（任期 1946 - 51）

華南總修院院長

第二任院長馬良神父（**Fr. John O'Meara, SJ**，任期 1937 - 47）

第三任院長夏禮士神父（**Fr. Richard Harris, SJ**，任期 1947 - 51）

- | | |
|-------------|-------------------------------------------|
| 1941.11 | 華南總修院成立十周年 |
| 1941.12.8 | 香港保抗日戰爭開始 |
| 1941.12 - | 香港日佔時期 |
| 1945.8 | |
| 1945.5 | 華南總修院修生被迫遷往澳門 |
| 1945.11 | 修生重返香港復課 |
| 1946.4.11 | 教宗為中國建立聖統制，香港升格為教區
宗座代牧恩理覺主教擢升香港教區首任主教 |
| 1946 - 1949 | 國共內戰 |
| 1948.9 | 修院內成立聖母會 |
| 1949 | 於西貢開設聖神小修院 |
| 1949 | 聖母會創辦《院聲》月刊 |
| 1949 | 中國大陸大批難民湧入香港 |
| 1949.10.1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

導言

踏入四十年代，世界和中國內地時局驟變，華南總修院原本平靜、有規律、少受外界干擾的生活節奏因而受到巨大影響。

1941 年華南總修院慶祝建院十周年之後不足兩個月，頃刻便要面臨日本侵略者的軍事佔領歲月。在香港教區的神職班裡，四十年代在華南總修院攻讀神哲學的修生，現存只有林志遠神父一人。他對香港保衛戰最後幾天有甚麼回憶呢？

香港日佔時期歷時三年零八個月，華南總修院全體人員以信賴上主為本，迸發出驚人的堅忍克難精神，才能勉強維持運作。修院上下是怎樣省吃省喝？修院的師生又是如何答謝天主的庇佑？

雖然日軍沒對修院日常運作作出干擾，但佔領末期面對無米之炊的困境，修院如何照顧託付給他們的修生？而 1945 年戰爭過後，只剩院長一人留守的華南總修院，是在甚麼景況下逐漸從戰火硝煙中重新出發，負重前行？這些都在林神父的記憶中為我們解答。



林志遠神父

1940 進入華南總修院

1948 晉鐸



為本研究揭開序幕的林志遠（林猶生）神父，生於1919年，迄今已屆102歲高齡。他在2019年百歲之年適逢晉鐸七十周年之喜。林神父原籍潮州，1933年由叔父林惠風引薦他進入「揭陽聖伯多祿小修院」，當時潮汕教會相當興盛，1940年他被派往香港華南總修院修讀神哲學。然而，李神父當修生的年代，與戰爭緊緊相連。林神父就是在中日戰爭中抵達香港：

日本仔佔領中國華南。我從汕頭坐船去珠江口，轉艇仔入廣州。廣州不能直接來香港，〔因為〕是交戰國，便在廣州住下，等候澳門船，等了三個月。打仗期間不是時常有船的，住了三個月，8月多住到11月，坐船去澳門，澳門過一夜，就坐澳門船來香港。¹

1941年11月1日華南總修院慶祝十周年紀念，但一個多月後，日軍於12月8日對香港發動攻擊，修院的生活也大受影響。

朝早七點多炸啟德〔機場〕，我們以為是演習。嘩！這麼早英軍演習！原來是日本軍炸啟德。

香港政府早已通知修院，一旦爆發戰爭，會徵用修院並需要停課。為了確定每個人在戰時有一定的崗位，教授及學生都分別加入各種公眾服務。戰事開始的最初幾天，有些修生到市區協助安置難民。其他人則指導派發食物，給予香港仔的漁民。但日軍迅速前進，使這一切活動結束。其他留在修院沒有奉召出動的，便在飯堂的窗邊堆上沙包。²

¹ 在本研究中，林志遠神父口述歷史訪問獲「香港培聖會」授權使用，<<http://serraclubhk.org/priests/priests-JohnBLam.html>>。本書受訪者自述段落中的方括號〔〕為研究中心編輯所加，圓括號（）為作者的補充。

² 駱顯慈著，林瑞琪譯：〈香港仔華南總修院（一九三一至一九六四）〉，《神學年刊》第5期，1981：頁61-71。

日軍於12月13日先攻佔九龍；再於18日晚上登陸香港島，但遭遇英軍頑強抵抗，雙方從19日起先後在黃泥涌峽、淺水灣及赤柱等地爆發激戰；12月23至25日是「香港保衛戰」的最後三天。始料未及的是修院竟然遭日軍轟炸。

英軍後來撤退路經修院，歇腳後便去香港那邊，日本仔知道，可能看到了……便炸！掉炮，三個炮彈……飯廳，早已預備作避難所用，大窗放了沙包，聖堂反而就沒有，預備這邊作避難所。

真是天主意思，我打理祭衣房，〔12月24日〕一早到聖堂，開門預備做彌撒，一般都在六點多或七點做彌撒的，預備完之後，院長馬良神父說：「林兄弟，今天我們不要在〔聖堂〕做彌撒，要搬到飯廳那邊。」當時如果沒有天主保佑，繼續在那邊做彌撒，會死很多人！我搬了三張飯桌作祭台，在這邊做彌撒，做彌撒之際就炸了。啊！緊要啦！³一粒炮彈落下去，祭台全毀了，聖堂三分之一變成了爛木，聖體櫃跌了下來，聖體櫃由銅造的，也穿了一個洞，所以從那時起，修院立了聖母為主保，感謝聖母，每年12月8日，修院特別恭敬聖母。

據原文是拉丁文的檔案記錄，修生得到院長的同意給聖母許願。呈願的內容是由12月24日起一個月內每天恭念一串玫瑰經以表感恩；修院特別敬禮聖母諸寵中保（Our Lady Mediatrix of All Graces）的名號；並承諾各人倘若安全渡過危難，將來每位修生晉鐸後獻祭十台，以謝聖母保祐之恩。

24日晚上最緊要，〔日本人〕打到赤柱，翌日早上，嘩！好緊要，轟轟聲響不停，我們便走，由修院走去香港仔聖堂，到下午安定了一點，就由香港仔搬回來修院住。

1941年12月25日，香港宣布投降。駱顯慈神父（Fr. Michael McLoughlin, SJ）自五十年代任教於華南總修院，他曾撰文指出，院長馬良神父聖誕日早上帶同於修院避難的婦孺，前往村中的女修院暫避，三分之二修生亦同行，其他修生自願留守修院，以免有人趁機搶掠。全體人員翌日上午返回總修院。留守的修生都精神飽滿，但聖誕日當天院舍兩度被轟炸。修院立即作臨時修葺及清理，留在院內的婦孺悉數送回市區。修院自12月8日至1月7日停課一個月後，重新展開正常的課程，但修生很多的時間都花在修補院廈的損毀上。⁴

³ 粵語「緊要」，意指嚴重、厲害。

⁴ 駱顯慈：〈香港仔華南總修院（一九三一至一九六四）〉，頁61-71。

日軍對修院的攻擊雖然未造成重大的人命損失，卻使修院失去一項貴重的資產。總修院設有一度是亞洲最大的天文望遠鏡，日軍誤會以為是炮位，因此向天文望遠鏡發了幾炮。⁵自此以後，天文望遠鏡不復存在。

香港淪陷，踏入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修生的生活與當時其他香港人一樣，面對物質及精神兩方面的困難。林神父當時應該是哲學一年級生，但事隔半世紀，他對這段艱難歲月仍然是歷歷在目，印象磨滅不了。

1941年4月，為了要慳錢，修院要裁員。工人裁剩下兩個煮飯的，其他的都裁了。那修生呢，也要慳錢。我們上午讀書，下午割草，草割沒了就斬樹。斬樹要等晚間下雨時，趁日本仔看不清楚才去斬樹，晚間斬的樹去當柴燒。

修院當時採取半工讀制，上午讀書，下午工作。院長為節省開支，辭退數十名工人，每天下午修院總動員上山割草、下廚、清潔飯廳、出外購買食物等。另有修生組隊出外砍樹，充當煮食燃料。此舉是冒著賠上生命，犯軍法被槍殺而進行的，故此修生多於雨夜出動，藉雨聲夜色掩護，幸好每次都能平安歸來。⁶

為了慳錢，〔修院要〕買黑市米。日本仔配給六兩四的米，六兩四不全是米啊。有時是米碎，有時是薯粉，有時是黃豆、綠豆等，有時是糙米、米碌之類，不是時常都是米，一小碗粉或薯仔，有蘿蔔就做蘿蔔糕，甚麼都有。

我也種菜，在山邊掘地種蕃茄、種菜、種薯仔。我當時年青，不過瘦弱，氣力不及別人，於是寫信給哥哥，叫他從泰國寄錢來。我說現在香港缺糧，沒有糧食了，寄錢給我。在泰國的哥哥寄了錢給我買東西，買這買那，養兔仔，養雞。為甚麼呢？養雞生蛋，兔子，鬆毛兔，養來賣，兔子要吃草，但沒有草給牠們吃，在黃竹坑可買蕃薯藤。當時黃竹坑、深水灣、淺水灣種菜人家那兒，買蕃薯藤來餵兔子。我養雞，生蛋來作食用，雞可賣，甚麼都要做。

⁵ 林瑞琪訪問黃勇牧神父，2003年1月3日。

⁶ 黃景賢：〈香港淪陷期間的修院生活〉，《香港鴨巴甸華南總修院》（香港：華南總修院，1956），頁95。

在艱苦的歲月中也要提防野狗來偷食：

英軍被囚在集中營，他們的狗都跑出來成了野狗，四處覓食，來擒我的雞。為甚麼這麼多雞毛而不見雞呢？一定是野狗，便去捉牠們。我用一枝竹、電線，拉下來綁個活結。活結中放食物，野狗取食物時拉動了活結，就吊起來，三隻腳落地，一隻腳被拉著，逃不了！

顧及溫飽之餘，修院在禮儀上的種種需要也要照顧，林神父在這方面出了不少力：

院長要買麵餅〔作聖體〕，我說：「不用買！」為甚麼不用買？我說：「我們有麵粉不是嗎？我能造麵餅，做聖體。」院長遂叫：「那你立即開始造呀！」

需要買蠟燭，但又貴。我又說：「不用買蠟燭，讓我自己來澆蠟燭。」澆了之後，乾了，就掛起，第二根，又這樣澆，澆了之後，乾了，就掛起來。二十、三十根，這邊的乾了，再來又澆，一層又一層。

五傷蠟燭我也造……怎樣造呢？叫人打造一個鐵盒，圓圓的，皮球那麼大，下面一個座，上面打一個十字，一個鐵鈎，燭芯，入面抹凡士林，澆蠟下去不會黏著，這樣澆，乾了之後，就用水浸，待冷了，取出來！

院長總是看著我笑，他很喜歡我，讀書成績又好，甚麼也會做，澆蠟燭、造麵餅。

往後的三年多，華南總修院總靠著一種難以注解的特性，在淪陷中維持一點的平靜生活：

日本仔來修院，完全沒有理會我們，對教會沒有甚麼，入聖堂就恭恭敬敬地鞠躬。

日本人從來沒法為總修院明確註冊，它不是學校，不是聖堂，也不是修道院，歸入任何一類也不是，因而總修院能維持下去。從日本人手中所取得的自由，還要依賴羅馬及愛爾蘭不定期及不能預計的經濟支援，修院才能勉力生存下去的。⁷ 直至 1945 年 5 月，香港淪陷期最艱苦的時候，華南總修院也不能幸免。糧食供應短缺，物價高漲，食米每磅售價高達六十五美元。原本每人每日六兩四的配給米亦

⁷ 駱顯慈：〈香港仔華南總修院（一九三一至一九六四）〉，頁 61-71。

取消，修院至是山窮水盡。修院最後決定接受澳門羅若望主教（Bishop João de Deus Ramalho, SJ）的邀請，由夏禮士神父作為華南總修院代理院長，與十四名修生遷到澳門的修院寄讀，院長馬良神父則留守總修院。⁸

三個多月後的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結束戰爭。不過修生依然留在澳門，直至11月初有六位修生突然從中國大陸乘掃雷艇回修院，促使總修院召回所有修生，並於11月19日開課。日本佔領期間遺下的痕跡清晰可見，修院旁邊的炸彈洞尚未修補，屋瓦的砲彈洞只用一二塊鐵片蓋著，因此有幾個房間因下雨時在室內也要撐傘而不能居住。⁹

修院復課面對的問題也不少，糧食不足，修生營養不夠。教授亦少，新進入修院的哲學生只讀哲學及英文。1945年底至1946年底的生活是「窮困暗淡」的。¹⁰到了1947年，各樣的事情才漸見起色。

然而在教區層面，教廷於1946年4月為國人傳來重要的喜訊——在中國建立聖統制，把中國所有代牧區升格為教區。香港代牧區亦成為了教區，繼續由宗座外方傳教會管理。時任宗座代牧恩理覺主教，成為香港教區首任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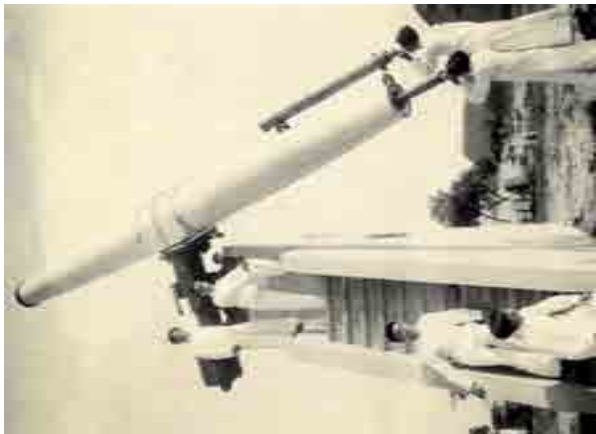
在四十年代末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10月1日成立後，大批難民從內地湧入香港，而教廷及中國教會亦恐政局改變影響修生的修道聖召，陸續將內地修生轉來香港。在下一章我們將看到華南總修院再一次面對政局變化帶來的嚴峻挑戰。

⁸ 駱顯慈：〈香港仔華南總修院（一九三一至一九六四）〉，頁61-71；黃景賢，〈香港淪陷期間的修院生活〉，頁95。

⁹ 駱顯慈：〈香港仔華南總修院（一九三一至一九六四）〉，頁61-71；劉蘊遜，〈憶當年，話當年〉，《香港鴨巴甸華南總修院》（香港：華南總修院，1956），頁94。

¹⁰ 劉蘊遜：〈憶當年，話當年〉，頁94。

01



02



03



01 修院曾有小型天文台，
備有天文望遠鏡

02 華南總修院修生在戰時
曾短暫遷往澳門聖若瑟
修院

03 西貢聖神修院

1950s

教宗比約十二世（任期 1939 - 58）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任期 1958 - 63，2014 年宣聖）

恩理覺主教（**Bishop Enrico Valtorta, PIME**，任期 1946 - 51）

白英奇主教（**Lorenzo Bianchi, PIME**，任期 1951 - 69）

華南總修院院長

第三任院長夏禮士神父（**Fr. Richard Harris, SJ**，任期 1947 - 51）

第四任院長倫若瑟神父（**Fr. Joseph Garland, SJ**，任期 1951 - 57）

第五任院長黃永耀神父（**Fr. John Wood, SJ**，任期 1957 - 63）

- 1950** 中國大陸出現鎮壓反革命運動及「土地改革」
- 1950s** 內地難民大批湧入香港
- 1954** 教宗比約十二世頒布為「聖母年」，聖神修院修生每月一次赴各區聖母聖堂朝聖及參與多項活動
- 1956** 華南總修院成立二十五周年；修院大聖堂奠基
- 1957** 修院大聖堂落成

導言

承接上一章，華南總修院在四十年代末，再次要面對的挑戰是來自中國內地政權的更迭。據天主教《益世周刊》1949年2月22日的報道，教廷要求國內的教會將大修院修生遷往安全地帶，繼續學業。因此，內地修院出現了大規模的南遷行動，大批修生由各地轉來香港，使五十年代的華南總修院變成幾近全國修院的角色，肩負了重大的任務，培養出大批牧者。當時華南總修院的「盛況」如何？修院又怎樣解決人滿之患所帶來的各種挑戰？

本章輯錄了共十位神父的訪問，逾半是從內地來港。他們是隻身而來？還是有夥伴同行？他們離開自己的故土，從北方來到南方的香港，會遇上甚麼適應的問題呢？他們當中有些是直接入讀華南總修院，有些是先入讀香港或澳門的小修院，繼而考入或轉入華南總修院。在神父們的回憶中，那些年的修院生活是怎麼的一回事呢？還有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沒法返回內地教區服務，修生畢業的歸屬事宜是怎樣解決的？

另外，香港教區接連派出薄扶林聖神小修院的小修生出國，前往羅馬修讀神哲學。他們在彼邦又會遇上怎樣的經歷，為他們日後返港後的鐸職帶來甚麼影響？



溫以政神父

- 1949 進入西貢聖神小修院
- 1953 進入華南總修院
- 1960 晉鐸



來自汕頭教區揭西的溫以政（原名溫祿道）神父，於1930年3月24日出生，十六歲時受父親及陳維本神父鼓勵，進入揭陽小修院，改名「以政」，取意為以聖言培育成為司鐸。

梅縣有間中學，是修院來的，叫聖若瑟中學。本來中國主教團決定，每個省設立一間小修院，但因為廣東省太廣闊，所以將其分為兩間小修院，而香港就是總修院。

在十九歲那年，因為逃避國共內戰的關係，促使溫神父於1949年9月離開了家鄉到香港，並進入西貢聖神小修院繼續未完成的學業。

1948年在梅縣聖若瑟修院讀了兩三個月，共產黨就來了，我們還是繼續讀下去，但人人都心慌慌，也沒有很用心去讀書。第二年5月我們就解散回家了。

我沒想過會來香港，因收到揭陽修院的院長寫信叫我到修院，集中修生一起去香港，我們先到汕頭主教府，坐一條外國船，夜晚開船，第二天朝早就到中環海港，很接近「公教進行社」的。

本來告訴我們去堅道的修院，是香港教區的修院來的嘛，後來不知道為甚麼……接了我們卻帶我們去了西貢，原來西貢建了一間小修院……九龍城開車，然後去彩雲，再轉彎落山，那裡是單一條行車線的，車在那裡停了很久，然後下面那些車全開上來了，我們的車才開下去。

日佔時期結束後，教區的聖母無原罪修院原址（今堅道高主教書院）被破壞不堪，所以香港教區另在西貢覓址建造新的小修院，取名聖神修院。新落成的修院設施還未完全妥當，溫以政神父和其他修生都是年輕小伙子，為修院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我們在籃球場挖，又在修院後面一個山坡挖泥，挖好的泥在那裡做一個化糞池。

不過，溫神父認為這樣「不是真讀書」。小修院讀的是一般中學課程，另進行靈修和《聖經》道理的訓練。溫神父最初只會潮州話和客家話，初入小修院的時候「不懂得聽廣東話，由一位意大利神父教修生廣東話，才慢慢懂了」。另外，修生必須修讀拉丁文，為進入華南總修院作準備：

在小修院學少少拉丁文，硬著頭皮讀的。教授都很幫我們的，知道我們這班是過渡時期的，學生是不夠資格，考試之後院長寫信給大修院那邊問，我們這些修生可不可以去大修院？大修院的院長就說：「不是說去不去，你批多少我們就收多少。」

江志堅神父¹便說：「好吧，你們全部都去吧！」那時是非常時期，不是隨便就能找到學校讀書的。

修生們在香港大小修院的學費、生活費又是誰給的呢？

是修院負責的，我們一個仙都沒出。我在小修院四年，然後就是大修院，七年都沒出過錢的。

據長期研究中國天主教會的林瑞琪指出，在日常的運作中，各教區仍需負擔一定的費用。分擔比例有不同的計算法，方式也不盡相同。第一個方法是按教區分攤，即將負擔的數字均分給各個教區，這種分攤法用於修院的首期建築經費上。第二個方法是按修生人數比例，即按「頭顱」計算。每個代牧區應負擔其所派遣修生的生活費。由於剛恆毅總主教在致傳信部的信中提到，華南修院的主權應「屬於傳信部」²，於是傳信部便得為沒有財力的代牧區承擔經費。

溫神父於 1953 年進入華南總修院後，便碰上了一個特殊的狀況：

後來到大修院讀書，多了很多人，大量修生講國語的，我用半鹹淡的國語跟他們說話。我的國語不是正規的，他們慢慢講，我也跟著學，所以不停學新事物。

¹ 江志堅神父 (Fr. Quirino De Ascaniis, PIME, 1908-2009)，宗座外方傳教會士，1933 年來港，早年在內地傳教，於 1953-55 年在西貢聖神小修院擔任院長。見〈江志堅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https://bit.ly/2VLtDMu>〉，[5-4-2021]。

² 田英傑著、游清麗譯：《天主教掌故》（香港：聖神研究中心，1983），頁 216。

華南總修院何來有「大量」說國語的修生？1949年前後，正值國共內戰，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共產黨成立新中國，國內天主教修院被關閉，當中大部分修生，像溫神父一樣到了香港，而且申請寄讀華南總修院的都獲得批准，來自東北、山東、北平（北京）、上海、漢口等不同省市的修生多達數十名。修院人數躍增至一百二十人。修院通用語言亦由廣東話改成國語。³

面對突如其來的修生，修院面對的問題也不少，宿位是一個問題，飯堂用膳時間也要分兩批進食。同級班數倍增，倫理神學共有三班，而教義神學及哲學都要加倍。⁴ 修院原有的聖堂也不敷應用，需另外興建一間容納更多人的教堂。華南總修院這段時期由區域性的大修院，驟然變成一間全國大修院一樣！

修生雖然來自五湖四海、不同省份，溫神父認為大家在生活習慣上沒有很大的適應問題。

大家都沒問題啊！吃飯，大家都會照樣吃光，不會有甚麼不習慣。飯菜會不會遷就北方來的？不會的，修院做甚麼飯菜，我們都會吃，大家都很和氣的。是的，因為大家都是走難來的，所以大家都沒有表達一些不合理的東西。

教授叫我們做甚麼，我們每個人都會去做的。

那時教會有些救濟品要分給當地的人，我們修院的修生都很出力幫忙，就在修院現在聖母亭那裡，有石梯級走下去，對面就是香港仔。分發救濟品時，聖母亭那裡就會有很多人，有修女來派救濟品，我們修生就把救濟品分給他們。

香港那時並不多人，不過因為有大陸的人進來，人口就增加了。

香港教區在五十年代，先後開設了約二十個社會服務中心，向有需要人士，特別是那些來自內地的難民提供援助服務，後於1957年成立了「香港天主教社會援助協會」和「香港公教社會福利會」，修院便定期分發不同種類的救濟品。⁵ 當時修院山下的黃竹坑涌尾屬淺水沙泥灘，是艇戶聚居地，六十年代涌尾艇戶過千，住有約一萬一千多人。⁶

³ 〈華南總修院廿年來 擢陞司鐸百餘〉，載《公教報》，1951年8月5日。

⁴ 駱顯慈：〈香港仔華南總修院（一九三一至一九六四）〉，頁61-71。

⁵ 柯毅霖：《從米蘭到香港：150年傳教使命：宗座外方傳教會，1858-2008》（香港：良友之聲出版社，2008），頁133-134。

⁶ 劉智鵬、黃君健：〈工業區〉，《黃竹坑故事：從河谷平原到創協坊》（香港：三聯書店，2015），頁48。

溫神父回想修院的生活，有不少輕鬆有趣的工作和活動：

修院有一個花園，我是神學生的時期，負責打理過一兩年修院的花，幫忙種花，那時我種了很多小白菊，在修院「廣東門」出面那個廣場，擺了數十盆，種得很好，院長很欣賞。

此外，他熱衷參與修院一年一度的運動會，並且擔任過召集人。

每年十月一日會舉行三日的運動會，院長會吩咐一個修生做帶領的工作，我讀神學第三年時〔1959年〕曾試過做召集人，召集大概七八個修生，將工作分給他們負責，我就看他們哪裡有需要幫忙，我就去幫他們。

運動會有很多東西玩的，又有籃球比賽，又有足球比賽，又有水上比賽，跳水、潛水、跳遠等等，你喜歡參加哪樣就自己打勾。我就不選擇的，全都打勾。樣樣我都參加，但遇上我不能及時參加的，就到時不去，我可以的就樣樣都參加。

甚麼跳水都會去！跳水就在修院「廣東門」後面，現在是水上餐廳那裡，有很多遊艇停在那裡，以前沒有的，是修院唯一的游泳的地方。那裡不危險，水很深，又有個石級跳板。周末、節日，即是放假就會下去游泳。

熱衷於修院的活動，並不代表溫神父不看重自己的學習，反而他知道自己處身非常時期，與其他修生未敢怠惰：

教授怎樣幫我們呢？他用拉丁文講書，之後就做一整張簡單的講辭掛出來，我和同學都爭相拿去打字，每人一張，我們就依這張紙寫的資料去溫習，那個勞神父⁷是這樣幫我們渡過，取得大修院的學歷。

學習之餘，也要到社區中實習，溫神父神學四年級的時候，被派去探訪從大陸南下的難民，

有機會和他們講論天主教道理，當中有二十多人在1960年的復活節領洗，成為香港仔聖伯多祿堂的教友！

⁷ 據林瑞琪整理的華南總修院歷任教授名單中，只有一位勞達一神父（Fr. Ladislaus Ladanyi, SJ），推斷他是溫神父口中，協助修生渡過學習困難的教授。

在畢業前，溫神父和其他修生也有忐忑不安的時候，

當時蔡明通⁸曾問院長倫神父：「我的學識都不夠資格，可不可以升神父？」院長說：「可以，現在的教友水準也不是很高，你們出來幫教會工作，有多些人幫手是可以的。」

我也有問過院長，能不能升神父，他也說：「可以，沒問題，可以升神父的。」全都讓我們升。

溫神父縱使得到院長首肯願意批准晉鐸，因政局轉變，原屬教區歸不得，因此在晉鐸路上又要闖關：

好像有八九個修生一起升神父的，有些是屬於台灣教區的，我屬於汕頭教區，但汕頭教區沒有主教，不可以讓我升神父。因為院長是耶穌會士，在馬來西亞亦有傳教工作，與當地主教相熟，所以詢問了吉隆坡主教，就這樣批准我升神父，然後就去了馬來西亞傳教。

就是這樣，溫神父於 1960 年升神父以後，到了馬來西亞服務十五年，後來應馬國政府政策要求而離開，輾轉應時任主教胡振中樞機⁹的邀請入籍香港教區。

⁸ 蔡明通神父是香港教區神父，於 1964 年晉鐸。

⁹ 胡振中樞機（1925-2002），生於廣東省五華縣，小時在嘉應教區接受教育。1948 年前往華南總修院攻讀，1952 年在港晉鐸，翌年前往羅馬進修，1956 年取得教律學博士學位後，赴美國實習及在台灣新竹教區服務。1975 年教宗保祿六世委任其為香港教區主教，1988 年獲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命為香港首位樞機。見〈胡振中樞機〉，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https://bit.ly/2SBjvUK>〉，[27-3-2021]。

彭保祿神父



- 1949 進入西貢聖神小修院
- 1953 進入華南總修院
- 1959 加入方濟會
- 1963 晉鐸

彭保祿神父來自汕尾的陸豐縣，彭神父的父親因為政治原因而坐牢，他怕國內修院有關閉的可能，便鼓勵兒子離鄉到海外繼續修道。1949年9月12日，當時仍是小修生的彭神父和溫以政，以及另外三位小修生乘坐客輪離開汕頭，次日早上到達香港。¹⁰

登岸後，輾轉乘公車前往新界西貢聖神小修院報到……可惜的是，我們中間最好的一位，也是我們的學長，竟然在三個月後，因了一些誤會，被院長開除了。另一位也因水土不合，經常生病，在半年後，也離港回大陸家鄉去了。此後留下我們三位「外來的」借讀修士相依為命。有一天，其中一位因為午飯後休息時間較為嘈鬧，院長宣布開除他，要他次日離開修院。幸得修院其他四位神長求情擔保，才能僥倖保存聖召！

1953年8月中的一天，我們三位汕頭教區修士，再加上香港教區的三位，一行六人進入了香港西北邊海灣，鴨巴甸漁港旁小山丘上的華南總修院就讀。開始了三年的哲學課程。當時還有來自大陸瀋陽和營口兩教區的三位，福建廈門和福州兩教區的兩位，國籍主徒會的一位，廣東嘉應州教區的兩位，共十四位修士一班。再加上神哲學課程的一百多位，共約一百二十位〔修生〕。其中包括日後的香港教區胡振中樞機主教、李宏基主教和湯漢助理主教，以及三十多年後生長在國內而在北美晉陞主教的第一位華人三藩市總教區輔理汪中璋主教。¹¹

¹⁰ 彭保祿：〈彭保祿弟兄自傳〉，《彭保祿弟兄 Friar Paul Pang OFM》，台灣及香港中華之后方濟會省兄弟一覽表，〈www.ofm.org.tw + hk〉，[4-5-2021]。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得彭保祿神父授權在本研究中使用他的自傳內容。

¹¹ 彭神父的自傳於2010年更新。文中提到的湯漢樞機，是於1996年獲祝聖為輔理主教，2008年任命為助理主教，翌年成為正權主教，於2012年獲擢升為樞機。他於2017年榮休，

小修院和大修院的確是截然不同的。不但是自由方面，而更是自主方面，尤其在時間分配方面。個人的祈禱溫習，自由時間的分配，比如個人的遊戲消遣，集體的運動玩球，幾個朋友的閒聊散步等，很多都是隨個人的決定而進行。

在假期，不少的修士幾乎整天都在球場上奔馳，毫無倦容。但無疑的，也有比較嚴肅的課題，如找教授討論功課，與同學研究作業，找神父談論神修，找神師解答聖召上的一些問題等。

所有有意登上鐸品的修士要經過嚴格的神、哲學訓練。三年的哲學課程會研究本體學、宇宙學、批判學和哲學史；有些課程也加上社會學和倫理學。批判學也包括邏輯，幫助發言人不要說話時自相矛盾，言論前後不符，也就是說不合邏輯……神學的範圍就大多了。大凡教義神學、倫理神學、聖經學、神修學、傳教學、教會史、要理傳授、民族文化等，都在教學範圍內。

當時華南總修院每學年舉辦兩次辯論會，就是修生學習進度的具體表現。

教授們都很重視。辯論會可以鼓勵學生們深入瞭解任何一個問題的結癥，尋求解決的論證，再以有說服力的言辭，或加以證明，或加以反駁，務求聽眾能瞭解問題的真相，並與發言人得到共識。

這對日後經常需要面對的教義解答、要理講授、彌撒證道，以及一般的問題討論都有決定性的影響。所以教授都會精挑細選，尋找對課題較有準備並且較有靈活頭腦的學生來擔任辯論會的主持人。這樣一來，三年哲學、四年神學的多次辯論會給予學生們腦力和智力莫大的刺激。

在本研究的訪問中，當年與彭保祿神父一起入讀修院的溫以政神父稱讚他語文能力相當不錯，「人很聰明，在大修院很快就應付得來」。華南總修院1956年二十五周年紀念特刊中，頁首的院長致辭就是由當時是哲學生的彭神父翻譯的。然而，此時內地一些傳教士路過香港，到華南總修院與修生分享經驗，卻讓彭神父遇上了聖召的掙扎：

但楊鳴章主教於2019年去逝後，獲任命為宗教署理，暫管教區事務，直至2021年5月21日任命的周守仁主教於同年12月祝聖為止。他因為一直居於修院，在其2017年的離任家書中自稱聖神修院「金禧住客」。汪中璋主教則於2003年祝聖為輔理主教，直至2009年榮休。

他們在傳教工作中比較難接受的是孤獨。因為國內教區相當遼闊，同樣堂區與堂區之間的距離也很遠，再加上交通不便，很多傳教士感覺與其他傳教士或當地神父們的見面變成幾乎不可能，因而感到傳教生活過於孤獨。

〔我〕比較懼怕孤獨的。多方思考之後，只好向神師請教。剛好自己當時正在閱讀荷蘭方濟會士約根遜所著《聖五傷方濟言行》，而神師（愛爾蘭籍耶穌會士郭年士神父）鼓勵我繼續閱讀，並鼓勵多多祈禱，祈求聖神啟迪，幫助自己神辨。

彭神父的轉捩點出現在 1957、1958 兩年。修院每年開學後不久都會舉行周年退省，並會請外面的耶穌會士來主講。彭神父正考慮應否留在教區或求進一個修會的時候，

一連兩年所請的耶穌會主講神父都在最後一天才發覺不能來，而兩次都就近從香港請來了方濟會神父（一是思高聖經學會創辦人雷永明神父，另一是同一間學會的張俊哲神父）主講！

兩位退省神師給了我對方濟會更深的認識。後來郭神父還說服了請雷神父當我的神師。感謝天主，雷神父雖是極忙，學會內、外工作應接不暇，卻沒有拒絕做一個小修士的神師。

彭神父經過一年多的分辨，在兩位神師的催促下，又得到汕頭教區的香港負責人李若安神父¹² 諒解，最後決定加入方濟會。

當時方濟會在東方還沒有自己的初學院，便只好告別修院神長和同學以及在港的家人和親朋友好而束裝上道，到上司所指定的意大利去了。當時最難過的心情莫過於放棄只差一年便能晉鐸的良機，而踏上前途未卜的路程。

彭神父最終在 1959 年完成神學第三年之後，離開了華南總修院，加入方濟會，繼續追尋自己聖召之路。他後來更成為全球海外華人傳教處主任，直至 2008 年。

¹² 李若安神父（1901-1992），生於廣東揭陽縣，先後入讀廣州及汕頭小修院。1927 年畢業於馬來西亞檳城宗座大修院，回國後在潮州一帶傳教及執教於小修院。1951 年由大陸來港，1953 年任何文田恩理覺小堂主任司鐸達三十年之久。〈李若安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J-Lee.htm>〉，[5-4-2021]。

潘瓊輝神父

- 1948 進入高雄五塊厝小修院
- 1955 到華南總修院修讀神哲學
- 1962 晉鐸



在 1930 年出生於台灣中部員林羅厝的潘瓊輝神父，其實是來自南部屏東萬金鄉，人稱「台灣本土天主教福傳工作第一家族」的潘家。潘父年輕時曾修道，潘母則是首位去山地傳教的女性。¹³

萬金鄉潘家是「傳道世家」，我們家的墓園就寫著這四個字，我阿公就是傳道員，父親十來歲被送到廈門去讀神學院，就是想成神父，只是後來因為手指受傷而殘廢，被迫放棄當神父的願望。可是他生了七個兒子一個女兒，我是老二，替他完成了心願，其他幾個弟弟也都在教會做傳教員，我姑姑也是傳道師，終身守貞為天主傳福音。¹⁴

至於潘神父本人，研究台灣天主教歷史的古偉瀛教授曾稱，他是台灣教史上得到很多個第一的神父¹⁵。而與本研究相關的第一：潘神父是高雄教區 1961 年成立後，全台灣首位晉鐸的本地人。

因為我要經過七年的神父培育，三年哲學、四年神學，但是台灣沒有這個學校，只好送到香港。坐了三天四川輪，七年後回來也一樣坐這個船。

那個時候年輕人要出國第一就是困難，第二就是要當兵，所以我當過兵才能夠出去。因為剛好一個教友是在軍事科，他就叫我先進入國民兵的訓練，這才可以出去。

我 1955 年進去的時候，總修院差不多有七八十人，大部分是大陸過來，像東北。他們當時是先到台灣，有的先到了香港教區。他們比我

¹³ 蕭曉玲：〈潘氏四兄弟——Ma'ma Mia〉，載於《轉角遇見神——20則尋找與相遇的故事》（台北：光啟出版社，2007）。

¹⁴ 蕭曉玲：〈潘氏四兄弟——Ma'ma Mia〉。本段口述歷史徵得潘神父同意採用。

¹⁵ 古偉瀛：〈痛悼天主的好女兒，我們的好姐妹——李菖薇〉，《芥子》51 期，2020 年 1 月，<<https://bit.ly/3dW52L2>>，[1-3-2021]。

早去華南總修院，是因為我要當兵，有兵役的問題，要等四五年以上才能出去，所以我要晚一點。

同班有四個同學來自台灣，林天助¹⁶也在。林天助因為沒到年齡，所以他是升了神父之後，回來才要當兵。

當時大修生過的是封閉式生活，與社會接觸很少，但潘神父對香港的整體印象還是不錯：

當時跟社會好像不太有接觸。香港是英國管理，那時候算平靜，很平安，沒有甚麼困難。而生活方面，做神父要有七年考驗，生活跟外面是不一樣啦，不但要讀書，還要聽命。

總修院的訓練以聽命為重，以拉丁文來學習，潘神父認為兩者對未來鐸職都有幫助。

總修院那時是耶穌會管理。課程是一般所謂神學與哲學，還有一些升神父要學的東西。拉丁文我在台灣小修院已開始學習，到大修院都要用，是已經學好了才去。這是教會的文字嘛，當時教會的證件、領洗證，都是用拉丁文寫，所以是有幫助。

那時候的教育是按照課本來教，最怕就是一年兩次的考試。考不過要補考，但多數都過得去。

考試是用拉丁文口試，他給你十五個論題，三個神父抽幾題來問你，一個教授問五分鐘，三個教授都要問。所以考試等於是一個很大的考驗，十五題都要念，不能說忘記了。問到沒有念的就糟糕了，哈哈。

自律是我們修院一個非常重要的要求，要聽命嘛。一切都由院長管理，所以我們都要聽他的話，一板一眼的。這對神父的生活有幫助，因為以後神父的生活也差不多是這樣。

以前是比較聽命，優點就是我們教會裡面的三願¹⁷，這一方面會做到。現在就比較自己作主，自動自發，不用人家管，自己來。當然這個聽命我們要好好遵守，這個不遵守就不是神父啊！

¹⁶ 林天助主教（1935-1994），高雄教區神父，1985年獲任命為嘉義教區主教。

¹⁷ 三願是指神貧、貞潔及服從。

潘神父認為現代的自由，符合社會的進展，但神父需要由做好靈修來把握尺度。

現在的社會就比較講自由，本地化，用本地話，這是比較符合現代的，教友也明白彌撒的意義。梵二¹⁸以前，神父就是神父，教會跟社會不會那麼密切。我升了神父前後才開梵二會議。之前在聖堂做彌撒是背向教友，神父對著聖像。

但做神父就要比較做靈修，自己要好好做，無論是傳教或甚麼，都要有榜樣，這個我們應該要放在第一。你不要說隨隨便便的，這個傳教方面就是我們的本份。

儘管現在已達九十高齡，潘神父仍記得在大修生時期的生活點滴。

修院的生活就是每天早上上課，下午自修。下午可以游泳。我們是一個半島，修院下面是個海。還有運動會。

我們修生當中，會選一個學長來管理，神學一個、哲學也有一個。生活一切都好，單單是考試很困難。

哲學三年的時候，倫若瑟神父做院長，有點嚴格，對後來神父的生活也應該有影響的。神學的院長是另外一個，比較溫和，沒這麼厲害。他們都是從愛爾蘭來。神師又是另外一個，是一個中國人，但也是耶穌會的。外籍老師比較嚴，國籍的比較和善。

潘神父在總修院期間，遇到了音樂上的恩師，也交上摯友。

在修院時，因為喜歡音樂，一到放假就跟香港教區的一個學弟去一位女老師那邊學鋼琴。她叫我念音樂課程，然後考外面的級別試。我之後考到第六級，如果考到第十級，就可以當老師。這位鋼琴老師楊美寶，到我晉鐸了，又給我送風琴和摩托車。另一同學就沒有送。

我剛進修院第一年，陶成章神父¹⁹已經快要神學畢業了，但不曉得為甚麼，大家感情很好，可能都喜歡去旅遊朝聖，因此覺得投緣。後期，原籍廣西的陶神父也有邀請我一起去桂林。陶神父過世的時候，我也有特地飛到香港。那邊的本堂神父特別要求我來做彌撒。

¹⁸ 梵二 / 梵二會議，全稱為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62年10月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開，至1965年9月由繼任的教宗保祿六世結束。

¹⁹ 陶成章神父（1926-2018），廣西出生，1949年逃難到港，入讀華南總修院，1956年晉鐸為香港教區神父。

對音樂的愛好，潘神父在晉鐸後，獲教區主教派遣到羅馬攻讀聖樂。

我在聖樂、音樂方面有這個興趣，所以鄭天祥主教²⁰派我去羅馬宗座音樂學院。在華南總修院七年，都有念音樂方面的東西。那一本《額我略聖樂唱經》，我很熟悉，全讀過了，因為要唱彌撒和日課晚課，完全用拉丁文唱。

因為在香港已學過，到羅馬的時候又再念這個，所以可以輕鬆自由地上課。那裡同學來自很多的國家，有日本、韓國等，他們不全是神父，有的也不是教友。

在羅馬期間，我又利用三四個月的暑假時間，去紐約學習，並在那裡看到華僑的傳教，就一邊幫忙。這種海外的經驗，使我對傳教更加有心得。

由於在華南總修院時學會了廣東話，潘神父在彭保祿神父和另一位香港神父的聯繫下，到了加拿大服務當地華僑，直至後來高雄教區需要人手，才回到台灣服務。潘神父到加拿大傳教時，總會彈著手風琴，帶動教友的活動。

在羅馬念完書後，又到加拿大多倫多中華聖人堂服務四年，那是一間大聖堂，主日有七台彌撒，來參加彌撒的有六七千人，完全用廣東話，因為香港的華僑多。有一次本堂問：「可以做一台閩南話的嗎？」我就說：「我可以講台灣話的。」那裡有幾個台灣來的教友，他們就是講閩南話的，還有菲律賓的華僑。

在鐸職崗位服務快六十年的潘瓊輝神父，目前仍擔任高雄教區後勁聖若瑟堂主任司鐸一職。學習聖樂的潘神父當然也有投入聖樂創作。如其弟潘瓊琚編輯的聖樂歌本《聖樂的饗宴》中，《榮耀歸天主》一曲就是由潘神父編曲。這歌本是台灣第一本台、國語雙聲語言都能詠唱的聖歌集。

²⁰ 鄭天祥總主教（1922-1990），道明會士，高雄監牧區 1961 年升格為教區時，成為首位高雄教區主教，1969 年獲總主教的個人頭銜。

李毓明神父

1954 進入華南總修院
1957 晉鐸



(圖：聖瑪加利大堂)

李毓明神父在華南總修院只渡過三年寒暑，因為他在 1954 年才轉到香港繼續修讀神學。此前，他在澳門兩湖總修院完成神學課程第一年，當時修院裡只餘他和另外三人。

來自山西的李神父，乳名「富元」，字「子揚」，生於 1927 年 6 月 5 日，祖先七代信仰天主教，祖父及伯父於 1900 年教難時為主殉道，父親也屬半殉道。

他的修道歷程與時代緊緊連繫起來。1939 年他十二歲時進入太原市備修院，讀了一年半後轉到太原小修院，至 1943 年因中日戰爭，被日本人趕回家，翌年才重返修院。再過了兩年，由於投訴院長的作風，遭趕出修院。李神父其後畢業於太原中學，家裡正想替他準備婚配的人生大事，卻因逃避國共內戰而作罷。

1948 年暑假，由於戰爭迫近太原城，因此我二哥毓文神父就帶領我和弟弟毓章，姪兒瑞祥及外甥生來，一起逃往北平（現北京）。準備找學校讀書之際，戰事又打到了北平；我二哥就讓我和外甥生來，跟著山西洪洞教區逃來北平的神父們，一起向南方逃。

他從天津到青島坐船到上海，再往杭州，渡錢塘江，再擠火車往南下，先後到了衡陽和廣州，最後到達香港。²¹

由於是逃難，所以一切交通工具都是免費，因此，大家都在爭著往車上擠，很辛苦才能爭上。我倆爭著上了一輛火車，直開到湖南的衡陽車站。過了一夜，我們又爭上火車往廣州。那是最後一班車，車箱內早已擠滿了人，只好往車頂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席座位。原來車頂

²¹ 李毓明：〈我〉，《李毓明主日福音分享（電子版）第一冊～甲年》，頁 5-11，<<https://bit.ly/3dmJis2>>。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獲李毓明神父授權在本研究中使用他的自傳內容。另有部分內部為林瑞琪對李神父的訪問，2003 年 2 月 28 日。

也是滿滿的人。那時候的火車，並不是電動，而是燒煤炭，車頂可以坐人，但不是平頂，而是弧形的，如果不小心，就會滑下去。

戰事已臨近廣州，既然費了那麼大力，從北平逃到廣州，不能半途而廢，只好再逃。有兩條路可選擇，一是台灣，一是香港。到台灣的交通工具，首先是為那些政府人員，因此，我們就選了來香港。

我在公教進行社看書，來了一位中國主教，我們在北平時常見面，他就是河北正定教區成啟明主教，他一見到我就問我：「你住在那兒？」我說：「無處容身。」他便說：「來，跟我們的修生住在一起吧。」

當時香港有兩個地方收容逃難的神職人員。薄扶林道的伯大尼修院，是給神父們住的；而玫瑰崗道明會是給修士們住的。直至半年後，李神父遇到家裡的世交朋友兼同鄉張體謙神父，介紹他加入榆次教區，並送到澳門兩湖總修院。那是借用澳門教區聖若瑟修院門口的舊聖若瑟中學，修生都是難民，來自湖南、湖北及山西、山東的修士，有些更是太原修院的同學，因此李神父不感到生疏。

我在這裡用拉丁文讀完兩年士林哲學及一年神學，直至1954年，由兩湖總修院和華南總修院的院長磋商，才轉往香港華南總修院，補讀三年神學。

華南總修院這個新環境，對李神父來說較澳門修院自由，出門可穿便服。然而李神父個人較喜歡嚴格的修院生活。

對於耶穌會士的印象，李毓明神父的即時反應是：「不兇」。另外，李神父喜歡裝飾祭台，院長亦特別給予他機會發揮所長，負責主理修院祭台的布置。可見修院對修生個人發展方面上都加以支持和鼓勵。

修院對修生守時的觀念要求十分嚴格。修院設有學長與副學長各一人，從修生中挑選出來，副學長按時間表打鐘，所有修士一聽到打鐘便自覺活動。

另外，修生與外界的溝通，若以今天的標準來看，可算是管得相當嚴謹的：

寄出的信是不封口的，由院長封口；收信亦是先由院長拆信，再交給修生。

但李神父相信外籍院長很少會看書信的內容，因為裡面寫的是中文。

在膳食上，華南總修院大致都是提供廣東餸菜，並沒有甚麼問題，只是李神父自己不大習慣廣東飯菜。他還記得當時約有五十多名修生是來自北方的，大家都是說國語。他們過農曆新年時，就會包水餃慶祝一下。

修院既重視生活規律，亦注重鍛鍊修生的體魄。李神父來自北方，但他的泳術絕對不在南方修生之下。游泳對總修院的修生來說並不陌生。修院的「廣東門」後面現仍有一道樓梯，通往深灣，修生以往在空餘時間就會去游泳。李神父更曾在修院每年一度的水運會奪得冠軍，獲得精美墨水筆一支。

由於大量修生從國內南移到此，令總修院財政壓力驟增。負責管理的耶穌會士都需要動動腦筋，為修院開拓財資。據李神父說，修院會為修生找「恩人」（benefactor）支持修生的生活費及學費。這些款項是直接寄到修院，零用錢則交予修生。他記得曾在復活節及聖誕節收到恩人寄給他五十美元的零用錢！當時來說，這算是一筆可觀的金額！

華南總修院設有總考，修生在完成神學課程之後，即使選擇不參加考試，到堂區工作之前，仍需面對一項中文口試的挑戰，就是由教區秘書長主持進行授告解權的審查。李神父記得他是由石抱璞神父²²及潘崇理神父（Fr. Edmund Bruzzone, PIME）²³審查主考的，通過後才能到堂區服務。

華南總修院畢業的同學，許多是從大陸逃出來的難民，香港教區並不願意收留難民神父。因此，我們晉鐸後便分散到世界各地教區。有些到東南亞，有些到南美各國，也有些到歐洲或美國升學的，也有去韓國的，但大多數去了台灣，我也申請去台灣。

當我申請入台證時，有一項是「職業」，它列出三十三樣，「傳教士」也是其中一樣職業。世俗人既然把我們傳教的工作當作職業，我們就要好好看待這份職業。要以「敬業樂業」的精神去作，這樣，才能作好這份工作。

²² 石抱璞神父（1895-1962）出生於香港，1922年晉鐸，曾於香港、內地及北婆羅洲服務，1949-1952年間在西貢小修院擔任院長，1953年獲委為副主教，是首位國籍副主教。1961年獲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擢升為榮譽侍從，領蒙席銜，是國籍神職班中首位獲此殊榮者。見〈石抱璞副主教〉，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http://bitly.ws/dXQJ>〉，[31-3-2021]。

²³ 潘崇理神父（Fr. Edmondo Bruzzone, PIME, 1903-1981）意大利宗座外方傳教會士，1926年晉鐸便來港服務，從未回鄉，曾擔任主教公署特別顧問、教區秘書長及教區法庭主席，並於1964及68年在聖神修院任教倫理學及教會法。〈潘崇理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https://bit.ly/37keaFe>〉，[31-3-2021]。

在等候入台證的期間，我先住在思高聖經學會（堅尼地道舊址），過了一個多月，有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學友陶成章神父，介紹我到九龍仔聖伯多祿堂（現已取消）及牛頭角復華村天神之后堂（現改在順利村）學習。由於辦不下入台證，我的監護人雷永明神父，提議我留在香港，他說：「白主教²⁴是我的好朋友，一定答應的。」就這樣使我加入了香港教區。

最終，李神父於1957年7月6日在灣仔煉靈堂（今聖母聖衣堂），由白英奇主教祝聖為神父。為了牧民工作，他在晉鐸後開始學習廣東話，並一直在香港教區不同的堂區服務直至榮休，現居於跑馬地聖瑪加利大堂。

²⁴ 白英奇主教 (Bishop Lorenzo Bianchi, PIME, 1899-1983)，意大利宗座外方傳教會士，1922年晉鐸，翌年來港，1949年成為助理主教前，絕大部分時間在當時屬於香港代牧區管轄的汕頭及海豐傳教。他於1950被大陸政府拘留，直至1952年獲釋回港，並於同年正式上任為香港教區第二任主教。他於1968年底辭任主教之職，翌年回國，由徐誠斌神父繼任，成為首位國籍主教。

曾慶文神父

1956 進入華南總修院

1963 晉鐸



曾慶文神父和一群有意準備入修院的小伙子在 1950 年中國封關之前，離開家鄉。

我來自一個很熱心的天主教家庭，祖父母、父母每個主日都會到耶穌聖心主教座堂啊！我和哥哥自小就做輔祭，輔彌撒很開心的，可以打鐘。看到很多神父對人很好，對他們有很好印象，那時候修院院長顏神父也鼓勵我們多過去修院玩。

當時廣州教區鄧以明神父²⁵認為修生要趕快離開廣州，那時我們個個都是小學畢業，於是被送往澳門聖若瑟修院讀書。

1949年，國民黨撤退的時候，為了不讓共產黨追到他們，炸了海珠橋，我家住的地方離海珠橋很近的。後來父母也知道解放軍入城，就開始很緊張，政權轉移嘛，父母也覺得有機會離開就離開吧！

就這樣，曾神父、他哥哥曾慶霖神父及湯漢樞機等七個小男孩，由廣州教區一位神父帶他們離開廣州到澳門去。

聖若瑟修院的修生全是廣東人，但他們都是香港人和澳門人。那裡有另外一班叫兩湖修院，修士都從大陸湖南湖北走出來的，由方濟會神父打理。

初到聖若瑟修院不很習慣，因為生活很有規律。清早很早就要起床，眼都未完全睜開，就要去念經、參加彌撒，修生全都要穿長衫。我們也穿著黑長衫踢球，做守龍門挺好的，那球就撞在衫上面，入不到龍

²⁵ 鄧以明總主教（1908-1995），耶穌會士，廣州總教區首位國籍總主教，出生於香港，1941年晉鐸，1951年接受祝聖為廣州總教區署理主教。鄧以明：《天意莫測》（香港：康和製作，1994年第三版）。

門嘛！修院過團體生活，有學長看管住我們的，所以跟以前在外邊自由的生活是不一樣，在團體就要跟隨團體生活，慢慢就適應啦！

曾神父在澳門聖若瑟修院渡過了六年小修院的生活後，於 1956 年轉到香港華南總修院。

由澳門小修院升往香港的華南總修院沒有經過考試的，由鄧主教推介我們去的。

在華南總修院的時候，生活比較自由一些，規則沒以往在澳門小修院那麼嚴緊。大節日可以去探親友，尤其暑假的時候更加多一些；出外去看醫生要兩個人一起去，不能自己單獨外出，一定要有一個人來陪同。外出時不用穿修生袍，可以穿普通衣服，我們穿白色長袖衣服，有白領。

每日有早禱、默想、彌撒，每周兩天幫忙執拾樹葉、掃地等，其他日子打球。大修院也有一些規矩，例如守靜默，小息時可以談天，沒有問題，食飯時讀致命聖人傳記，大家聽完之後才可以談話。

守靜默的時間是挺長的。例如：大家用過晚飯，完了小息，打過了鐘，我們七八十人便一起回到舊樓的圖書館²⁶ 自修。我們稱為「自修室」，各自在自己的書桌，讀書、做功課，到睡覺的時候都不准談話。有時想問人一些東西，就低聲的問，不能騷擾別人。

雖然設立總修院的原意是為華南地區的教會服務，卻因政權轉移，修生逃難至此，使之儼如一所全國性的大修院。

很多修生從大陸不同地方到來香港，甚麼地方的修生都有。當時修院共有七八十人，廣東人只是少數，反而大多數是北方人，香港教區的聖召不多。

我們和北方來的修生相處沒有問題，一起吃飯、參加彌撒、祈禱、大家有來有往，即使我們的普通話不太行，但溝通沒問題。廣東人少，

²⁶ 華南總修院於 1964 年 7 月交回香港教區，改名聖神修院，薄扶林的聖神小修院遷入，因大小修生眾多，遂擴建神哲學新樓，「新樓」的稱呼是用以區別 1930 年落成的修院主樓，所以有新舊樓之稱。

就組一個小團體，喜歡聚在一個叫「廣東門」的地方聊天，說廣東話方便一些。北方人就到現在的圖書館那裡玩橋牌、看報紙。

在餐桌上，不管修生來自大江南北，都要接受修院的安排。然而，修生也曾出現對食物表示不滿，表達抗議。

廚子不會特別遷就某一方，大家一起吃的，都是很簡單的小菜。因為北方人喜歡吃麵和餃子，偶然也會吃的。

我們覺得餸菜簡單，肉食比較少，大家表達不滿意。當家神父知道後很傷心難過，好像要流淚般對我們說：「你們知道錢來得不易，經濟困難，大家要忍耐。」

餐桌上不單純只是南北兩地的文化交流，另有東西方的文化交流：

修生一般都不會與教授一起用膳的，但在神學第四年，即將升神父前的時候，修生就會被請到神父的飯廳，跟神父一起吃飯。耶穌會的神父會教我們餐桌禮儀，學習吃西餐，怎樣拿刀叉，怎樣用湯羹等，吃飯時還要講英文。

回想起總修院的院長和教授，也教曾神父津津樂道：

我入修院時的院長是倫若瑟神父，之後就是黃永耀神父，他在長洲思維靜院避靜時，視網膜脫落，因為沒有立刻去就醫，結果演變成失明，就返回愛爾蘭。科利神父做代理院長，他是最後一任的院長，1964年他把修院移交給香港教區，由唐多明神父²⁷當院長接收。

神父跟我們一起很友善的。修院有籃球場及足球場給修生做運動，湯樞機喜歡打籃球，耶穌會神父也有一兩位會參加，其中一個是加拿大法語區的林喜達神父²⁸，他很喜歡跟我們一起打籃球。

另外，耶穌會教授有時會和我們一起行山，碰上假期不用上課的話，我們有時會去旅行，粉嶺、沙田是旅行地點，這些地方當年還是鄉郊，能夠外出已經很開心，不用經常留在修院裡面。記得有一次奧地

²⁷ 唐多明神父 (Fr. Domenico Bazzo, PIME, 1906-1998)，意大利宗座外方傳教會士，1932年晉鐸，翌年抵港，曾先後任聖神小修院院長（1963-64）及聖神修院院長（1965-67）。參〈唐多明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https://bit.ly/3AskkQV>〉，[25-2-2021]。

²⁸ 林喜達神父 (Fr. Henri Forest, SJ, 1916-2002)，加拿大耶穌會士，1946年在中國晉鐸，1951年來港。見 Irish Jesuit Archives: 〈<https://bit.ly/3tQmwNG>〉，[25-2-2021]。

利人龔自珍神父²⁹和我們修生去參觀美國航空母艦的時候，因他有大肚腩，下不了樓梯，要坐升降機落去。

五十年代的香港社會充斥著來自不同背景的中國難民，修生就在這機遇上出一分力：

那時很多人逃亡來香港，很多人都很窮困，沒甚麼吃的，那時有一個 Catholic Charities of USA，是美國的一個專門幫助發展地區的機構。

我記得一星期一次，救濟品運到修院來，修生幫手抬麵粉、米等往山下面，那裡有很多漁船、艇家，好像現在大澳船屋一樣。我們派救濟品、衣服、麵粉給他們。派的時候，有些住在陸上的人都會過來拿的，因為有很多窮人啊！

每個修生都要幫手派救濟品的。健碩的修生會把整包麵粉抬下山去，其他的便拿輕便一些的東西。大家都徒手搬落去修院下面的船，走石級路去的，不能拖車的。

住在修院下面的漁民也成為修生服務的對象：

那時修生自發辦「街邊學校」，漁民的子女就來修院上課，在主樓後面的路，小朋友坐在路邊，修生教他們中文，好像一間在街邊的小學一樣，不是硬性規定要教甚麼，很隨意的，不像小學那般有系統，總之教他們寫中文字。這也是一種服務，因為很多小朋友沒錢，沒機會讀書，在街上隨處走，那我們便去教他們。

「街邊小學」是在修生自由時間辦的，上課的上午不能辦，逢星期三沒有課就可以幫忙教，並不是天天都有的。

此外，修生在神哲學時期也要嘗試教道理：

不論神學、哲學修生都會分派一些工作，我就負責到鴨利洲，教一位中醫師道理，他女兒是天主教徒，在嘉諾撒培德學校讀書，她成功說服爸爸慕道，我一對一教他，直至到他領洗為止。

神學時期，如果堂區接受的話，也可以去堂區服務。那時沒現在般有系統的，而且安排好便去，沒有多姿多彩的活動。

²⁹ 龔自珍神父 (Fr. John Kronthaler, SJ, 1899-1979)，奧地利出生的耶穌會士，1928 年晉鐸，1979 年在台灣逝世，曾在香港華南總修院任教神學約十年。參〈龔自珍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https://bit.ly/2Ud8rhI>>，[25-2-2021]。

總修院有著的多元化活動，為修生的健康和學習打好基礎：

每年修院有辦陸運會和水運會兩個運動會。陸運會有跑步、踢球、跑圈、長短跑等。水運會就到修院下面，現在遊艇會那裡，以前只有一個碼頭仔，我們就在那裡跳水、游泳；玩海底尋寶，放些玻璃瓶在海底讓我們修生找，或者捉水鴨，買一兩隻水鴨回來，我們成群修生就去捉。水鴨可以飛，又可以潛水逃走的，有些人很有本事，五六個人包圍著牠，捉到牠。這就是水運會。大家都很開心的。

我就是總修院學懂游泳的。夏天的時候很熱，下水就很舒服，因此學懂了游泳。

總修院每年都有半天的辯論大會，所有修生都要參加嗎？

華南總修院的時期，有兩種課程，一種叫 major course，一種叫 minor course，minor 就讀少一些科目，major 就讀多些。我是讀 major course 的，要參加辯論會。辯論會是用拉丁文對答，那時很慘的，要背誦的東西很多。

兩三個修生輪流到台前，其他修生、神父會就著主題提問，修生便嘗試回答。我的一份做好了，就換別個修生來。

也沒甚麼評判的，完了之後，大家都心中有數，比方別人提的問題你答不到，就知道水平不濟了。

我們每年都要考試，每一科都要考，有口試和筆試。當時教會要求修生升執事之前，神學四年級就一定要找一個教區接納。我回不了廣州，於是可選擇加入香港教區、台灣、新加坡，或者馬來西亞教區。

據曾神父說，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前，修生神學第一年有 Tonsure（剪髮禮），在頭上剪一個圓圈，就正式準備領受神品。現在修會也會這樣做。神品有七級，五品以下是小品，就是司門者、讀經、驅魔、輔祭，神學第三年升五品，是大品，可以參加大彌撒，不過只能幫神父洗抹嘴巾、念日課等。如果沒有特別原因，神學第四年開始升六品就是執事，第七級就升神父，有種一步步接近升神父的感覺。

曾神父最後於 1963 年在香港晉鐸。五十多年以來分別從事修院和教區的行政工作，以及投身堂區牧民工作，縱然近年退休，仍擔任培聖會神師。

尹雅白神父



1953	入讀西貢聖神小修院
1957年5-8月	薄扶林聖神小修院
1957	華南總修院
1964	晉鐸

尹雅白神父一家在 1950 年初遇上國共內戰，家裡被清算鬥爭，他隨父親和兄姊從湖南衡陽逃難到香港，以難民身分居於調景嶺，認識了耀漢兄弟會曹立珊神父和一批修士兄弟。難民生活非常艱苦，但他從曹神父的傳教精神得到很大的啟發，因此，學習了祈禱刻苦的精神。

我開始喜歡參與堂區活動，除了祈禱，更喜愛看聖書，那時喜歡的除了《師主篇》，就是《崇修引》，也同時有機會看到《公教報》及程野聲神父³⁰所編的小叢書，還有他編的《學生時代》月刊。我很崇拜他，聖召的種子油然而生。

尹神父憶述他進入小修院不久，在《公教報》看到程神父於 1953 年 9 月 7 日被刺殺的事件，心裡有很大的感觸。

我真的很難過，要效法這個神父做一點事。我在中學的時候，喜歡寫一些文章。我當時真的很希望自己可以像程野聲神父那樣，在文化工作上做一點事，所以後來在小修院的時候，我已投稿給《公教報》。

西貢的小修院設備很簡陋，尹神父回想當時的生活甚為嚴格和有規律。

小修院白天上課，下午有一個小時空閒，可能做一些清潔的工作，或種花，或做運動打籃球、踢足球之類。修院在西貢的時候，後面是一座山，每星期都會遠足等。

有一年 [1956 年] 暴動，全港戒嚴，院長帶我們去爬山，一路上有說有笑，有唱有叫，在馬鞍山腰上，從沒有想到戒嚴的事，突然來了一隊警察趕了上來，大聲斥喝，罵我們不遵守戒嚴法，後來知道是修

³⁰ 據《香港時報》1953 年 9 月 8 日程野聲神父兇殺案報道，指其曾收警告信，不得發表反共言論。懷疑其被殺與此有關。〈程野聲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https://bit.ly/3AKcSJD>>，[5-1-2021]。

生，又見是一位意大利神父帶著我們，才放過我們，沒有帶我們到警局去。³¹

小修院每天早上五時半起床參與彌撒、念早課、做默想、然後才進早餐和上課。上課的是中學的課程，要修中文、國史、地理、數學，但最重要是要學拉丁文，因為拉丁文是念神哲學所用的語言。如果拉丁文不及格，也就等於沒有聖召了！

小修院下面是崇真中學，大概中五的時候，因為不夠學生，而修院又不是每一科都有。院長便送了我們幾個修生到崇真中學讀。真的很有趣，我們下山去上課，上完課便回到修院。我是崇真中學中五第一屆畢業學生。

對於這批修生同學，尹神父說，崇真的學生們都「見怪不怪了」。

中五畢業後，我就多讀一年拉丁文。那時的拉丁文很難讀的。一個名詞可以變成十幾二十字，一個動詞可以變百多個字，形容詞變數十個，變化太多，變化萬千。我們是要背的，如果你不記得那些方程式，是不會懂。真的讀得很辛苦，很辛苦，小修院很多修生讀拉丁文讀到病。

我們到大修院是要考拉丁文的，不及格是不能進大修院。考甚麼呢？他給你作一篇拉丁文的文章，或者把文章翻譯成拉丁文，交給大修院看。一般來說，考完試後，身體沒大問題的話，小修院便會送你去大修院，大修院也會收錄的。

在考進大修院之前，由於西貢小修院位處偏僻，瘧疾肆虐，尹神父於 1957 年復活節後跟隨修院遷到薄扶林太古樓³²的新修院住了四個月。新的小修院建於巴黎外方傳教會捐出的土地上，一切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最顯著的是居住環境與伙食方面，所有修生的健康也比以前好得多。

修院拉丁文稱為 *seminarium*, *seminario*，好像篩米那樣篩走修生，小修院便篩了一部分。我們有很多人一起進入小修院的。進去大修院

³¹ 本研究獲尹雅白神父同意，以其個人博客及自傳，作訪問補充資料。尹雅白：〈修院生活〉，《我的司鐸聖召路》，〈<https://frjameswan.org/my-vocation6>〉，[5-1-2020]。

³² 太古樓村原屬於巴黎外方傳教會，是一個包括員工宿舍、小學、聖堂等的建築群，1977 年拆卸。昔日的太古樓已經改建成為薄扶林花園。

時，已經走了一大半。到大修院，有些人讀了四年，最後也是離開了。有些是拉丁文不成，有些是身體不好，有些是受不了小修院的生活。小修院的伙食很一般，粗茶淡飯，沒有甚麼生果吃，聖誕新年和特別的瞻禮慶節，才会有較豐富的肉類食物。不過每逢白英奇主教來訪就會放假一天，加餸一味！³³

大修院的生活跟小修院的完全不同，多彩多姿，很開心的。那時大修生有六七十人，差不多二十歲以上，中學畢業。當時華南總修院很多修生是從大陸各省市出來，有山東、山西、河南、河北、東北、廣州、汕頭等。

當時和我同班的有十二個修生，我和蔡明通屬於香港教區的。另外那十個是別的教區，他們由大陸走難去澳門。大陸的主教把他們送到澳門去。湯漢樞機也跟我們同班。他也是從澳門來。還有梁耀忠神父、劉志明神父、劉利賢神父、黃俊傑神父等，他們來自廣州、北海和其他教區。

中國神父、外國神父都來了香港，所以香港教會那麼興旺，發展得很好。而且當時美國天主教福利會有很多救濟，使到教會可以多做服務社會的工作。

當時香港教區白英奇主教也是從在大陸坐牢之後釋放回香港。白主教1952年回來之後，對香港教區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

尹神父在訪問中分享了白英奇主教於1952年從中國被驅逐到香港的片段：

在香港羅湖橋邊坐著一位西人，戴著農夫的草帽，穿著一件破舊的唐裝。香港邊境警察向教會報告其人臉貌，即刻由粉嶺堂區的賴法禹神父³⁴去觀察，原來就是白英奇主教，立刻通知教區主教府，由主教府要求政府派了一列特別的火車開到羅湖，把他接到香港，不久他正式就任香港教區主教。

³³ 尹雅白：〈主教來訪 放假加餸〉《我的司鐸聖召路》，〈<https://bit.ly/36ubNza>〉，[5-1-2021]。

³⁴ 賴法禹神父 (Fr. Ambrogio Poletti, PIME, 1905-1973)，意大利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1929年晉鐸，翌年抵港。早年在大陸傳教，五十年代起於新界區服務。因其擔任粉嶺聖若瑟堂的主任司鐸，最靠近羅湖邊界，從大陸被逐離境的傳教士，多由他代表教會於羅湖橋頭迎接。

因為喜愛寫作，尹神父對耶穌會兩位院長、神師，以至日常生活的記憶都很細緻：

在我入總修院之前，倫若瑟神父做院長，很嚴格的，修生每次出外都要穿長衫。之後，我的院長是黃永耀神父，他就比較開放，寬容很多，修生請假外出，去買東西，去公教進行社，或許看醫生甚麼的，就不用穿長衫，而且伙食也改善很多。他說，我們已經長大了，懂得自己怎樣做，不用甚麼都管著，懂得管自己。雖然兩個都是耶穌會的神父，但兩個的作風有很大分別。

而家人寫信來，也要先檢查過才給修生。那時〔在小修院〕，你要打個電話，不是要問院長，而是根本沒有機會讓你打電話。華南總修院的時候，打電話也要先問過院長才可以。當時不同的，完全不同。哪有電話？哪有電視機看？哪裡來有收音機？收音機也不讓你聽。

至於神師有好幾位。每個星期有幾個神父聽告解，星期六下午的時候大家排著隊去辦告解。倫若瑟神父沒做院長之後，便做了神師。剛巧他是我的神師。每個月都要去見他一次，與他聊天甚麼甚麼，小心一點，便沒有甚麼事。

我在小修院三年的時候，院長派我打理花園。聖堂祭台和聖像兩旁的花，也是我們自己種的。種一些菊花、薑花、劍蘭，都是比較容易種的。到了華南總修院，院長又派我做了兩年「花王」。記得有一年颱風溫黛³⁵襲港，把一艘皇后號郵輪從海裡打上了岸，我所種的花也被溫黛破壞得滿院滄桑，體無完膚！³⁶

到畢業的時候。我和蔡明通神父是香港教區，所以便留在香港。其他十個同學便送了到羅馬讀書，再加入了其他如台灣教區。湯樞機那時候沒有升神父，到了羅馬讀書，在羅馬升神父，由保祿六世為他祝聖。之後，他回了香港，加入香港教區，成了香港教區主教，感謝天主！跟我一起同屆的十二名修生是華南總修院最後一屆畢業生，是1964年6月27日畢業。同年9月，華南總修院交給香港教區。

³⁵ 颱風溫黛1962吹襲香港，引致嚴重破壞及傷亡，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具破壞力的颱風之一。

³⁶ 尹雅白，〈修院生活〉《我的司鐸聖召路》，〈<https://bit.ly/3e52Nou>〉，[7-1-2020]。

七年大修院的生活雖然看起來很長，但對於真正有聖召而立志晉鐸的尹神父，他形容是「一個快樂的天堂」。他的寫作天份在大修院時已發揮出來，並且成了日後鐸職生涯中的一個主要任務。

倫神父知道我喜歡寫作，他就叫我負責打理《院聲》³⁷，是修院的一份刊物。他給我一些資料，是修院的消息，另每月給我一本書，多數是光啟出版或真理學會出版的，寫一些介紹書評，然後寄給所有華南總修院畢業的神父。我做了《院聲》這本中文刊物數年的主編。當時我與陳達明神父³⁸兩個負責的，把寫的東西寫在蠟紙上，還沒有油印的。寫在蠟紙上，然後拿去印。不像現在可以打字。我就是這樣慢慢走上新聞寫作。³⁹

晉鐸後的尹神父，首個任務就是派回西貢聖心堂做副本堂，當年小修院已改成了崇真中學的校舍。1965年，白英奇主教批准他到政府辦的夜校「文商書院」讀中國文學，為幾年後的編輯工作奠下良好的基礎。

就是這些寫作經驗和準備，以及追隨程野聲神父的心願，尹神父後來兩度獲委任為《公教報》編輯，第一次是1966-70年為《公教報》主編，當時辦公室仍在中環的大昌大廈十六樓。第二次於1993-96年任中英文《公教報》總編輯。

在此期間，尹神父於1971年申請到加拿大深造，先後在徐誠斌主教⁴⁰及李宏基主教⁴¹批准下，在滿地可市協助中華天主堂的堂區工作，從而得到杜實田神父資助進

³⁷ 《院聲》可視為華南總修院與該院畢業修生的溝通橋樑。這份月刊每期約有一百多份會寄給在香港和海外的所有舊生鐸友。

³⁸ 尹神父記得陳達明神父比他高一班，他一次可以輕鬆地背兩包麵粉，即二百公斤，故在修院有「大力士」的外號。陳神父畢業後在越南西貢晉鐸，為華人教友服務。1976年越南難民大逃亡，香港收容了好幾萬難民，陳神父回到香港傳教，最後在九龍觀塘聖若瑟堂做主任司鐸，1998年因癌病逝。尹雅白，〈社會福利與街童學校〉《我的司鐸聖召路》，〈<https://bit.ly/3hrWKfQ>〉，[6-1-2020]。

³⁹ 尹神父晉鐸後，除了擔任《公教報》主編，亦得到徐誠斌主教支持，籌辦《時代青年》青年雜誌，於1970年1月發行。

⁴⁰ 上海出生的徐誠斌主教（1920-1973），是成人聖召的例子，年輕時接受高等教育，曾任教授，1955年棄俗修道，1959年晉鐸，1967年獲委任為香港教區輔理主教，翌年代替白英奇主教成為署理主教，至1969年就職正權主教，可惜在任不久後於1973年逝世。他1973年在《公教報》的訪問中指出，「修院第一要訓練的還是牧靈人才」，並希望國籍司鐸「擔任各方面的工作」。參〈徐誠斌主教〉，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https://bit.ly/3CGzdAd>〉，[25-2-2021]。

⁴¹ 廣州出生的李宏基主教（1922-1974），五十年代任教於小修院，1969-73年為香港仔聖神

修，完成了社會學的學位課程及研究院課程。經歷近八年的海外半讀書半傳教的生涯後，尹神父於 1979 年回港，初期在堂區服務，直至胡振中樞機委派他第二次執掌教區周報。這次的委派完成後，與加拿大華人堂區已結下深深緣份的尹神父，在 1996 年再赴當地傳教，並於 1998-2005 年擔任中華天主堂的本堂，在五年後的 2010 年回港。

修院院長。他於 1971 年獲任命為輔理主教，1974 年 4 月就任香港教區主教，但於三個月後心臟病發去世。參〈李宏基主教〉，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https://bit.ly/3fYmvDr>>，[25-2-2021]。

姚崇傑神父

- 1957 進入薄扶林聖神小修院
- 1958 入讀華南總修院
- 1965 晉鐸



在泰國出生的姚崇傑神父，父母是泰國華僑，三代奉教，因為是家中長子，父親在他六歲那年，安排他隨大伯回潮州家鄉照顧祖母。

高中三年級時〔1953〕，內地正處於土地改革的時期，看到聖堂被佔，教會不自由，如果有教友需要神父，但又沒有神父那怎麼辦？這樣使我思考去做神父。湊巧鄒德鄰神父問我想不想做神父，就這樣便慢慢地培育起來。

姚神父在 1956 年到達香港，首先找的人是當時汕頭教區在香港的負責人李若安神父，住在何文田恩理覺主教小堂受李神父的教導，翌年才進入薄扶林的聖神小修院。

李神父非常嚴格，但非常關心群眾。生活作息非常有秩序，十年如一日。

我在小修院只有一年時間。上午上課，下午也上課，之後是運動，然後每個星期一次外出行山。每天五點半便起床，然後去聖堂，早上七時多便去吃早餐。九時便去上課至十二時；下午再上課到差不多三、四時，就會打籃球做運動一個小時左右，之後便去洗澡，然後入聖堂祈禱，晚飯，之後便自修，十時之前便休息。

小修院是初中到高中，最少六年。但我只在那裡一年，因為我在內地家鄉已完成高中，並已進修院兩年，所以主要是讀拉丁文，再加讀道理，然後便到華南總修院。其他的修生是中學課程加上一年的拉丁文，他們都要去會考。

僅僅一年的時間，姚神父就從小修院轉到華南總修院：

到總修院這裡就是學習神哲學、做神父的事。那時有大陸走出來的很多教區修士和主徒會會士，以及後來從台灣來總修院就讀的耀漢兄弟會會士。

華南總修院是為廣東、廣西、福建一帶，並不只是為廣東服務。我小修生之時算是代培，但到了華南總修院便算是正式了，是屬於汕頭這個教區。

在 1958 年那時有七十多個修生。同學之間關係沒說不好的，與自己合得來的便多聊一些。當時的風氣很好的，晚飯後便兩個兩個，如某人想去台灣或者哪裡，要學那裡的方言，例如要學客家話，便找人去教。又如第一年我的拉丁文不成，所以我就找當時大陸出來的教我拉丁。每晚吃完飯都是這樣。

說到學習拉丁文，每位有心想當神父的也不敢馬虎應付。拉丁文是斷定他們有否聖召的一科！

那時上課要抄的，便照著抄。老師不會用中文再解釋一遍，說真的，是捱過來的。看書有懂的，也有不懂的。第一個學期真的想離開，真的「讀到喊」。當時真的想走。為我是整天要查字典，一有空便看書和查字典。第一學期考試，我只照書本背。教授問我問題，我便背出來。然後，他叫停我，再問我很多問題。我當時真的不知道他問甚麼！他問完之後，我便繼續背下去。第一學期便是這樣過了。他給我六十分及格。

我有跟神師說。他又解決不到我的難題，只有慢慢捱落去。捱落去的動力是想起我在汕頭教區同屆十多個同學，只有我和另一個走了出來。其他的坐了牢或者有其他的狀況，一想到這裡，就鼓勵了我要捱下去，因為他們想做神父也做不了。我感到辛苦時便到聖堂念經、祈禱，哭一下，然後便重新來過。

第二學期就好了，慢慢聽得懂。我在家鄉讀書是中文底子，所以學得比較困難。修生中有懂英文的，相對是比較輕鬆，學得快一點。

學這個語言，我們上課教甚麼都要用它。禮儀各樣都要用到它。以後去羅馬的時候學意大利話也會容易一點。這是幫助學其他的語言。我有一個暑假去法國一個月。過了幾個月我可以寫一些簡單的短文。那個修女也很驚訝。我說我是用拉丁文來翻譯法文，就是差不多。

在哲學班及神學班時期，姚神父都有機會參與修院一年一度的辯論大會。拉丁文出色的同學，會被挑選出賽，因此可見姚神父在拉丁文下的苦功終於見到成效！

我在修院六年，培育者全部都是耶穌會的外籍神父。耶穌會是中國人的只有一個，他是從北方來的。我們接觸比較少，因為他要照顧北方來的同學，他們都是說普通話。南方就沒有這樣的照顧者。總修院的修生來自不同的教區，所以自己教區的修生會比較親近一些，其他就不太熟。

以前一個神父「一脚踢」，跟現在大不同，一個教倫理，一個教《聖經》，一個教哲學。我們也有讀中國哲學，是一位老先生教的。

修院的教授和學生地位是不同的，不會打成一片，教授住在修院的中間部分，而修生是住在兩邊。修生不能去教授的地方，教授也不會過去修生的地方。而且哲學生在一邊，神學生是在另一邊。因為有細班大班的分別，兩者也不去對方的一邊。哲學生不能去神學生那邊，神學生也不能去哲學生那邊。另有學長制，有一個學長在這裡就像班長一樣。

我們在修院讀書守規矩，不會外出。神師會問讀書有沒有甚麼問題，又或者有沒有吃得好，睡不睡得好。你說多少他們便聽多少。

神師的角色是陪伴者，聆聽修生各種經歷和感受，帶領他們在修道中與天主的關係更加密切。姚神父回想初到華南總修院的時候，卻和神師有一段不愉快的片段：

我進來的時候已廿多歲。那時由鄉下出來，共產黨來就很慌張，有很多困難，沒有信心。人們與我聊天，我也不知道要怎樣了，胡思亂想很多事，又不知道人家會不會接納我。我把這些困難告訴神師，他聽完我第一句話便問我：「你今年幾歲了？」我回答廿多歲，他便沒有再接下去。後來我想，他認為我已那麼大了，還那麼孩子氣，不應該是這樣的。之後我甚麼也不跟他說，感覺是他傷害了我。

這種受傷害的感覺打擊了姚神父的信心，他坦言要待離開了修院後，通過多年的種種經歷才能肯定自己的價值！

修院的生活並不開放，不能隨意和外界接觸，甚至是自己的親人也是遙不可及：

入了華南總修院之後，與家人的聯繫是很少的，一年才有三天回家，在聖誕節和農曆新年。暑假是一個月，回去時與神父一起住在聖堂。我暑假和新年都在香港，不能回鄉。祖母還在，但見不到。父母更沒有機會見到。我們去堂區住，或者有時我們全部去長洲，去思維靜院

一個月，意思是耶穌會的修生就會來我們這裡，交換一下，純粹換環境住而已。

在修院生活了六年的姚神父，對探訪漁民和為漁民子弟服務印象深刻：

修院的山下面，以前是海來的，現在已經填了。香港仔是一條小鄉村，中間有一條大街貫通，有一所警署；臨海許多漁船停泊，漁戶約千家。

教會在南區的救濟站設於田灣、聖伯多祿堂及聖神修院。聖神修院亦伸手援手，救濟工作方面由外籍神長聯絡美國天主教福利會索取救援物資，如白米、麵粉和奶粉等。

我神學第一、二年〔1961、62年〕，定時有小朋友上來，我們就去幫手。每天四點鐘我們下課，下面的小朋友便上來，我們把吃剩的麵包，和開一些奶粉派給他們。吃完後，他們就一班一班，坐在〔修院主樓後方〕我們叫「街邊巷」地方上課。一年中的聖誕或大節日便帶這些學生外出遠足。

我說潮州話，所以便負責鶴佬話的一群。星期四下午沒有課便下山。我是一條船過一條船去探訪的，看他們有甚麼需要。他們需要甚麼便上山來拿，很好的。他們從大陸偷渡來甚麼都沒有。買一隻舢板給他們，可以住人的。這些都由美國神父負責，也有些教友捐錢，透過我們下去的時候，為他們寫小紙條，還派奶粉等的東西，然後登記，跟神父說要怎樣幫他們，需要多少錢。這個工作很有意思。

過程中，修士認識一些初中學生，把他們訓練起來，充當風紀，維持秩序。那些學生中有學業優異者，均獲修會經濟資助，繼續升學。

在這些上課或探訪中，修生也把握機會教人們有關天主的道理：

有漁民因我們探訪而信教，但不是太多。大人想學道理，我們就下山去艇上教，而小朋友則上來，我們在這裡教他們。當時人們純品一些，我們說甚麼他們就相信了。

姚神父第五年的時候，要考慮自己升神父的事，因為暫時不能回內地，就要另謀出路：

那時有一位就讀總修院的修士，後來加入耀漢兄弟會。晉鐸後，被派往越南一間由他們開辦的中學，擔任校長一職。他認識當時西貢教區華人堂區一個中國籍本堂神父，想找人幫手，便介紹我到那邊去。

華南總修院在 1964 年移交了香港教區運用，改為聖神修院，我剛好讀完神三。總修院是讀七年的，不過我在第六年結束便離開了。之後我便去越南，想在當地完成最後一年神學，在那裡升神父。

以前寧夏一個主教曾在中國服務，政局令他來香港，羅馬便委任他負責全球華人。他是比利時人王守禮主教⁴²。當時有很多人離開了大陸，到了香港，如果神父有地方去便去，如果沒有便可請他幫忙。那時，升完神父的一批一批便去海外。全部都可以去海外，台灣、南洋、馬來西亞、南美等有華人的地方。

就這樣，姚神父和眾多不能回內地的神父、修士一樣，嘗試前往海外，服務不同的教區。

耶穌會在越南那裡開了一間新的總修院。但還沒有神學第四年。本來要轉去西貢，卻要用越南話上課。因為本堂神父是從羅馬考得神學博士學位，所以西貢教區主教請他教我剩下未讀的神學課程。一年後即 1965 年我便祝聖為神父。晉鐸後，因政局不穩便往羅馬讀書。

65 年剛好是梵二結束，確實很不同，但衝擊還未算大。因為還只是剛剛開始，受衝擊的是上層那些學者教授。我們修生還未衝擊到。神學家有些說的不同。我剛剛去的時候是 65 年，我們還是用拉丁文上堂的。到 68 年我去耶穌會另一間大學額我略大學修讀另一課程。我們那班上課，要說什麼語言？意大利文嗎？那大家就舉手，大部分都要說拉丁文，反而是不懂意大利文。

大陸出來的修生，因為未能與本教區保持密切聯繫，所以在羅馬之時，有很大的自由度。

⁴² 王守禮主教 (Bishop Charles Joseph van Melckebeke, 1898-1980)，出生於比利時，加入聖母聖心會後於二十四歲晉鐸並到中國傳教。1946 年獲任命為寧夏宗座代牧（後升格為主教）。他於五十年代初被拘留在大陸，獲釋並被逐離大陸後擔任教廷華僑教務視察員，負責華人神父的調配，直至 1977 年退休。

我在傳信大學之時讀法律，教會法。在額我略讀靈修，靈修神學。我自己選的，比較接近我個性，法律不是那麼喜歡。

那時剛剛出來，大陸教會也很亂，你喜歡便讓你讀。主教在大陸，他們又不能出來。我們暑假，主教也顧不上，有神父在這裡打理。那時也不知道甚麼時候能回國，完全沒有計劃，就是回來再說。現在從大陸派出去的，都會考慮過將來回去會教書還是做甚麼工作。我們那時是剛剛出來，總之就是先讀了再說。

本來想在越南那裡傳教，幫助越南華僑。但那裡的局勢又不好。1970年再回來香港。

姚神父因越南政局不穩，到了羅馬完成教會法和靈修神學的學位後，經香港和越南教區的協商，最後加入香港教區服務。那段時間，剛好正舉行令教會受到最大衝擊的梵二會議。

這裡要指出，由於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華南總修院畢業的新晉鐸神父，或從海外剛來香港的其他教區年青司鐸，都不知自己的正確身分，出現了一種比較特殊的情況，拉丁文稱為 *quasi incardinatio*。姚崇傑神父在1970年從羅馬來到香港，由於本身不是香港教區成員，於是申請 *quasi incardinatio*，意思就是「等同於在當地服務」的神父。不過，由於徐誠斌主教邀請他正式加入香港教區，當時意大利籍秘書長潘崇理神父給姚神父覆信說，他在香港教區是正式的 *incardinatio* 了。⁴³

⁴³ 林瑞琪訪問姚崇傑神父，2004年7月20日。

從小修院直奔羅馬聖城

在五十年代後期，為了因應聖召和培育的需要和變化，主教在這段時期作出了權宜的改變，因此部分修生的修道歷程與前人不盡相同，與後來者也有分別。例如余福綿神父、夏其龍神父和關俊棠神父，原本該進入華南總修院，但在完成小修院課程後，卻被直接派往羅馬攻讀神哲學。據二十年來首位獲此安排的余神父指出，三年哲學縮短至兩年的做法，是因為當時聖召不多，他又年紀偏大。鑑於拉丁文仍是做神父必須學習的語言，大修院對哲學師資又有規定，只好安排他到小修院接受拉丁文和哲學的教育。這批神父從比大修院更為嚴格的小修院環境，直接面對羅馬國際性的培育衝擊，回頭看修道經歷，另有一番見解。

余福錦神父

- 1959 進入薄扶林聖神小修院
- 1961 留學羅馬攻讀神哲學及深造神修學
- 1968 晉鐸



出生於外教家庭的余福綿神父，曾經歷戰爭，四歲逃難到內地，十二歲才回到香港。他在十九歲才領洗，視此為生命中第一個召叫。

我在 1959 年廿一歲時萌發當神父的念頭，我視為第二個召叫。當時我已讀完中學，還工作過。我在翌年進入薄扶林聖神小修院。

聖神小修院搬了去薄扶林的太古樓，修院有兩層樓，一層全部是睡房，一人一張床，一個茶几。另一層是自修室，一人一張枱，年紀輕的在前面，我們年紀大的在後面。我這些「小修院的大修生」叫做特別班，攻讀拉丁文及《聖經》。除了《聖經》課，不會與其他修生一起上課的。

小修院中的大修生是怎麼的一回事？

我那個時候其實不是有很多聖召，白主教就想我這麼大年紀的修生不用讀三年哲學，轉為讀兩年。

如果是兩年，就要有學位的人才可以教的，當時管理小修院的 PIME（宗座外方傳教會）神父，他們是傳教的，並不是專門教書的，其中覺法治神父⁴⁴的哲學了得，但是沒學位，每年要向羅馬申請特准他去教，他在小修院教兩年哲學。

耶穌會負責的華南總修院是大修院，哲學需要讀三年，所以便想在小修院讀哲學，之後才去大修院讀神學，這樣讀兩年哲學，就省了一年的時間，就快一點升神父。

⁴⁴ 覺法治神父（Fr. Fernando Galbiati, PIME, 1932-2017）是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1956 晉鐸，翌年來港，於 1960-61 年在薄扶林小修院任教哲學。覺神父生前也曾服務香港多個堂區。見〈覺法治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https://bit.ly/3zFjvTA>〉，[1-4-2021]。

小修院的生活是怎樣的？

我初到埗時很模糊的，甚麼也不知道，連彌撒也不懂。是學長在籃球架下教我輔彌撒。小修院過著團體的生活，有院長、副院長、神師、教授四個神父，除一般中學的科目，要讀《聖經》。小修院畢業，拉丁文及格才可以到大修院，因為讀哲學、神學時要用上，課本也是拉丁的。

小修院過的都是有規律、紀律的生活。起床的時候，學長的鬧鐘一響，說一句拉丁文，像「讚美天主」，全部人念一句經回應，就要立即跪下，不能懶床不起，好像軍訓一樣，然後就去刷牙、換衫、洗面，到聖堂參與彌撒，念早課。直到現在，起床習慣就是修院的訓練。

在小修院裡，學習拉丁文至為重要：

以前有「無拉丁無聖召」這句說話，所以說英文再好也沒用，拉丁不及格便完蛋，很多修生讀不上拉丁，便離開了修院。

小修院有中、英班，我是英文班的。一般都是九月入修院，而只得我一個是五月入的，而且我在外面已經讀了一個階段的拉丁文，有了基礎，只是繼續讀下去，所以由院長教我一個。

剛進修院不久，這種一對一的教學為余神父來說是苦不堪言：

當時院長是站著教我的，而我是穿著涼鞋坐著，他有十條問題就會問十條問題，有二十條問題就問足二十條，讀得我好辛苦，要哭一樣。如果我不懂回答問題，他就拍枱、踏我的腳。

院長看到我讀拉丁文讀得不好不開心，我曾在他面前哭說：「我那麼辛苦，放棄工作來到修院。」他就給我鼓勵，“courage, Edward, courage!”，亦不再拍枱，我就盡力去做到。

修生對老師十分尊重，院長每個月都跟修生見面，檢視他們要改善的地方。如果去的話，不會有甚麼的。但不去的話，就會是大件事，他會告訴你有甚麼缺點，改正的話，就不會懲罰。其實這些舉措都是幫我們的。

我記得對我有一個評語，就是做事之前一定要執清枱面才開始工作。這是我的性格，都算是讚賞。

小修生甚少可以和家人聯繫，竟然引發偷偷探訪的事件：

小修院一個月有一天可以回家，星期六去，星期日返回修院。一般星期六下午家人可以去修院探望。有些人會拿湯去的。與家人的見面不多，我是修院中的大哥哥，妹妹會來探我。因為不是常常可以見面，更加珍惜大家。

那時有些同學的弟妹年紀小小，穿著睡衣走到修院，瞞著家裡的人，以為他們只是「落街」⁴⁵，原來是不捨得哥哥，偷偷去老遠的薄扶林看他。

經過兩年拉丁文的學習，余神父獲得一個意想不到的機會。

教區收到羅馬通知，給予兩個到羅馬攻讀神哲學的名額。一個從中文班挑選，一個從英文班。我剛剛完成了拉丁文的階段，在小修院再修讀兩年哲學，就會到大修院。

余神父最後獲揀選派往羅馬讀書：

我沒有想過去羅馬的，在我之前教區已二十年沒有派修生去過，過往有在羅馬那邊死了，也有返到香港不久死了。⁴⁶ 已故胡振中樞機及三藩市總教區榮休汪中璋主教都是在華南總修院畢業後到羅馬進修的。

中文班選出的修生最終沒升神父，因此我算是第一個由白英奇主教派去羅馬的神父。在香港考完拉丁文及格，院長就公布去羅馬的人選。

我是留學羅馬修讀神哲學的第一批修生，第二批是康建璋神父，第三批是關俊棠神父和夏其龍神父，其後還有修生留學羅馬的，他們多是在香港修畢哲學課程之後，才到羅馬攻讀神學。

到羅馬讀書，三年就有哲學碩士，再四年就有神學碩士，去大修院就沒有學位的。要待後來我們從羅馬回來之後才向羅馬申請。

以往讀修院都是三年哲學、四年神學，但沒有甚麼證書的。

⁴⁵ 粵語「落街」一般指外出到離家不遠的地方。

⁴⁶ 聖母無原罪修院（1888-1946），在華南總修院啟用之前，肩負小修院及大修院的功能。不過，由於本港師資有限，修生自小修院畢業後，很多都會送到澳門或檳城的大修院，有少數則被送往羅馬或那不勒斯。由此可見早期都有少數修生前往羅馬讀書。參聖神修院網頁，<<http://hss.org.hk/history.html>>，[11-2-2021]。

原來華南總修院從不向畢業生頒發學位，甚至連文憑也沒有。即使到了後期，聖神修院頒發文憑，對畢業神父仍產生一定的不便，因為香港政府不承認修院的資格，使他們在外間進修出現困難。

余神父於二十四歲前赴羅馬，在宗座傳信大學攻讀哲學及神學。

在羅馬，上課要說意大利文，公眾場合要講意大利文，在飯廳也要說意大利話。在香港的時候，院長沒有教我意大利文，只說沒問題的，會懂的。這是比較辛苦的。當時我口袋常常帶著一本字典，只好像小朋友一樣跟著。你懂拉丁文的話，就會對意大利文容易理解一些。

自己國家的語言，要星期天才可以說。中國同學、泰國同學、日本同學、澳洲同學可以自己「埋堆」⁴⁷。

星期日有大禮彌撒，修生可自由外出。大家便去趁墟，去一些攤檔，買一些便宜的東西。修生星期四才能允許到百貨公司，不需要問准的，所以整間百貨公司你都看到很多身穿黑色紅色袍的修生，買雞、買酒返到修院偷偷地煮。

在羅馬外出需穿著的制服，由米高安哲羅 Michelangelo 設計的，前面有五粒斜排的鈕是代表五大洲，企領位有三粒鈕代表信、望、愛三德，左右手袖五粒鈕，代表十誡。還有披肩兩條穗一條是聽命於教宗，一條是聽命於主教。

余神父認為在外國修院讀書時，視野擴闊了很多：

修生要和不同國籍、不同文化的人相處。人生觀擴闊了。這是書本學習不到的。我曾經和一個印度籍的修生坐火車去旅行，在旅途中反被其他旅客問我們的兩個國家差不多要用武，但我們還是那麼「老友」。我答因為有信仰，國家對立，不影響個人之間的友誼，因為包融其他人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對問者做了福傳。

除了專注學業，余神父在神學時期更擔任禮節司（禮儀協調員）：

我在神一的時候，修院副院長欽點了我當禮節司，專門負責彌撒的禮儀，這個位置要做三年的，由位置三，逐年升上位置二和位置一。神學第四年做「太上皇」。

⁴⁷ 聚在一起的意思。

我被點中是很開心的，全個修院的人都要聽你說話，連樞機都要聽我的。我們不能叫樞機做綵排，所以到做禮儀的時候，拿著禮儀書叫樞機怎樣做，有時說到一半他會叫我們慢慢由頭講。樞機很謙虛的，當時我們還是修生，未升神父，樞機最高級。我的印象是越高級越謙遜。

以往禮儀三個頭目，MC〔領經〕、choirmaster〔歌詠團指揮〕和禮節司常常有爭執。我做禮節司很隨和的，我那一屆從來未試過有爭執，個個都服我的，尊重我，高我一班的都是我教他們的彌撒。

余神父修畢哲學，到神學時期經歷剪髮禮、一至六品，1968年在羅馬祝聖為神父。後來還多留一年，修讀神修學文憑課程。他在羅馬一共生活了八年，才回香港開展其數十年堂區及修院的職務。

夏其龍神父

1959 入讀薄扶林聖神小修院
1963 到羅馬攻讀神哲學
1970 晉鐸



夏其龍神父的父母本身是香港人，又是公教家庭，因為避開戰亂，去了印度洋島國毛里裘斯。夏神父是在那邊出生和領洗。

我 1943 年出生，四歲就返回香港，在香港讀小學。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夏神父隨家人回港。修道的念頭在他初中的時候出現。

我當時覺得做人要有理想，不想渾渾噩噩。我的年代，十四歲已經很會思想。

我知道修道是要獨身的。生活簡單，盡量減低對生活的要求。能夠簡樸而得到自由。如果要求越多就只有束縛。你想自由就要放棄，我當然覺得這是對的，所以就這樣做了。

我是高一〔中四〕的時候入修院的。我的家人原本希望我完成中學才入。我的本堂黃景賢神父⁴⁸ 著我儘早入修院，可能他認為我畢業後家人不會讓我入，所以在中學中段入修院。

夏神父回想進薄扶林聖神小修院的情境：

入修院有出家的概念。修院列明入修院時，不能帶東西進去。我只帶了一個藤籃書包，坐在本堂神父的「綿羊仔」⁴⁹ 後座，從元朗去薄扶林，就這樣入修院。入修院是甚麼都要放棄。

家人一個月只有數小時來修院探望。修生時期很少和家人相聚，差不多沒有了與家人的關係。暑假說是會回家的，不過實際上是要去堂區住，所以也不是回家。

⁴⁸ 黃景賢神父（1919-1971），於 1946 年在香港晉鐸，曾於 1949-53 年在西貢聖神小修院工作，及 1952-62 年擔任元朗聖伯多祿聖保祿堂的本堂神父。〈黃景賢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https://bit.ly/33PHGAW>〉，[17-3-2021]。

⁴⁹ 馬力較小的電單車的俗稱，容易穿梭橫街窄巷。

修院紀律性的生活，為年輕人來說是一種挑戰。就算是懂事的孩子都會有不適應的事。

和夏神父同一屆的同學有三位，包括關俊棠神父和徐錦堯神父。

修院的時間表很嚴謹，每樣事情都規定了，不可以選擇，一定要參與。除了上課，還有靈修、每天彌撒和念經，每個月有避靜，每日的院務，每星期有行山。全部都要跟著去做。

修院重視修士對每個人的友誼，卻不鼓勵特別要好的朋友。

很清楚表明修生之間可以傾談，但不能常常是同一個人。這種情況稱為「私交」，就算同學之間，也不能時常特定與某一位傾談和走在一起。

傾談的時候，不能兩個人，是要三個人，但又不能時常是那三個。當時大家都沒有反抗，因為這是規則，能遵守便留下，守不到就離開。因此有很多人離開。跟我一起讀書的有十二人，最後只剩我一個。

我們修生之間都顧忌建立一些親密的關係，大家都不是朋友，只是同學或同道。當時的神父訓練是這樣的，相當絕情。

現藏於聖神修院的《香港聖母無原罪小修院院規》，對於私交有詳細的敘述，院規以中文及拉丁文撰寫，於1935年1月印刷：

第四章持己及待同學

(七) 私交私好均需戒絕。因大有害於靈魂也。固修生對於同學。不得有私交情事。為此嚴禁互相撫摩。或三二人離群細語於暗處。萬一有犯此規。已經告誡。尚不知悔改者。應逐出修院。

由此可見小修生在社交方面備受限制！

此外，小修院雖然有圖書館，但館內有些藏書是修生不能看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雷鳴遠神父⁵⁰，現在我們都敬仰他，當年小修院圖書館的《雷鳴遠傳》是不能借出閱讀。

⁵⁰ 雷鳴遠神父 (Fr. Vincent Lebbe, 1877-1940)，生於比利時，法國遣使會士，1901年來華傳教，曾任中華公教進行社監督，創辦面向社會的《益世報》。他熱愛中國，其後更入籍中國天津，又創辦耀漢小兄弟會及德來小姊妹會。

沒有人解釋為甚麼不能看。我後來知道，雷鳴遠神父很反叛的，與他修會的法國籍主教發生衝突，反對侵佔中國人的權利。他反抗主教，所以修院很有可能不想我們培育出反抗主教的叛逆精神。

修院的生活嚴謹，當時的小修院培育的目標是怎樣的？

服從、聽命和健康的神父。如果多病和不健康就要離開。例如跟我一起讀書的十二人中，有十個人走，當中是因為身體問題、不夠聰敏或其他的原因是不清楚的。他們是突然間離開的。

我在修院讀了三年高中，在香港多留了一年讀拉丁文，其他同學是初中一的時候開始讀，我高一才讀，所以用一年去補回他們之前學習的時間。

夏神父修道的時候，雖然華南總修院仍然運作，他卻並沒有在總修院接受培育，而是在 1963 年和關俊棠神父直接出國到羅馬攻讀神哲學。事實上，各地教區或修院的培育方針都是一樣的，但方式經常有變化，尤其在香港政治動盪的五六十年代。

羅馬的修院生活不再一樣，教學經驗也截然不同：教授都是外籍，很國際化！

香港的小修院很嚴謹。全部人都睡在一間大房中，甚麼都是公開的。若升上香港的大修院，其實已經寬鬆了很多，而且多一些私穩，多些自由。羅馬更甚，有自己的房間，返大學上課，相當自由。

雖然少了很多小修院的規限，不過外出都是規定最少三個人，並且要穿禮服，禮帽。

我是接受梵二改變的教育，我覺得是進步的，開放的，為教會是正確的路向，我自己是完全接受的。縱然梵二給教會很大的衝擊，但也給教會增加了很多活力。

回想當時羅馬是國際化的地方，有數十個國家的修生一起，但夏神父感到可惜是：

長上和教授只記掛培訓我們在教會中做一個神職人員，卻沒有看到我們是一個國際性的公民，教會在國際社會內的一種力量，完全沒有盡早把我們的眼光擴闊，跨越宗教、跨越文化，然後有國際的聯繫。如有這種聯繫，至少思想上可以再開放多一些。

夏神父在羅馬修讀了七年的神哲學課程，於 1970 年回到香港晉鐸，卻並不急於在堂區服務：

我自己向徐誠斌主教請求，要自己維持生活，用自己的方法為教會工作。適逢當時教會有工人司鐸運動，有感當時神父有時會被捧上「雲端」，備受教友的崇拜，這並不符合我為人服務的理想。徐主教最終答允，讓我賺取自己的生活，當時我搬到板間房生活，每周一晚「揸的士」，其他時間則服務教會團體，這生活維持了三年多。

期後，我回到教會的文化機關工作，能夠與社會保持多一些關係，堂區雖然也和社會有關，不過服務堂區只會越來越記掛堂區的事。

夏神父先後為《公教報》、香港教區社會傳播處和檔案處，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服務。他苦學多年的拉丁文也沒有浪費，到現在仍然開班教學。

關俊棠神父

- 1957 進入薄扶林聖神小修院
- 1963 留學羅馬
- 1970 晉鐸



關 俊棠神父回想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每天大清早總會跑到老遠新成立的小堂，並做了兩年輔祭。

神父當然很欣賞我，便勸我媽媽給我入修院。媽媽因為害怕沒能力供我讀中學，所以都很願意。我小學讀的是德信學校，周末就會去慈幼會的慶禮院玩整個下午。那裡的伊思高神父⁵¹，他對我很好的，還帶我去慈幼會備修院參觀……最後媽媽帶我到薄扶林參觀教區的小修院。哇！修院向山面海，一片綠油油，空氣又好，窗又大，我很喜歡的。那時我說好啊，便入了。

關神父在小修院修讀期間，經歷三任院長，包括孟德道神父 (Fr. Pietro Bonaldo)⁵²，艾巧智神父 (Fr. Secondo Einaudi)⁵³ 和唐多明神父 (Fr. Domenico Bazzo)。

可能那個年代入修院是要刻苦耐勞，是在受訓練，受訓練就是這樣，有些修會也是這樣，你是修生的時候，伙食與神父是兩回事來的。

我在修院是挺用功的，經常看《聖人傳記》，圖書館裡的《聖人傳記》我差不多都全看過，那年代寫的聖人每一位都是刻苦耐勞，不苟言笑，說話講得多很容易說錯話，所以盡量不說話，要虛心、聽教聽話、要刻苦。我把這些書全看遍，入了腦。

⁵¹ 伊思高神父 (Fr. Bruno Gelosa, SDB, 1914-2005) 是意大利慈幼會士，1956-59 年曾於鄧鏡波學校擔任宗教教育主任一職。見 Salesian 1967，<<https://bit.ly/2SLITXV>>，[15-2-2021]。

⁵² 孟德道神父 (Fr. Pietro Bonaldo, PIME, 1915-1973)，1926 年加入宗座外方傳教會，1937 年晉鐸，1953 年來港即任其修會在長洲的上智之座語言學院院長，1956 年擔任小修院院長，翌年回國任省會長一職。參〈孟德道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https://bit.ly/3CFHCUH>>，[31-3-2021]。

⁵³ 艾巧智神父 (Fr. Secondo Einaudi, PIME, 1926-2003)，1952 年在米蘭晉鐸，兩年後赴港服務，1959-62 年曾任薄扶林聖神小修院院長，六十至八十年代身居教區要職，於 1970-85 年獲委為副主教。參〈艾巧智神父 (安納德)〉，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http://bitly.ws/dJUm>>，[31-3-2021]。

但那時我看聖書太多了，想做聖人，所以就算新院長孟神父知道我們很多修生因為年輕，吃得不好對身體也不是好事，就把伙食變好，但我也沒因此狂食，沒有讓自己放縱，變相錯過了第二期發育，所以一直很瘦的。

關神父認為他今年（2021年）七十七歲，還能走、能跑、能跳、能蹲下站起，皆因小修生那些年天天做運動，每周兩次行山鍛鍊出來的成果。

還有洗冷水澡，冬天也如是！直至有一個大哥哥修生，他在外面工作過才入修院的，不像我們這些讀中學課程，他只讀拉丁文的。他受不住洗冷水澡，有一次他想跳熱身子才洗，撞到水龍頭流血，院長才改讓修生洗熱水澡。我入修院最初數年都是洗冷水澡的。那時冬天比現在冷得多了！

小修院有一個規矩，關神父認為是令一些守規矩的同學，變相被孤立起來。

小修生大概有三十多至四十多個。初中一到高中三都有，然後有三四個是大哥哥。那個年代很好玩的，大家都是男生，吃過飯就在操場散步、聊天，三五成群，院長與副院長都一起來，是為了盯住我們。那時有一項規矩，我們不能時常都與同一批同學聊天，這種 particular friendship [私交] 是不行的。我們做神父要愛世上所有的人，加上我們獨身，所以觀念上是我們應該對人人都好，人人都一視同仁，不應該有特別的友情。這其實是一種不健康的發展。

如果你今天吃完飯跟幾個同學一起，昨天已是這幾個，今天又是這樣，如果明天還是這樣，院長便會向你問話：「為甚麼你老是與這幾個同學一起，為甚麼聊天不與其他同學聊？」就是這樣。

青少年成長有很多掙扎，情緒、感情甚至是性的掙扎，是可以跟神師談，但神師是外國人，年紀與我們相隔那麼遠，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否理解我們，變相很多事「屈」⁵⁴ 在心中。

我上一級有一班同學，可能對院長有些不滿，平常不能說出來，跟神師談又害怕會被洩露。怎知他們五六個同學有一個晚上，在十時睡覺時間後，偷偷上了天台傾談分享。怎知道因為太靜，天台下面就是院長房間，聽到他們談話。第二天就發生大事，這些修生要明供聖體，

54 「屈」，憋在心裡，粵語指埋藏的意思。

一起做贖罪。之後，院長出來跟我們說：「你們要知道，你們生活是很多教友辛勞的捐獻，如果你們不乖、不守規矩是對不起他們，你們就好像賊一樣偷他們的錢，你們每天偷少少，經常這樣做就變成大罪。」因為他知道有班同學做得很錯。那年暑假之後，這幾個同學就沒回來了，應該趕走了，所以在小修院裡面，我覺得最大的遺憾是冷，沒有親情。

小修院只有規矩，守規則就是乖，所以我想那時最先可以到羅馬讀書的六個修生，都是因為我們乖。我們讀書成績不錯，又守規則，就是乖，所以就能去羅馬。余福綿、陳振威、康建璋、夏其龍和我，還有盧錫興，不過他在羅馬讀到執事時就離開了修院。

關神父回看神父的發展，不論是本地的，外籍的神父也是，他們以前都是勤力、吃得苦、很能幹，但人情味不太足夠，這種氛圍在小修院比較缺乏。

小修院見到的那些神父，都是比較欠缺人情味，還有對情感的處理，比較 rigid [死板] 一些，修院是很保護式的。對修生而言，怕他們被誘惑，例如說與異性的相處。

那時暑假前，神師會對修生訓話：「你們暑假在外面是高危的，有很多誘惑，自己要留心。你們最好多留在聖堂幫手。如果你們去游泳要小心，因為沙灘裡面有很多『鯊魚』與『鱷魚』。」其實他在說女生。那我們說怎麼辦？他說去游泳也可以，但最好請本堂神父一起去。又或者去那些沒甚麼人的沙灘，連浮台都沒有的。

關神父認為小修生正值他們最需要親情、友情的時期，卻在修院中缺少了，是很可惜的事。

你可以想像那個年代，性教育是很缺乏的。

小修院每個月都有個死亡練習，經常提醒我們「萬民四末」，即人類最後的四件事：死亡、審判、天堂、地獄，所以要時常準備。當時有一個情況，就是男生發育時期很容易會有自慰的習慣，這也是生理上的需要，但修生超級害怕的，因為自慰是大罪，足以落地獄的。

如果現在死了要下地獄，就會去找神師告解。但又害怕神師覺得這修生整天辦告解都是這些事，肯定是沒聖召，要趕出修院。

關神父對小修院的這些片段印象深刻，並認為影響他日後的成長，要花上十數年的時間慢慢整合年青時不同階段的缺失。

那麼六年來在小修院得到甚麼訓練呢？

每天都有彌撒、早課、晚課，這些訓練至少令我們有個底子，就算每天早上彌撒前，神師帶修生做默想，大部分同學都是在「釣魚」⁵⁵，但釣了六年還是有一個底子。這些是非寄宿不可的。

小修院幸運地有很好的老師。那時從大陸逃難過來的是國民黨時代很資深的老師來的，有些是很高級的官員來教我們，所以他們「很有料」⁵⁶的，很好的，讀中學的時候也很不錯，這是基礎。

另外吃得苦、能捱、勤力、還有紀律，這些無可否認是那時學到的，我們那時洗衣、熨衫、漿衫、補衫、補襪都是自己學的。

不過做學問的同時也有規限的：

我在小修院的時期，1957至1963年，那段時期整個香港都是反共的，很強烈的。我初中三懂得看簡體字，那時一放假就去彌敦道中華書局打書釘，就這樣看懂簡體字的。有一次，我買了魯迅的《吶喊》和《徬徨》，帶回了小修院，做完功課自己看，給副院長沒收了。他說：「你竟敢看這樣的書？」⁵⁷

修院的圖書館上面有一格是禁書，被鎖上的。例如《風蕭蕭》、《紅樓夢》這些作品，可能認為看這些書會令修生胡思亂想。可能是讓教書的老師去看。

小修院都學到很多東西。但有一點很怪的，他們說你要做神父一定要學懂音樂，我是choir〔歌詠團〕的，也是能唱歌的，但我興趣不是唱歌，而是畫畫。我記得我完成功課後想要畫畫，都會給副院長沒收的：畫畫浪費時間！

⁵⁵ 打瞌睡。

⁵⁶ 粵語「有料」是指有學問和懂很多事物。

⁵⁷ 自五十年代初，香港成為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左派和支持中國國民黨的右派持續鬥爭的地方。1956年發生「雙十暴動」，三百多人死傷。此外，滲透香港的共產黨分子試圖清除在香港的國民黨勢力及企圖激起反英情緒，所以香港政府對共產黨的活動嚴加提防。維基百科，<<https://bit.ly/3y5QSPG>>，[20-2-2021]。

至於為甚麼可以去羅馬讀書呢？

完成小修院後，因為成績佳，很乖巧，所以被揀選去羅馬留學。我有儲起小修院每一年的成績表。我記得高中三那年，我很勤力，成績很好，品行是一百分。

我去羅馬之前三年開始，白英奇主教有遠見，開始想栽培本地的教區神父。

以往教區的中國人神父，是被人看不起的，外國神父和修會神父認為這些神父只是打理聖堂、做聖事而已，不用太多學問，懂一些拉丁文就可以了。

我想在傳教區試過一段很長時間，凡是外來傳教的，然後栽培出來的神職人員，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尤其在梵二之前，多數被認為在能力上是低一等的。梵二前中國神父是做不到本堂的，頂多做副本堂。麥耀初神父、劉蘊遜神父等幾位已去世的神父以前跟我說，他們在華南總修院的時候，再老一輩的神父做修生時，就算那時是耶穌會打理，都是不准學英文的，只准學拉丁文。因為學英文表示你有野心，做教區神父用不著學這麼多。學好拉丁文、開好彌撒、做聖事、打理教友、探教友就夠了。這就是教區神父的責任，就沒了，其他就不用做，一多了就好像有野心。所以後來有些……他們口述的，有些修士在冬天晚上睡覺關了燈後，在被窩裡偷偷地用電筒照著學英文。

當白英奇主教派修生去羅馬的時候，很多傳教士提出反對和批評，有些不覺得我們要讀這麼多書，更多覺得不用這麼急派我們出去，他們覺得我們會驕傲。

對我來說，白奇英主教很親切的。他以前在海豐、惠陽傳教，後來臨危受命成為香港主教，他為人很謙虛，又很慈祥。我在小修院時，教區大禮儀是修院全部人一起去的，所以有時會見到他。他是一個很沉實，但又很和藹的主教。那時我年紀還小，不懂得他的思維是怎樣的。後來他派余福綿神父、陳振威神父去羅馬時，我已經聽到反對聲音，到我和夏其龍神父第三批去羅馬都聽到反對聲音。我們第三批之後就沒有了。一來可能是嘗試一下，因為已經有六個修生去了，看看怎樣。二來可能是華南總修院將轉做聖神修院，可能想著先集中做好自己的大修院吧。

直至 67 年暴動，教區害怕共產黨奪得香港，便派出所有神學生分批去羅馬，想保留種子，所以後來去羅馬的修生本身已在讀哲學，只是去讀四年神學。跟我們前三批的稍有不同。又或已讀了一年神學，如徐錦堯神父、駱鏗祥神父、譚坤神父。不過羅馬那邊不算的，要重新讀過。

關神父 1963 年留學羅馬，教會剛剛正值梵二大公會議開展的第二年：

我上的課，無論哲學或是神學，對我一生都有很大影響，影響我倒不只是內容，內容是很精彩的，讀教會學真的會讀到熱血沸騰，很精彩，而我覺得自己很幸運是天主教徒，很慶幸自己將來會當神父。

但一走在街上，是另一個景象，有時會見到樞機們會穿上全套樞機裝、高級主教，坐著豪華房車、有司機，自己就在後座不知道在念日課還是甚麼。我們在讀教會歷史與教會學的時候，神學上呢，會令人覺得很雀躍，但在羅馬……因為羅馬太多神職人員，日日在街上隨處都見到，特別在梵蒂岡附近，樞機甚麼的，但有個印象很有趣，他們其實沒甚麼笑容，很嚴肅的，令我覺得很奇怪。如果這麼令人雀躍又為甚麼這麼嚴肅？還有看到樞機們的身分代表，就覺得很矛盾。

其二，我們一大堆人上課，上午八點半就開始上兩課或三課。第一課的教授講得很好，因為他很前衛，令人聽得興致勃勃；第二課是另一個教授，又是講得很好，講得很容易懂，但他的觀點與第一個教授幾乎是對立的。兩者教的內容都是神學上的東西，但立場不同。無論是前衛或者保守，教授們都能自圓其說。

所以那幾年，我受到的訓練，很是感恩。那時開始我愛聽的課要聽，不愛聽的也要聽，前衛的要聽，保守的也要聽，聽完再自己做整合、分析，不可以先有立場再找理由，而是聽完後，覺得哪些對自己來說更有道理。

至於他的第二個大得著是跨文化的文流：

與四十幾個不同國籍的同學一起相處了七年，這個經驗是真的沒有其他東西可代替，我們有三百多個來自四十多個不同國家的修士住在一起，分成十組，每組三十人左右。

我們每年都要調組，不能每年都在同一組裡面。要與不同的人相處，至少都會和十幾二十個不同國籍的人一起，所以日夜與他們一起相

處，一起旅行、運動、有時一起去野餐，一起學習、休息，其實很幫到我們怎樣去接納其他人，因為大家的國籍、背景不一樣。這一點令到我們視野擴闊，對不同的事情不需要大驚小怪。

關神父留羅期間第三個得著就是在神學時期遇到聖召的低潮，其後遇到一件事，使他勇敢地完成神學，成為神父。

梵二的思想，可以說是豐富，也可以說是很混亂。我記得讀完哲學也沒甚麼，一心一意的，但神學完了第一年之後我忽然有點恐慌，怕自己做不成神父，對不起江東父老。梵二那時很多神父離開了，教授、作家，有些我認識的神父也走了。

神師說這是魔鬼誘惑，不用怕，多祈禱就可以了。那我便祈禱，但仍揮之不去，直到暑假，我去了做暑期工。做暑期工也沒甚麼的，但一回來踏進修院又有恐慌，又再跟神師說，他也是叫我堅持祈禱，那我也堅持祈禱，但仍然害怕，直至復活節時，那時我有少少決定，如果我再這樣怕下去，我暑假就走吧，受不了。

那時就因為復活節，很多同學都出去堂區幫手，但我因為沒有心機沒有出去。剛好有個同學報了一個三日的避靜……突然有事去不了……我便代替他去。在第一個講座裡，那位意大利神父第一句就說：「各位親愛的修士，做神父是一點價值都沒有的。」

我一聽完很生氣，心想：「有沒有搞錯？我有沒有來錯地方？我掙扎這麼久，這麼辛苦，你卻輕描淡寫說做神父一點價值都沒有。」他見到我們很驚訝，再說了一遍：「做神父一點價值都沒有，除非你先選擇天主做你生命的中心與理想。」

一聽完，我整個心就「砰」一聲，心頭大石落下，我立即明白為甚麼我這麼害怕，因為那個年代、我廿來歲一直追尋的都是做神父，而不是天主。

那幾天講了甚麼，我都全忘了，但這一句說話已經夠了，這真的把我整個人改變了。我回到宿舍之後，我正讀神學第二年，第三、第四年，我都很平安。我不再怕做不到神父，最重要是盡我能力做應該做的事，讀好我的書，度好我的團體生活，打好我的靈修基礎。我很深深感受到這個事件對我影響很大。

所以我升神父後也不太執著於神父這個身分，也不介意如果天主教在某個階段要我轉型。我並不認為做神父很「巴閉」⁵⁸，而是我經常想：我有今天是天主照看著我而已。我只是跟隨著祂。

關神父修讀神學那幾年，因為是梵二後的年代，講求改革，整個修院氣氛都很緊張，也很紛亂，有些修生與院長、副院長對著幹。

有一批澳洲的修士，他們聯名寫信要求解僱我們的院長，說他太保守……我們少數有一批覺得這樣不好，要在現實做修和，做和平使者，我們穿插在同學與長上之間，多些時間找長上談天，也多些時間與那些反叛的同學談天。

我們也疏忽了功課，所以我成績不太理想，但自己覺得是值得的……如果我們不去面對這些衝突，回到教區，同樣也有衝突的啊，我們也打算不管嗎？

小修院、大修院給我的訓練成為了一個 solid container [堅實的盛器]，盛載我往後作為神父時遇到很多的衝擊、很多的疑惑、很多不愉快的經歷，甚至很多不友善的對待，我真的要感謝這些訓練使我有能力面對。

經過種種的訓練和挑戰，關神父現時主要從事人的成長工作，包括：人格健康、道德品格、靈性修持等培訓。

⁵⁸ 厲害的意思。

01



01 薄扶林太古樓村聖神小修院

02



02 (前排左起) 薄扶林聖神小修院神師金普仁神父、院長艾巧智神父、副院長李宏基輔理主教、甘增佑神父

04



03



03 修生組成的聖母會舉行周會

04 修生以拉丁文進行辯論比賽

05 運動會



05



06

06 大聖堂落成

07 教廷傳信部部長探訪本地及眾多從內地逃難而來的修生



07

08



神父們在不同年代見到不同的教宗，同樣感恩

08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到訪彭保祿神父在羅馬的辦公室

09 曾慶文神父晉見教宗方濟各

09



1960s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任期 1958 - 63，2014 年宣聖）

教宗保祿六世（任期 1963 - 78，2018 年宣聖）

白英奇主教（**Bishop Lorenzo Bianchi, PIME**，任期 1951 - 69）

徐誠斌主教（首位華人主教，任期 1969 - 73）

華南總修院院長

黃永耀神父（**Fr. John Wood, SJ**，任期 1957 - 63）

科利神父（**Fr. John Foley, SJ**，代理院長，任期 1963 - 64）

聖神修院院長

唐多明神父（**Fr. Domenico Bazzo, PIME**，任期 1964 - 67）

馮汝鈞神父（任期 1967-68，1969 - 71）

田義神父（**Fr. Charlo Tei, PIME**，任期 1968 - 69）

1962 - 65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1964 教廷華南總修院原址交香港教區管理，稱聖神修院，原於薄扶林的聖神小修院同時遷入，使之兼備大小修院功能。同年底決定籌建新翼，翌年落成

1966 - 76 中國內地發生文化大革命

1967 六七暴動

1967.10.7 徐誠斌神父接受祝聖為輔理主教

1968.11.30 白英奇主教請辭獲准，翌年四月返回意大利

1969.5.29 徐誠斌主教就任香港教區第三任主教，亦是首位華人主教

1970 - 71 舉行教區會議

1970 成立聖神修院神哲學院；

聖神修院神學部重開，由香港及澳門教區、耶穌會、慈幼會及方濟會（85 年加入）共同管理

導言

在六十年代初年，華南總修院只有二十五名修生，它要面對的是自身的生存問題！1949至1964年間，修院畢業的神父共有二百三十名，來自四十五個教區及一個修會，每年平均有七位神父晉鐸。然而，修生南遷的現象經過十多年的時間，已經退潮，五十年代末再沒有修生從內地前來香港，華南總修院最初興辦的使命似乎失落了。教廷、香港教區和耶穌會最終怎樣處理呢？

雖然香港當時為英國殖民地，但內地政局對它仍產生影響。中國大陸於1966年發生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香港繼而在1967年發生了對抗殖民地政府的「六七暴動」事件。教會因恐政局有變，為保留聖召種子、血脈，觸發修院趕緊把大修生送到羅馬繼續學業。他們遠離了香港這裡的政治危機，但卻置身於教會內部的一股旋風，修生聖召之途會否因而受阻？

這裡說的教會旋風，指的是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62-1965）。它是近代普世教會翻天覆地更新和改革的起始點。華南總修院時代的管理者及修生，當然不知道自己正面臨要脫離四百多年自脫利騰大公會議發展下來的修院傳統。香港教區在1964年接辦華南總修院，更名聖神修院，在六十年代中後期營辦大修院的經驗仍屬初階，處身於教會嶄新改革的風氣之中，又會摸索出一條怎麼樣的發展路向？



社會事件促成的一群「留羅」學子

有別於早年遠赴羅馬的修生，六十年代中留學羅馬的修生不單止是所乘坐的交通工具，由輪船改乘飛機，更重要的是他們被派出國的動機，都與前期的鐸兄不同。雖然修院長上的決定未必會向他們清楚解釋，但這批留羅學子都知道主要是與「六七暴動」有關。該次暴動始於1967年5月6日，至同年12月基本平息，由最初的工人運動，演變成後來炸彈襲擊平民的恐怖主義行為。主教和院長等神長們深怕政治動盪影響教會存續，為保護教會幼苗，把他們通通都送去羅馬——教會的中心，沒有著意他們是否讀書的材料，因為普世教會的司鐸培育，基本上都是一樣的，不同的只是在於語文及其身處的環境。

徐錦堯神父

- 1956 進入西貢聖神小修院
- 1957 遷至薄扶林聖神小修院
- 1962 在華南總修院攻讀哲學
- 1967 赴羅馬修讀神學
- 1971 在香港晉鐸



在香港大澳漁村教外家庭出生的徐錦堯神父，是受訪神父中唯一在西貢及薄扶林的小修院讀過書，然後進入華南總修院，再過渡到教區接辦的大修院——聖神修院修讀哲學，最後到羅馬學習神學的。

其他人像鄭生來、駱鏗祥，他們都是讀完大學才進入修院，都是打過工才進去。只有我是初中一進入。梁達材好像是初中二才進來。所以真正「根正苗紅」的，就可能只有我一個。

我經過四五間修院，六七個神師，八九個院長。在修道路上，我有很多、很長、很深的經歷，由最保守的到最前進的都有。其中一個院長已經還俗。

我很慶幸在梵二前後進入修院。我56年入小修院，62年是梵二，然後是1971年晉鐸。期間我受過最保守的訓練，例如要盲目聽命，一棵菜要倒轉來種，你也得聽命。神師要你做甚麼，你都要聽。你沒有你的思想，是完全將你的生命、你的一切交託給神師及院長。

當時我並不覺得不合理。但我可不敢用這些老方法來訓練下一代。這種訓練只是要告訴我：人做不到的事，天主可以做到，我只要聽命就是了。

但不說不知，修院把我訓練到「銅皮鐵骨」，正正就是在那段期間。還有，在梵二之前，禮儀和靈修都很嚴格。刻苦、愛德工作、朝拜聖體、念玫瑰經、各種神業，那時都認真到不得了。

但這樣的方式，徐神父會覺得好嗎？

如果一輩子這樣當然不好。我經歷了六年小修院，九年大修院，一半梵二前，一半梵二後，那是最棒的經歷。即是在前半段，我受過梵二

以前的那種苦行僧式的苦，也受過梵二之後那種天馬行空式的栽培。就好像你要做一個得道高僧，也需經過這些訓練。學武功起初沒教你任何東西，要你擔水煮飯三年，我想想也有它的道理。

所以我有點覺得現在的修院培育未必不好，但修生們可能不知道甚麼是真正的苦，不知道甚麼是不完美。現在的香港青年人追求完美；可這個世界並不完美。這叫「弔詭」Paradox。

徐神父口中的苦，到底是甚麼樣的？

當時西貢落後到不能再落後了，由蠔涌到西貢市是單程路，來程的車走完，才輪到去程；全部都是單程的。我們的修院就在現在的崇真中學傍，後面就是墳場，很偏僻。

當時年輕，甚麼都不怕。但物資缺乏，營養不良，甚麼問題都有。大家都辛苦，師資也普通。當時中學行舊制，有初中高中。兩個老師教全部六班的學生。

而且那裡有很多蚊子。我在那裡一年，半間修院的人都染了瘧疾，要吃黃丸（金雞納霜）；全部人都要吃。上課自修的時候，雙腳要縮起來，因為椅子下面都是蚊子。當時穿的是長褲，但都被叮。

那時的冬天好冷，經常是攝氏四度、六度、八度。我們是用冷水洗澡。而且因為院舍太舊，沖涼房的水喉有時有水有時沒有水。我們人多，大概有十格浴格，水龍頭一開，全都是霧氣，其實那是冷水澆到修生們溫暖身體的效果。有時候也試過塗完肥皂就沒有水，所以因為我捱慣，容易覺得甚麼東西都是恩典。

在西貢一年之後，他就隨聖神小修院搬到薄扶林太古樓，再進華南總修院，是總修院最後一屆的修生。

在修院裡第二年便搬到薄扶林。那時我們應該是第一屆參加香港中學公開會考。在薄扶林讀完後，我便去了華南總修院。在華南總修院修畢三年的哲學課程。

華南總修院後來易名為聖神修院，我讀了一年神學便去羅馬傳信大學。在華南總修院開始接觸國內同學，我們稱之為「北方人」；香港修生只佔少數。莊宗澤神父教我普通話、吹牧童笛。修院每年有三天運動

會，最後一天是水運會，最有趣的比賽項目是捉鴨。長上把一隻鴨子放進海裡，看誰最先捉到。以前修院山下的海水很乾淨，現在面目全非。

某年夏天，副院長教書時，有修生打瞌睡，頭部「砰」的一聲碰到桌子，所有文具掉到地上，其他修生哄堂大笑，神父的臉色變得像關公一樣紅。當晚神父叫了我進他辦公室（他應是叫了我們全班逐個去見他），說如果不喜歡上他的課，可以立刻回家。我「好漢不吃眼前虧」，馬上回答「很喜歡」上他的課，加上我平時很乖，因而沒被趕走。

從前修生很多，甚至太多，不愁沒有聖召，所以也聽聞有修生因為在休息時間偷偷上天台自學英文而遭開除，院長認為他自修英文是驕傲，想做主教。

不過，這條修道之路並非一帆風順的。徐神父十八歲時，因左耳動了兩次手術，變成半失聰狀態，在講究神父要身體健全的年代，他也險些被迫離開修院。

有神父私下對我說，他們開修院會議時曾討論要否叫我退學，因為殘障者不能做神父，那時聖召又多，不在乎勸退幾個。但可能因為我的學業成績好，又負責彈琴和指揮，對修院有用，所以沒有把我趕走。聖召那麼多，找個健康的不是更好嗎？以前聖召有三個條件，三個拉丁文S：*Sanitas*（健康），*Sanctitas*（聖德），*Scientia*（學問）。這三個「基本」條件，中庸程度即可。

那麼，徐神父的音樂造詣有多好？教區聖樂歌集《頌恩》就是由他編輯和出版的。

有一位院長唐多明神父Fr. Bazzo，他認為所有修生都應該要識彈琴。所以每個修生都要學彈琴，但唯一指導他們的，就是我這個半桶水音樂愛好者。我會彈琴，是進修院一年之後學會的。

下午人人去打籃球，修生們則排隊來學彈琴半個小時，我就要看著他們所有人、督促他們練習。晚上就更加大問題，因為第二天彌撒要唱歌，是我一個人負責選歌，那時沒有歌書，是派歌紙，每晚都很忙。直到後來1973至77年我在教友總會任指導司鐸，想出版一本教區通用聖歌集，我便收集從前那些歌紙，再增補一些，便變成今天的《頌恩》了。那段日子，無論是收集歌曲、邀請作曲者、填詞、改詞（以配合梵二思想）、改編或作曲，主要都是由我一個人包辦；黃鳳儀修女則負責抄譜排版。

所以在小修院時代，每天吃完晚飯，我不止要選歌，還要為派歌紙和練琴作準備。當時我聽到院長在操場與修生一起玩耍、開玩笑。那些歡笑聲進入我的耳朵，讓我心有戚戚然。但我就只可以彈琴、練琴、彈琴、練琴。所以難聽一點說，我是沒有童年或青春期的，我六年裡就是要做這些事。可這亦養成了我刻苦耐勞的性格，並明白後來鄭板橋所說「吃虧是福」的深義。

眾所周知，徐神父的中國文化底子深厚，講道都與別不同，部分原因與教會的培育有關。

我會看拉丁文《聖經》，是自學的。因為我熟讀《聖經》，也熟悉中國文化。我現在已近八十之年，一遇到問題，我腦袋便會閃出兩句說話，一句是《聖經》，一句是中國文化；它們都能指導我的人生方向。我教書時經常強調：《聖經》加中國文化，雙劍合璧，天下無敵。

所以到現在為止，誰敢說自己是利瑪竇傳人？在香港或許只得一個，叫做徐錦堯。為甚麼呢？因為我不單止熟讀《聖經》及中國文化，我還將之應用到平常主日彌撒和慕道班裡。這些東西你如果不廣泛應用在主日彌撒和慕道班裡，它是會自動消失的，最多只能塵封在圖書館或檔案室裡。

他在修院也得到兩位老師的鼓勵，激發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愛。

有一位叫黎正甫老師¹，他很好，教中文。那時，我學寫詩詞，寫了給他看，他就會為我修改。

還有，初中二的時候，我的老師張雅各神父²，他看到我寫的東西，然後跟我說：「徐錦堯，你的東西可以投稿。」我說：「怎樣投？」他

¹ 黎正甫教授（1908-1988）出生於福建，曾入讀北京師範學校，在內地大學教授文史科，與方豪、錢穆、羅香林等名士一同任職。他於 1940 年在華南總修院任教，因戰亂使修院難以維持，一年後返回內地，至 1946 年再回修院任教，直至 1968 年退休。參林雪碧：〈黎正甫與羅馬教皇世系〉，《天主教研究學報》，2016 年第 7 期：頁 235-246。

² 張雅各神父（1903-1972），出生於河南南陽，1928 年晉鐸，1949 年來港，並加入香港教區。他曾在薄扶林聖神小修院服務，並協助編輯第一本完整的中文每日彌撒經書。〈張雅各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J-Chang.htm>〉，[6-7-2021]。

說：「我幫你，你寫好我幫你投。」那個時代有《華僑日報》的「青年園地」，還有《學生週報》。我一共投了約十篇，每一篇兩三元稿費。他幫我收集了那些錢之後，買了一本叫《古文評註》的書，現在多叫《古文觀止》。他在我的《古文評註》第一頁寫了一句鼓勵我的話：「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希望我好好裝備自己，時機一到，便可以魚躍龍門，終非池中物了。

香港第一本中文彌撒書是張神父一個人獨力編寫的。那本彌撒書現在已經找不到了，禮委會應該有。他的中文很棒，是他和我爸爸教我中國文化，是他吸引我去寫稿、投稿。那時我才念初中二。

我的另一恩師是甘增佑神父³，他教我彈琴，鼓勵我做個勤奮、上進、爭氣的修生。我生病住醫院，他開「綿羊仔」來探我，不幸發生車禍，回歸父家，沒有機會讓他看到他對我的影響是如此的鉅大。

除了華人老師，當年教會仍由外籍神父主導，故與他們有更多接觸。

我發現我見神師的最大特點是，我是會先想好要和神師談的內容，到神師面前便滔滔不絕地說這說那，而神師就會點頭、搖頭、微笑。現在回想過來，我更像是我自己的神師。至今我仍相信，修道人最重要的神師是自己，別人只能是輔助。你不幫自己，別人幫不了你。

這位外籍神師要求我們每個月都要見他一次。我發覺他沒有叫過我去見他，但很多人卻是過了期便要被抓去見他；而我卻是每個月都準時（甚至提前一兩天）去見他。我總是把過去一個月內大小事情都向神師匯報，所以十一個人進修院，只有我一個人最後升了神父，這大概與我的這種主動有關。我很珍惜我的聖召，我要努力培育自己。

徐神父雖然用功，但這並非他完成神一後能出國的原因；而在歐洲的培育，使他的世界觀更拓寬。

我們正因為「六七暴動」而去羅馬，我們去機場的當天，仍是滿街「土製菠蘿」⁴。我們要繞不少路，才到達當時的九龍城啟德機場。

³ 甘增佑神父（1912-1964），來自北平總教區，1940年在羅馬攻讀神學及教會法，曾任田耕莘樞機的西文秘書，1949年隨樞機來港，1958-1964年在聖神小修院任教。由於修院另有外籍神父金普仁，修生稱甘增佑神父為「中甘」，金普仁神父為「西金」，以作區別。〈甘增佑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https://bit.ly/3jA3tUO>〉，[6-7-2021]。

⁴ 炸彈。

所以我要說，我可以去羅馬，不是因為我厲害，而是教會需要保留一些火種、種子。我們那一班有六個人去，駱鏗祥、譚坤就是那時候去的。

我喜歡看遍和看透全世界，所以我很喜歡看報紙，立場左、中、右的報紙都看。我會互相比對。

在羅馬讀書的時候，世界大同的氣氛很濃，那是 1971 年之前。我記得有一年暑假，我帶著吉他周圍去，遊歷了整個歐洲和參加很多青年人的聚會。我彈吉他，他們唱歌，很美麗很和平的世界！

我在修院很開心。我經過了最保守的西貢聖神修院，慢慢開放的華南總修院，最後去了羅馬。那四年神學很開放的，再做了九年神父之後，我到了英國讀書兩年，接觸到更多更多不同的新事物。

經過華洋文化的薰陶，梵二前後的洗禮，在中西方環境下的聖召培育，徐神父自有一番領悟：

我主張完整和整全的培育。一個重視靈修活動的人要很靈性，而靈性的人必有道德，沒有道德你靈性不了，因為靈性的人可以用基督的眼睛看世界，用基督的心愛世人。還有應該要合群，而合群應該是「群而不黨」，即合群但不結黨，因為一結黨，人便會進入「我黨全對你黨全錯」的迷思和大醬缸裡。

還有，理性與感情要互相配合，身體要健康。以上總共八點，我戲稱之為「徐錦堯八卦」。八方面全做了，才叫神聖；因為「神聖就是完整」Holiness is wholeness。

我自小對中國文化有興趣，所以我對道教有親切感，例如老子的《老子》（或稱之為《道德經》）。我小時候因為窮，每年大嶼山的廟宇會有派粥派飯等活動，我和母親都會去吃這些免費的齋飯，這使我覺得佛教也是好的。我是在大澳一間天主教學校讀書，叫永助學校，並在那裡學習《要理問答》，然後領洗。因此，在我生命中有各種宗教，以及有很多無神主義者朋友。而世界大同對我來說，是一件很自然和正常的事。

問你一個有關救恩的問題。我爸爸沒有領洗，他能不能上天堂？起初我覺得他是不能上天堂的，現在我卻覺得，除非他有其他的罪，否則不會因為他不是天主教徒而不能上天堂。

徐神父認為自己今天能做那麼多事情，是得助於三位教友提供的機遇，更是由修院刻苦的生活培養出來的。

我的成功是由三個教友而來，這都是機緣。一位教友邀請我去台灣，到各教區、各修會和各學校去演講和做培訓；十年內走遍了全台灣。另一教友幫助我一起成立公教教研中心。也是一位教友邀請我到中國大陸，走遍全國七十五個大大小小的地方作福傳。

這一切都和我在修院的教育有關。我經歷過最保守、最刻苦、最無人道（不是無人性）的培育。無人道，因為當時神師鼓勵我在鞋內放幾粒沙行走，讓自己「吃苦」，有能力戰勝私慾偏情，我也照做不誤。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我做事非常拼命。甚麼叫拼命？洗廁所會洗得比別人乾淨。我試過N次洗完廁所後，會看其它的廁格，我洗的那個果然與別不同，因為我拼命洗。我也拼命擦蠟燭台，拼命學琴。考中學會考時，我除了拼命學習，也拼命教幾位成績欠理想的同學。這些都是我甘心和主動去做的。我不知道我還學了甚麼，我肯定學會了的，就是「主動」和「拼命」去做一切事，包括疫情下我在網上的「兩文三語」講道；這真的多花我三倍時間！

在不同地方的培育和特殊歷練，也令他勇於嘗試和創新。

香港教區神父每年都有三個月假期。我做了神父將近五十年，沒有一次享用過這些假期，因為我不知這三個月要做甚麼？於是我做了九年神父後，我跟胡振中樞機說，我想放大假去英國讀書，是做了九年神父後，想進修一下。他說：「好啊，好啊。」然後他問：「你想讀甚麼？」我說：「想讀政治。」

他看著我，不反對，也沒贊成。你要知道，1970年代是「認中關社」的火紅年代。當時「認中關社」很流行：「認同中國、關心社會」。現在愛國是死罪，七十及八十年代，愛國才是「正確」中的正確。「認中關社」也包括反貪污、捉葛伯、關心政治。所以我說要讀政治，他看著我默不作聲。我知道他不太贊成，所以立刻改口：「那不如讀教育。」他就說：「好啊，好啊。」

他更曾向胡樞機提出「試驗堂區」，包括一個青年住宿計劃，為聖召打好基礎。

真的是試驗：「試驗堂區」。是的，胡樞機給我特權，讓我對梵二的新理想，在我堂區的特定範圍內，找尋可以實踐的方法。

其中一個計劃叫「在職培訓」。堂區的神父樓有三間空房，每個房間放五個床位，兩張碌架床⁵，一張單人床；三個房間便可容納十五人。我這計劃也叫「三周宿營」，有興趣的人就報名住在聖堂，早上一起參加彌撒、吃早餐，然後返工或者上學，晚上回來吃晚飯，接著我們便會有一個小時的講話，分享一個小時，然後便睡覺。周末星期六日變長一點。很多人報名，做了數次以後發覺反應很好。

正是因為沒有人做過，才叫試驗堂區。結束後我跟主教說：「主教，我已做了九年神父，其中兩年副本堂、四年教友總會和青年聯會、三年本堂和試驗堂區。我好想再看深一點。」於是去了英國兩年，回來後便開始寫書，寫了六本倫理書，還有約七十本小冊子。

胡樞機年代，他十分信任我，給了我很大很廣的自由度。有一次有一件重大事情，我希望他批准，說著說著，到差不多要說完時，他便說，“Father, thank you for informing me.”「Informing」這個字，我一聽便識 do 了，他的意思是不用他批准。因為他一批准便也要負責。他知道我已相當成熟，也有很多各方面的學識和經驗，我的信仰和對教會的忠誠，也讓他十分放心。他知道我有能力負起應負的責任。於是我便自己開始做、放心也放手去做。這便是公教教研中心的由來。

因此，公教教研中心在《香港天主教手冊》上，是少數列入「教區外的天主教組織」，意即香港教區承認它們是天主教團體，但不會管轄它們的工作。

意思是：教區不要管教研中心，主教也不必管徐錦堯神父。因為當時九七前很亂，每個人都要主教發言講話。胡樞機不愛多說話。我說我們成立中心，我們會說我們該說的話，做我們認為教會團體該做的事。我們有足夠能力，負起教會內外的責任。做得好便歸光榮於教會，做得不好就由徐錦堯去坐牢；這對教區不會有任何損失。條件之一，就是教區和主教都不要直接管我們。一管就要負責了。

5 雙層床。

胡樞機很認同這個概念。在一個亂世時代，無人知道未來如何，整個教區數十萬人和數百個教區機構，也不能完全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不怕告訴你們一個小秘密，胡樞機說「教研」成立這麼重大的事，一定要經過教區諮議會通過。幾番波折，最初當然是否定；之後是一半贊成，一半反對；最後是樞機以他主席的身分，投最後一個 casting vote，便多了一票通過了。所以這個教研中心是在一個小小的爭議聲中成立的，幸虧支持我們的是教區的最高領導：胡振中樞機！

公教教研中心於 1986 年成立，最先的三位負責人是馬珍娜修女 (Sr. Mary Louise Martin, MM)、張家興先生和徐錦堯神父。張先生後來被聘為《公教報》總編輯而離職，馬修女則因年邁退休回美國，至今一直是徐神父帶領中心發展和籌劃各項的培訓、研究和福傳等項目。

梁達材神父

- 1958 進入薄扶林聖神小修院
- 1963 升讀華南總修院，修讀哲學
- 1964 華南總修院原址轉為教區接辦的聖神修院，繼續修讀哲學
- 1966 升讀神學
- 1967 到羅馬攻讀神學
- 1972 晉鐸



梁達材神父幼時居所鄰近聖堂，觸發了他對基督宗教的好奇心。直至母親因病進了天主教醫院，促使他和母親稍後慕道，成為了他一生追隨天主的契機。

我幼年的時候，住在旺角黑布街，隔鄰就是聖公會的諸聖堂。每天早上都會聽到唱聖詩，我問媽媽聖詩的內容。她就回答：「他們是信耶穌的，耶穌是為世人被釘死的。」我當時第一次聽到關於耶穌的概念。我後來入不到諸聖堂的小學，就進了培正小學。因為我從小就常常聽聖詩，感覺自己有些基督教的底子。

在培正讀書的時候，參加了團契，老師都會時常詢問哪一位同學想受洗？我前後三年都交出了名字，但老師都沒有告訴我可以受洗。第四年的時候，我媽媽入了聖德肋撒醫院，我遇上和靈導神父⁶，他詢問我想不想領洗入教？我在心裡說，我想領洗已等了三年。媽媽出院之後，我們一起到聖德肋撒堂慕道，之後一起於1953年領洗。

我領洗之後就做輔祭，大概小六、中一的時候每逢星期日下午參加鄧鏡波學校慶禮院的活動。在那裡遇上伊思高神父，他詢問我想不想做神父，而且有一個輔祭入了修院，他寫信出來給輔祭會，大家分享他的信時，我有一些感覺，就這樣啟發了我思考入修院。

⁶ 和靈導神父 (Fr. Carmelo M. Orlando, PIME, 1907-1979) 1930年晉鐸，翌年赴港。和神父曾短暫在內地傳教，返港後於1936至65年間，除了有幾個月在其他堂區工作外，均服務於聖德肋撒堂。參〈和靈導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https://bit.ly/3zfpvx1>>，[31-3-2021]。

我回想因為媽媽的說話，我想跟隨耶穌，其實我不知道這是代表甚麼。然後有和靈導神父和伊思高神父的詢問，好像一步一步的，天主透過不同的人、事來引導我。

還有輔祭會 57 年到薄扶林太古樓剛剛落成的新修院旅行，四周參觀時遇上我以往的副本堂艾巧智 Fr. Einaudi，他當時是修院的院長；又遇上當時是修士的江潤坤，彼此傾談了一下。修院環境很好，有人鼓勵，又有相熟的人，心裡先有一個 like [讚]。

梁神父就在 1958 年十六歲中二那年進入了薄扶林小修院。梁神父在家中排行第八，入修院讀書，母親「是非常捨不得的，不過因為她疼愛我，隨我的意願，才可以了」。況且他要從一間辦學出色的天主教中學轉到小修院讀書，是甚麼驅使一個十多歲的少年作出這個決定？梁神父認為「這是天主的神恩！」

離家遠去，修院又是一個怎樣的新環境？

當時整間小修院有五六十人左右，也不是很多人，不同的班級，有不同的工作安排，住方面就是大宿舍。

小修院是 PIME 神父和教區神父打理的。當時院長是 Fr. Bazzo 唐多明神父，他曾是大堂的本堂神父。李宏基輔理主教是我的副院長。

我不會覺得修院如其他人所形容的是勞苦監禁。修院有吃飯時間、有休息時間、有飲食時間、有運動時間，很正常的，可能比外面生活「無規無矩」好些。外面放學之後整個世界都是你自己的，你喜歡做甚麼便做甚麼，修院並不一樣，要做院務，例如是打掃地方、清洗廁所，有一些人就做園藝。在小修院的時候，我有時間便去練琴，有神父教的，我是其中一個司琴，和其他修生輪流彈奏。

上課的科目就跟中學一樣，我們高三時照樣要考外面的公開試，不及格不能升上大修院，一定要中學畢業的，那時候我也考過大專，這個不是必須，中學會考是必須的，萬一在大修院不成功，都有學歷可出來社會找工作。

當年到大修院修讀神哲學，要通過考試才可以，梁神父也不例外；而且還給他遇上華南總修院於 1964 年交由香港教區接手，以聖神修院的名稱，繼續開辦大小修院，培育本地聖召。

入大修院也要考試的，考甚麼？就是考拉丁文，要翻譯拉丁文，也要會說一些，拉丁文要及格。當時神哲學都是以拉丁文教授，如果不及格就不能進大修院，有些人要離開修院就是因為拉丁文不及格。

大修院沒那麼規章化。那時小修院也搬了進來，我們人大了，思想成熟一點，叫做大修士，穿著長袍，要給小修士做榜樣。

我哲學第一年的時候，是做副學長，學長是余尚實神父。

大修院學制理論上是三年哲學，四年神學，哲學有四五科，1963年讀哲學第一年時，仍是華南總修院，耶穌會士教授的，有愛爾蘭人的風格；一年之後便轉為教區營辦，科目沒有變，都以拉丁文教的，只是教授不同了，是 PIME 的神父、國籍的神父和教區以前派出去羅馬讀書回來的那些神父，他們都是很棒的。我記得耶穌會士 Fr. Russell 劉勝義神父⁷ 教授教律，另有田義神父教哲學。

雖然當時的修院屬於封閉式管理，修生較少和外界接觸，但從梁神父一些舊照片看到一些小朋友到修院探望他，「他們是我教過的學生，鴨脷洲街坊學校的，校監是一位神父，他希望修生到學校教《聖經》。學生是漁民，他們坐小船到修院來探我。」

梁神父在香港完成三年哲學及第一年神學課程，便被派到羅馬讀神學。他認為自己不是讀書人，到羅馬讀書，只因政治危機給他帶來了的機會。總的來說，梁神父對修院生活覺得是愉快的。

67 年的時候香港大暴動，總督府前的示威與日俱增，並且被人寫大字報。我們一整班神哲學生被派到羅馬。如果不是這樣，我不會到羅馬的。我不是讀書人，讀博士的就一早已經去了。湯漢樞機早一些去的，他原屬另一個教區，是訓練做讀書人的，所以他的方向和我們的不同。

⁷ 劉勝義神父 (Fr. John Russell, SJ, 1926-) 1951 年從愛爾蘭來港，早年在華南總修院及聖神修院任教。他是本地婚前培育課程的倡導者之一，曾任教區法庭法官和辯護人等崗位，2012 年退任教區司法代理及中環公教進行社聖母無玷之心小堂主任司鐸後，仍繼續服務教區法庭，直至 2020 年以九十四歲高齡宣布榮休。〈教區法庭劉勝義神父榮休〉，《公教報》，2020 年 6 月 21 日。

和我一班的有徐錦堯、駱鏗祥、譚坤。譚坤現已離世。當時駱鏗祥跟我一起去羅馬，同一班的。他入修院前有工作經驗，是教師，入修院讀特別班⁸。他沒有讀過神學，到了羅馬才讀。我就讀了三年哲學，一年神學，再去羅馬讀了四年神學。在升神父之前一年，我多留了一年在羅馬，上了一個訓練課程，我讀神學的時間是六年。我是由十六歲讀到三十歲，長達十四年的時間。

我覺得修生的生活是愉快的，如果不是我今天怎能存在呢？我想我做人是能屈能伸，你要得到一樣東西就會面對，就會有挑戰，就不能像有祿母事事照顧周到的，對嗎？

出國到羅馬修讀神學，不論適應如何，也是新的挑戰。

第一次到歐洲，對各樣事情都感到新鮮，我第一次坐飛機。以前到羅馬的修生是坐船去的，要個多兩個月時間，過印度洋最辛苦，風浪大，整整三四天常常嘔吐，很多神父都坐得死去活來。我們是第一批坐飛機去的。Pan Am〔泛美航空〕以前無直航到羅馬，飛機要經印度、貝魯特加油才到達羅馬。

讀書方面，全部是以意大利文學習，同學是國際化的，印度、斯里蘭卡、非洲等，天主一早就為我預備了在國際公學這些環境成長，所以我日後能夠更容易接受不同的人。

到羅馬那年是「六七暴動」之後，修院在大公會議後，全部科目已經用當地語言意大利文上課。我在香港只學了一個小時，幸好，我們有拉丁文的底子，所以聽得懂。自己課餘自修，溫習一下。

到羅馬都要穿著長袍，更漂亮的。有披肩，身上有鈕扣。是文藝復興時代 Michelangelo 設計的，他當時和教會的關係很密切，是數百年前了，但很有意思的。

吃和住的是歐洲的食物和環境。It is a change of climate and food〔是氣候和食物的改變〕。我當時是年輕人，不會抗拒 salami〔莎樂美腸〕、葡萄酒，天天都會喝葡萄酒。

⁸ 短暫時期學習拉丁文。

梁神父在羅馬之時，梵二大公會議已經結束，看到不少神職離開教會，但感覺衝擊並不太大。

在羅馬的時候，梵二會議已經完畢，我們主要在修院，不會直接接觸外界，但是我們看到很多修生都離開了。另外，對於有名氣的、撰寫書籍的教授離職都有所聞，當時這些神父的影響力很大，所以或多或少也帶給我們衝擊。自己也會思考，是怎麼一回事呢？要怎樣呢？多了一方面去思考，以往是不會想的。

梵二是新氣象，是挑戰。如果是大公會議之前做神父的，分別就會大一些。在修院裡漸進地轉化著，便感覺不大。如你已經當了神父，可能會覺得突然間有這樣的轉變，就需要一段時期去適應。我就並不是這樣，我剛剛是新一代，我的培訓一半是大公會議之前，另一半是大公會議之後。

我常常相信聖神是在教會裡，無論好與壞都有祂的安排，我不會刻意說因為梵二，所以我們要 celebrate [慶祝]，歷屆的教宗都是這樣，特別是保祿六世、若望保祿二世，你會看到他們對教會的看法都會影響我們。我讀書的時候的保祿六世就比較嚴謹一些，樣樣都好像「執到正」⁹，我不完全認同的，太嚴格，但沒辦法，他是上一代的人。若望保祿二世則很牧民、很開放，他影響我們的使命感。我之後有機會到羅馬開會見到他。我有一張相片，相中的情況是他已經走過了，我大聲叫 from China [來自中國]，他折返和我握手，用手摸我的額頭，很友善。

梁神父在修讀神學期間因為認識及體驗了普世博愛運動而造就了他修道的轉捩點。

我在 1968 年神學第二年的時候，幹微忱神父¹⁰ 到意大利修讀靈修學，準備做神師。他去探我們，帶我們去 Focolare¹¹ 羅馬的總部，認識普世博愛運動這團體。

⁹ 事事按原則，按規矩。

¹⁰ 幹微忱神父 (Fr. Filippo Comissari, 1931-)，宗座外方傳教會士，1954 年晉鐸，兩年後來港服務，直至 2017 年退休回意大利。他是首位把普世博愛運動的精神帶到香港的人。參〈幹微忱神父服務香港半世紀 陪伴工人 推動普世博愛運動 現在已返回意大利靜養〉，《公教報》，2017 年 6 月 23 日。

¹¹ Focolare Movement，普世博愛運動，1944 年由盧嘉勒 (Chiara Lubich) 及同伴們在戰火

到神二的暑假，我去法國露德做義工，之後到了露德朝聖，當時已經有很多神父離職，我求聖母恩典。我有想過如果離開修院都不錯，我就告訴聖母不知道怎樣做，祈求她指引。回來修院半年之後，我就去了探訪 Focolare 在 Loppiano [洛皮亞諾] 的中心，和一群來自世界各地的平信徒青年一起。我原先是過一個星期的假期，但就在那裡我感覺到年輕人強大的合一感覺，所以我在那裡決定完成了神三的時候暫時停學一年，第四年去了 Focolare 的培育中心一年，領受它的精神和 unity [合一]，然後再回去讀神學的第四年，所以我就遲了同班同學一年，我升神父是和新一班的同學一起升，這是我修道的轉捩點。當時梵二影響了一些世界的變化、思想。我就在 Focolare 那段期間重新獲取中心點，重拾精神。如果不是這樣，我就沒有了方向，這是屬於我自己的救恩。

幸好留在 Focolare 那裡，實際上後來很多升了神父的都離開了鐸職。我在 Focolare 強化了靈性的生命。

從香港的小修院到羅馬的大修院，梁神父身旁也有不少一起修道的夥伴未能踏上神職之途。

我入小修院那年是有四十人，最後升神父的只得四個。很多修生離開了。

即使後來我到羅馬讀書，那些修生都已經讀了十多年，準備第二天升神父都可能有變卦。我是回香港升神父的，有些則在羅馬。有一位同學，他並不是我們香港教區的，在羅馬升神父的早一天晚上，敲我的房門說：「我不是太想升。」我就對他說不如告訴院長，當時已是深夜，但想過事情的正反面，我說：還是不好，睡不睡覺都敲敲他的門。找過院長後，那位同學最後沒有升神父。

每個人有自己的 calling [召叫]，他當時感覺不到的就先不要升神父，可能他十年之後仍覺得有 calling 便升。事情是一樣的，修生準備升神父等了十多年，不會沒有意向的，但最後他的 calling 未必那麼強烈，便要尊重自己內心的聲音。

在羅馬完成司鐸培育回港，梁神父 1972 年晉鐸後，任堂區助理司鐸，在 1980-82 年擔任聖神修院副院長一職，再到美國芝加哥羅耀拉大學修讀牧靈碩士一年，作為

中創辦，是一個跨宗教合一團體，以推動和平博愛與合一精神為目標。

他做院長之職的準備，接任關俊棠神父，但他覺得自己的神恩不在這方面而沒有勉強自己。

我記得在修院做了兩年副院長後去芝加哥培育的，理論上培育完便回去做院長，我回來後去了聖母堂任本堂，就沒有繼續在修院。

這課程使我認識自己多一些，也認識他人，不是一鼓作氣向前衝。不是這樣的，要聆聽內心的聲音，覺得不是自己的神恩，不要「認叻」，當然胡振中主教堅持要我去，我都會去。不過他尊重我的意見，我要感謝他。

教導和行政是兩回事，我不是太適宜做管理；教導我並不喜歡，簡直是厭惡，所以我就嘗試一下看看是不是那麼厭惡，嘗試過後仍然覺得很厭惡，我要對自己真誠。

堂區不是那麼嚴格的，修院培育那些是將來要做神父的人，修院的事一定要跟足，不能有偏差，每個人的 formation [培育] 也不同，我不喜歡，是很煩的。

梁神父將於 2022 年晉鐸半世紀，除了有兩年參與修院培育工作、一年在芝加哥進修，另有六年時間在加拿大多倫多服務華人教友之外，其他時間皆參與香港教區的牧民工作。目前是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助理司鐸。

鄭生來神父

- 1964 在薄扶林小修院學拉丁文，
同年進入聖神修院修讀哲學
1966 往羅馬修讀神學
1970 晉鐸



在牙買加出生的鄭生來神父，於 1947 年六歲那年，隨希望落葉歸根的父親和家人一起回到香港。

當時我並沒有感覺社會有甚麼亂事，但有很多窮人，就是這樣。我記得第一件事是下船。我們是坐船回來的，要一個月時間。

我爸爸不是教友，我媽媽也不是天主教徒。我爸爸 1948 年過身後，我們才真正接觸天主教會。我大哥哥在聖德肋撒堂做輔祭，我便跟他去做。

做輔祭之前，對天主是沒有意識的，是第一次接觸天主、第一次認識基督，認識信仰。我做了輔祭後，便經常到聖堂輔彌撒，接觸神父多了，便影響了我，八歲左右已開始想做神父。神父當時也鼓勵我們做神父。但主要不是他們鼓勵，主要是接觸到他們。

後來聖堂有幾位熟悉的神父也鼓勵我入修院。但當時我是想「早走早著」，開始覺得他們與社會有些脫節。到中學時，就覺得他們與社會脫節。

直至 1958 年，其中有一位特別鼓勵他的神父，敦促他去修院了解一下，他便照神父的意思去做。

那就出大事了。我去的時候，那時是梵二之前。那位院長是穿黑色長袍。我那時是歌詠團的人。歌詠團的人經常見面，有時候去行山等等。我去的時候帶了兩個朋友一起去，一男一女。在等待的時候，我們在說笑。那女孩在黑板上寫：God made Anthony in the light but forgot to paint him white 意思是天主在光明中造了我，但卻忘記把我塗白，因為我皮膚黝黑。但那院長看到，他說：「你們怎麼這樣說？」

之後是個別面談。他問我：「你們是不是整天到處去遊玩？」我說：「我們都會去行山等等。」他說：「如果你以後做神父，這些活動要減少。」不知他是甚麼原因這樣說，可能見到我們三個經常說笑。他就說：「你看我，我現在穿神父的黑衣服，做神父有神父的尊嚴，是高一級的，所以你以後做神父，對教友是高一等的，有點不同，所以要開始疏離一點。」就因他說了這句話，我心裡說我不會再來。

鄭神父正式進修院是 1964 年之事，是經過十天向天主祈求指引。

高主教學校 1958 年剛剛開始辦，一位相熟的神父做了那裡的校監，他就走來跟我說：「你怎樣了？你的將來會怎樣？」我說：「還未想到。」他就說：「那你過來教書。」我當時還沒有考慮過甚麼，所以便去了教書。當神父的念頭仍然會跳出來的，但一直淡下來。然後我就想到，一定要做一個決定，即在十日的祈禱中問天主：「你想我做甚麼呢？」

開初數天都是剛才那些很亂的，想很多事情，想來想去。但過了五天左右便開始有些沉穩，沉下來不見了，而做神父的思想就開始浮現，到第七天做神父的念頭已經全部上來。亦即是說最初它上來的時候，我會把它壓下去，一上來便壓下去，不讓它上來，到第七天左右一直壓下去。但我說好是按天主的意思，沒理由自己一直把它壓下去，再壓下去的時候便放手，亦就是有意識的時候便會放手，不再把它壓下去。那變成我可以八成肯定，不是百分之百，是八成。那就好了。

校監神父要他快點進修院，怕他會變卦。而好友的父親則說他做了愚蠢的決定。

但我想到我也要向媽媽、朋友交代，因此我就定了 4 月 1 日進入修院。當時是 12 月，我想三個月時間便夠了。但他仍叫我早點辭職，讓我快點過去。但我是定了 4 月 1 日。然後，我便向其他人交代。其中一位好朋友，到了他家裡，他爸爸平常很少講話，我與他兒子就很熟，與他的家人也不用說太多，大家都認識，他爸爸突然指著我，好像是說：「你是蠢材，為何入修院？好端端的進入修院？」我回家的時候一直想，他說我是蠢才，我 4 月 1 日進入修院，是愚人節來的。我說不成，一定要早一天進去，所以我記得那日子，我是 3 月 31 日入修院。

一般開學都在九月，為何鄭神父會選在三四月入學呢？

因為我想減少一年。我入修院只想「快快趣趣」¹²，我只是想做神父，不是入修院。那我怎樣早一點進去？我是準備用幾個月完成一年的事。進去的時候，譚坤已經入了。他已經學拉丁文。有一位神父教他，那位神父也教我。他又吩咐譚坤神父看顧我。他不是比我高級，不過學拉丁文，只有我一個人，而當時讀拉丁文也只有他一個。

我在那一年便立刻跟著進入大修院，很多事情「符碌」¹³。真的。當時小修院在薄扶林，大修院在黃竹坑，是耶穌會辦的。而我入大修院那年，大修院交給了教區。於是，教區的大修院與小修院合併，小修院搬了過去，小修院在一邊，大修院在另一邊。

修院原本要讀三年哲學，因為部分修生已有工作經驗，三年的學制便採取彈性政策。鄭神父總共讀了兩年半，三個月拉丁文，然後兩年哲學。

因為我在外面工作過，所以他們說，讓我讀兩年，於是我又減一年。讀兩年的有林焯煒。譚坤要讀三年，他就遲我一年升神父，他本來早我幾個月進修院。但他要讀滿三年，而我只讀兩年，都合乎我口味，快。

鄭神父當年去羅馬是孤身上路，且是先在香港完成哲學課程，與前一批在那裡攻讀神哲學的稍有不同。

院長跟我們說，你明年要讀神學。他問我有沒有護照，我說沒有。他說：「你可以的話就去領一本護照，有了在手會很方便。」我說：「好吧。」但我不緊張這事，也沒有放在心上。後來他再問我申請了沒有，我說沒有。他說：「你快點去領。」我說：「現在不需要啊。」他說：「我們現在打算派你去羅馬。」於是我便去申請。他又不早點跟我說。1966年，只有我一個人去。夏其龍和關俊棠進入修院比我還要早，他們一早便過去了，在那邊讀七年。他們神哲學都是在那邊讀，而我是讀神學才過去。

鄭神父在羅馬遇上不同期的香港同學，更成立小組討論當時熱門的話題——梵二會議的成果。

¹² 盡快的意思。

¹³ 胡混通過。

後來我們有一個香港小組，即香港的同學一組。我們差不多一個星期聚一次。大家有些不同，但經常會溝通，所以與夏其龍與關俊棠都很熟，完全沒有甚麼。大家都很不同，但是都熟絡，可以聊天。

大家討論整個流程有甚麼意義。在羅馬修院就是這樣。很好的聊天，但回香港以後就沒有這種機會。當時經常有聚頭，同學見到我們也覺得我們關係很密切，而我們的聚會是很認真的。

在梵二的時候，有位神父收到一本雜誌。那本雜誌是緊密報道梵二的。他看完便給我看，好像未進入修院已開始看。進入修院後，他仍繼續給我看，使得我用了很多時間看梵二的東西。梵二是適合我的，最合適。如果不是梵二，我真不知道自己會是怎樣，所以我很重視梵二，用很多時間跟進，甚至我在修院的時候叫同學一起討論修院培育。他有一份文件，所以大家便一起看。

當時我已經留意解放神學，亦即自己自修。我是很肯定解放神學的。它很強調實踐和反省。不是學究式的神學，是要實踐的神學，但實踐要反省。另一樣是，有人提出 Conscientization，在 Conscientization 中，在實踐中要提升意識，沒有實踐便不能提升意識。

好像是 68 年左右，有一個暑期課程是講關於宗教社會學，它叫 Sociology of Religion 還是 Religious Sociology，在比利時魯汶有一個中心是專教這一類課程。那裡有教授很出名的。他也教過解放神學的人。我去了，但是用法文上課的，我便說：「死啦，死啦，死啦。」我只會說些少法文，勉強過關。它說的是你要改變制度才能改變這裡，亦即是徹底改變社會，分析就是分析這些東西。那是一個很關鍵的課程，因為要實踐，在個人成長以及個人心理學方面，再加上這個社會分析。

解放神學其中一樣東西，尤其是 Conscientization，信仰上的特質是我與對方對立，不是要消滅對方，我與對方對立是要為對方好。不是所有人都這樣說，但有部分人是這樣認為。我指的是解放神學。是為對方好的，是希望對方能夠改變，成為共同的。換言之，與對方對立並不是要推到他，不是要消滅他，而是希望他會意識醒覺。

在未進入修院前鄭神父便開始吸收梵二精神，以至留羅時期的這個課程，大大影響了他升神父後的工作。

我主要在講道理時提及關心工人。我在中半山聖若瑟堂，最富有的堂區。我跟徐誠斌主教說，我要去貧窮的堂區，講中文的，他卻偏偏派我去英文堂區。那時可能找不到人，不是所有人都適合。之後我到西環。我回來之後介紹梵二，介紹解放神學，我會在道理裡面提及。

我們在羅馬的時候可以選擇在羅馬還是在香港升神父。我們作討論的時候，很多是討論本地化，後來我們都同意回來香港升。

我們最初回來的時候推動梵二，像夏其龍、關俊棠，當時因為是新鮮，很多人參加，好熱烈的。現在就淡了。

現在梵二仍有很多人有興趣，但它的問題已經過了很多年。那時有新鮮感而且很熱烈，使得人們有很大的興趣，而且當時人們不知道它是甚麼，所以很想知道。如果改革會好些，他們也會希望改。修女也是這樣想。

梵二也只不過是一個過渡的東西。它很多的新事物是有突破性的。但是我們實踐梵二都未徹底。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所以我會講比較多些是《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它的突破性是最高和最徹底的。

現在不同了，因為社會有很多的吸引和不同的選擇。神父的任務和特質可能應該要再去探討，以配合梵二。

或許就是梵二的衝擊時期，部分神父似乎都有他們的主張和做法，引起內部不同的反應。鄭神父就希望接觸剛開放的中國教會。

我在小孩子的時候，曾對姊姊說：「我遲早要入大陸。」機會是甚麼時候來？是改革開放。內地開始讓外面的人進去。宗教恢復就在那時開始。

因為沒有表示要請示，只要不是代表教會，不是代表教區，不是代表任何人，是私人的，便可以去。但有些人不高興。

在74年要參加菲律賓一個有關社會分析的研討會。我和胡樞機商量希望參加，回來就住在聖家堂，但不屬於堂區，只是住在那裡，在那裡幫忙開主日彌撒。如果他們有其他需要也會幫忙。我便跟胡樞機這

樣說。他說：「我正想安排一些工作給你。你現在這樣的安排，有這樣的想法，也好吧。你就做你喜歡的。」這樣我就去了那裡。

此後，鄭神父 1979 年創辦天主教刊物《驛》，成為內地教會與其他地區教會的溝通橋樑。他又於 1983 年成立信仰探討中心，從 1989 年開始，該中心以天主教「綠識傳人」大力推行綠色生態環保，2012 年成立「天主教永續樂田園」，以至於推崇母乳餵哺及愛嬰觀念，使達致天地人合一。

駱鏗祥神父

- 1964 進入聖神修院直至哲學畢業
- 1967 赴羅馬傳信大學修讀神學
- 1971 晉鐸



中學時才領洗的駱鏗祥神父和其他稍後進修院的修生，大多數沒有進小修院，而是直接入讀聖神修院，可說是香港教區修道路徑的另一新發展。

我們當時都在聖安多尼堂做聖母軍，一直做聖母軍，看到、體會到獻身生活也是一種可行的生活方式。當時聖安多尼堂副本堂薛理覺神父¹⁴很支持、培育和鼓勵，所以有了這個抉擇，強化了。

我讀的聖類斯是慈幼會辦的中學，我們跟從的神師所屬的聖安多尼堂，也是慈幼會負責的。神師主張我們入教區修院。他覺得那個時代，應該要去教區修院，所以那時比較特別，我們都進入教區修院。

當時的副主教知道，駱神父、譚坤及李國雄等有心修道，便安排他們在培聖中學頂樓的神父宿舍嘗試過團體生活。

那時只有我們三個人，白天去工作或教書，晚上和星期六日一起祈禱，經過兩三年時間才正式加入修院。這是為了強化我們的聖召，使我們修道的心更強。我們之後便沒有這種安排了。

這些修生直接進入大修院，是因為他們有部分讀過專上課程或在外面工作過，性格各方面較為成熟，故此修院也對他們有特別的安排。

剛進去的時候，修院仍是耶穌會的。將整個修院交回給教區，就是我們正式入讀的時候。當時我們比較年長，人不多，只有幾個，便在四樓分配一些獨立的板間房給我們。

¹⁴ 薛理覺神父 (Fr. Thomas Szeliga, SDB, 1915-2005) 1941 年在香港晉鐸，在港澳兩地傳教及在多所慈幼會學校任職，他於 1955-66 年擔任聖安多尼堂副本堂。〈薛理覺神父 (Fr. Thomas Szeliga) 安息主懷〉，《鮑思高家庭通訊》，第 185 期，〈<http://www.sdb.org.hk/old/sbchinese/185/18523.htm>〉，[8-5-2021]。

我們有些又教過書又讀完大學，年紀比較大，所以對自己的抉擇已經很清楚，不是糊塗地入修院的。我是在中文大學畢業並教了兩年書，然後才進入修院的。當時已看清了與家人、社會、教會的關係。

但身邊的人未必明白。有一起做聖母軍的朋友說：「會不會殘忍了一點？」他都會說這種話。他們認為這樣的抉擇是放棄家庭。雖然我有兩個姊姊結了婚，但也有照顧家裡，所以才有機會進入修院。父母不是很支持，但姊姊很支持。我家裡只有一個兒子，就好像做了和尚，就甚麼都沒有。這種觀念中國人的身分是很清晰的。

我們當時那一屆，有徐錦堯、梁達材，大家都是家裡的獨子，能夠家裡都很願意，是一個奇跡。

我們進修院第一年是操練一下靈修和學拉丁文。經過一兩年時間便開始讀哲學神學。以往是讀三年哲學，四年神學。我們當時年紀比較大，便讀兩年哲學，然後到羅馬讀神學四年，有實習。

其間中文大學正式成立，因為我讀的時候是文憑，所以我問修院能否讓我補回學位，可能將來做神父的時候有需要也說不定。修院說好，所以我便一邊讀修院的哲學，然後回中大完成課程。

那時在中大，有一個同學也是教友，他教書的，我便與他合作，一人上一半的課堂。他能去上課，我便留在修院上修院的課堂，當他不能去上課，便由我去中大。

駱神父在聖神修院時，梵二會議正在進行，在此過渡期，被視為當神父的必須條件的拉丁文，是以個別指導形式進行。

修院做法依然傳統，但也受到梵蒂岡大公會議的影響。我們可以接受到改變，不接受也不成，因為這是教會的趨勢。

不過也有一點衝擊。在香港讀哲學的時候仍是要用拉丁文，只有兩三人。上課的時候，神父是半天來教我們，一直開始減少。我進修院的時候有三個人，都在高主教書院教書，有一個與我一起進修院。他幾個月之後覺得自己不適合讀拉丁文，也很辛苦，便離開了。收到他離開修院的信，真的很有感受，真的是莊稼多工人少。

當時我們是由院長唐多明個別教授，然後便去實習教小修院的中學生，教學相長。當時修院還有中學，那時關傑棠他們也在，就是去教他們，所以關傑棠會叫我「駱 Sir」。

不過後來中學沒有了，小修生全部都走了。那時考不進外面中學的，便到小修院讀中學，浪費了很多資源。教區便取消了小修院，只辦哲學院和神學院。

取消小修院的原因有多方面，一來「一個嬌兩個妙」，子女少了，沒有甚麼兄弟姊妹。我進修院的時候，有三個是獨子。掙扎方面會覺得是否殘忍了一點，有些怨念。所以我覺得社會已改變了，有沒有繼承人也不太重要，看你能否發揮社會上家庭上的特質。

修院除了日常生活，還有愛德服務讓修生們預視到他們升神父以後，這些就是他們的工作。

神師是一位意大利神父，是靈修的指導，瞭解你祈禱和做神父的生活是怎樣的，看如何可以幫助你。我們進入修院時，是甚麼都不可以有的。見神師，他連我們帶一盆小盆栽也不成，要交給他。

在修院生活裡面，服從是相當重要的。這也是考驗你有沒有聖召，願不願意服從犧牲。

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遊玩，都是一起。當時的娛樂是打球。每天到四點便打籃球、踢足球、打乒乓球等等。他不讓你做其他事情。我記得有一年與余尚實神父，他當時已升了六品，我與他一起捉棋也不成，一定要打球。不能倖免。因為打球需要團隊精神，性格文靜的人，也迫著要你改變。

愛德服務多數是出外探訪，探漁船的船家，香港仔那裡的那些，與他們聊天瞭解他們一切，就是這樣。當時整個香港仔都是漁船區，刮颱風他們便全部進來。但跟他們不是太熟，因為我們在修院山上，沒有太多機會與他們接觸。大概每兩星期探訪他們一次，樣子也認不出來。

在修院時要穿長袍，在羅馬也要，連外出也要。讀哲學的時候才准你穿。最初不習慣。每天都要穿，所有學生都要穿，便習慣了。現在不用穿反而有些影響，有些象徵的東西沒有了，是會有一點影響。

修院的團體與堂區又很不同，因為修院的團體比較密切，比較容易感受到兄弟間的情誼。在堂區，除了一起工作的人員、堂區善會、修女等積極一點的人，才會關係比較密切。與教友則疏離一點。

讀完哲學，駱神父便被派去羅馬繼續神學課程。

到神學的時候，便去了羅馬傳信大學，已經不用拉丁文了，所以我們到羅馬附近的城去讀意大利文。上學期還用拉丁文，下學期已全部換成意大利文，因為本地化。不是爭論，是已定案要本地化。第一年學拉丁文，是因為還未完全轉型。

修院每一年都派一些出去讀書，要看修院的政策。我們沒有選擇的，修院派我們去我們便去，如果不派便在聖神修院繼續讀。但因為我們進去的那個年代，耶穌會管理的修院交給教區成為聖神修院，我是那個年代才進入修院的，並不是每個都能去羅馬，只有一部分。不知道原因，視乎修院的需要。上面要栽培甚麼人便做甚麼。

當時傳信大學的學生，四分之三是非洲人，四分之一是東南亞、日本、韓國和來自中國的。如果我們在羅馬升神父是由教宗升的，早半年便已經升，但有數百人一起。我們覺得，為香港來說，為家裡來說，都是回香港升比較好。

數百個修生由教宗升是很有意思，但在香港升，只有一兩個就很隆重。我與徐錦堯一起升的。原本梁達材也是一起的，但他遲了一年，因為他參與了普世博愛運動。

駱神父認為，羅馬的培育很有開放性、很自由，但得靠自己，沒有人會幫到你。而梵二的爭論期已經過去，修生們都知道那些爭論點。

梵二之後在神學方面的開放性很大，尊重本地文化，尊重個人的抉擇，不是死讀書或者死做便算了，所以在後來的工作上也很有幫助，比較有開放性。其實在羅馬讀書與在香港讀書，課程是一樣的，不過在當地接觸的人，相當不同，所以思想會開放的，看東西的眼光也會闊些。

你接觸普世教會，你接觸的事物，看世界也會清楚很多。不派出去的修生，有些也是有恩人贊助的，像有德國的教友恩人，所以我們暑假的時候，就到德國去探望他們，去多謝他們支持遠東的神學生。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給予的自由度很大。之前，就像餵食一樣，你沒有選擇，我給你甚麼，你就要吃甚麼。大公會議之後就像放了幾盤菜在枱上，由你自己去選擇。就是這樣的自由度，所以我們活在梵二會議之後也是一份恩賜。

香港的修院與羅馬的修院已很不同了。自由度兩地也不同，所以我覺得修院，以前有小修院，在中學裡收小修生。後來發覺他們不夠成熟，不如等他們讀完中學，工作幾年，才進修院，到時才收錄，成熟程度就大很多了。離開修院的機率也低很多。

駱神父在晉鐸初年曾任《公教報》編輯及擔任聖母軍督察區團神師至2011年，七十年代末更擔任教友總會指導司鐸至2006年。多年來服務不同的堂區，現時已退休。

從華南總修院過渡至聖神修院

1964年，即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結束前的一年，教廷傳信部因內地修生已不能來港培育，遂決定停辦華南總修院，並把修院建築物轉交香港教區管理。原本只培育小修生的薄扶林聖神小修院亦遷入，使總修院原址集合大小修院於一身，教區把這所修院定名為聖神修院。梵二結束後，本地修生的培育邁向新一頁，修院以普世教會要求的改革精神，並配合香港社會的變化，逐漸完善司鐸的陶成教育。故此，在這個過渡期，數位受訪者都有比較特別的經歷，有去台灣一年便被召回來的，有從澳門過來的，也有曾短暫離開修院的。

劉德光神父



- 1959 進入薄扶林聖神小修院
- 1966 轉入香港仔聖神修院
- 1969 赴台灣修讀神學
- 1970 回港繼續神學課程
- 1973 晉鐸

作為聖神修院神學院第一屆畢業生的劉德光神父，出生於傳統公教家庭，家裡是世代天主教徒，信仰方面從小受到雙親、叔父劉蘊遜神父的薰陶，他認為自己入小修院是很自然的事。

我是 1959 年入小修院的，當時十一歲。哥哥入了修院，自己放假時會去修院探他。我覺得神父很威風，但又很有愛心。後來就知道修生的生活有彌撒、默禱、念經，信仰、靈修生活，是有系統的培育。

小修院一般和中學的課程一樣，加上拉丁文、《聖經》的課堂。我讀的是中文中學，我們叫初一、初二、初三，中一、中二、中三；中三即現時的會考班，參加政府的會考。

還有神師定期的訓話和每天靈修的功夫，即是早晚課、玫瑰經和朝拜聖體或類似的神工，慢慢的薰陶我們，所以小修院是一個預備的階段。我們要到大修院才正式讀修院的課程。中一至高三，六年之後，有一年是預備班，去考 GCE 倫敦大學入學試，一年時間就是讀這課程。讀完這七年訓練，就開始讀三年哲學，四年神學。從小修院至完成神學第四年，一共有十四年的時間在修院裡。

當時的修院制度，不用交學費，修院會提供你的日常用品。但你額外要買東西的話，就要家人經濟上支持你。我得到父母經濟上的支持，家裡每個月都會給數十元給我作使費。在當時社會來說，數十元已經是很多。

我是聖神修院第一屆畢業生，華南總修院交給香港教區管理，我入大修院後就易名。香港教區就將它改名為聖神修院。

要抉擇是否做神父，我沒有太多掙扎，家人都是教友，支持的。而且自己很穩定，所以自己的掙扎和他人給予的壓力也不多。

在大修院學哲學基本上都是用拉丁文，課本是拉丁文，教授也是用拉丁文，會輔以英語，因為當時的教授都是外籍的。教哲學的教授當中，有一位較為特別，是現在仍然在香港的田義神父，他當年是聖神修院的副院長，他教導我們哲學，用拉丁文，甚至用中文、英文教我們，但課本一定是拉丁文課本。

在劉神父修讀神學的時候，修院發生了一件事，引起很大的爭議，緣於修院神學院的開辦和梵二本地化：

聖神修院最早期讀到哲學院，便沒有神學院，所以我之前的修生讀神學的就要去羅馬，但到我那一年便開始轉去台灣讀神學，因為香港的神學院剛剛開始辦，所以讀了一年便要回來。我們最初都是準備去羅馬讀神學，所以都有學習意大利文。我記得是徐誠斌主教的時候，他覺得之前多年的神父都是去羅馬讀神學，對於信仰本地化做不到很多，所以第一個最大的改變就是由我那一屆開始，安排我們到台灣的輔仁大學神學院，那裡是耶穌會神父辦的。當時和我一起去的共有五位同學。

徐誠斌主教最初答應我們去台灣讀四年神學，讀完便升神父。豈知在台灣讀第一年的神學課程，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醞釀成立，當我們要升讀神學第二年的時候，聖神修院的神學院正式開辦。當時徐主教很厲害，他決定我們五個在台灣讀書的修士要返回香港就讀。他的主張就是說，香港有自己的神學院，就要求我們回來。

但是我另外幾位同學，因為徐誠斌主教要求我們回來這事受到的衝擊很厲害，他們很歡喜在輔仁大學神學院，要返回香港很不開心。那是一間國際化的神學院，雖然是台灣耶穌會主辦，但是有不同國籍的修士、修女等。我們都很喜歡這個學習環境，但基於徐主教要我們必須回來的決定，我們沒有選擇，所以去台灣的修生中有三位就決定不再繼續讀神學，立即離開了修院。當年從台灣返回香港繼續修讀的，有我和另一位同學。這個同學和我一起讀到第四年神學之後，也決定不會當神父，因此最後升神父的只剩下我一人。

雖然留學台灣只有一年，但劉神父觀察和感受到一些分別：

我想神學的內容，每間神學院都是一樣，分別是學院的氣氛，當時輔仁大學神學院真是有一種大學的氣氛，當時香港的聖神修院神學院就沒有。

台灣的教區接納我們去做培育、靈修等，我們香港一群修生同學就在聖多瑪斯總修院一起住。這一所神學院本身就是台灣的總修院，全台灣包括嘉義、台東很多不同教區的修士在此就讀。如果比較聖多瑪斯總修院和聖神修院都是沒有甚麼分別、差不多。不同的是我們早上參加彌撒或者是默想這些靈修功夫，吃過早餐便會去輔仁大學的神學院。輔仁大學有不同的學院，使你感覺每天都是去上課，大學的氣氛很濃厚，在神學院裡因為學生不同的國籍，而教授大多數是耶穌會的神父，很有水準，所以我們去讀神學的時候，就會有國際的幅度。因此，當年三個不願回來香港的修生，因為實在太歡喜當時在台灣的豐富思想交流，無奈教區修生一定要聽命於主教，主教說要回來，我們就一定要回來。

我們不能跟主教說不想回來。如果我們留在台灣，為教區的聖召來說表示終結，因為你不聽命於你的主教。台灣的神學院或修院亦不容許你繼續留下來，以往的神學院是為了栽培神父，不會有外讀生，跟現在香港的神哲學院有外讀生有所不同……你離開了自己的聖召崗位，台灣那邊也不會再收你，因為你已成為平信徒，人家不會接受，我們幾位修生只好「死死地氣」¹⁵ 回來香港。那三位不跟我一起讀神學的同学就回復了普通人的生活，開始了不同的職業，甚至是沒有繼續讀書。

我認為聖召在哪裡培育是沒有問題的，意願最重要，只要自己想做神父，所以我跟我的同學說……在台灣讀神學和回來香港讀也沒有甚麼分別。這是我的看法，但是我的同學沒有嘗試回來讀，聽到要返香港已經很不開心。

他們的激動，他們的反應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反而我自己，第一個反應都是不開心，但我是想做神父，接受自己的聖召，平衡輕重，我會接受主教的安排。

1970年以前，修院的課程全為修生而設，讓修生接受全人修道的訓練，不接受外來的學生。之後，徐誠斌主教看到送修生往台灣輔仁大學附設的神學院進修神學課程的不方便，和在本地化的牧民訓練推展上有所不足，為履行梵二精神和教區會議的建議，在聖神修院院址內成立了一所培育修生和教友的「聖神修院神哲學

¹⁵ 心不甘，情不願地。

院」，並毅然地將送往台灣神學院進修的修生召回香港修讀，修院的圖書館亦一併擴建。¹⁶

劉神父回到香港，學習上出現了改變：

回到香港，神學課程已經不用拉丁文。耶穌會的教授每位都說英文的，所以主要是用英語教的。而且他們已經教授神學很多年，有些是華南總修院時代已經教授，他們繼續教我們。

在台灣的時候就用國語，所有外籍神學生都要學習普通話。課本就很特別，主要是教授自己編寫的教材，因為教授多為外籍人士，因此內容多為英語。台灣著名神學家張春申，另外有一位教《聖經》的叫房志榮神父，當時無論在《聖經》或神學都稱得上是專家，他們都有自己的講義，我們的其他參考書籍大多數是英文的。當時很少是中文神學書。

這是自然的事，因為禮儀開始已經用中文，不需要學習拉丁文，因此修生自己有興趣去學拉丁文，只是一種興趣，並非必修科。這是一個慢慢的轉變。

講及修院內的聽命、聆聽與溝通，劉神父有自己的見解：

我有些同學說，院長不會聆聽我們的提議。我會說，院長要聽十個意見，你講的意見，他可能覺得已有更合適的意見，不是不聆聽。

我在修院的生活很開心，因為每個月都會見神師一次，有不妥的地方說出來。甚至後期的院長已經開放了很多。我們走進去跟院長說話，他都會聆聽，所以不要假設別人不聆聽而不說，說的時候都要明白對方未必接納你的意見，因為同一時間會聽到很多意見，作為長上會衡量，然後才決定採納哪一個意見。

修生每天早上吃麵包，飲品是規定了，例如星期一是牛奶，星期二是阿華田，星期三是好立克，但就沒有咖啡這類東西。我記得當時是田義神父做副院長。我也曾經做過一段時間學長。有一天我走進田義神父的辦公室跟他說：「你知道我們已經是大人嗎？就算要飲阿華田，

¹⁶ 周景勳：〈反思梵二後香港教友神學培育的發展——以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宗教學部的發展為例〉，頁4。

是否應該放置阿華田等修生自己沖呢？」我的意見是早上在枱面上放好立克、阿華田，以及奶粉，或一罐咖啡，修生可以自由選擇。田神父非常樂意接納我這個意見，之後真的開始跟我提議的做法。

我覺得修院是可以溝通的，以及你講的事情合情理，修院長上是會聆聽的。我覺得修院長上的意見和決定始終很重要，帶領著修生。大公會議之後多了對話，大家多了商量或者互相聆聽對方的意見。

修院在我就讀的後期，大班、中班、小班各自做檢討，差不多每年至少有一次，晚上大家一起，神師和院長也在席上，副院長帶領我們檢討生活及問題。

修院院長開放與否，很明顯的表現在修生的生活節奏上，我說的是小修院，由院長主導你去做甚麼，那時候院長要負責六七十個修生。因此院長很嚴格，樣子嚴肅，因為要帶領一群要成長的小朋友。院長一定不能給你有選擇，而是為你定下路線。回頭一看，我們當時的年紀實在不適宜自己作選擇，所以院長定下路線給我們走，有時是比我們自己摸索來得好。

到了大修院的時候就不同了，我很有印象小修生時參觀大修院，聽到有雞蛋吃，一人一隻。我們很羨慕，在小修院是沒有的，感覺大修生的生活很自由，而且他們早餐是有這些又有那些。

大修生已是成年人，早上有得喝咖啡，但小修院沒有。小修院裡的是小朋友，不應該喝咖啡。大修院的修生外出或其他的機會多一些，小朋友只會很羨慕他們。

大小修院的團體生活是劉神父最回味的：

當時教區修院非常重視群體生活，而我真的覺得這種生活是有頗大的樂趣。想起這些團體生活，想起現在很多人，如陳志明神父和同期的神父，我們以前在修院一起打球，很開心的，團體生活真很奇妙。

修院聖召發展到現在的階段，人數比較少，跟我們以前有精彩的團體生活不可同日而語，那時的團體生活真的很豐富。我們修生甚至多至需要分小、中、大班，所謂大班就是讀神學哲學那些，中班就是中三開始的高年級中學生，小班就是剛入修院的那些。修院當然同一院

長、神師，但修生人多，以分班制的管理方式，有學長帶領修士。學長可能是由中三最高年班的其中一個做。

1971年，香港政府開始推行免費教育，社會整體經濟環境也逐漸改善，青年大多在中學畢業後才考慮修道，所以修院逐步不再收錄小修生，小修院亦告終。劉神父如何回看這個制度呢？

時代真的不同了，現在會否有十多人入修院呢？另一樣很重要的，一個人的成長，家庭的培育很重要。跟我同年紀入修院的人是中一生，很多都是十一二歲，他們要離開自己的家，你可以想到每晚睡覺的時候有些同學會哭，他們掛念爸爸媽媽，這個年紀是需要與家庭一起，所以回望過去這種離家、遠離父母入修院的制度是頗值得商榷的。

當時修院也有一種講法，就是把院長、副院長當作爸爸媽媽。但望著他們真的不是自己的父母啊！院長要打理幾十個小朋友，他關心每個人的程度不可能像父母關心子女一樣。很懂得與人溝通、接觸的同學，便能受到他人注意。某些同學性格偏靜，不是很懂得與人相處，會站在後排角落。但這個小朋友真的需要人培育，所以我們在長大過程中，看到不同類型在心理上欠缺的小朋友，有些最後會離開修院。

現今只有很少數的人做神父，這個就是要我們思考，問題出在哪裡？我看得出這是家庭的問題，因為家庭的信仰低落。回想我那個時代的爸爸媽媽可能很 push [催逼] 我們望主日彌撒或者參加歌詠團、善會，如果不聽從的話，便會用藤條打我們。現在的父母很少會這樣督促子女，而且我們的社會把父母的注意力放在生活，家裡的對話都會關於工作、收入和支出，整個家庭的核心有時就放在這些事情上。我們的時代，沒有娛樂，沒有電視或甚麼，一到晚上爸爸媽媽就會叫我們圍在一起念玫瑰經。

以我們的年代為例，小時候入修院很多人都是被動的，父母鼓勵小朋友入修院，有些同學是受父母強迫才入修院，他本人不願意的。因此當修生逐漸長大，會自主的時候，就會離開。另一方面也有同學的爸爸媽媽不斷 push 他們，使他們由無興趣變成有興趣，最後都能做神父，所以父母家庭的力量，始終是重要的。我想現在的聖召一定要聚焦家庭，然後建立一些真正的教友家庭、家庭的信仰和家庭的祈禱。

說起在修院難忘的事，劉神父分享了他從鬼門關逃出來的事：

我現在也會和人分享我的生命是天主的恩賜。我在修院讀中三左右，得了盲腸炎。我記得我的肚子有一段時間常常痛，我都在想是甚麼病，在圖書館看一些生理衛生的書籍，有一點點頭緒覺得是盲腸炎。到了某一晚盲腸炎發作，又發燒又嘔又咳，當天晚上是十一、二點，院長唐多明神父對我說：「劉德光，你乖。今晚太夜了，我找不到人送你出去，不如明天一大清早送你。」我平常很聽院長的話，那天晚上我有一股很特別的力量要去。院長繼續說：「乖啦乖啦！聽話啦。」我說：「不行，一定要去。」當時我還不知是甚麼事情。後來院長真的聽我的話，找人送我出去。陪我去瑪麗醫院看守著我的就是夏其龍神父。他當時是學長，可能是高三。到醫院的時候，醫生一看是盲腸炎，而且已經穿了，去了腹膜，所以即時一個小時內做手術。醫生問我為何這樣。因為當時唐多明神父遇到我們有甚麼病，都叫我們喝「果子鹽」。你知道如果盲腸炎胃壁變薄了，還喝「果子鹽」，會令胃部潰爛。

我仍然有很深印象記得醫生對我說：「你幸好早來一個小時，遲一個小時已經來不及了。」手術之後我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比一般只需一星期就可出院長很多。這件事是生死攸關的決定，如果我當晚聽從院長的說話，我已經不在人世。當天晚上有一股很奇怪的力量，所以我有今天，才能在這裡。對我來說，這件事是非常深刻的。

最後，劉神父於 1973 年 6 月 30 日晉鐸，便開始於不同的堂區服務。修院學習的種種，足夠協助他日後多樣的牧民工作嗎？

我在我的堂區聖德肋撒堂升神父。主持我這個晉鐸禮的是李宏基主教，他晉牧主教不久便離世，所以我印象中在香港，李主教應該只升了我一個做神父。

我們在修院讀神學哲學七年是幫助我們去思考、分析日常生活很多的事情，所以萬萬不要覺得修院這麼多年讀完都沒有用。這些思考幫助你將來思考其他問題快捷很多，清楚看到正確和正負的事情。這是我覺得最大的用途。

以前的神父很獨立，很有權威。以前神父的能力，例如建造一間聖堂，是神父自己獨力做好；今天一定不是一位神父可以建聖堂。我覺

得以前的「神職主義」現在都有，不過現在的是集體領導的「神職主義」。以前的神父是在團體的前面，現在的神父是在團體中間，這個是很重要的。

劉神父現時是海星堂的主任司鐸，見證教友投入堂區事務，他認為神父今天的角色是帶領教友去發揮他們所長。

今日的香港教會很棒，已經刺激了一些教友走出來，以他們的專業來服務，每個堂區都有不同管理小組，當中的成員包括有建築師等的教友，有些財經界的教友，就會服務財務組。我只帶領著他們靈修的事情。

神父可以客觀的看看這些專業人士的決定，很容易知道建築的專業對聖堂這座樓宇的建議是有益處的。中間的細節很多是需要專業人士的意見，做本堂的要懂得去找這些專業的人士，和他們合作。他們給予的意見是好的話，要讚許，如果遇到不大合適的意見，要和他們分析。大家維持一份良好的友誼。不要像一些人脾氣很大，不認同教友專業人士的說法，覺得自己是本堂，說的就是對。

蔡子敬神父

- 1958 從大陸來港，獲安排到澳門讀書
- 1961 入讀薄扶林聖神小修院
- 1964 隨小修院搬進聖神修院
- 1967 離開聖神修院，轉到馬來西亞檳城大修院
- 1975 在大溪地晉鐸



出生於大陸汕頭教區一個公教家族的蔡子敬神父，因政治環境的關係，領洗記錄、《聖經》、聖物在小時候被政府燒光了。在他的家鄉，只有蔡神父的家族是信奉天主教，他自小跟爸媽念經，有些聖歌也能背唱出來。

小的時候，我們家鄉沒有聖堂，沒有修士修女，也沒有神父長期居住，所以沒有平日和主日彌撒。每逢過大瞻禮，只能夠去有神父居住的石仔溪望彌撒和領聖事。自家鄉到石仔溪，必須步行幾個小時的路程。

我們家鄉很少有神父到訪，就算有，他逗留的時間也不長。由於缺乏神父，教友只有在家裡或公所裡一起念經：例如念玫瑰經，若有人逝世，大家為他（她）恭念煉靈經，或拜苦路等等。

對我來說，家庭信仰、見證，對信仰的培育很重要。我的聖召也是全靠家人在信仰上的善表、見證、祈禱和鼓勵才培養出來的。熱心教友家庭是聖召的重要園地。

直至蔡神父十一歲的時候，1958年的清明節左右，他偕同父親、三哥、細姐和幾位叔叔共十二人偷渡香港。

其實我們偷渡香港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幫助汕頭大堂的副本堂陳希天神父逃離大陸。當時政府不准他與教友聯繫，在兩次違命後，第三次政府又抓他，他只好晚上到各處教友家庭躲藏，並要求教友盡量幫他逃去香港。我家是他的首選，因為家鄉近海，我父親曾在大陸和香港之間做生意，路途較熟悉，我三哥又是漁民，所以他要求我們幫他。

經過數個月秘密商討各項細節，時日、出發地點、飲食、船隻大小、人數人選、保密和如何逃避民兵幹部等。所有會議全在我家夜間舉行。我當時和父母同床睡的，年紀雖小，但對偷渡計劃完全知曉。依

照計劃我是沒份去香港的，因為我是家裡最小，排行第十，父親要我留在母親身邊。

就在出發的那天，我細叔要求我三兄准他帶其養子子光同去。我三兄接納他的請求，由於船隻夠大，我三兄也決定帶我一起去，我知悉後，喜出望外。對事情的變化，我三兄不准我告訴任何人，連父母都不知情。當三兄帶我跪在母親面前和她拜別時，我媽媽拉起我問：「你做甚麼？」我三兄便說：「我要帶子敬去香港『讀神父書』。」我媽媽聽了眼淚直流，三兄和我站起來，就這樣離家走了。這是我聖召旅程的開始。

我家鄉說「讀神父書」即是入修院做神父的意思。其實，當時的本堂彭敬元神父原本有意派我三兄去修院，後來共產黨當權，就沒機會了。這次他用「讀神父書」為藉口，使我媽媽讓我離家，我相信是天主的旨意吧，所以大家在天主面前，說話要謹慎，話說了效果很靈驗。

出發的那天晚上，當大家正在心急地等候最後一位成員到來時，我細姐突然出現。當時，除了我心感高興，大家都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因為要來的人沒來，意想不到的人卻出現了。事後才知道那要來的人在路途中發覺有人跟在他後面而自動放棄，回家去了。誰知在他後面的，正是我細姐！

逃亡過程中，蔡神父的小船遇上了大陸船，有戴五星帽的人在大船上出現，他們把陳神父和被誤以為船長的三兄朋友捉上大船，再用繩索拖著小船回大陸方向。幸得富有航海經驗的三兄機智指揮小船上的各人，並且齊聲誦念：「聖母救我！聖母救我！」，終在九死一生的情況下才逃到香港。

我們的小船在香港太古船塢靠岸，大人們都上岸去找親戚，只留下我一人在船上等他們回來。其間有香港水警經過，只看見我一個小孩子，沒有抓我便離開了。他們回來後，親人帶我們去拜訪白英奇主教，因為他去過我們家鄉。因為我們是幫陳神父偷渡，加上我三兄的意願，我來香港是為了「讀神父書」，白主教就請李若安神父幫助照顧我們。

那時我們是難民，李神父安排大人們到何文田一間小屋暫住，食用當時的救濟品，我則住在京士柏恩主教紀念堂的閣樓。隨後李神父送我去澳門慈幼讀小學兼寄宿。

初到香港和澳門，只會講家鄉話，語言不通，生活和與人交往確實困難重重。在澳門讀書時經常受人欺凌，很孤獨淒涼。我在澳門開始學廣東話，同學教我的都是粗口，很快學會，但一想起放假時，如果在李神父面前順口講粗口怎辦！我便定志改過，不講粗口直至現今。

我在大陸只讀過一兩年書，在澳門讀三、四年級，三年級時全班三十六人考第九名；但到第四年級，語言識講識聽了，成績較好，常在前三名之內，便跳去六年級，省錢又省時間。讀完小學，校長時乃德神父（Fr. Martin Schneidtberger, SDB）問過我想不想入慈幼會修院，那時我只聽從李若安神父的安排，入了聖神修院。

61年小學畢業之後，我就進入薄扶林聖神修院，那時是艾巧智神父 Einaudi 做院長。我是屬汕頭教區的修生。

入修院的時候，需要我爸爸簽名認可。那時我爸爸年老，已進入牛池灣老人院。我去找他時，他正在看報紙。我跟他說：「爸爸，我想入修院，你要簽名啊。」他就在報紙一個角落找個空白處寫了他的名字，撕下來交給我，我把它給李神父看，說爸爸簽了名，李神父看後在笑，我就這樣入了修院。

小修院的生活是挺好的，神修生活就是早晚課、彌撒、神師訓話、避靜，其他都是跟中學課程一樣，應付會考，修院根本像一間寄宿學校，而且沒有澳門慈幼會寄宿那麼嚴緊。生活挺輕鬆自在，因為只是讀書，而且每星期都會去行山，我們常跑上太平山，行薄扶林水塘，到處走來走去，在很多地方留下不少足印。

蔡神父回想在薄扶林修院期間也有不少有趣的點滴：

63年香港開始制水，院長唐多明神父就叫修生去裝水。沒有水桶，就用大水袋，是塑膠做的。制水時頗淒涼不便，也很緊張。

記得冬天洗澡的時候，熱身時好像打功夫一樣！因為好冷啊，加上沒有花灑，要自己用凍水抹身，天冷時的感受真令人難忘。遇著颱風吹襲香港，小修院生活變得緊張起來，若發生在晚上的話，颱風的風聲會令你驚醒，很可怕的。

通常在吃過晚飯，睡覺之前，我們會在大門口外面談天說地、講故事，很喜歡聽鬼故事，但聽完之後又害怕，有時睡不著覺。那時候有些同學害怕到要向人借念珠或聖像來壯膽。

小時候我很怕鬼、很怕黑，睡大宿舍，晚上上廁所都心驚膽跳，尤其是見到有些掛在牆上的長衣，夜裡見到就好像有人站在那裡，令我害怕。有人晚上說夢話，日間都會被人取笑。

蔡神父的父親在他進入修院的第一年逝世，往後都是李若安神父照料他的。

李若安神父可說是把我養大的大恩人。九龍恩理覺紀念堂，可說是我們汕頭教區修士、修女、神父的大本營，李神父牧養在香港的潮州教友。彭保祿、溫以政、蔡仲甄、張秉剛、黃俊傑、姚崇傑、李緒忠等鐸兄，都是他培養照顧的。那時我才一個小孩子，而他們在汕頭教區都有入過修院，李神父幫了很多這些聖召繼續修道。我們那群裡，周景勳年紀小一點。

李神父對我而言，就像父親。我幫他洗腳，倒尿壺、鋪床、洗車，總之他要做甚麼，我就做甚麼，甚至沒叫我做的，我都幫他做妥。

不過，對神父的官僚作風，我不敢領教，這是老一輩的神父培養出來的！我不喜歡這種風格。我們小時候沒有資格跟神父同枱吃飯，只能跟亞孀在廚房裡面一起吃。到我讀完神學從馬來西亞回來，才有資格跟李神父一起吃飯。

平常我們在修院的時候就沒有資格跟神父吃飯。他們吃完才輪到我們。我對這些很反感，但我對李神父做的，我並不後悔，我很討厭那些存有階級觀念，喜愛擺架子的神父，所以我做神父之後，有人說我不像神父，我感謝他們說：「幸好你說我不像神父，我是神父，我不想做個喜愛擺架子的神父。」我喜歡與人打成一片。其實做神父沒甚麼特別，它只是一個服務的聖召罷了。

1964年香港教區接手管理華南總修院的院址，並把薄扶林聖神小修院遷入，成為本地教區的修院，繼續以聖神修院為名。

我們是第一批由薄扶林聖神修院轉入華南總修院的。我跟劉德光神父同住在新建成的新樓裡，我房間跟他是隔壁。他比我高一班，比我先會考畢業，我是搬去香港仔後才參加會考。

66年香港發生暴動¹⁷。因為怕共產黨，李若安神父他有意派我去馬來西亞那邊讀書，因為他以前是在馬來西亞檳城讀神哲學的。但我不想一個人去，後來有另一個汕頭教區修生想陪我一起去，我便答應了。誰知，我們申辦去馬來西亞的手續不到一個月，他就推遲不去了，因為他結交了一位女朋友。這事令我很失望，心裡想：「豈有此理，說了去最後又不去。好，我就一個人去。」1967年我獨自乘客貨船，自香港經新加坡到檳城。

檳城大修院很有名氣。它是東南亞的總修院，歷史悠久，先後培養出五十一位真福殉道者。我到馬來西亞之後，不知何故，香港修院的同班同學一個個離開了修院，只剩我一個在遠方。幸好，我在檳城修院的同班同學大部分學成晉鐸，其中一位在泰國晉升為主教。感謝天主。

蔡神父在香港修院的階段，看到一些令修生無所適從的情況。

每個傳教士在各方面都很值得我們去學習，但也有缺點，好像我們在聖神修院的時候，有時真的被神父「點死」¹⁸，他們說做甚麼，我們就做甚麼。

那年代的修院，收到信件要先讓神父過目，在蔡神父臨離開修院之前就碰上這樣的事情：

當時院長唐多明神父叫我去見他，他問我：「你為甚麼要走？」我說：「我沒走！」他再說「你不要走！」我覺得莫名其妙。他仔細問過後，叫我去通知張耀先副院長，說我見過院長了。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張副院長告訴我，修院收到兩封我的信，一封來自羅馬，另一封來自馬來西亞，兩封信都叫我請李若安神父派我去海外讀書，一個想他派我去羅馬，一個想他派我去檳城。這些事我事先是完全不知情。

我問張副院長：「那兩封信在哪裡？」他說：「現在不能夠給你，因為會影響你讀書。」我心想：「如果真的不想影響我讀書，你應該等我

¹⁷ 1965年10月，當時唯一的渡海交通工具天星小輪申請加價，雖受社會輿論反對，但交通諮詢委員會於翌年3月仍批准申請。青年人蘇守忠為此於4月4日絕食抗議，得到其他市民上街聲援抗議，引發騷亂，港英政府出動軍警平亂，稱為「六六暴動」或官方所稱的「九龍騷動」。

¹⁸ 吩咐做很多不同的任務。

考完會考再告訴我啦！通知我，又不把信給我。」幸好，我會考及格。會考後，我去問副院長拿信，他說不知放在了哪裡。這兩封信直到現在我都沒看過。這是小事，不重要。不過這樣處事很不好。沒有私隱，不讓我知，怕影響我讀書，就不該在會考前告訴我。告訴了我又不讓我看信，事後信又弄丟了。

另外，有遇到女性親人來修院探我們，唐多明神父經常說：「鯨魚到了。」我不認同這樣稱呼女性。另外，在對待中國人和西人方面都有些差異，混血兒或西人老師有自己房間，幾個中國老師卻聚在同一間房，何解？公平嗎？

大公會議之後，有時參加演講，或有外國神職人員來演講，我們有問為甚麼我們中國修士要先讀英文或拉丁文才去明白神哲學呢？不是為我們中國人難上加難嗎？當時的答案是因為缺少華人教授。教區繼續派人去羅馬或其他國家留學，培養人才是對的。

在檳城的大修院繼續培育，為蔡神父來說是要重新適應新環境。

我到檳城之後，在語言方面，大公會議後，用本土語言，以前所有的拉丁書全都取消，改用英文，所以我從中文開始轉用英文讀哲學、神學，真不容易，很辛苦。我們修院的修生有好幾十人，大部分是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越南、柬埔寨，也包括從大陸和香港過去的。在食物方面，以咖哩、辣椒和很多「熱氣」¹⁹的東西為主，但我受不了，所以每星期我都要喝「王老吉」²⁰。

檳城修院的教授大部分都是法國神父，他們處事規則跟香港有些不同。他們比較講理、開放、重人權。

有一年我在檳城修院負責很多東西，例如主辦學習班、運動組等活動，組織與院外比賽，或者是組織郊外活動等等，很受歡迎。因為在熱帶地方，修院准許修士抽煙。聽說以前較為嚴格，由修院去別墅山都要穿著同樣的制服。後來改革，變得更現代化。

在牧民訓練方面，馬來亞比香港好。我們每個假期都有一個牧民主題去實習。我們去參加善會、做探訪，做完之後，都有數星期自由活動，我們每次被派去任何堂區，修院都會給那個堂區修生的膳食費。

¹⁹ 「熱氣」是中醫對咽喉腫痛、炎症、口舌潰瘍等多類症狀的籠統說法。

²⁰ 王老吉，涼茶品牌名稱，人們飲用以消除「熱氣」。

我們每個修生都有恩人，但沒有遇見他們，只知道他們的名字，為他們祈禱。有慈善組織跟修院接觸，負責我們每年每人的費用。我很感謝這些恩人。那時我有恩人在美國、瑞士、荷蘭和香港。

香港的恩人大多數是李若安神父經手。我們知道有些熱心汕頭教友幫助我們。

蔡神父從香港轉到檳城修院，最後卻服務他毫無概念的大溪地教區。

我在檳城領六品，就加入了大溪地教區。這事也很奇妙，因為我們不能夠回去大陸，需要加入另一教區才能領神品，當時大溪地總主教需要中國神父牧養當地的華僑，他去找住在新加坡的王守禮主教，向他求神父。王主教以前是大陸寧夏教區的主教，離開大陸後，教宗任命他做海外華僑宗座專員。我們是屬於王守禮主教管理的。

大溪地主教接觸王守禮主教，王主教沒辦法派神父去，叫他去香港找李若安神父幫忙。李神父自己不能夠去，大溪地主教就問他有沒有修生。我當時在香港度假，見到李神父時，他就跟我說：「大溪地主教來香港找我，問有沒有神父可以派去他那裡，你想不想去？」我問：「大溪地在哪裡？」找地圖看，地圖太小找不到大溪地。這事沒有下文，我就回到檳城繼續讀書。

一年後，李神父到檳城，再詢問我有關去大溪地的事。我又問了很多相關問題，他不能解答，我便寫信給王守禮主教，王主教又將我的信寄去大溪地主教，他用法文回了很長的信，四頁紙全是法文，我一個字都不懂。後來，我又接到另一封信，來自南美洲，那教區的華人神父從《海星報》知道我快畢業，便寫信叫我去接替他。大溪地主教又找我去，我兩個地方都不認識，修院的法國神父提議我說：「去大溪地，因為是法屬的。」我不知大溪地是怎樣的地方，這樣選擇好像對我不太公平，修院便給我一個機會去看看，再作決定。

大溪地的主教願意為我出機票去度假。1972年我第一次去大溪地，語言不通像個啞巴似的，地疏人不熟，但因為那裡人情好，在返回檳城前，我在大溪地主教座堂領了讀經員和輔祭兩神職，返回馬來亞讀第四年神學，在讀完之前，我決定加入大溪地教區，在檳城升六品。領完六品我又多讀了一年。

大溪地主教容許我升神父後去法國讀書，因為我到大溪地甚麼都不懂；不懂法文，不懂客家話，不懂大溪地話，加入教區一切都從零開始。幸好有很多人支持和勉勵我。我終於在 1975 年 1 月 18 日晉鐸，成為大溪地教區司鐸。

同年 10 月，蔡神父被派到法國修讀法文及考取神學學位，又拿到獎學金去倫敦和愛爾蘭進修大眾傳播課程。完成學業後，返回大溪地教區為傳媒和華裔教友團體服務。

1993 年，蔡神父的三兄在港去世，他返港奔喪，途經奧克蘭，當時奧克蘭教區主教丹尼斯·布朗（Bishop Denis Browne）邀請他到奧克蘭協助華人牧民工作。在兩個教區主教和神父本身的認同下，達成協議。1994 年初，蔡子敬神父正式成為 *Fidei Donum*²¹，在大溪地和奧克蘭兩教區服務，起初每年為期六個月。自 1995 年後改為每年九個月在奧克蘭，三個月返回大溪地為華人團體服務至今。

²¹ 拉丁文指意天主的恩寵，亦是 1957 年教宗比約十二世頒布的《信仰的恩惠》通諭的首兩個字，內容強調主教對普世教會的責任，鼓勵每位教友關心教會宣揚福音的事業。

薛君浩神父

- 1962 進入薄扶林聖神小修院
- 1967 進入聖神修院
- 1971 離開修院，加入「普世博愛運動」
- 1998 再開始聖神修院神哲學課程
- 2002 晉鐸



在眾多受訪者當中，薛君浩神父的經歷也是比較特殊。他在六十年代已進入修院，卻是一位「千禧神父」。這中間的幾十年，讓他更能看到修院箇中的變化和發展。

機緣巧合將薛君浩神父帶進小修院。他生於公教家庭，小學畢業，參加全港聖母軍的避靜，地點就在聖神修院，主辦者亦想藉這次避靜的機會推廣聖召。

我是六年級開始做聖母軍。我做輔祭很多年，神父就讓我試一下做聖母軍，然後跟其他人去做服務。當時功課不會很忙。沒有升中試，所以自己要去找學校。

我感覺聖母軍探訪員每星期的分享有些作為，聖母軍的領袖率先分享內心深處，見到受助的人的苦況或在信仰上的迷惘，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幫自己反省。聖母軍作為這樣的一個搖籃，是否聖召培育，我想是可以肯定的。只不過聖母軍也沒有很明顯的講及聖召。我覺得它作為一個青年團體，有一個好像好兄弟的關係。這是有助於自己的發展。就算有些人的性格沒有那麼開放，參加了聖母軍就比較容易社會性一點，社會化一點。

回到堂區後，堂區神父有跟進參加了避靜的成員，問我們：「誰有興趣想認識更多修院的生活呀？」我那時便表示願意嘗試。當時我已經找到了中學，但既然都是讀中學，修院也有中學，那便轉去修院讀。家人很開放的，也很贊成。

就這樣，薛神父於 1962 年進入薄扶林聖神小修院。小修院的生活比較封閉，一年到晚都在修院範圍內。

我中一那班有卅人。之後第二年有四十人入小修院，所以是很擠擁的。進去的每個都想做神父？可能其中甚至有不知道修院是甚麼的，

所以當作是教友培育又好，慢慢去觀摩聖召也可以，是一個很好的訓練，訓練內容比較關注靈修生活，對一個普通教友而言，也是一種很大的幫助。

學拉丁文不是太辛苦，因為我是英文小學畢業，相對來說容易一點。有些從中文小學畢業的同學會比較困難，他們入修院後，發現原來很著重英文，要學拉丁文，所以頗為辛苦。為我自己來說，中文就比較差，而小修院當時是中文中學，所以要急起直追。

入聖神小修院之後，與外面的同學沒有甚麼聯絡了，甚至大節日也只是在修院內慶祝，所以有印象進去以後就像進入了隱修院。當然在裡面幾十人一起，不會覺得孤單。團體生活很適合多種集體遊戲，所以生活並不苦悶。我們那個年代，小學畢業，一般學生也不會有太多社交生活，因為當時的環境比較清貧，生活很簡樸。

中一的時候，修生是要穿長袍的。在修院，由於彌撒都要穿長袍，所以自小便習慣了，沒有太大問題。反而穿著長袍出外，那就不一定。我中一第一年放暑假回去鑽石山堂區的時候，要穿著黑色長袍望彌撒。大家的眼睛都看著我，感覺很尷尬，之後第二年已經不需要穿了。

我中學畢業之後便立即入大修院。我當時是要考中六的，考完了有機會讀大學，不過沒去讀，卻開始讀神哲學。

薛神父入大修院的決定是經過充分考慮，甚至連隱修院也考慮過。

小修院的培育，不只重視學業，更著重心靈上的體味。這令我覺得對人生的價值應有所取捨，修院生活比較著重信仰實踐，並展望教會的發展。

那時由小朋友讀到中學畢業，對於獨身也有些少瞭解。小修院的培育讓我們瞭解到家庭的重要。它是很美好的，但也看到神父的獻身生活更美好。瞭解到堂區的生活，需要與其他人士合作，不是要獨善其身。

我也有到隱修院看過，也很認同它與天主契合的精神，頗受到吸引的，但同時又感到隱修生活未必適合自己。

從小修院晉身大修院，培育的生活就不一樣了。除了要牧民實習，還參與了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²²，關懷社會。

在大修院我們要嘗試到堂區做牧民工作，體驗各種牧民訓練，開始多一點外面的接觸，也是慢慢來，又不是說很長的時間在堂區。逢星期六都出去堂區，直到晚上，星期日吃過午飯就回到修院去，所以是很短的時間。

除非修院有特別安排，我們是沒有社會體驗的。剛好修院開始參加大專聯會，聖神修院算是一個專上學院身分。在我們修士之中派兩個代表去，我是其中一個。一次認識了余理謙神父²³。他在多年之後仍記得我。

兩個代表的角色是向修院同學做一些匯報，但其他修士未必有興趣聽，所以只需要作間歇性的報道。有時遇上大專聯會幹事大選，也參與了大選的過程。

當時大專聯會有很多學生認同的價值，未必是殖民政府所認同的。我們跟余理謙神父學了很多東西，了解到大專學生的需要。但我們與大專學生的接觸是很少的，他們對我們也沒有很大的興趣，我們不妨礙他們已經很好了。

那時代的氣氛就等於七十年代在明愛做社工的時候。我曾在小組社區單位工作，接觸街坊。當時香港社會十分關心社會的低下層，社會服務短缺，我們也曾為他們請命。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當時很有名，劉千石先生曾是總幹事，是我們學習的對象。事實上，在掌握社會脈搏方面，我們天主教可以說還是比他們慢一步，以修院培育大方向來說，向外開放之餘也不會站在社會太前線。

如果說到現在，我們教會如何回應社會，為自己定位？我也覺得要有所斟酌，是否人們怎樣做，我們就怎樣做？七十年代有一些教會人士

²² 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簡稱大專聯會，於1961年成立，由香港各大專院校的天主教同學會合組而成，目標是秉承梵二的本地化教會精神，協助同學理解低下階層的生活，積極投身於各項爭取其基本權利的行動，共創公義和平的社會。

²³ 余理謙神父 (Fr. James Hurley, 1926-2020)，愛爾蘭耶穌會士，長期致力於正義和平工作，1963-1972年出任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司鐸，參與多項學生運動。2020年因染新冠肺炎而去世。見〈余理謙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https://bit.ly/3AHticH>〉，[21-4-2021]。

也曾主張要站在前線，但我們也很容易被別人利用，成為一種政治工具，被人玩弄。所以我們要小心看待自己的角色。

梵二對全球教會所產生的震盪，即使聖神修院這個神父培育場所也無法獨善其身。

唐多明神父做院長之後，由田義神父接手。整個修院在梵二之後改革很多，要配合到修院發展方向之餘，又要顧及到所有大修士的反應，並不簡單。當時還有一位北方神父在香港服務，接著在修院做副院長，這位神父便首當其衝。因為他是副院長，有很多改革由他宣布，所以大修士對他很不滿。你可以想像，那時的修院正進行改革，但很多老臣子都有意見，不是那麼簡單。為何有那麼多神父轉來轉去？都是因為對改革不適應，甚至那時有一位院長也離開了崗位，不做神父了，所以要瞭解梵二時代的轉變對聖召有很大的衝擊。

在梵二帶動的改變下，薛神父在修讀的時期，也經歷了聖召上的變化：

我是讀完神一那年離開修院，還差幾年才可以升神父。整個過程都很簡單，因為梵二精神，在神哲學那數年發現特別多一些，十分認同教會應成為共融教會。教會作為共融團體來說，要求神父著重，並曉得發展團體的互愛和共融精神。

記得院長很強調這點：一個神父應該抱住要將堂區變成共融團體的想法，所以做神父的話就要是成為團體的父親。這是一個相當吸引我的主題。

之後，機緣巧合下認識了「普世博愛運動」，我很驚訝一個平信徒組織會那麼主動，強調教會共融、團體合一，所以產生了一種興趣。

它的共融是建基於聖言生活，基礎一定比較穩固，不是一種浮華的靈修運動，加上日後認識多一點，它的趨向原來需要好像一個修會那麼多的要求。因為自小在小修院，神貧、貞潔、聽命都已經習慣了，反而它強調的是一切都是為了共融合一，這種關係令我體味到福音是很積極的，不是只為了聖願這方面的意思，是它推動令到團體會嚮往活現福音。活現福音便要在生活中沒有太多牽掛，以致神貧、貞潔、聽命成為排除牽掛的工具。那種團體生活是比較認真一點的，亦容易令它福音化。

當時我的神師是關俊棠，跟他談及我的考慮時，他是很支持的。他自己也認識普世博愛運動。我去意大利參加培訓的目的，初步都是先觀摩，不是決志做普世博愛運動的獻身成員。

院長田義神父也很支持，是他讓我瞭解到神父是一個團體的發起人。另一個影響我認識普世博愛運動的，是幹微忱神父，他也是普世博愛運動的成員，屬於修會人士分支。

我們修士之間都參加過一些活動，自己在修院也發起了一個生活聖言小組，彼此有分享和支持，所以當時在修院也很有一個焦點放在共融方面，當然不是所有修士都會有興趣。

1970年亞洲主教團出了一份文件，說小修院培育出來的，最好在神學階段離開修院兩年左右，觀摩社會生活。那個文獻還在。那時讓我覺得我要有些行動。當時我也跟徐誠斌主教說了。他說：「我不贊成，但你要去我也會讓你。」神一之後，便去了意大利觀摩。

薛神父於1971年到意大利，三年之後，1974年秋天返回香港，開始為普世博愛運動的出版事業工作。

我在意大利有很長的時間慢慢反省。反省我為甚麼要做神父？會不會普世博愛運動的生活模式也適合我？

我在那經驗中是再深一步去了解團體生活。普世博愛運動意大利那個中心是全球培訓中心，遇到很多非洲、南美洲的人，亞洲與其他各大洲的文化距離是很大的，所以我覺得自己既然要建設一個共融的團體，技巧上或是待人接物方面，還有很多事情要學習，所以我覺得不要太倉促去選擇做神父。

事實上，從我被派回來香港服務，立刻體驗到要在社會上立足也是要經過一番努力。不單是要再讀書找工作，社會上也有不少事情需要學習，至少在工作環境中有不少辦公室政治，待人接物需要很多技巧，感到是上主安排的一個為我好的訓練。

那時香港團體的中國人只有一個，就是羅乾坤神父。他獨力開創出版事業，沒有人幫助他，所以我回來後便幫助他做翻譯工作，刊印《生活聖言》、《新城雙月刊》，還有出版書籍。

為薛神父來說，能在普世博愛運動中積極發揮團體意識，是受益於修院時期的培養。

我覺得在梵二後的修院曉得團體意識的重要。當時修院的長上也很強調團體氣氛，所以，可以說孤僻一點的性格都不會被視為有聖召的標記。因此，我也很認同這方面的價值。

如果我們拿梵二前後作比較，梵二之前著重個人靈修，梵二之後著重團體精神。在禮儀改革上，有恩保德神父、田義神父等前輩，全部都比較著重共融團體，我們修士因而大開眼界，發現原來為一個神父來說，團體是那麼重要。

為何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要在 2000 年的文告《新千年的開始》裡，提到共融靈修？為何共融靈修要落實到堂區層面？他舉了很多例子，就是因為梵二之後的共融教會還未能真正的體現出來。

另外教宗方濟各所講的，教會是一個 synodal church [同行教會]，亦都很強調教會在傳教精神裡面，神父要聆聽天主子民，亦即是要與堂區的教友一起，步向傳教的教會。所以團體精神真的很重要。你說今天我們能把這目標落實到多少？不知道。梵二至今已五十多年，但教宗方濟各說，五十年只是起步，所以你可以想像。

現在教會的專家對此還有很多不同意見。我們的管理模式，仍是一個神父作主。堂區大小事務都是由神父擔起，堂區議會與神父一起做決策，是體現管治權的一種方式，但同一時間管治模式背後有沒有一套靈修？如果沒有靈修在背後，長遠來說對建立堂區團體精神不會有很好的成果，所以我們不能只記住管轄的方式，而是背後的靈修也很重要，就好像我們與基督教進行合一交談也是一樣。

我瞭解很多基督教會的管理方式，很多牧師都好像做「妹仔」²⁴ 一樣，在堂區議會長老要他來就來，要他走就走。這樣的模式他們也維持了幾百年，為何不可以以這方式繼續走下去？問題不在於用甚麼模式，卻在於其背後要有靈修，所以現在我們教會的合一交談，強調走向共融教會。就是要求教會走向共融靈修。

²⁴ 粵語指婢女、丫環。

經過十多年後，普世博愛運動的會長發信詢問誰有興趣做神父，給了薛神父再回到修院繼續陶成的契機。

我一直都沒有抗拒做神父，也是有興趣的，所以我就寫信，給他一個正面的回覆。於是他們就著我去讀神學……但是由接到那一封信直到我去讀神學，不是立刻就可以去讀，因為我在香港的團體負責很多事情，要負責自己的刊物《新城雙月刊》，再者我在外面做全職工作，沒辦法一下子放下所有事情去讀神學。

我們普世博愛運動的核心團體是自給自足，是共產制度，沒有甚麼人支持，所以要等待一段時間，終於跟這裡的團體討論安排好。因為我到了外邊，這裡就少了一份收入。原則是這樣的，如果在非洲或者落後國家，總部都會幫助。香港這個地方算是發展了的地方，我們不但是自給自足，還會將盈餘寄去總部，由總部轉去其他國家，所以我們叫做共融，一種實質的共融。

我是1998年才回到修院讀神學。1971-74年是在意大利受訓練，那些不是神學，只是普世博愛運動的培訓課程。雖然有幫助，但也是有一段長時間沒有讀神學。會長1991年的信，想給我們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向。我當時在理工大學教書，也在做出版事業，要放下都比較難一些，因此我一直等到1998年才放下所有工作。

薛神父於1998年再度進入聖神修院修讀神學，於2002年晉鐸。

經過那麼多年，哲學的培育方面多了很多現代的哲學，而我的哲學基礎也有涵蓋。神學當然有很多發展，所以也很享受進修的過程。雖然我有讀過一年的神學課程，但有很多我都沒有讀，所以回來之後增加了很多見識。

開始的時候是兼讀制，1999年才全日制，讀到2000年便畢業，所以在很短的時間便畢業。但也要等一段時間才能升神父，因為升六品要一段時間，升完六品還要隔一段時間才能升神父。

再回去讀書其實很容易適應，沒有甚麼衝擊之餘，也很開心。以前的同學都畢業了，又見到很多年輕的修士，那時又有很多修會的會士，譬如董澤龍神父。現在很多升了神父的修會修士都是我的同班同學。有些修女也在那裡讀書。見到修院不再只是修士，有不同的氣氛，是一件好事。

直到 2009 年，我有機會放一年的 sabbatical leave [安息假]。我申請去羅馬讀神學，一讀便讓我讀了兩年。讀完碩士，亦即 license²⁵，學校給我獎學金，於是把博士也讀了回來，所以我說是機緣巧合。很多人都問：「你年紀那麼大還讀甚麼？」我會說：「普世博愛運動是一個神恩團體，我們讀書的節奏也不一樣。我是靠神恩讀神學的。」

在香港教區和普世博愛運動香港團體的協議之下，薛君浩神父獲破例加入了教區神職班，卻以全職身分繼續為普世博愛運動的團體服務，只需每年依例向教區主教工作匯報。他會接受團體的指派，到不同地方工作。他起初是派回香港，並且要繼續在外面工作，其後曾派往澳門，目前在菲律賓一個名為大谷地 (Tagaytay) 的小城奇塔德爾 (Citadel) 服務。

²⁵ 在天主教修院教書的教員，都需要在天主教神學院取得碩士或以上的授業資格，稱為 license 或 licentiate。

范錦棠神父

- 1964 進香港仔聖神修院
- 1972 於聖神修院大修院攻讀神哲學
- 1978 晉鐸



富有歷史的聖神修院是天主教香港教區培育有志獻身服務教區的青年成為神父的地方。在六十年代，修生人數高達一百多人，范錦棠神父就是當時其中的一位。

范神父自幼與聖召搖籃太古樓結下不解之緣。他住在離太古樓不遠的薄扶林村，在太古樓的聖華學校讀書，在太古樓的露德聖母堂領洗，星期天也會到那裡參與彌撒。

當時居住在太古樓的大部分都是教友，那時候小修院就位於太古樓內。我入修院是受到明之剛神父²⁶的影響，加上有些比我高班的同學也入了修院，就是這些因素吸引了我進去。

1964年9月，范神父入讀聖神修院的小修院。修院分了大中小三班，以人數的多少劃分。

小班是中一、二學生，多達四五十人。他們住在修院飯廳樓上，二樓是自修室，三樓就是睡房，四樓是用來放雜物的。

六十年代的香港市民真的很貧窮，加上大多數家庭沒有計劃生育的概念，家裡小孩多，糧食不足，家中沒有飽飯吃。那時候，很多外籍傳教士都對外宣講：「多小孩沒關係，教會幫你養兩三個，讓他們來做神父吧！」對於子女眾多的家庭，父母是有這個思想，家中有兒子是神父也是一份光榮。

²⁶ 明之剛神父 (Fr. Rene Chevalier, MEP, 1909-1981) 1942年晉鐸，二戰結束後到中國傳教。他在1952年被迫離開大陸來到香港，任薄扶林露德聖母堂主任司鐸，至1971年調任聖神修院神師一職，1980年任聖母玫瑰堂主任司鐸，翌年回國休假途中，在探訪泰國邊境難民營後遇車禍喪生。〈明之剛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https://bit.ly/2VHKRVL>>，[26-3-2021]。

中班是中三至中六的修生，因為當時中三至中六的修生人數比較少，這樣的劃分是為了方便配合住房安排。中班住在圖書館樓上，圖書館的二樓用作自修室。當時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則，大中小班是完全不能溝通講話的，有「視線不能過界，目不斜視」這句話，是中班跟小班開的玩笑。

聖神修院小修院提供六年的中學課程，中一至中六的科目與一般中學無異。我入修院時仍是六年制，但中五時學制已經修改，所以，我是第一屆五年制的學生。

至於大修院，因為內地的修生 1949 年後逃來香港接受培育的現象不再，1950 年代後期，國內教區再也沒有派修生來港，導致華南總修院的修生人數下降，在修生不足的情況下，原先已入讀華南總修院的修生也過渡到原址的聖神修院繼續修讀。

那時，大修士約有卅人，修院四樓是大修士住宿的地方，房間空間很小，只有一張床、一個小櫃和一張書枱。

聖神修院成為教區修院之後，不斷完善教學和住宿環境，這過程修生也有出一分力。

在 1965 年間，院長唐多明神父率領全體修生總動員，一齊參與運送石頭，給建築工人興建聖母岩之用。大小修生每天吃飽飯便去搬石頭，每人搬一塊，大小隨意，有氣力就搬大石頭，氣力少一些就搬小石頭，放在預備建聖母山的位置。而修院的新翼亦於 1967 年竣工及啟用。

范神父回顧在小修院的生活是相當充實：

每天六時起床早禱、彌撒、默想，然後吃早餐，打掃清潔修院；八時四十五分至十二時半是上課時間，午飯後自修半小時，上完下午的課堂後，三時正去朝拜聖體，三時半是下午茶時間，之後是自由活動時段，一大群年輕人一起踢足球、打籃球、游泳，五時回宿舍洗澡，晚禱晚飯結束後，七時半至九時自修，十時準時上床睡覺。

在修院每天的生活，都被安排得密密麻麻，且很有紀律。作為修生每天最期待的，就是下午四時半的運動時間，因為修院的山坡下有個地方可以游泳、潛水。除此之外，修院安排修生要學琴，鋼琴或風琴，一星期一次，就是在打球時間，對於不喜歡彈琴的修士來說，會覺得好悶，好無奈；而對喜歡音樂的，就會十分有興趣。

體能鍛鍊，也是修院非常重視的一環，所以修生每個月都要去行山，海洋公園側的針山，大概需要一個多小時；路程長一點，經香港仔上下水塘直上太平山、薑花澗、紅蕃鼻（一個比較險要的山），這些路徑在昔日都留下了修生們無數的足跡。

星期日是大家所期待的，期待家人的探訪。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衣服鞋襪，都是靠探望的時間送來。修院離市區較遙遠，每個星期我都是依靠弟弟送來物資，由家中出發，首先坐車到香港仔，然後步行到香港仔工業學校，再乘小艇，穿過羊腸小徑，綠蔭深處的小路，才能到達修院。

等待家人的心情非筆墨能夠形容，那些年資訊不發達，莫說手提電話，就算是固網電話當時也不是很普遍，所以，假如在途中發生事故是無法通知對方的。其實，我內心明瞭自己已是非常幸運，因為有些修生，真的是從沒有家人來探望的。

聖神修院非常重視禮儀生活，每日小修士穿上黑袍，大修士穿上白袍，整整齊齊、浩浩蕩蕩到聖堂祈禱以及參與彌撒，遇上是大瞻禮，聖神降臨、耶穌升天、聖誕、將臨期、逾越節三日慶典，彌撒更是隆重，要綵排。好幾個輔祭，手持蠟燭、提吊爐、乳香船仔、十字架，整台彌撒是用拉丁文，以唱經的形式，福音由一位六品執事誦唱。

在教學語言上，梵二會議後，修院由必修拉丁文，開始著重修生中英文的能力。

當年唐多明神父是修院的院長，他親自教授拉丁文，每天上課，第一堂便是拉丁文，是必修科。每個修生都很努力學習拉丁文，因為它是全世界神父的共同語言。若不懂拉丁文就等於是沒有聖召。

況且當時神哲學也是用拉丁文來讀的，因此拉丁文的底子一定要很好。英文是世界的語言，院長為要提升我們的程度，想我們英文好些，在自修時是不讓我們看中文書的，但若看英文小說就無妨。同時，修院另外找來兩個外國女士和一位外籍男士專門教我們英文。身為中國人對於中國文學也應該要有一定的水平，在修院裡，中一便開始教「四書五經」，要背誦的，所以那個年代出來的神父，中英文的程度都十分高。

當年黎正甫教授曾在聖神修院居住，教授大修士中文、哲學等。黎正甫寫的文章，四五十年前在《公教報》都可找到。我們中五會考那

年，中文老師突然離世，黎正甫教授臨危受命教導會考班的中文。由於他從未教過中學，所以對他來說是一項很大的挑戰。

梵二革新令普世教會出現巨大的轉變和震盪，修院改革的挑戰帶來思想上的衝擊，使不少神職人員、修士都離開了修院。那個時候，范神父也離開了修院，在外面工作了一段時間，然而聖召的種子在他的心中已扎根，短暫的抽身是為將來走更遠的路作準備。

我 72 年重返大修院，明神父在前一年也進入了修院做神師，這是天主的意思。明神父一直看著我成長。他說話未必很多，但我很敬佩他。有些人就是這樣，不用說話，只看他做事便可以，就是那麼簡單。明神父不用做甚麼大事，你看著他便已經信服。他影響我很深遠。能夠跟隨這樣好榜樣的神父是好事，身教不是言教那麼簡單。不過，我覺得身教和言教一樣重要。在堂區與青年人聊天，陪伴他們，並與他們一起成長。換句話說，這就是生命影響生命。人的行為，人的信仰，影響另一個人走聖召這條路。

范神父重返聖神修院大修院攻讀神哲學時，學科隨著時代的轉變而有所調整。

哲學期間科目很多元化，引入了現代的哲學和神學。因為時代的需要，又增加了心理學、輔導學、社會學等很多社會性的科目，加強修生認識人際和社會的關係。

范神父神學三年級時，即升神父前一年的暑假，有機會在外地嘗試到不同文化的牧民訓練。

我的經驗很特別，77 年六品執事的實習訓練是在美國。當時我比較膽小，楊正義²⁷ 與我很熟絡，他與我商量，安排我在羅省一個堂區服務。那時瑪利諾神父負責執事的培育。整個羅省的六品執事每兩三個星期便聚會一次，我也有參與，這經驗為我來說獲益良多。

當時我實習的堂區有樞機和執事，他們專注在禮儀及牧民的工作，至於堂區大大小小的事務如水電、維修等便聘請專人來負責管理。美國

²⁷ 楊正義神父 (Fr. John Francis Ahearn, MM, 1947-2020)，美國瑪利諾會會士，1973 年晉鐸後同年來港，一直在聖神修院擔任禮儀學教席，又為修生開設醫院牧靈的實習課程，加強他們的牧民訓練。見〈楊正義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https://bit.ly/3gFOk2M>>，[12-4-2021]。

的天主教會 77 年的時候已經開始走這條路線。其實這是整個社會改變運作模式的結果。

環顧今天全球聖召減少，我認為香港的堂區也需要這樣的人。神父逐漸減少的時候，若有一個專業的人看顧堂區的「燈油火蠟」，甚至還可以協調禮儀等工作。神父就可以專心負責牧民工作。

修院的培育只不過是一個基礎。晉鐸後到堂區服務及管理各種事務是要慢慢摸索的。要多看書，還要靠經驗的累積。

范神父晉鐸超過四十年，多年來服務不同堂區，現時是聖雅各伯堂的主任司鐸。

鍾志堅神父



(圖：望廈聖方濟各堂)

- | | |
|---------|----------------|
| 1962 | 進入澳門聖若瑟修院的小修院 |
| 1968年9月 | 轉往香港聖神修院修讀神哲學 |
| 1974 | 聖神修院畢業 |
| 1975 | 在澳門由胡振中主教祝聖為神父 |

來自澳門教區的鍾志堅神父，並非出生於公教家庭，父親是教友，不過不算熱心。他本人七歲左右才跟母親一起領洗入教。

媽媽對我來說是信仰的開始。她是很虔誠的教友，會參加聖像出遊等等。她沒讀過書，很少向我解釋信仰。但我覺得她是把信仰放在心上，我看著她祈禱念經的樣子很虔誠，又會帶我去聖堂，這是我小時候的記憶，到現在還是留在我心裡。

我記得媽媽是跟聖母軍學道理的，他們來家裡教我們，那時我就站在一旁聽故事般，到底領洗是甚麼意思，也不是很明白。

去參加彌撒也不知道在做甚麼，那時還在用拉丁文。我很記得那個神父很出名，是耶穌會陸毅神父²⁸。那時只有講道才會用本地話，我卻聽不懂他在說甚麼。我看他的傳記，人們說他是西班牙話、普通話、廣東話一起出動，口音混在一起的。

我小學是在耶穌會學校念書，學校特別恭敬耶穌聖心。在天主教學校讀書，對天主教的經文、故事，多少有些認識。我很小就懂得怎樣念經，還有，天主教學生是有聚會的。

念四五年級的時期，每個星期六，修院有三個讀神學的修生，穿我們現在叫「長衫」的——以前他們不能穿便服——來我們學校踢足球。我以前特別喜歡踢足球，每星期都與他們一起，他們說甚麼我都不記得了。

²⁸ 西班牙籍的陸毅神父 (Fr. Luis Ruiz Suarez, SJ, 1913-2011) 1930 年加入耶穌會，1941 年到中國大陸傳教，1951 年抵達澳門，1977 年矢發大末願。他是澳門利瑪竇社會服務中心（今澳門明愛）創辦人，於八十年代中期在大陸不同省份開展對麻風病人的服務。參〈陸毅神父〉，耶穌會中華省網頁，〈<https://bit.ly/3s0zRUu>〉，[6-7-2021]。

小學畢業那一年，校長是耶穌會神父，他讓我們在操場集隊，詢問我們有誰想入修院，我舉手。校長也沒說做神父是甚麼，只說：「你回去問問爸爸行不行吧。」我回去問爸爸，他就說：「好啊，你進去吧。」這就是我入修院的經過，修院是甚麼，我也不清楚的，只知道可以踢足球，我就很想入了，我是誤打誤撞入了修院的。

小學畢業的一級，有三個不同班的同學與我一起入修院，是進了修院才認識，只知道我們讀同一間學校。最後也只有我一個升神父，其他的都離開了。

鍾神父進修院，一方面是可以踢球，另一方面是可以免費讀書。

我是家裡的大兒子，爸爸在我媽媽過身後，娶了另一位太太，共有七兄弟姐妹。我只知道入修院不用付錢就可以讀書，全部修院負責。在六十年代初期，對我們不是太富有的家庭來說，簡直不用多想就接受了這機會。

我第一天入修院，想看的就是球場是怎麼樣，但很失望，球場就是一個大花園，中間有棵樹，那怎樣踢球啊？但我也在這裡待了六年，差不多天天都踢球，很開心。

我62年入聖若瑟修院小修院讀中學，直至68年。當時大修院、小修院在同一幢大樓裡面，大修院是讀神學哲學的，也是六年。

回想小修院的生活就是一層層有規律的管理：

中學讀小修院的時候，我們接觸到的修院神父都是很守規則的，而且很遠離我們，吃飯都不在一起。但我們整班同學從中學一年級至五年級在一起，六年級十九歲就去大修院。大修院有一些神學生叫做「管學仔」，看管著我們，一個中國人，一個葡國人，跟我們一起飲食玩耍，只有上課不在一起，他們上面有個叫做「管學神父」，也是看管著我們的，還有神師，這就是我們的管理系統。

我們早上五時半起床，早課、默想，然後吃早餐後八時半上課，直到下午一時吃午飯，休息之後大概二時半就上兩課左右，四時半便打球了，這是最喜歡的時段，大概四十五分鐘，之後是洗澡、念玫瑰經，大概六時自修，到七時吃飯，七時半散步半個小時，就念晚課。晚課後就準備睡覺，所以我們是很早睡覺，晚上不會繼續讀書自修。

我在小修院的時候，修院比較強調「聽話」、要乖，我是有很強這樣的觀念。我只知要讀書、聽話、守規則，我又不會去競爭的。

當時修院連報紙也不讓看，免得被世俗思想影響。管理我們的神父看到有些台灣出版的教會雜誌，有些女性衣著，他都要用黑色筆塗滿蓋住，不讓我們看到。那時候的思想是完全不同，是黑白分明，甚至不能跟基督教會的人聊天，因為基督教會是天主教的相反。

我們有些同學離開了，修院不鼓勵甚至是阻止我們跟這些人聊天，因為離開修院是被視為不對的，就好像是被逐出師門。那時候規矩很嚴格，甚至小修院的修生，跟大修院的修生是不能聊天的。他們有他們的世界，我們有我們的世界。我們跟神父也不是很常聊天，只有管學的神父可以聊一下，其他的不鼓勵去接觸，所以我覺得澳門小修院的培育是很安全的，很保護式的。

對於天主教會，鍾神父是入了修院才更加清楚。

我以前去聖堂，不認識神父，有事才找他的。甚麼事呢？喪事便要找他們。

在 65 至 68 年左右，澳門教區分六個堂區，再之前只有兩個，用國籍來分，就是葡萄牙人及華人堂區。望德堂就是華人堂區，無論你住哪裡，華人就去望德堂領洗，其他的就去大堂聖安多尼堂和聖老楞佐堂，這些是為葡萄牙人而設的。那時彌撒都是拉丁文，去哪都一樣。

我入小修院的時候有四十多人，大修院也有三十人左右。小修院分葡文及中文兩個組別，因為有些葡國小朋友，是他們的叔伯從葡萄牙帶他們來，十一、十二歲就來澳門讀書。跟我們一起的還有一些土生葡人，他們是說葡文的，但他們廣東話比我還要好。他們讀書就入葡文班，我們華人就讀中文班。

大修院裡面讀神學的有華人、有葡萄牙人，也有帝汶人，因為帝汶當時屬於葡萄牙管轄。帝汶沒有大修院，就要來澳門大修院讀書。

澳門的修生離開修道的原因，與香港的又不盡相同。

因為聖召減少，每年修生都不是很多。他們離開修院的時候大概是中學四年級，十七八歲，現在人們六歲就讀書，當時不是這麼早讀書，我也很遲才讀書。

讀拉丁文、葡文是最重要的文字，中文沒有問題，大家都懂。學科有些問題，令人覺得自己不合適，會思想很多東西，所以很多人會離開修院。以前在修院上課，完全是一個封閉的環境，一年只有兩天，每次只有八個小時可以回家，就是聖誕節與復活節，其他日子都在修院裡面。

後來沒有這麼多人進修院，修院就開始想辦法，於是就讓修生出去外面的學校讀書，上完課就回來修院，但外面讀書跟修院這麼禁閉式的生活是很不同的，所以心思是完全不同，這一班人變相差差不多全軍覆沒。

修院負責培育的人沒有這種經歷，他們都是自小在修院那個環境長大，沒經歷過類似的衝擊。他們讀修院的時候是四十年代，我讀時是六七十年代，是很不同的，很難跟他們解釋年輕人所面對的挑戰。

鍾神父在小修院期間，澳門的社會和政治環境漸漸起了變化：

66年開始，中國大陸裡面發生了大事件，就是「文化大革命」。這個時候，澳門社會也有很大轉變，大修院關閉。葡國、帝汶島開始沒有人到澳門修院，我們修院人數也一直下降，人少便沒法子繼續。

說與文革有關是因為容易記起，不過多少也有影響，因為文革的時候，澳門人很害怕，覺得差不多要被解放²⁹了，所以很多人離開了澳門。還有澳門人看到葡國人的管治已經要向中國低頭，因為與文革同期，1967年12月3日澳門發生了「一二·三事件」³⁰，澳門一團糟，葡國人要向中國政府認錯，這時葡國對殖民統治差不多是放棄了，一直說好要把澳門交回給中國，中國說，「我們先不要，你先等等」，稍後應該是1974年左右，葡國發生「鮮花革命」³¹，推翻獨裁政權，再

²⁹ 意指被中國接管。

³⁰ 澳葡當局被指在管治上行政混亂、效率低，而且貪污盛行，加上族群矛盾日深。1966年11月15日氹仔警民衝突，引致同年12月3日爆發澳門歷史上的一場大規模反政府動亂，衝突中至少八人死亡，二百多人受傷。

³¹ 又稱「康乃馨革命」或「四二五革命」。二次大戰，葡萄牙軍政權拒絕放棄殖民地，並遏制非殖民地化浪潮，因而爆發了殖民戰爭（1961-74）。連年戰爭和龐大軍費，令軍政權失去了本國人民的支持，中下級軍官更組成了「武裝部隊運動」，於1974年4月25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發起政變。在政變期間，民眾將康乃馨插在軍人的步槍上，因而得名「鮮花革命」。

不擁有殖民地，連非洲的殖民地也退出，他們也從澳門退出，所以整個政局的轉變也有影響。

說回 67 年那時候，澳門修院已經說要結束了，年級比我高的，他們短暫時間去了香港修院進修，然後就去了葡萄牙的花地瑪，這對他們或我們也沒有問題的，因為我們都懂葡文。上一任的黎主教³² 高我們幾屆，就是去了葡國讀神學。到我們的時候就要想去哪裡讀？……是修院院長定的，一是去葡國，一是去台灣，談完之後卻送了我們去香港。

我們這一班同學 68 年就去了香港。香港當時沒有神學院，耶穌會、慈幼會、香港教區與澳門教區，這四個單位就一起合作，在聖神修院那裡辦神哲學院。

因為是合作，我們教區有兩個神父要加入教授行列。我們的高秉常神父³³（後來做了主教），還有鄭志誠神父，最早期就派到香港那裡教書。我是 1968 年秋季、9 月份去了香港聖神修院讀書，我在香港修院也是六年，至 74 年完成神哲學的課程。

在香港聖神修院大修院的階段，鍾神父有截然不同的經歷。

我們以前在小修院不常看《聖經》，神父會講給我們聽，很少自己讀；而且小修院平常吃飯不許說話，只有星期天才許講話，會讀《聖經》，讀保祿書信，不過沒有人解釋，都不知道是甚麼來的。這就是梵二之前的經驗。在大修院，我就開始明白《聖經》，因為天天都要上課，有系統地讀。

香港大修院很多人。我是劉德光神父之後那一班，之前的去了羅馬讀書，李國雄神父那時在讀神學三年班，劉德光只比我們高一屆。在香港

³² 黎鴻昇主教（1946-）出生於澳門，2001 年晉牧為助理主教，兩年後接任林家駿主教成為澳門教區正權主教，2016 年因健康理由向教宗請辭，現於澳門休養。見〈黎鴻昇主教〉，天主教澳門教區歷史檔案及文物處網頁，〈<https://bit.ly/3fW5tWw>〉，[22-3-2021]。

³³ 葡國出生的高秉常主教（Bishop Arquimínio Rodrigues da Costa, 1924-2016），1938 年到澳門，自幼就讀於聖若瑟修院。1949 年晉鐸，1963 及 1965 年曾任署理主教，1973 年被選為代理主教，掌管教區事務。1976 年獲教宗任命為澳門教區主教，直至 1988 年榮休。見〈高秉常主教〉，天主教澳門教區歷史檔案及文物處網頁，〈<https://bit.ly/37xIwV0>〉，[22-3-2021]。

港大修院同學年紀相若，多了一些談話，不只是聽的機會；每星期都有一個節目，就是大家坐下來一起談天。

68到74年那段時期，香港是火紅年代，香港那時候已經有學生運動，我也有參加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修院派我出去跟他們開會，他們出版的刊物我們也有份，變相入世的機會多了。

我在香港修院讀神學的時候才開始對「神父」認識一些，我們跟神父的接觸很近的，經常都看到他們，吃飯看到他們，上課又看到他們，談天也可以，不同於小修院那種距離感。從而看到神父也有他們的問題，有他們的看法，不一定跟我們一樣。對一些神父，我們也會批評的。

在香港讀神學的修生裡面，有些不是從小修院讀起的，有很多是在外面工作過，所以他們的想法表達全都很不同，他們很懂得批判；我們澳門來的顯得單純，不懂批判有權力的人，他們就不是這樣。這些環境令我們的生活、思考，體會多了很多東西，這對我們澳門修生來說是很不習慣，因為融入不到這樣的環境，所以很多跟我一起來香港的同學都離開了修院。

還有很有趣的，香港修院是每人一間房間，那時候我們叫那棟樓「新樓」。每天起床由自己控制時間，並不如在小修院由管學到來拍掌讓所有人一齊起床。由於沒有人會把你叫醒，所以有些同學會遲到。記得那時候，李宏基主教做院長，我們看到他目測在點人數。當你默默地在點人數，你的頭會自然地轉動嘛，一二三四五。

以前在澳門，我們起床的時間到了就有人拍你起床，各樣行動都會按號令跟進。香港大修院不是的，是要自己安排時間的，很多同學覺得不知所措，這是一個未能調整到的難處。當然人長大了也多了很多東西都會想，不適應和未能調整生活是其中的一種因素，因而澳門教區修生由於不適應，大多數都離開了修院。我之後只有三位完成神學課程升了神父，中間廿幾卅個都離開了修院。

鍾神父修生培育時期經歷梵二會議前後，華人教會出現的改變不是即時的，首先是一些小改變，更大的改變則是逐步出現。

在小修院，我們開始有一些改變，以前我們穿黑色的長衫，一天到晚都要穿著，除了踢球、睡覺不用，其他時候都要穿，到67年左右就

全部不用穿這些衣服。那穿甚麼呢？穿襯衫、西褲等。修院找來裁縫用同一種布，為所有修生都裁一式一樣的衣服，在轉裝的那天早晨，所有修生站出來都是一個模樣，很是有趣。

梵二之後大概一兩年，彌撒開始用本地話，是很不習慣的。用本地話開彌撒也要翻譯，要準備好才開始推動。

那時彌撒經書不能說改就改，一定要台灣主教譯了，再經羅馬教廷批准，才可以用。後來，香港、澳門教區說，台灣跟我們語法不同。於是香港自己編，澳門又自己編。

隨著年紀漸長，鍾神父對於在澳門小修院及香港大修院的難忘生活，可說完全不同。

澳門修院每年七八月放兩個月暑假，制度跟歐洲一樣。路環離島有一間叫做聖若瑟修院別墅，專為修生度假用，要坐船去的。我們就跟大修院修生輪流去，我們七月他們就八月，下一年就對調。那整個月，一天到晚就去活動、游泳等等，因為別墅下面是竹灣，也會去行山、踏單車，有時去探麻風病人，自己要去買菜，總之不用上課，但彌撒、念玫瑰經是照常的。在那裡整整一個月很開心，小修生都曬得黑黑的。我特別記得一位神父很喜歡造東西，就和我們造了一隻木船，可以在水上划動的。在路環一起煮飯都很開心，因為平常不用自己煮。修生一起煮飯就會有爭拗，食物能不能吃也不知道。

大修院就不一樣，開始覺得建立友誼很重要，真正能夠講心中說話，真正可以彼此關心，而在這關心中是可以犧牲自己的，這是我在大修院有的經驗，因為人們成長了，看事情會不同，開始會談意念、理想。

我在香港大修院，覺得很寶貴的就是有幾位這些同學，真的很厲害的，一位就是過了身的楊鳴章³⁴，我比他高一兩年級，我們能一起聊很多東西，甚至升了神父之後大家都有互相支持，雖然不常見面，但你會感受到那份支持很強。

³⁴ 楊鳴章主教（1945-2019），出生於上海，四歲移民來港，居於薄扶林村，十二歲在慈幼會鄧鏡波學校就讀時領洗，1978年晉鐸，1986年起擔任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哲學講師，在香港明愛也服務了近三十年。他於2014年獲任命為輔理主教，2016年再獲任命為助理主教，翌年就任正權主教，至2019年1月3日逝世。

在培育的路上，修院的長上是怎樣推動鍾神父選擇做神父？

我這個選擇是有兩個神父推動的，一位是明之剛神父。明神父不是學者，也不是教授，甚麼都不是，他是修院神師，但看到的是他那份謙虛、真誠、不計較。比方我們見到他在修院做零碎工作，執樹葉、掃地等，但他每星期跟我們講道理是很盡責的，同學對修院每個神父都有批評，唯獨對他沒有。

他講道理非常悶，老人家講話都是差不多，但我們看到他的講稿是很用心寫的，他一直望著講稿跟我們講道理，講稿是用發黃的舊紙寫，拼音來的，不知道是否法文，因為他是法國人，我覺得這位神父，很像我在福音裡看到的耶穌。

另一位就是楊正義神父，他在 2020 年去世，他年紀其實只比我們大一點，他讀完書就由美國來香港教禮儀。我上他的課開始明白禮儀是甚麼，我們的信仰是甚麼。那時候他在香港大學學廣東話，我們對他說：「你不用去讀，跟我們一起住就會學懂。」他真的跟我們一起住，房間跟我們是同一樓層。

後來我才反省到他影響我最大的是他離鄉別井這一點。楊神父家裡應該也挺有錢的，要放開所有，學我們的文字、吃我們的飯菜，為甚麼呢？我們還不時取笑他，我們用化名叫他「鬼佬」，外國人很不喜歡別人叫他「鬼佬」，但沒辦法。他都願意接受，為甚麼呢？所以我覺得明神父和楊神父是耶穌所講的，離開家庭、為人的幸福、為服侍別人的人，他們就是在做這些事。

因此我是在香港大修院才開始明白，如果我要做神父，就應該要做這些事，要跟人一起分擔別人的需要，建立他人的美善。

我讀完神學，74 年返澳門升執事，我等了一年多才升神父，因為戴維理主教³⁵過身，澳門沒有主教，為甚麼請了李宏基主教到澳門升我為執事，就是這個原因。怎知稍後李宏基主教也過身了。

³⁵ 戴維理主教 (Bishop Paulo José Tavares, 1920-1973) 於 1961 年抵澳門任主教，是澳門最後一位非華裔主教。他首次選任華人為副主教，又重新劃分堂區地界，任內公教社會服務及教育事業達到高峰狀態，創建及擴建機構達二十所。〈戴維理主教〉，天主教澳門教區歷史檔案及文物處網頁，〈<https://bit.ly/3jTSHZU>〉，[22-3-2021]。

1975年籌備升神父的事。由於自己堅持禮儀要用廣東話，這是我對禮儀本地化的觀念，當時的高秉常署理主教同意，並請了剛接任香港主教不久的胡振中主教到澳門來，祝聖我為神父。

我記得胡樞機那時的廣東話還是不容易聽的，比較像客家話。等了一年半，我終於由這一位操不鹹不淡廣東話的主教來升我做神父。我在望德座堂升神父，是第一個用廣東話禮儀在澳門晉鐸的人。

在鐸職中，修院學的東西又是否足夠？

在修院讀的東西真的很基本，修院不是訓練學者，如果要做學者便要繼續進修，但基本的東西是有的。有甚麼呢？對天主的認識，尤其是對耶穌基督的認識，對教會組織的方式都要明白。

有很多工作是要做的時候才去讀書去追求，裝備自己。澳門修院以前不常派人出去讀書，派出去都是希望能回來教書。他們回來都是在修院教書，通常他們拿到的是碩士學位，博士也沒多少個。可能教區覺得碩士就夠了，修院需要有些人去教書，本堂神父不用這些東西，就不用讀那麼多書。

其實在修院讀書，就算小修院的傳統也一樣，努力就行了，最重要是做一個好神父，用修院的術語來說，就是做一個有聖德的神父。讀書不是最主要的東西。現在我們本堂神父的主保是誰？Vianney，聖維雅納神父，他讀書很笨，但他經常行聖事聽告解，救了很多人的靈。

鍾神父現時是澳門教區副主教、教區青年牧民中心主任，以及望廈聖芳濟各堂主任司鐸。自1976年開始青年工作後，慢慢便發現需要更多額外的知識，來輔助自己的事工。

我在教區青年中心工作大約五年左右，覺得甚麼都不夠用，空洞洞的，便跟主教要求去讀書，讀甚麼呢？就是牧靈學。我跟林家駿主教³⁶說想去讀書，他不想我去，我用一年時間求他，終於讓我去了。

³⁶ 林家駿主教 (Bishop Domingos Lam, 1928-2009)，出生於香港，在澳門聖若瑟修院接受培育，1987年獲任命為助理主教，翌年繼任為正權主教，是澳門教區首位華人主教。林主教在任時活躍於澳門文化界，任內深受修會和政府鼎力支持。2003年榮休，2009年因癌病逝。〈林家駿主教〉，天主教澳門教區歷史檔案及文物處網頁，<<https://www.macaudiocesearchives.org/22-d-domingos-lam/>>，[22-3-2021]。

我是在芝加哥羅耀拉大學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那裡讀的，是一個兩年碩士課程，包括了很多《聖經》與心理學的東西，特別是人的發展心理學。這兩方面對我來說，令我明白很多事情，在我繼續的工作上就會應用到。

第二次讀書是 1996 年，因為接近 1999 年澳門回歸，我就開始想，澳門教會在回歸這段過渡期，在社會之中應該有甚麼角色？

我第一個學位讀神學，要探討社會問題，須跟這些研究配合上才行。我到香港中文大學詢問能否讀政府及公共行政，寫了一個計劃書，見關信基教授，他看完之後接受做我導師，於是我就申請這個課程。

回首過去，鍾神父對自己的修道之路都是非常肯定的！

明之剛和楊正義這兩位神父對我來說是當神父的啟蒙，小時候我媽媽當我對上主虔心的啟蒙，另外是三位修士來踢足球引起我對入修院的興趣。在小修院的時候，規則對我的影響比較重要，大修院的時候接觸不同的人物、社會環境，開始建立我對神父司鐸生活的肯定。我升了神父四十六年，我覺得自己真的在活出這些價值，我覺得是開心的，是值得的。這就是我要走的路。

李亮神父

- 1968 入讀聖神修院預備班
- 1969 聖神修院哲學班
- 1971 聖神修院神學班
- 1975 晉鐸



李亮神父出生於外教家庭，受兩位兄弟的影響，在學校附近的聖多安尼堂慕道，於1964年的復活節領洗入教。

當時學道理流行三至六個月，學習《要理問答》之後就領洗。我家住北角，中三領洗後，課餘時間和星期日就會去北角聖猶達堂。預科時加入了善會，因此參加教堂的活動多了，而祈禱和參加彌撒也多了，增加了對教會的認識，亦較以往熱心。與教會接觸多了，便萌發入修院的念頭，就這樣追隨了聖召。

我當時接觸的神父，是從傳統中逐漸開放。神父們外出的時候，會穿黑長衫，外籍和中國籍都是這樣，不像我們現在的。在一般場合，神父們出席教會活動和善會會議時，都會穿白或黑色的長衫。

當時教會相當傳統，主教和教友接觸不多。我領洗時，是白英奇主教在任。七十年代初，我在修院受訓初期，是徐誠斌主教在任，我們和這兩位主教很少接觸。在我們的印象中，堂區主任司鐸都很嚴謹，身分很清楚。神長認為自己的身分比教友高一點。教友和神父傾談和做事，必須態度拘謹，大家身分有高低之分，這種情況在主教和教友之間更甚。

從胡振中主教開始，這種階級觀念的情況慢慢減弱。胡振中主教和陳日君主教的任內³⁷，主教們已經大眾化很多了，但並非隨便。梵二之前，教友不會在主教面前嘻哈說笑，主教也不輕易這樣做，神父也不

³⁷ 陳日君樞機（1932-），慈幼會士，出生於上海，1961年晉鐸，1996年獲任命為香港教區助理主教，2002年就任正權主教。他於2006年獲教宗本篤十六世擢升為樞機，2009年退任教區主教一職。見〈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香港天主教手冊2020》（香港：香港教區真理學會，2020），頁39。

會毫無拘束地跟你說笑。早期他們的身分很清楚，與教友有距離。從信仰角度來看，這當然不是太理想，因為牧者的身分應該是親切些。我個人認為神職人員的形象，在後期好一些。徐誠斌主教的時期，他們開明了一些，但與教友之間的身分距離仍很明顯。到胡主教時期，梵二所講及的神職與教友之間的關係便有很大分別，神職人員親民很多，沒有高高在上。教會對平信徒開放態度的整個趨勢，是深受梵二影響的。

在六十年代，梵二會議還未結束時，教會的教規嚴格很多。例如，現在教友在禮儀中進進出出或談話，當時是不會有這表現，如有，便會給人責備。在聖堂，規矩是清清楚楚，例如女教友的衣著必須端莊，否則，神父即使不是直接「話」³⁸你，也會提醒你。所以，牧民上有時神父做事會頗嚴格，有時甚至當面責罵，為了指出是你錯了，要你接受規勸。

現在教友與神職交談截然不同，以往則拘謹很多，甚至是聖職人員與修女之間談話或態度上也有規定，與今日的氣氛不同。的確，有時太隨便亦不好，要尊重他人，例如，公開地責罵主教是不能想像的。以往的資訊不發達，沒有網上的東西，《公教報》上是不容許你質詢主教，接到對主教的批評也不會刊登出來。現時比較開放，對教會有不滿就說出來。

李神父中七畢業後，於1968年進入修院，當時聖神修院除了大小修院，還有預備班。不同的年代，顯示了進修院的修生學歷層次上的轉變，而小修院的中學制度也開始出現轉變。

我入修院時，還有小修院的，整體上大小修院都合稱為聖神修院。小修院由中一到中六，大修院讀神哲學，加一年預備班，專為那些直接進入大修院的新修生而設。

當時的小修院，讀中學的小修生早期是由從外間延聘的中學老師到修院授課。到了大約七十年代初，小修生分別到三間中學就讀。

1968年預備班那年是田義神父當大修院的代院長。原來的院長馮汝鈞神父當時在外地進修，田神父本來是小修院院長，兼管了大修院。一

38 「話」這裡有責備意思。

年之後，即 1969 年我讀哲學第一年時，馮院長進修完畢回來接手，而田義神父也返回意大利接受新工作，數年後才回來。1971 年，我完成哲學二年級後，馮院長便離開了鐸職。

當時的一年預備班，大概是和現在的先修班一樣，但課程上和現在的分別頗大，因為屬過渡性，不是很有系統。先修班的課程內容包括對司鐸聖召的基本認識，也學一點拉丁文，並進修中文和英文；又為了善用時間，兼讀一兩科哲學。當時預備班只有我和另一個同學。讀完預備班，我們在大修院讀了兩年哲學。學科是我們兩人及幾位低一班或高一班的修士「合班」上課，例如中國哲學和後期的西方哲學。

讀神學的時候，有些科目也是和高班或低班的同學「合班」上課，原因是為了遷就 cycle [循環] 制的課程編排。後期更有幾個修會加入。首先有慈幼會，第二年耶穌會加入，第三個是方濟會，於 85 年加入。之後有進一步的發展，現在也有聖言會、道明會加入，慢慢擴充了。

由七十年代起，聖神修院神哲學院 Holy Spirit Seminary College of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成立，由香港教區、澳門教區、慈幼會和耶穌會合辦，並由它們各自提供一些教授，因此，來自修會的學生也增多了。

在我修讀哲學時，澳門教區首次派了八九個大修生到聖神修院接受培育，下一學年又派另一批修生前來。兩班同學都只是約兩年便離開修院，一方面他們以往熟習葡萄牙文，不諳英語，對於聖神修院部分以英文授課的科目未能掌握；另一理由就是他們未能適應梵二後聖神修院向社會「開放」的培育模式。當時只有一位修生成功讀下去，就是目前澳門教區的副主教鍾志堅神父，他比我高一班。當時澳門主教剛去世，還未有新主教，所以鍾修士延遲了升神父。

香港教區於 1973 和 74 年兩年間痛失兩位主教，75 年才晉鐸的李神父在修道期間，見證了主教的更迭。

徐誠斌主教於 73 年去世，在 73-74 年這過渡期，李宏基主教做署理主教，到 74 年初正式成為香港主教，可惜至 7 月就去世。當時我仍在修院，主教職懸空了一年，由林焯煒神父做署理主教。翌年 7 月，原於台灣新竹教區當堂區主任司鐸的胡振中神父就獲任命為香港主教，

他於 75 年 7 月 25 日在香港升主教。當時大修院的院長是曾慶文神父，他做了數年院長，再由關俊棠神父繼任。

梵二精神講求入世，與民眾同喜同悲。六十年代末期，修院的新培訓模式亦漸現雛型：

我讀哲學和神學期間，同時接受牧民訓練，讀預備班和哲學期間，我主要是到黃竹坑探訪教友，二至三或三至四人一組挨戶去探訪，這是其中一樣的工作。

有些修生在鴨脷洲教主日學。當時鴨脷洲屬於香港仔堂區，有一間天主教幼稚園。在課餘時間和星期日，堂區委託修生教兒童主日學，甚至有少數艇家的子女也會來參加。有些修生到南朗醫院探訪癌症病人，少數到堂區幫忙。有些在星期六、主日或平日下午，探訪附近的公共屋邨。亦曾有一位神學班的修士擔當大專院校聖母軍支團的神師，每周到九龍指導他們。總之，有不同範疇的牧民工作，每周一次。

人與人之間的性格和作風既不同，在日常相處和合作上難免有磨擦，放諸修院團體也沒有例外！

早期修院有每年的生活檢討，回顧大半年的生活，檢討一下平日生活和禮儀上的安排、修士們各自分擔的一些本份，甚至打掃地方是否盡責等等。這些檢討帶有批評性的或訴苦的都可以。每年都有一至兩次。

修士們說出來的事情，通常都是有理據的，但往往會帶著情緒發洩。修院生活肯定不是百分百和諧，在檢討時，常有申訴或埋怨；說了出來，大家就知道，有需要就改善。

修院的廚房在修院舊樓，修士宿舍在 1967 年開始啟用的新翼，新舊兩翼彼此有一段距離。當時新翼宿舍四、五樓的茶水房放有裝水的圓形金屬桶，桶內的清水是修士們輪流去飯廳，把煮滾了的水拿上去倒進金屬桶內。曾有一次，水全喝掉了，一個修士疏忽了未添加，一位神學第四年的修士發脾氣罵他，可是被罵的修士就更不願意做。雖然被罵的的確有疏忽不對，但罵人的語氣也不好。我記得被罵的哲學修士回答說：「我唔攞，我唔攞水」。最後，有其他修士幫忙，事情才了結。

人與人之間，怎樣都會遇到問題，各人作風不同，合作上便難免有矛盾，往往會使人「鬱住」³⁹ 不開心，但是這些磨擦可視為修士修煉愛德和學習忍讓寬恕的機會。

李神父在聖神修院完成神哲學後，為了準備承擔教區秘書長的工作，在堂區服務兩三年後被派到外國深造。

我在 75 年晉鐸，胡主教 1978 年派我去意大利進修教律，至八十年代初期。緣於當時米蘭外方傳教會的會士⁴⁰ 認為梵二之後，香港教區七十年代開始本地化，雖然該會的會士一直擔任教區的主要職位，但他們認為，中國籍神父擔任這些職位更符合本地化。

直至八十年代初，教區的秘書長和財務長都是 PIME 的意籍神父，唯有兩個重要職位，即兩位副主教，分別由 PIME 的艾巧智神父 Fr. Secondo Einaudi 和中國籍的林焯煒神父擔任。在林神父之前，曾有一段短時間是中國籍的副主教李宏基，再之前是石抱璞。早在五十年代，只有一位副主教，後來委任多一位副主教，由石神父出任，他是香港教區第一位華籍司鐸擔任副主教職，這是華人神職人員被提升的一個實例。後來白主教也退下來，由中國人做主教。

艾神父在 85 年回意大利出任其他工作，他的副主教職位懸空之後，胡振中主教委任曾慶文神父接上，這樣，教區的兩位副主教都是華籍司鐸。

當我進修回來，秘書長便會有國籍司鐸接上。PIME 的會士堅持要從所有要職退下來。當時總務長是 PIME 的明鑑理神父 Fr. Lido Mencarini，胡主教指定康建璋神父接替他。起初康神父擔當明神父的副手，好像學師一樣，跟隨明神父數年，然後接任。而我完成進修後，有數個月跟隨彭慎靈神父 Fr. Osvaldo Pisani，PIME 學習，擔任副秘書長，其後就接手，彭神父就擔當顧問的角色。

³⁹ 不釋懷。

⁴⁰ 1926 年教宗比約十一世把兩個傳教修院，米蘭外方傳教會和（羅馬）聖伯多祿聖保祿宗徒會合併，成為宗座外方傳教會（PIME）。該會一百六十多年以來，共有二百零七位會士派到香港，在不同崗位服務。參柯毅霖：《從米蘭到香港——150 年傳教使命》（香港：良友之聲出版社，2008）。

PIME 神父說，「我們不應再擔任重要職位。本地教區要成長，要培育本地聖召，要有自己的接班人，不論主教、聖職人員等都要本地化。本地修院上了軌道，我們便只是從旁幫忙，不擔任主力。我們的傳教會人手少了，聖召不多。你們上了軌道，我們不應再留下來，人數應陸續減少，在二十人之內」。PIME 是香港天主教會開教時最早抵港的其中一批外籍傳教士。在徐主教出任香港教區主教後，由於要有足夠人力承擔教區的工作，故此，PIME 與教區簽合約時，便承諾為教區提供約四五十位會士之間，但人數隨時代陸續減少，而教區也要相應地培育本地聖召。現在派遣 PIME 會士到香港就不設下限了。我 1985 年 1 月起當秘書長，至今已經三十多年，同時兼任一點堂區工作，例如聽告解、主持彌撒等。

即使李神父並非主力從事堂區牧民服務，他認為不論在修院，或甚至其後的進修，對他作為秘書長的工作都很有幫助。

我現在處理的是教會事工和牧民工作，與信仰生活有密切關係。堂區的主任司鐸在有疑問時，常會諮詢我。我有時也需要進一步研究，說不定也要請教別人。司鐸或教友提出的都是現實問題，而我不是憑自己的普通常識去回答。例如有人問，在教會的慶節 feast/ solemnity，可否舉行亡者彌撒，我就不能隨便回答可以或不可以，因為教會是有規定的。

又例如堂區舉行公開的步行籌款前，要得到教區的批准，我便代主教去批准。教友婚姻破裂，如要探討能否宣布婚姻無效，我也要給予初步的答覆。總之，牧民問題要求教會法律和神學的學識，沒有修讀過的，未必能解答相關的疑問。

以往修院雖然在實體上等同專上學院，但欠缺一般專上學院所具備的學歷認證。隨著社會變遷和時代要求，聖神修院開始向外界尋求確認修院課程的資歷。

我們的神哲學院起初不能頒授學位，所以它便嘗試和海外的宗座大學聯繫。我讀神學時，神哲學院已經醞釀與宗座傳信大學掛鉤。經商討後，學院成為傳大的屬校，而學院的課程也相應地 upgrade [提升]。我 1975 年畢業那年剛巧是第一屆取得文憑，即 diploma，是神

學士學位⁴¹。後期一點，連哲學都有學位。但 2011 年開始，傳大跟隨歐洲的大學調整哲學課程，upgrade 了課程，學科多了，我們的教授卻不足夠，教授們要兼教多個學科。傳大認為這樣不能頒發學位，所以哲學課程近十年沒頒學位，只有修讀證書。神學方面的教授則比較充足。

要獲得神學學位，就要修讀完整的哲學課程。如普通教友有興趣修讀神學，卻沒有讀過哲學，學院仍會接受他們入學，但他們讀完神學，不能取得神學士學位。如要得到學位，就要補讀哲學課程，然後追認升格，取 STB 神學士學位 Bachelor of Sacred Theology。現在宗教學部 Higher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ciences 的學位本質上等同神學學位，但課程範圍較精簡，而且不要求報讀者先讀哲學，所以畢業生是獲頒宗教學士學位 Bachelor of Religious Sciences, BRS。神學士學位則不一樣，一定要求先完成哲學課程。

修院由教區接手後，課程上逐漸發展得有規模和有系統。這對修生培育很重要，也很有裨益。傳統上神父不能不學無術。以往神父的學識訓練，基本上是有的。然而，到了今日，人類社會受到很多文化上的衝擊，而潮流和價值觀也有很大改變，與以往截然不同。在這種社會文化氣氛下，我們做聖職人員的，便絕對需要充實自己。

於 2018 年去世的陶成章神父，是老一輩的神父，他與胡振中主教同期。他曾講及在華南總修院的生活：以往的修道生活是很刻苦的，飯菜很清淡、樸素；修士有病時才有雞蛋吃，讓身體能快一點康復，但其他同學平日沒有雞蛋吃。在讀書方面——我不是批評耶穌會，只是指出新舊觀念的分別——負責華南總修院的耶穌會神父常對修生說：「你們做教區神父，不需要讀很多書，只需要做個好神父，懂得照顧教友，教導他們熱心、向善成聖；你們只需做一個好的神父，能牧養教友就足夠了。」為甚麼這樣說？傳統上認為，修會司鐸要學識豐富些，要求高些，如耶穌會，因為他們的訓練往往不是為負起一般的牧民工作，卻常在專門範圍上為教會服務，所以修會在學識上的訓練是較嚴格的，而且在神修上也有特別要求。修會會士往往著書，或到大

⁴¹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神學部與哲學部先後於 1974 及 1976 年成為羅馬宗座傳信大學屬校。該兩學部畢業生可獲頒授學士學位。

學任教。以往負責管理修院的長上，只要求教區修士將來做好神父、好牧者，故此認為他們不需要鑽研很多學問，只需具備基本學識，便足夠做好神父，這便是以往教區修院的培訓目標。

就算李神父本人在修生時期也親身聽過類似的觀點。

有一次，徐主教探修院時，有一位修士對他說：「主教，有人說，我們做修士的，在學識上起碼能夠和大學生對等，好能與他們交談。」徐主教卻搖頭說：「信仰問題豈能藉辯論解答？」其實那位同學並不是說，修士的學識，應足夠讓他們與人辯論信仰問題，而是說：在今日的時代，聖職人員的學識應等同一般知識分子，否則便難以和他人作思想交流。所以，那位修士是言之有理的。

認為教區修士不必重視學術上的培訓的傳統觀念，以往是很普遍的。我在修院時期，曾經看過一本六七十年代梵二後出版的書，論及修院培育。該書其中一篇文章是美國天主教大學著名的教會歷史學者 Monsignor John Tracy Ellis 寫的。他指出：「教區神父的學識培訓不需要很嚴謹」這種觀念已經過時。的確，在今日的時代，論及信仰問題，如學識不足，便不能幫助別人。當教友和一般人有些觀念錯了，聖職人員假如沒有好的學識，便不會知道他們錯在哪裡，難以指正他們，亦無從與他們對話。

梵二後，修院的課程加入了社會學、心理學、講道學、大眾傳播等學科；這些學科在梵二前是沒有的。

在以往的時代，修院的長上都認為，「如果修生不懂拉丁文，就不能升神父。」其次，在修院時期，如修士在修讀拉丁文以外，也學習其他外國語言，如英文，這就表示他們打算離開修院，放棄追隨聖召，並且準備後路。的確，拉丁文對一個人在社會上找工作並沒有幫助。修士有興趣讀英文和其他學科，這樣就表示他們沒有把心思投放在修院，而是準備離開修院。曾有這樣的傳聞，一些修生會在廁所看其他書籍，如英文書等，因為如果在當眼地方閱讀這些書籍，一旦被院長發覺，定會被責備。

李神父回顧修院從沿用舊有的管理模式到擁抱時代的變化，以及與時俱進和革新的精神面貌：

以往，傳統上的修院是封閉性的，修士們不能經常外出，不能時常接觸和關注外面的世界。例如，供修士看的報章，有些新聞會被剪去部分內容，例如一些相片或有色情內容的會被剪去。我聽過修士們提及，院長跟他們說：「暑假到堂區做牧民工作時，要記著小心，要留意自己的眼睛！」這是甚麼意思呢？意思是說：別看見漂亮的女教友就「心思思」⁴²，否則就不能專心追隨聖召。我們在修院的後期，已沒有剪報紙這回事。我們當時訂購的是《華橋日報》和《星島日報》，但還未有《明報》，也沒有訂英文報紙。我們前期的修院培育是封閉性的，修士外出要小心，因為認為他們常面對充滿罪惡的俗世，故此要時常小心防範，避免受影響。

在學識培育上，修院後期充實了很多。以前教授神哲學的神父常是兼教的，例如，教禮儀的並不是曾專門進修禮儀的。到現在則沒有這樣的情況，整個教授團的學歷已 upgrade，例如，若沒有倫理神學學位，一定不能去教倫理神學。

以往完全是家長式的培訓，尊卑分明，對長上必須聽命。現在，修士們放假都可以外出，以往的修士，卻是一個月才可探望家人一次，而且只有半天時間，下午五時前要回來。院長會坐在院長室望著修生是否準時回來，過時的定會被追問原因。

馮院長在修院一次訓話的時候，說得很清楚：修士面對修院逐步開放的時候，可以認為過了火，開放帶來不自律；也可以認為不足，覺得開放得仍未足夠。他知道修士們想享到多些自由，但又掛慮自己會妄用自由，受到衝擊，不守院規。「遲一些，我將給你們修士更多更大的自由，來訓練你們。」當時馮院長認為這個時代的修院培育需要這樣做。

馮院長是對的，封閉式的管理模式不合用了，要給修生充分的自由，讓他們去適應新的環境。這個時代再不能像以往一樣。雖然馮院長遇到不少批評，他都照樣推行了新的修院培訓。

⁴² 惦念的意思。

李宏基主教多次提及，「教區修院是教區的心臟」。心臟如有問題，人便有問題。修院是教區的中心地點，是中樞，如果培育修士得宜，將來就有好神父，教區也會興旺，但如果修士出了問題，晉鐸後便會把自己的問題帶到牧民工作中。

在梵二後的初期，教會曾面對很多衝擊：修院的長上受到很大壓力，主教面對很多困難，教區有很多問題也解決不到。這是過渡性的時期，教會好比在黑暗中摸索，因此大家在行事上難免有不少偏差。

曾有一年，當時比我高兩班的幾位修士經教區批准，可選擇到台灣輔仁大學或到羅馬讀神學。當時正值梵二之後，輔大神學院辦的新神學課程辦得很好，於是修士們選擇去台灣，用中文讀神學，省卻了學意大利文。他們到輔大，完成了第一年的神學課程。那時正是 1970 年。那一年，香港教區自行開辦神哲學院，故此教區要求幾位修士返港，完成餘下來的神學課程。幾位修士非常不滿，他們感到在台灣接受到很好的神學培育，為何要返回香港？他們有很多怨言，有兩位修士先後離開修院，餘下兩位完成神學課程，但最後只有一位升神父。當時因為課程安排問題，引起很大衝擊。

李神父總結，在修院的生活經過不少考驗，包括初期身體比較弱，常有精神緊張，身心受到影響，曾疑惑自己能否堅持下去，幸得三位修院神長的鼓勵：

一位是馮汝鈞院長，另一位是神師曾慶霖神父，還有一位是教哲學的鄭志誠神父，他隸屬澳門教區。可惜馮神父和鄭神父後來離開了鐸職。我有一個時期身體不大好，讀書有困難，心情緊張，精神低落。院長對我很體諒，教我怎樣適應。曾神父身為神師，也給我很多鼓勵。教哲學的鄭神父對我則很通融，對我在讀書和成績的要求上寬鬆一點。三位神長在我面對很大困難時，在不同層面都願意幫助我。鄭神父安慰我說：「我在修院時也和你一樣，曾長期神經衰弱，你不用太緊張，讀書放鬆一點，課堂上我會對你的要求減低一點。」不足一年，我的精神狀態回復正常，我對他們三位甚為感激。

李神父最終克服了困難，於 1975 年晉鐸，1984 年學成返港後，一直擔任教區秘書長至今。

05



04



04 修生參觀航空母艦

05 修生到小學教授《聖經》

06 大小修生雲集，等候運動會開始



06

07



08



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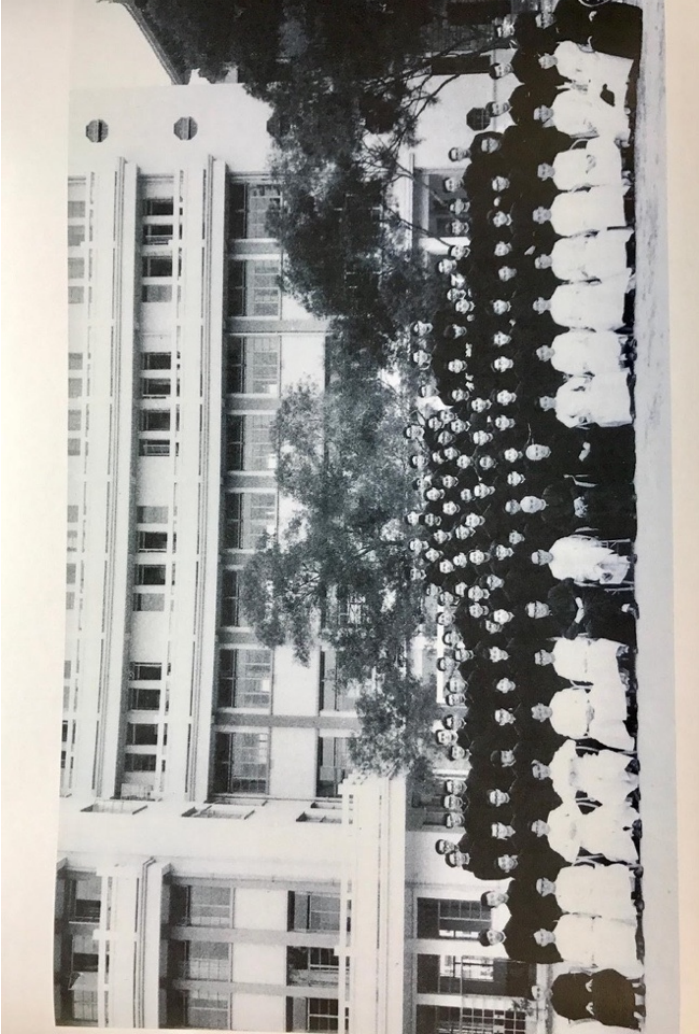


07 修院神師金普仁神父接見學生

08 香港修院神長探望留學羅馬的修生 (1968-69)

09 修生郊遊燒烤

10



10 修院新翼落成，師生大合照（1967）

11 白英奇主教主持祝聖修院聖母山落成（1966）



11

1970s

- 教宗保祿六世 (任期 1963 - 78, 2018 年宣聖)
教宗若望保祿一世 (任期 1978)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任期 1978 - 2005, 2014 年宣聖)

- 徐誠斌主教 (首位華人主教, 任期 1969 - 73)
李宏基主教 (任期 1973 - 74)
林焯焯神父 (教區署理, 任期 1974 - 75)
胡振中主教 (任期 1975 - 2002, 1998 年擢升為樞機)

聖神修院院長

- 馮汝鈞神父 (任期 1967 - 68, 1969 - 71)
李宏基主教 (當時為輔理主教, 任期 1971 - 73)
曾慶文神父 (任期 1974 - 80)
余福綿神父 (署任, 任期 1974 - 75)

- 1970 - 71 香港教區會議
1971.9.8 李宏基神父接受祝聖為輔理主教
1973.5.23 徐誠斌主教逝世
1973.12.21 李宏基輔理主教奉委為香港教區第四任主教
1974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神學部成為羅馬宗座傳信大學屬校，
並可頒授神學學士學位
1974.7.23 李宏基主教逝世；林焯焯神父被選為署理主教
1975.4.5 教宗任命胡振中神父為香港教區第五任主教
1976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哲學部成為羅馬宗座傳信大學屬校，
並可頒授哲學學士學位

導言

聖神修院在七十年代進一步發展，無論在管理上、架構上和牧民訓練上都有明顯的不同。

縱然聖神修院於 1964 年開辦，但礙於缺乏神學教授，加上社會動亂，大修生起初一般派往羅馬宗座傳信大學修讀神學。然而，為了落實本地化，首任華人主教徐誠斌在 1970 年召開的教區會議中，決議開辦教區自己的神學院，名為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此舉可視為聖神修院的里程碑。

在架構上，聖神修院專注於修生的聖召和強化靈修，尤其是第一年的先修班，作為聖召、修道、靈修和教區神父的鐸職培訓準備。在學術上，修生們則在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學習兩年哲學和四年神學的課程。在管理上，神哲學院不再是教區獨力開辦，而是成為資源、師資、修生源等共享的平台。這些助力是從何方而來？此外，神學部與哲學部在七十年代先後成為羅馬宗座傳信大學屬校。至於在牧民職務的培育中，修生又會嘗試哪些範疇的工作？這些體驗對他們有甚麼啟發？對日後的工作有何幫助？

同一時期，自香港天主教開教以來已有的小修院制度，因應香港社會發展的變化，在七十年代初完成其歷史任務，已面臨式微的階段。「成人聖召」由此時期開始，逐漸成為唯一的修生源。修院對有志於修道的男青年在年齡、學歷、工作經驗、思想成熟等方面均有所要求。在本章受訪的十位受訪神父當中，近半是屬於這類成人聖召。他們的聖召之途，相對於從小修院就一直讀下去的修生，會有甚麼不同之處，就由他們在訪談中揭曉。



關傑棠神父



- 1964 進入聖神修院的小修院
- 1970 聖神修院哲學課程
- 1973 暫別修院，到羅馬普世博愛運動體驗
- 1975 重回修院開始神學課程
- 1979 晉鐸

關傑棠神父可說是出自一個聖召家庭，其長兄是關俊棠神父，人們為了區別二人，稱關傑棠神父為「細關」。細關還有一位修女姊姊，另外有一兄一妹，但沒有修道。他認為自己修道不是受兄長的影響。

我十三歲小學畢業後便進入小修院，當時華南總修院已易手交回給教區，定名聖神修院。薄扶林的小修院亦已搬進來，聖神修院內有大小修院，小修院就是中學。

那時很多小朋友未必有機會讀中學，修院給予一個很好的機會去讀書。我哥哥「大關」比我大七年，已經入了修院，而且派了他去羅馬讀書。

那個年代修院很嚴格、很保守、很內向的，大關與我們家裡接觸的機會不多，只有暑期長一點，他在的時候我還很小。後來他也不在香港，所以大關對我的聖召應該沒甚麼影響。

由於小修院兼備中學的功能，當時修生數目盛極一時。

我那一屆最興盛，中一級大概四十五人，可以將比例推上去，越高班便越少人。當時有種心態很奇怪：「你讀不上拉丁文，就是沒有聖召，就要離開」；還有很多像：「你不聽話，頂嘴就要離開」。或者家裡覺得修生要立即從修院出來幫補家計，也會離開的。很多修生讀到中六便決定離開。

我覺得當時教會的心態是：就算他們做不了神父，也至少做個公教青年。沒問題，「放長線釣大魚」，再多也會接受。

我怎樣去形容小修院呢？是一間非常熱心、充滿著宗教氛圍與培訓的天主教寄宿中學。說到認真考慮聖召，就要再大一些，讀完哲學才開始想這些事。

從神父的培訓角度來看，小修院有它的優勢，因為我們曾經一起生活過，同學間的感情深厚，就算不是同班，也會覺得是兄弟、一個團體。這個對教區神父來說，算是奢侈品，因為教區神父，原則上升了神父之後，很難有甚麼團體。如果沒進過小修院，我們發現一種 defect [缺失]，他們很多在成長中已經有自己的格局、性格、生活態度，對團體未必重視。他們可能覺得入修院，做神父就可以了，最重要是讀好神哲學、做好自己的靈修培訓。

這個情況今天也很明顯，當然不是說甚麼好與壞，而是客觀的環境造成。

關神父當修生期間，曾五度轉換修院院長，而神師也是頻密更換：

有影響的，不是太好的。因為在我們那個年代，青年人需要一個我們信任的長上，與他交心談天，但似乎不是太成功。我不是說哪位神父好，哪位不好，只是關係比較疏遠。

神師一定每個月見一次，那時是金普仁神父¹，後來是明之剛神父，他後來撞車過身了。還有曾慶霖神父，「大曾」²也因癌症過身了。接著有位意大利人。後來開放到可以自己找神師，假如某個修會神父或者教區神父，你覺得他德高望重，可以自己找他。

以前小修院是很有紀律、規律的，比如神師問你：「修士，你望彌撒熱不熱心？」你答：「Okay 吧，有時分心。」他便會問：「為甚麼分心？」或者說讀書專不專心、經常都打瞌睡這些。他們重視是否滿全各樣要求，有沒有達到標準，要修生聽命。如果你們頂撞長上，就一定糟糕。後來讀神哲學時年長一些，就多些牽涉到自己與天主之間的關係，就 okay 一些了。

以往說笑的說：「你想做神父？學生時代要乖乖的，不要礙手礙腳、批評長上」，因為教會的觀念裡，聽命很重要。如果修生經常意見多

¹ 金普仁神父 (Fr. Luigi Gambaro, PIME, 1924-1997)，1953 年後抵港服務，1960-68 年任教區小修院神師。因修院另有國籍甘增佑神父，故修生稱甘增佑為「中甘」，金普仁神父為「西金」，以作區別。〈金普仁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https://bit.ly/3lOJNiE>〉，[6-7-2021]。

² 相對弟弟曾慶文神父而言。曾慶霖神父 (1934-1991)，原屬廣州教區，1958 年轉入華南總修院攻讀神哲學，1962 年晉鐸，於 1970-71 年擔任聖神修院神師，並獲獲任命為新界區主教代表。〈曾慶霖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https://bit.ly/3xy2RUM>〉，[6-7-2021]。

多，有時頂嘴，是有危機的。當然我不認同這種態度。修生有自己的性格，未必配合到長上，長上也要開放一些；如果他的性格不是去到破壞他做神父的基本要求時，也應要接受。

現代聖召的一大缺憾：就是教會直到今天，仍然對人格成長 human development 不是看得太重要。整天說靈修、修德成聖……當你還未學懂做人的時候，便送一對翅膀給你，就要你做天使。

梵二後，整個教會處於摸索階段，修院也不例外。

教區在面對梵二那個法令³ 改革裡面，感覺到修院應該要更開放，與世界要有關係，結果我們由一個很封閉的環境，去到一個非常開放的景況。

在小修院的時候，因為很少機會回家，與家人的關係很疏離。直到讀哲學七十年代初的時候，修院剛剛改革開放，突然由一年只回家數次，變成每個星期三休息日都可以回家，有一段時間很不習慣。

因為每個星期三，隨便你做任何事都可以，那時我們傻呼呼的，同學們一起去運轉工人賺點外快，又接觸到社會。

然而，小修院隨著時代的變遷，最終完成了歷史的任務。

我們這一批小修生之後，差不多 70 年左右開始，小修院的制度也慢慢式微了。當你不再招生，沒有中一，就沒有中二和中三。就是這樣逐年減少，數年後就沒有了。

小修院的衰落，少了人進來是其一，另一個原因是從經濟層面來說不實際。我中五、中六時只剩下幾個修生，仍要請整個團隊的老師去教。結果，在我讀中六那年，修院就決定將全部修生送去慈幼中學，或者是香港仔聖伯多祿中學就讀。

拉丁文也差不多衰落了。觀點也改變了：即使你拉丁文不強，也不代表你沒有聖召。過去犧牲了很多人才，很多人哭著走，但他們都是好人。問他們做不做神父呢？他們是很願意的，無奈語文方面……熬不下去。

³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司鐸之培養》法令 (OT) 重申培育修生一些基本原則，亦策劃新猷，以符合大公會議的憲章與法令，並適應時代的變遷。
<<https://bit.ly/2ScviIV>>，[3-4-2021]。

在修畢哲學課程後，關神父出現了聖召的危機。

我讀完中學去哲學院的時候，還有很多位同學的，所謂多也是十個以內，相比小修院那時四十多人還是差很遠。後來在 1973 年讀完哲學之後，我停了兩年，可以說我當時聖召出現了一些危機，不知道不做神父好。我在哲學院的時候多了時間思考、察看自己的生命方向，當時是梵二後的改革，風浪很大，很多修院都出現了人事更替的問題，即有些院長離開了，學長又離開。

我廿二歲左右離開，接著的兩年在外面——初時我是留在香港，但後來有機會跟隨了普世博愛運動，去了意大利前後兩年，再回來香港，進了陳志明神父、閻德龍神父那一班。

我離開修院前，當時的主教是徐誠斌。我問他：「徐主教，我可不可以離開修院，給我一些時間。」他起初給我一年，因為機緣際遇，我去了意大利，第一年結束後，我想著要回香港，剛巧徐主教去世，我便趁機問李宏基主教。他說：「沒問題，你的意大利文才剛剛上手，多讀一年也可以。」這樣就兩年了。

第一年是較為 layman [平信徒] 的氛圍，第二年去羅馬就是……專為想做神父的年輕人，即神父、執事那些已經在做的，加深他們對普世博愛運動靈修精神的認識……上課、聽講座和靈修。

第二年尤其是在末段，那時差不多放大假了，我就整個歐洲四處去。那時自己能夠多些思考聖召的問題，結果就這樣返港繼續神學課程。

然而，關神父在聖召上的挑戰還未完結啊！

我最初打算專心一意，但讀到神學第三年又遇到了感情的衝擊，拍拖甚麼的，再令自己要作出痛苦的抉擇，還去了長洲參加神操。

當時修院已經比從前開放得多了，教友已經可以去聖神修院讀神哲學。因為修院開始策劃與推動神哲學課程，神哲學院開放給外面教友，就是那時認識到女孩子。

我也要感謝耶穌會神父的神操，的確是很有系統的，幫助檢視自己的抉擇，終於「把心一橫」做神父。我也要感激女朋友的冷靜與大方，因為如果不是她支持，就很難做到神父。

坦白說，這個經驗，可以說是讓我日後在工作裡，更加有一份同理心，體會到感情生活中的種種。

除了異性戀，關神父也談及修生中的同性戀事情。

修院以前有個規則，我現在才明白的，叫做「永遠不能兩個人，要有三個人」。背後原因就是怕兩個人感情發展得太多，演變成同性相戀。

在五十年代同性戀者入〔各地〕修院很興旺，為什麼？第一，因為剛剛二次大戰之後，人們面對生死有很大的感受，覺得一切都會過去，覺得能夠為天主做事是一件好事，那時的聖召多得消化不來，有時堂區神父，甚至多人多到要斟水、掃地也有……沒事做，太多神父了。

第二，假設我是同性戀者，其實很容易接受獨身生活。……我滿足到三個條件就一定升到神父，第一、學業上讀書可以；第二，公教教育，聽命就最重要。你不「搞搞震」⁴、不批評教會、世界，就會是個好修士；第三，如果你是同性戀者，更加喜歡在單一性別的範圍中。生活上沒甚麼大困難，就能走上祭台做神父。但神職生活不是說永遠都這麼一帆風順的，當你遇到困難，內心這份傾向可能就會呈現。

我知道在我們的修道生活團體裡面，是有這樣的人存在的。

晉鐸後的關神父並沒有與修院脫離關係。他當了五年本堂神父後，到了美國加州柏克萊神學研究聯合院進修神學，回來後便在修院授課，教授牧職訓練和牧民反思等。

我讀的神學院如果沒記錯是四個天主教修會——耶穌會、道明會、方濟會，還有好像是Holy Cross〔聖十字架會〕，加上十一個基督教的宗派聯合組成，我們那間圖書館的藏書應該是最厲害、最實用的，集合了全世界天主教、基督教的書籍，那圖書館對我是很大的啟發，因為很多東西在香港這裡讀神學時是看不到的。

還有眼界大開的是，加州很開放的，舉個例子：同性戀的問題。那邊教會有很多神父、修士、修女是同性戀，相當盛行，沒人管的。當然我們今天不是討論對或錯的問題，但事實上會遇到這樣的同學和朋友。

說回在修院的難忘的人：

有一個難忘的人，我在小修院的時候，院長是唐多明，他平常給人的印象很兇惡，很嚴肅的。有一次，我在清潔的時候貪玩，將祭衣房樓

⁴ 搗亂的意思。

上貨倉一個聖像的手弄斷了。這是一件很大的事，我很害怕，又過不到自己，覺得做人要誠實，於是戰戰兢兢地去講，講完之後，居然院長向我說：「我喜歡年輕人老實。」所以沒事！

無論你是甚麼國籍，只要你的心是愛修生、用心為他們服務，其實也是可以的，甚麼人都會接受，與你的國籍無關。但如果你是 hea⁵ 做的話，甚麼血統、貴族也沒用。

傳統來說，聽命有它的好處，因為神父不能自己揀選哪間聖堂好就去，但這是理想，那是人性，如果我揀選的時候，真的是出於愛德，例如我與你真的不能合得來，我也要講出我的感受。

這一點我很欣賞胡樞機，他的年代真的很開放，在神職調動方面，他給我們很大自由。如果堂區那邊有個神父很難忍受，肯定會「開片」⁶ 的，你可以提出憂慮，而胡樞機很好人，大多數都會接受。例如如果你要去跑馬地，但與「阿關」真的合不來的時候，他不會逼你去的。

關神父晉鐸超過四十二年，先後服務多個堂區，目前是跑馬地聖瑪加利大堂的本堂神父。

⁵ 懶散的意思。

⁶ 打架的意思。

陳志明神父

- 1966 進入聖神修院的小修院
- 1972 聖神修院哲學部
- 1974 開始修習神學
- 1979 晉鐸



(圖：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

童年在薄扶林太古樓渡過的陳志明神父，家族是來自西貢鹽田梓。他自己是第八代原村民。陳爸爸婚後便搬到薄扶林。

太古樓是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宿舍，那裡是做印刷的，當時有四十八間屋，是香港其中一條公教村……全盛時期，這條村或者這個堂區，有十一個男青年進入聖神修院。現在仍是神父的有范錦棠神父，其他有些因病或其他原因，離開修院或在後來離開神職。

因為那裡是公教村，同時聖神小修院有數年時間在太古樓村旁邊，小修生星期天都上來太古樓的露德聖母堂參加彌撒。逢星期六，他們又會經過我們的村去行山，上山頂，所以我們有很多機會接觸。

1966年，陳神父原本與兩個非常要好的朋友準備9月1日一起進修院。但父母知道後反對。

由於當時的環境不是太多人有機會讀中學，所以有些父母便送孩子去小修院，讀完中學就離開。我父母最初反對我入修院，因為怕被人說閒話：「你兒子想讀書才進修院，會打爛齋鉢。」而且要十三年後才能做神父，他們怕我未必能熬那麼久。

我一般習慣每天早上去聖堂，明之剛神父9月5日見到我問：「你不是進聖神修院嗎？」我說父母反對。他說：「你叫媽媽明天來。」媽媽第二天見了明神父，當日下午便帶我去中環摩羅街，買衫褲鞋襪、漱口杯等。現在我還在用那個漱口杯，跟了我五十三年。9月9日明神父就載我和媽媽去黃竹坑聖神修院。

畢竟是公教家庭，雖然父母起初不贊同，但陳神父進修院後，還是大力支持。

第一年雖然不能回家，每個星期日下午有三個小時，家人是可以前來修院探望。那時的出入口是聖母山旁邊的水池，水池有一條小路，要坐小艇過來。吃過午飯，大家都會很期待的坐在修院飯廳外面，看著哪個親人來。……我家是公教家庭，在培育的過程裡，不會說太多，但每個家人都是支持的。

縱然陳神父初入小修院時仍然是梵二前的體制，但數年間漸漸也起了變化。

小修院的生活很有紀律性。每天早上六時起床，我們小修院有四十多人，像醫院的大房，一到六時正打鐘，大家便跳下床。然後有個學長說：「請大家讚美天主。」大家使用拉丁文說：「感謝天主」。然後去刷牙洗臉，再去聖堂。曾經有一次我們聽到打鐘便跳下床，然後每個人又立即跳回床上。原來四樓的水箱漏水，整層樓都淹水了，拖鞋在飄浮，所以大家都跳回床上。

那時剛開完梵二會議，但那股風未吹到過來，所以 66 年進修院的時候，還是很傳統。傳統的意思是，我 9 月進入修院，到聖誕節才可回家半天。早上九點吃完早餐便回家，下午四點就要回到修院。我住在太古樓相對好一些，如果我住上水，一到家便要回來了，當年就是那麼嚴格。但第二年，1967 年，每個星期六都可回家，可是第三年的時候，改為每個月最少要回家一天。

我們的經驗也很特別，經過了梵二前中後，因此觀察到拉丁文由盛轉弱的情況。我從小到大都在太古樓，有接觸拉丁文，唱那些拉丁歌，以及在小修院的時間一定要讀拉丁文，一定要修音樂，所以我們這方面都有一些把握。大修院的時候，就視乎教授。他們大多數用英文教學。

陳神父在修院的十多年，正值國內爆發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初又因釣魚台主權問題而引發保釣運動⁷。

當時社會也是動盪的。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後來政府成立了青年事務委員會。教區也成立天主教青年聯會。我們有時候會出席的，知道

⁷ 1970 年 9 月 10 日，美日兩國私下達成協議，將釣魚群島和沖繩一起的管治權移交給日本，北京和台北當局對此均提出抗議，宣稱釣魚島列島是自己的固有領土。美日兩國的舉動引發全球華人抗議，港台兩地均出現民間的保衛行動。

一些事情。例如釣魚台，靜坐那些。釣魚台事件我們也有去示威，我們也有出席其他抗議。有時經院長批准，有時也沒有理會，我們自己幾個便跑出去。

修院裡同學的性格、作風各有異同，陳神父在團體內與同學的關係是怎樣的？

每個人的性格不一樣，我自己家裡有十個兄弟姊妹，在太古樓村有四十八家人，我叔叔也住在我們後座，所以從小到大我都習慣跟很多人一起，習慣很狹窄、很多人的環境。

我在家裡排第七，要生存，就要懂得與人相處，形成自己這方面的性格。我與其他人都很容易相處，不會讓人覺得很難相處。

這種平易近人的性格可能為陳神父的培育增添多樣性。

修院培養我們可以很多元化的。在大修院第二年找了我做學長，通常由高班做的。一些場合也找我做領袖。那時我也彈琴的，72-78 年的時候與蔡詩亞，一個星期是我彈奏，另一星期是他彈奏。有些活動由他去彈琴，我去指揮。我踢足球也很棒，與劉富根合作，他踢左翼，我踢右翼。

我也很喜歡創意，當我做學長時，建議李宏基主教，修院辦一個「細運會」，即是小型運動會，除了一般的踢足球活動，我們建議在黃竹坑租幾副麻雀牌，只是打四圈爭冠軍。李宏基院長也同意。有些不會打的修生也贏了，並且用毛氈墊著不讓其他人聽到。這是創新的麻雀牌玩法。

過去五六十年代向香港仔船家派救濟物資、在修院內辦起「街邊學校」等工作已不再需要，陳神父大修生的時期便開始不同類型的社會接觸。

我們那段時間 74-78 年神學期間每逢暑假有三個月的特別體驗。例如第一年我們去黃大仙聖母醫院。我們可以陪著病人至他逝世，也可以進入手術室，去了幾次，看著做手術。另外，以前是可以進入產房，看著 BB 出生。又陪伴病人，他們拉屎撒尿，我們也要去負責換床單等等。這些經驗都很寶貴。

有一年我們去了九龍城寨做三個月青年工作，下午二時到晚上十時。那裡品流複雜，這經驗很特別。又有一年我們四個修士同住荃灣，我們去工廠找工作，有人負責買餸、煮飯、洗碗，三個月就是這種生

活，很豐富的，現在就沒有這種經驗了。雖然說我們的生活封閉，讀的科目很理論，某程度上也狹窄，但也有些人已經在外面讀書，也有很多人會來找我們，所以資訊是不少的。

修院的生活變化厲害之外，在思想上，即梵二的思想，衝擊得很厲害，所以很多人、一批一批的離開修院。

陳神父在修院的年代，經歷了好幾位院長，反映出修院當時的變動。

那幾年很浮動的。1966年，我在小修院第一年的院長是唐多明神父，是傳統的老神父。第二年院長是馮汝鈞，第三年是 Fr. Tei，做了一年，沒有甚麼特別印象。馮汝鈞進修回來又做了一年，就離開了鐸職。之後就是林焯煒當院長，然後李宏基又做了數年。最長時間是曾慶文，好像做了六年院長，之後我就升神父，離開了修院。

那麼多人，我最有印象是李宏基主教。我跟他有點像父子的關係。他很多時候都默不作聲，但人很好的。以前很多時，我一個人坐在修院地下的大會議室彈琴，原來他就在我後面聽著，我都不知道。他又有時在二樓客廳，疲倦地在那裡看電視，我就陪著他。以前廣播不是廿四小時，晚上十一時便變了「雪花」。我便叫醒他說：「院長，已經變『雪花』了，你快去睡覺吧。」

大修院期間，我很敬佩澳門教區鄭志誠神父，他教哲學很清晰，例子用得很好，但他也離開了鐸職。他是我的偶像，為我很大打擊，偶像幻滅了，哭得很厲害，很傷心。

面對教會改革的衝擊，陳志明神父求助於當時的神師明之剛神父，因為神師的角色就是陪伴修生。

明之剛神父說：「他是他，你是你。對嗎？他離開不等於你也要離開。你跟隨天主，不是跟隨他。」有時候神師幫助會好些。

明之剛神父與陳志明神父兩人可用緣份深厚來形容，前者從小看著後者長大，後者如書僮般協助前者傳教。

他是我的恩師。還未進修院的時候，有四年的時間，每逢星期日下午，我陪本堂明神父由西環坐木船去南丫島，為南丫島的教友開下午彌撒，就像書僮般。所以我很受明之剛神父生活的影響。他是我們整條村都公認的好神父，他的榜樣令我選擇做神父這條路。

我 1972 年進入大修院的時候，碰巧他調進聖神修院做神師。當我晉鐸後，他又調到西環做本堂，所以可以看到天主的計劃，他一直在陪伴我。

在修院內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一定是明之剛神父，他是我的榜樣。在學術上來說，我很欣賞 Fr. Sean⁸，耶穌會那位。他對〈若望福音〉分析得很好，很多人都欣賞他。我那個時代的教授都差不多是「鬼佬」，中國神父不多，只有「大關」⁹ 一個。

陳神父認為靈修給予他：「目標，有目標」，因為，早於他進修院不久，就體會到靈修的力量。

我進修院三個月，通常逢星期日下午四時我們都會穿上長袍，參加隆重的聖體降福，是第二個晚課 vesper。我記得我個子很小，不足五尺高，所以坐在第一排，高班的人唱著拉丁歌，很漂亮的。有一次我看著聖體的時候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很有滿足感，覺得與聖體的關係，是自然流露的。那次為我是一個屬靈很深的經驗，不是經常有的。就算現在說回五十多年前的事，也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在修生的時代，教區提供了我們全部的衣食住行，一個人當物質不缺的時候……會喜歡追求靈性。靈性的經驗讓自己有很大的滿足，給我力量繼續前行。我覺得修院和教區對修生的培育都很好，尤其是與外國相比，其實不差的。

後來在神學階段，陳神父為了追求靈性，先有大膽隻身遠赴日本，後有到法國泰澤體驗，更出現當神父以外的另一個選擇。

讀哲學很乏味，自己不是太喜歡，我比較追求靈性的滿足。我很慶幸有機會可以追求靈性。例如跟隨不同的大師，去日本跟 Fr. Oshida。後來又去泰澤，很幸運遇到這些高人。

⁸ 嘉理陵神父 (Fr. Sean Ó Cearbhalláin, SJ, 1938-)，1956 年加入愛爾蘭耶穌會，1964 年抵港，1971 年晉鐸，是聖經神學家，曾在聖神修院神哲學院任教及擔任教務主任，直到 2005 年第二次中風才終止，現居於港島聖若瑟會院。

⁹ 關俊棠神父。

到了神學二年級，我聽聞日本有位神父¹⁰來香港為修女帶避靜。我問准修女加入參加。參加後我覺得很有「味道」。我問神父：「可否去你那裡跟你學習？」他說：「好，好。」後來我寫了信給他說想暑假去，但他沒有回覆，我不管就照樣去了。我當時很大膽。之前兩年75、76年每個星期三我與「細關」¹¹去聖瑪加利女書院教中六級倫理，賺了千多元，便用九百多元買機票，拿著二百多元便去日本。我全家人也來送機，我說有人會接我，但其實沒有。

就這樣，陳神父一個人獨闖日本，還真的給他找到道明會神父押田成人（Fr. Vincent Shigeto Oshida, OP）在長野縣高森的日式禪修靈修團體。

我就在那裡住了六個星期。每天靜坐祈禱，到田裡摘薯仔，那個經歷培養了我靜的經驗，與主有一種個人的關係。回來後我仍然每朝早三點多便起來靜坐一個小時。

1977年，泰澤院長 Br. Roger¹²來香港，住在香港仔的棚屋，很多人慕名報名前來。我那時覺得靈修上已很滿足，不過明之剛神父著我去。參與彌撒後 Br. Roger 問我覺得怎樣。我說，“I felt something”有些感覺，他就著我去聊天。他說法文，英文不太好。我的英文也不太好，兩個英文不好的人用英文對話了兩小時。外面有數十人慕名而來想見他，但他繼續與我聊天，其後還叫我與修士一起住。我說要先問得院長同意。回去修院後，我敲曾神父的門說：「泰澤的修士想我與他們一起，不知可不可以？」我想他會說不好，怎知他說：「你試一下吧。」第二天上完課後我就拿著睡袋過去，與其他修士一起。

Br. Roger 留港最後一天說：「Dominic，你可不可以跟我們一起回法國？」像《聖經》說「跟我走」，“come follow me”。

¹⁰ 道明會押田成人神父（Fr. Shigeto Oshida, OP, 1922-2003），出生於神道教家庭，二十歲時遇到一位耶穌會士而觸發讀神學的念頭，至二十六歲時險些遇溺的經驗更使他毅然修道成為神父，並加入了道明會。他多番受疾病折磨，選擇在高森隱修，但這草庵卻吸引了許多人前往做禪修。參“Vincent Shigeto Oshida (1922-2003)”，荷蘭道明會網頁，<<https://bit.ly/2UaToVO>>，[6-7-2021]。

¹¹ 關傑棠神父。

¹² 羅哲·舒茨修士（Roger Schutz, 1915-2005），瑞士出生的基督徒，1940年創辦泰澤團體，團體以法國總部所在地為名，是一個基督徒合一組織，每年吸引數以萬計的信仰者前往體驗合一氛圍。

不過，陳神父婉拒了，但答應翌年暑假去拜訪，羅哲修士也慷慨地提出支付旅費。對於突如其來的邀約，陳神父不禁問天主：「到底發生甚麼事？你告訴我，我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第二年他真的寄了機票給我，我便到泰澤住了三個月，甚至他想我留下。那時我做了十天隱修士那種避靜。但我沒有感受到甚麼。他就說：「沒關係，我們會當你是我們的修士。」所以我升神父時，他也派人來參加。那幾年每當有時間我都會回去泰澤。他每次都會叫我穿上他們的修士袍坐在中間祈禱，所以 2019 年他們來香港於主教座堂舉行洲際祈禱大會的時候，我就是坐在中間與他們一起祈禱。這是因為他們跟以往 Br. Roger 一樣，當我是他們的修士。雖然名義上不是，但心神上是一致的。

我覺得自己很有福氣，遇著明之剛神父陪伴我成長，在神學期間遇上 Br. Roger，使我在神學上有很深的成長。還有 Fr. Oshida 和 Br. Roger 的教會觀、世界觀很強。而我也很幸運與 Mother Teresa 德蘭修女有個人的接觸。我覺得人生裡遇到四個這樣的聖人、這樣的大師級人物，真的很幸運，所以我時常都很感恩，白白得來的靈性經驗與人分享。

陳神父自己早年在修院接受培育，後期也管理一個「活的修院」；而梵二對他的影響，體現在教會觀，以至推動終身執事這事務上。陳志明神父自 1996 起擔任終身執事委員會主席。

終身執事是一個 living seminary 活的修院，是一個動態的修院。很多時候你不只是要做培育，還要做很多事，要見很多人。

教會是大家一齊建設的，就會有不同的職務。特別是我負責終身執事，更加看到重要性。如果大家都實現梵二的教會觀，神父要瞭解教友的職務，教友也要瞭解修道人的貢獻，修道人也要知道神職的使命。肯定別人的使命，也肯定自己的使命，有四十多萬人一起在教會服務。但如果傳統式，我們甚麼都依賴神父，能力有限，教會變得弱，所以繼續發展教友職務是很重要的。

對比今昔教會肯定不同，以前很著重是禮儀性。開了彌撒、聽了告解便滿足了。今時今日有社會訓導，完全不同。手法上來說，以前全部都是由神父做，你幫神父忙。但胡樞機的年代已開始有教友職務。教友可以做甚麼就讓他們做。

陳神父於 1979 晉鐸，先後服務多個堂區。自 1985 年開始，他兼做較多的行政工作，1992 年獲任命為副主教，1997 至 1999 年間前赴羅馬攻讀靈修神學碩士課程。返港後，工作與日俱增，現時是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主任司鐸，也是多個教區小組及委員會的主席。

我覺得我們那一代人服從性、教會感很強，主教說甚麼我們都會配合，不會太個人化，我們那一代人的培育就是這樣。第二是紀律性。紀律是指自己維持著生活的一個節奏。

服從是一個一個團結起來，即一個教區。我覺得教會如果沒有內部團結沒有甚麼意思。每個人做自己的事有甚麼意思呢？有內部團結才能做見證。

胡樞機給我機會去羅馬讀書，他就說：「你不只去讀書，讀書到哪裡都可以讀。」因為羅馬是教會二千年的中心，他叫我離開之前要熟悉羅馬的歷史。他叫我不要整天躲在房裡讀書，要到處走，去參觀，所以那幾年我去參觀的聖堂大大小小也約有一千座。那裡有二千座聖堂，所以單是羅馬我都參觀了一千座。

事實上，神父領受司鐸聖職後，各有工作指派，不會像在修院時每天一起讀書、玩樂和生活那樣密切。為此，教區為神父們定期於每個月第三個星期三的下午三時，舉行簡稱「333」的活動來拉緊大家的關係：

所以我們有「333」這個活動，有個維繫，但只是聯誼性，反而更重要的是每個人與主教的關係。如果按照教會所講，他就是我們的父親。我們有「333」這種聚會。但基本上就是主教，然後就是我們自己的團體堂區。

閻德龍神父

- 1969 入讀聖神修院小修院
- 1972 開始聖神修院哲學課程
- 1975 開始神學部課程
- 1979 晉鐸



閻 德龍神父自幼做輔祭，經常被問及會否做神父或修士。閻神父最初選擇做修士，被推薦進入聖母昆仲會的初試院接受培育。

我初中三年都在聖母昆仲會的初試院內，一方面受訓，一方面讀書。就讀初中時，梵二已開完好一段時間，我不用修讀拉丁文。我在聖芳濟書院念中學，日間學習與一般學生無疑。下課後，倒有點像寄宿生，我會返回修院接受培育。修院裡有團體生活，我們會一起念早課、晚課、參與彌撒。之後，我又做回學生，做功課、自修。星期六、日不用上課，初試院會進行一些活動，但與拉丁文沒多大關係。因為我和其他修生沒打算做神父。我們看重的是努力讀書，因為昆仲會主要辦教育工作，我們被培育將來做修士和老師。

家人認為做修士是一件好事，只要不做壞人便行了。可是三年後，聖母昆仲會決定停辦初試院，閻神父才轉到聖神修院接受培育。

我讀完中三那年，修會決定暫停初試院。這是修會經過長時間分辨後的決定，因為初試院培育期達七年之久，成效不是太大，卻要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既要照顧我們起居飲食，又要安排修士與我們一起生活。最後，修會會長對我們說，我們會考後如果仍有興趣，可回去接受修士培育，又說屆時我們年長一些，成熟一些，跟進培育可能會好一些。他說會考後，我們如繼續念中六、中七，預科兩年可同時接受培育，如培育時發覺我們適合修道，便送我們去修院。他說暫停初試院，不是解散，我們只是不需要度回初試院生活。修院每月有小團體聚會，並給予我們靈修培訓。我覺得他們是想藉此留住我們。

回家裡住，沒有初試院的正規培訓，只是參與每月一次的團體聚會，我覺得這樣的培育是不行的。因為我們當時年紀輕，很活躍，有很多想法，不會很專心於修道。所以培育的環境很重要。

聖母昆仲會初試院停辦前，中一至中五各級都有幾個修生，大概十四、五人。可是，最終只有我一人進入聖神修院，另有一個做了修士。

我記得當年回去告訴本堂神父：「修院『執笠』¹³。」本堂神父聽得莫名其妙，說：「修院怎可能『執笠』？」我說：「是真的，修會會長是這樣說的，他叫我以後不用回修院了。」神父聽罷，二話不說便寫了一封信，叫我帶去聖神修院見院長。我問他：「那是甚麼地方？」他說：「那是修院。」我問：「甚麼修院？」他說：「那是教區的修院，不是修會的修院。那裡是培育人做神父的。」我說：「我不要做神父，我要做修士。」本堂神父說：「做神父、做修士一樣是度獻身生活，服務天主，都是一樣（有意義）的。你去試試吧。」因此，我帶著信箋到聖神修院去，之後獲錄取在聖神修院接受培育。

轉到聖神修院之後，閻神父發現與之前的昆仲會有明顯不同。

最大的不同當然是聖神修院很大，人也多，當時最少有七八十人，有大修士、小修士。訓練是類似的，因為我和一些小修士仍在念中學，平日外出上課，下課後回修院接受培育，參與團體生活。

我記得當時聖神修院的小修士有念中文中學的，也有念英文中學的。我念英文中學中四級，念最高班，同期還有一些念中一至中三級的小修士。聖神修院原本自行提供中文中學課程供修生修讀，但後來修院進行改革，讓修畢初中課程的修生，即升讀中四、中五、中六的修生，到了筲箕灣慈幼會的學校讀書。修院他們的計劃是不再收錄小修士，讓原先的收錄制度慢慢 phase out [逐步淘汰]，之後錄取的修生便送到香港仔聖伯多祿中學就讀，修讀英文中學課程。我因初中時念英文中學，便安排在聖伯多祿中學插班中四。因此，我與後來進修院的中一至中三級的修士一起在聖伯多祿上課。那時聖神修院內念英文中學的修士被安排住在一塊，有數十人；念中文中學的修士也有二三十人。那便是小修院。我們還有大修院，當時念哲學的修士也有十多人。

我們在大飯堂吃飯，大修士們有他們的飯堂。聖神修院有三處地方供修士居住。其中，古色古香的那幢建築物，兩邊的樓房分別給念中

¹³ 結束的意思。

一、二、三的小修生和念中四、五、六，連同後來念中七的修生居住。至於相連的新建樓房，有兩層是給讀哲學的大修士住的。

當時修院住了很多人，加起來有八九十人，大家擠在一起，怎麼辦？所以上課要分開，吃飯也要分開；連吃飯後散心聊天也分開在不同地方；念初中的小修士在籃球場上散步，我們念高中的在足球場上散步，念哲學的大修士則沿著修院繞圈散步。說得難聽一點，是大家各有「地盤」。如果你想踏進人家的地盤，你要先問准，並說明你想過去做甚麼。如果是整個修院的活動，大家當然一起參與。

念中學的小修士雖然分開管理，但大家一起吃飯，活動也在一起，在小修院一同生活六七年時間，怎會不認識？與大修士就比較疏離，但仍會認識他們，因為修院的集體活動一年中還有很多，我們和念哲學的修士關係不那麼密切而已。

我與念初中的修士關係當然密切，因每天都一起上學，一起放學，一起吃飯，一起活動。初中修士與在慈幼會念高中的修士，關係沒有那麼密切，因為學習和居住的地方也不同。但我卻例外，因為我念中四，上學與初中的小修士一起；卻與念高中的小修士同住，所以我、與念高中和初中的小修士都熟悉。這很有趣。

小修院全都是國籍神父管理。記得當時院長是姓馮的神父，副院長是林焯煒神父，而負責我們小修院的是余福綿神父，就只有他們三位神父。管理大修院的神父，我們不認識，只知道當時有很多外籍神父，有許多耶穌會神父在修院教學。

我剛進去聖神修院時就更換了院長，改為國籍神父管理。院長、副院長，修院的培育團，照顧修士的神父，都是國籍神父。先前負責修院的耶穌會神父早已離開，修院一度交給宗座外方傳教會的神父打理。他們負責了一段時間，將修院交回給教區。當時剛好教區也更換了主教，由意大利籍主教改為國籍的徐誠斌主教。隨著徐主教接掌香港教區，修院的培育神父也全部轉為國籍神父。

管理修院方面，外籍和國籍神父的思維和做法有點不同，要求也不同。我聽說以前由意大利神父做神師時，修士要每個月填表，並帶同表格見神師，由他來評審。我們的年代已經不需要這樣做。國籍神師會直接與修生交談聊天，瞭解情況。

聞神父當談及修院的神師明之剛神父，言談間流露出欽佩和敬重！

修院唯一一位外籍神父，是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明之剛神父，他是我們的神師。

明神父的中文比我們還要好。他做神師的特色是以身作則，他為人很簡樸、很熱心、很包容。他的身教為我非常重要。除了明神父外，我沒有被分派另一位神父做神師，但我發覺明神父很特別。他雖然是法國人，卻是一個很「貼地」的人。他不會與你談風花雪月或講大道理。

神師平日做些甚麼？我們上學時，明神父便去耕田。修院現在很多果樹都是他當年種下的。明神父農夫出身，是一個很務實的人，很有牧者的心腸。他未進修院之前，在堂區做本堂神父，每個人都很喜歡他。他的思想很開放、很前衛，整天說教會是大家的，不是神職人員的，提醒我們做神父的要懂得與教友合作，並欣賞天主給他們的「元寶」¹⁴。明神父每次講話都很用心先寫下來。我想他應該看了很多書籍，有很多學問。

在修院培訓時，我們每星期有神師訓話。明神父會為我們作靈修講話。曾有一次，明神父講話時，大概因為明神父事前把講稿寫下再讀出來，聽起來有點沉悶。在他十分鐘的講話中，我們或在打瞌睡，或發白日夢，但明神父卻不在意，不指罵，只說：「你們不聽，你們睡覺嗎？天主祝福你們，繼續睡吧。」他就繼續講，講完就念經。現在回想起來，我卻有點後悔，白白浪費明神父很用心準備的講話，那些講話其實非常有用，只是當時不曉得是寶，真是「走寶了」¹⁵。

我們與院長的關係沒有那麼密切。院長訓話都是些大是大非的事情。由於當時的院長做了幾年，便換了李宏基神父接任。那時李宏基神父剛被擢升為輔理主教，隨即接掌修院院長。因為李主教白天要回教區中心工作，下午四、五時才返回修院，我們與他接觸的機會不太多。

現在聖神修院院長也是主教。這說明第一，修院培育是重要的，不可隨便交由一個人擔任。院長是整個培育的舵手，對培育修生尤為重

¹⁴ 《聖經》中耶穌使用的比喻。

¹⁵ 錯失了寶貴的東西。

要。一位神父能當上主教，教會感不會有甚麼大問題。他培育出來的修生、神父大概有一定的保證。我想教會一直有這個想法和傳統。不單香港，世界各地許多大修院的院長也是主教。

從小修院到大修院，閻神父是怎樣做抉擇的呢？

院長也有跟我們談及進大修院一事，因為當時很多修生讀完中學便離開修院。完成中學，我們已經是十七、八歲，可能重新考慮自己追求甚麼。我覺得第一類選擇離開修院的人，是最棒的一批。他們考進了大學後，大多都離開，就算留下來，一年左右還是離開。在大學可能有更多的衝擊，對信仰的衝擊很大，加上七十年代的社運，衝擊更大。修院當然保守得多，沒有那麼前衛。第二類離開的是那些讀書不成的，因為之後要讀哲學，要求又不同了，沒有多大信心。之後的培育還有七年，也很「難捱」。如果屆時中途離開，年紀大了一點，才再看讀些甚麼或幹甚麼，就有點困難了。

在大修院，我們班裡當時有陳志明、我，及由小修院上來的數個修生，再加上幾個直接進大修院的。其中一個是上一任主教楊鳴章。楊主教與我們在大修院是同班同學，但比我們提前畢業，早一年升神父。因為楊主教聰明，讀書表現優異，三年的哲學課程，他兩年便修畢。四年神學課程，他本可以三年讀完，但修院長上們著他慢慢讀，不用急，所以沒給他三年畢業。他們認為讀書是一回事，也要讓他對修院生活多浸淫一下。

另外，還有曾偉雄、羅國輝，另有一個澳門修生。我們班應該有七八個人左右，有直接進大修院的，也有小修院上來的。小修院上來的有兩類人，一類是留在修院讀書，另一類到大學讀書。到大學讀書分別有入讀中大、港大和台灣輔仁大學的。周景勳當年入讀輔仁大學。周神父當年和我一起念中四，但同級不同班。

修院覺得成年聖召的修士，也是有進有出，不是很穩定的。成年聖召多數是曾在社會工作過的，如楊鳴章工作了一段時間才進入修院，曾偉雄也是在社會上工作過，羅國輝也曾從事教學，都是一些在工作期間發現召叫才入修院的。第一，他們放下課本已經數年。第二就算多熱心，也不會每天去聖堂祈禱和做神業¹⁶，一定有些分別。

¹⁶ 做靈修的意思。

修院因此在課程上作出改革。特別為成年聖召者，第一年設先修班。第一，讓他們再讀書，讀一些簡單的課程；第二多給他們一點靈修培育，讓他們可以適應修院培育生活，透過一年時間的浸淫，更認清自己是否真心回應召叫，才開始讀哲學，這會穩妥一些。因為只暫停工作一年，如果修道不成，還可以重投社會工作。……上述的安排是我修畢修院哲學、神學課程之後數年才開始的。換言之，為成年聖召者，修道培育包括一年先修班、兩年哲學、四年神學的年期。

現在聖神修院也是一年先修班、兩年哲學、三年神學課程。不過，做神父的在完成哲學、神學的課程後，還要修讀第四年課程，學習牧民訓練。同樣是四年，但不是從前用四年時間修讀神學，而是將第四年，留給一些準備做神父的，修讀與牧民相關的科目，如聽告解、堂區管理等。因為學院不只是修生，還有修女、教友修讀神學。修女、教友不用修讀第四年的神學課程。

從閻神父口中得知，小修生因為要外出上課，生活比大修院忙碌得多！

小修院整個生活節奏跟大修院不一樣。記得在小修院，我們要外出讀書，花上不少時間在交通上；我們到香港仔聖伯多祿中學讀書的，要提前一小時出門；另一些修生到筲箕灣慈幼會上學，要更早出門，當時修院租了一輛大巴接送他們。我們外出讀書，不可以遲到，也不可以被罰留堂，否則便要自己回修院。我們那時也很少參加學校的課外活動。因為若不跟大隊往返，天黑了也未必能回到修院來。

在大修院，吃在那裡，住在那裡，讀書也在那裡，只是在樓層間走動。上午九時上課，可以八時五十五分才下樓。想參與甚麼活動，只要不是上課的時間便可以，例如有人喜歡音樂，下課後可以習琴；有的喜歡運動，下課後可以打球。像楊鳴章不喜歡打球，他可以跑步或散步，也可以到圖書館裡看書。我中學開始已經很喜歡做運動，尤其喜歡跑步，是「長氣袋」。我一有空便跑步。我走路也很快，其他人與我外出就慘了，總是嚷著：「神父，慢一點！神父，慢一點！」我想可能因為習慣跑步，做每件事都「快」和「急」。

閻神父認為修院修讀的科目，最重要的是：

第一是《聖經》，不熟讀《聖經》是很難宣講天主的喜訊。神父作為一個宣講者，要宣講耶穌基督。怎樣宣講耶穌基督？就是透過聖言，所以熟讀《聖經》，精通《聖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第二當然是禮儀，禮儀很重要，禮儀是神父每天都要做好的一件事。不能只是跟著規矩去做。我覺得聖事也是很重要。禮儀也是聖事。很簡單，神父主持喪禮，不只是為了死者，死者已經躺在那裡；最重要是那一群仍在世的親友。神父怎樣讓他們明白在天主教的信仰中，死亡的意義與我們繼續生活的人有甚麼關係？神父如果做好喪禮的禮儀，是會影響很多人的。

第三是支撐宣講和禮儀的靈修。正如一張椅子若只有兩隻腳是站不起來的，它最少要有三隻腳。靈修指我的內修生活，我跟天主有否密切關係。若我不接觸天主，又如何將天主的喜訊在服務中帶出來？上述三個科目的學習都有難度，並不容易充分掌握。

香港 1970 年代，大學的政治氣氛非常熾熱，是學運的火紅年代。身處與以前不一樣的社會環境裡，修士們也會關注社會的發展和變化。

七十年代學運影響很大，大專聯會做了很多事情，我們都有關心，也有討論，但我們的參與不太多，說到底我們大部分時間在修院學習，但我們不能說學運與我們無關。我們讀哲學、神學，也算是個大專生。修院學習，我們也有學生會，也有參與社運的討論，當時參與最多的是慈幼會的李文烈神父¹⁷。李神父是我們高年級的同學，也是學生會的成員。他晚上時常來修院跟我們討論學運的事情，商討怎樣回應，怎樣參與。當時修院內有幾個修士也很熱衷學運。我們除關注、討論社會事件外，也盡量參與社運，雖然不是走到最前線。因為很多事情我們都不可以自行作主，必須要詢問院長。院長不准許的話，我們也不能做。

牧民實習使修生體驗和瞭解社會上不同階層的人士和他們的需要，「看到世界的另一面」。它除了幫助閩神父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礙，實習中也發生很多趣事。

我們獲安排牧民實習。在暑假不用上課的時候，修院長上會看我們哪一方面的經驗缺乏，便讓你去體驗一下。在念哲學、神學期間，我做

¹⁷ 李文烈神父 (Fr. Peter Newbery)，慈幼會士，1967 年從英國來港，曾擔任教師及懲教署輔導員，1991 年於香港創立「協青社」，幫助離家出走的青少年。〈致力服務高危青年成為正向青年 協青社創辦人及榮譽總幹事李文烈神父 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協青社，2018 年 10 月 27 日，〈https://www.yo.org.hk/Form/PressRelease_181027.pdf〉，[6-4-2021]。

過幾種工作。我曾跟明愛社工探訪老人家、獨居人士等。有一年暑假，我獲安排去沙田探訪一些老婆婆。我記得主管 supervisor 是在荃灣明愛中心工作，我住在香港仔，當時黃竹坑還沒有「地鐵」，由黃竹坑去荃灣要用上半天。

後來我被派去元朗實習。我先由修院乘車到中環，再坐船到佐敦，在佐敦碼頭再轉乘巴士和小巴到元朗，抵達元朗已是下午四、五點。有一些老人家住在聖堂附近的村落。我負責探望幾位操客家話的婆婆，跟她們聊天，瞭解一下她們有甚麼需要。我從中瞭解香港有很多獨居長者，只是當時的情況沒有現在那麼嚴重。由於路程遙遠，我星期六晚不回修院，就住在元朗聖堂，星期日再看聖堂有甚麼需要幫忙，待下午才回修院。

另一年暑假，我和一些修士獲安排到聖母醫院實習兩個月。當時是七十年代，聖母醫院是一所公教醫院，卻沒有牧工。我們就充當牧工。我們獲安排進病房探望病人，人家也不知道我們是誰，還以為是醫生或是護士。我們被囑咐站在一旁，不能阻礙醫護人員工作，不能亂碰東西，就算有東西跌在地上，也不能拾起來，因為可能會有細菌，會累己累人。總之，我們要跟著醫院的規矩去做。

在醫院實習期間，我們會看到一幕幕生老病死，我從中克服了很多心理障礙。還記得第一次入殮房，看著亡者遺體，已把我嚇得半死。我被派到產房，看到人怎樣來到世上。當時很少有剖腹取嬰，大多數是順產產嬰。有一次，一位準媽媽被推進產房，半個小時仍沒法生產；此時另一個產婦被推進來，護士還未準備好，嬰兒卻出生了……。這一幕讓我想起《聖經》說：「事事有時節……生有時，死有時。」

後來，我們幾位修士被分配每人陪伴一位末期癌症病人，直至他離世。我試過目睹一個長期病患者，他病得很厲害。一天，醫生教授帶著幾個小醫生巡房，看他的病症和牌板上的病歷。醫生和小醫生的對話，那病人雖沒聽懂，但大概知道自己康復無望。醫生巡房後不久，他爬到欄杆要跳樓。剛好被一個修士發現，急忙上前摟著他。其他人沒看清楚，以為那修士要跳樓，大聲喊說：「修士跳樓！修士跳樓！」他們看不到修士前面還有一個人，修士摟著他又不能動……後來那病人終於平復心情，返回病床。

我們在醫院實習，一般早上獲分派工作，下午分享工作體會和感受。當講及「修士跳樓」一事，大家笑個不停，我笑得淚如泉湧。後來，大家對那修士訕笑說：「修士，你有甚麼看不開也不要跳樓，更不要在那裡跳樓，要走遠一點，以免影響病人啊！」

此外，我還有一年被安排在學校實習，我跟著老師一起進課室做他的助教，協助上課，也是一份很好的體驗。

閻神父憑著在修院學術和牧民兩方面的裝備，於 1979 年晉鐸。過去四十多年，他曾擔任過不同的崗位，堂區司鐸、修院修生培育、及曾遠赴澳洲雪梨，為當地華人服務。他先後在美國和羅馬進修培育及靈修。雖然他今天成為香港明愛總裁，他重視的仍是他從修院學習得來的東西。

修院的神修很重要。如果我不祈禱，不做神修，沒有與天主建立關係，講道說得再好，甚至能把樹上的鳥兒哄下來，也沒用。

現在我在「明愛」工作，為同事是一個標記。他們很多都不是教友，也不知道神父是做甚麼的，但他們看到我的行事為人，便知道做神父是怎麼的一回事。

像有一次要搬動一張很重的桌子。我也和夥計一起搬。夥計都嚇了一跳，連忙說：「不用了，我們搬就是了。」我說沒關係，多一人搬，就不會那麼重。他們一臉訝異的望著我。我從不以為自己很了不起，以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自居。我覺得如果這樣看自己，心態很有問題，這是在修院學習和堂區工作時早已學會的。

羅國輝神父

- 1972 以走讀生形式修讀聖神修院哲學一年級
- 1973 正式入聖神修院，攻讀第二年哲學課程
- 1975 開始聖神修院神學課程
- 1979 晉鐸



羅國輝神父出身於灣仔區的草根階層，全家奉教，幼年已喜歡在教會學校的聖母山前祈禱，以及在彌撒中當輔祭，後來得到外祖母的啟發，踏上司鐸聖召之路。

我的外祖母是我聖召的啟發者。1950 年代，我在基立學校¹⁸ 讀小學，那裡有聖母山，我們放學後就在那裡跪下來祈禱；我也有求聖召。基立學校的信仰培育真的很好，每個星期給我們機會去辦告解，所以那段時間給我建立了一個很好的信仰基礎。

小學五年級後轉校到堅尼地道的聖若瑟書院。聖若瑟的教育，加強了我的信仰基礎。Br. Thomas 要求我們背誦〈路加福音〉。

一般同學都家境富裕，可以到餐廳吃飯，到飯堂買零食，但我沒有錢，有些自卑。那麼怎辦？我就拿兩塊白麵包塗一點煉奶回學校，躲在「兵頭花園」¹⁹ 溫室裡面吃，不敢讓人看到。天主很好，祂讓我開始學懂欣賞那些花朵。我走著走著，到了 St. John's Cathedral [聖若翰座堂]，聽他們唱午間禱，可能是午間音樂崇拜，很美麗，很欣賞。我也喜歡逗留在學校的小聖堂，有甚麼便跟天主說。

羅神父並沒有進過小修院，他在社會工作過，然後才進入大修院，屬於成人聖召。他為此要「感謝天主」。為甚麼呢？

天主對人有不同的召叫方式，以及造就。我五年級的時候很渴望進修院。不過，因為我是長子，還有四個弟弟。我爸爸是工人，我怎可能進修院呢？所以唯有用心讀書。

¹⁸ 1950 年煉靈堂（1957 年改名為聖母聖衣堂）建成後附設的小學，於 1994 年停辦。見《天主足跡在灣仔》，聖母聖衣堂，2019 年。〈<https://bit.ly/3gZNqj5>〉，[16-6-2021]。

¹⁹ 即今之香港動植物公園（1975 年易名）。公園於 1871 年建成，原名為「植物公園」。由於園址於 1841-42 年為督憲府所在地，而總督兼任駐港三軍總司令，俗稱「兵頭」，故公園又稱「兵頭花園」。

完成中學後，我半工讀，在當時的工業學院讀電訊工程，但我根本不喜歡這科目。為了生計，要養家，我又在工廠工作。這是我信仰成長的第二個階段。

那時我在觀塘一家工廠做技術員，看到工人有很多困難。例如工廠的女工……底薪很低，不可以遲到、請假，要加班才能拿到勤工獎。但人生是這樣過的嗎？有些真的出去「玩」，不潔身自愛，因為他們看不到自己的價值。

當時的老闆是基督教徒，但我卻看到他壓迫和剝削工人。這是社會問題，整個社會環境都是這樣。當你進入了罪惡的圈子，你犯了罪也不會覺察到。

老闆發薪水的同時，會送中文《聖經》，但人們拿來擦廁所板，用來賭大小。為甚麼？因為沒有人相信。老闆所做的事，對人的剝削，與《聖經》背道而馳。另外，老闆最喜歡我們在吃飯時候分享《聖經》。愛你的老闆在萬有之上；愛人如己，就首先愛你的老闆？這段時間讓我思考，我面對天主，面對這個社會，面對自己的人生，我要做些甚麼呢？我每天傍晚都會坐船過海，去聖猶達堂參加薄暮彌撒。在這過程中，我想了很多事情。

還有王輔臣神父²⁰。他的廣東話很差，但他為人的態度很吸引我，是一位屬靈的人，令我再開始尋找聖召。

還有禮儀營；是由鍾桂生神父²¹開始的。1970年我二十歲，剛好是禮儀改革的高峰，用新的彌撒書。因為我從小輔彌撒，對教會的祈禱生活和禮儀生活，有一份好奇，一份熱衷。禮儀營的出現使我對禮儀更感興趣。而這個禮儀營亦給予年輕人很大的幫助，培養出我和另一位神父，即耶穌會的蕭見忠神父²²，也出了一個修女，聖母頌主會蔡錦文修女²³。到今天禮儀營的營友仍偶有聚會。

²⁰ 王輔臣神父（1896-1971）於山西出生，1922年晉鐸，曾在堂區及小修院工作。1949年來港，加入香港教區，1953年起服務於北角聖猶達堂。〈王輔臣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https://bit.ly/3fd6cCR>〉，[8-4-2021]。

²¹ 鍾桂生神父是慈幼會士，現居於意大利，在羅馬殉道基督徒墓穴服務，並致力整理多份教宗的訓導文件和教會資料，輯錄及編譯成中文，進行講授和福傳工作。〈<https://chungfdb.wordpress.com/>〉，[8-4-2021]。

²² 蕭見忠神父現於加拿大多倫多華人天主教聖心堂服務。

²³ 蔡錦文修女是依納爵神操靈修導師及精神分析博士，現從事輔導及靈修指導、帶依納爵

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活動叫「聖召茶座」。我記得有康建璋神父、夏其龍神父、鄭生來神父，還有駱鏗祥神父。他們與年輕人聊天、分享生活。他們當時是年輕的華籍神父，我們又是一班在外邊世界尋尋覓覓的年輕人；其實，是天主教在尋找我們。聖召茶座吸引著我；與神父們的交談，為我來說，實在是一份聖召培育。我還記得夜訪駱鏗祥神父，猶如尼苛德摩夜訪耶穌。可以說，我的聖召培育，開始於聖召茶座；它對我非常有幫助，幫助我分辨聖召。

我最感動的一次，是聖召茶座的神父帶我們去修院，參加修士們的晚禱。那時有很多修生，在大聖堂，明供聖體，以及唱晚禱。我覺得是天上人間，那份感動給我很深的信仰經歷。

1972年我當時已經廿二歲，要做決定了，因為那個年代的人都很早結婚。最後，我便開始白天在修院讀哲學，下午在聖猶達小學教書。我記得哲學教授龍厚榮神父²⁴，每次下課後，他都開車，把我載到筲箕灣，我再轉車去聖猶達小學教下午班。那是一段操練期。

雖然羅國輝神父當時和修院已有密切的聯繫，但他卻並非如正式修生般住在修院。

我不敢對家人說，我要入修院。但我外祖母一直鼓勵我，為我祈禱。我知道如果我當時說出來，父母未必能夠接受。

有一次，聖召茶座，神父們約了我們行山，怎料全部年輕人「甩底」²⁵，剩下副院長康建璋神父和我。我們繞著山頂走；他問我有甚麼困難。我告訴他因為家裡需要我繼續支援。他說：「你可以在修院住，白天讀書，然後晚上教夜校，繼續支援家庭。」

康神父提出這個有創意而且可行的辦法，便引領羅神父會見李宏基主教。

我還記得在舊主教府大廳的一張圓枱坐下，與李宏基主教懇談，並得到他的接納和批准。這圓枱就是現在修院大聖堂的祭台。

於是，我就跟父母說去修院「寄宿」。他們其實也知道我要做神父，但我要把話說漂亮一點，讓他們好過一點。我是73年正式入修院。

神操及避靜、主持心理及靈修講座等工作。

²⁴ 龍厚榮神父 (Fr. Luciano Numeroso, PIME, 1940-1995)，意大利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1964年晉鐸，1970年來港服務，曾在聖神修院神哲學院任教多年，亦擔任過修院神師。〈龍厚榮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https://bit.ly/3vfo3i4>>，[9-4-2021]。

²⁵ 失約的意思。

入了修院，我的確是白天讀書，晚上在培德學校²⁶教書。當時培德有麥修女，後來有徐倩玲修女²⁷，她們作了非常好的見證。

夜中學是甚麼人來讀？工廠妹、工廠仔，還有學堂仔。我還記得我教英文，考試時有人作弊，被我看到，但他還恐嚇我，把刀插在枱面，看我敢不敢動他。……還有，「飛仔」²⁸會在門口等女生放學。徐修女很厲害，一個修女站在門口，一「婦」當關。修女就是這樣，甚麼也不怕，專心愛主，專心照顧學生。那種經驗為我也很重要，因為我看到甚麼叫全心全靈全意，及何謂大無畏精神。

白天在修院學習，晚上外出教書的生活，比其他修生辛苦，為羅神父是很大的歷練。而且他還要適應周遭的人和事。

天主給我很多恩寵。世上無難事，尤患志不堅。我求天主助佑，所以早晚課、彌撒為我都很重要，給我很大的力量。

我的一班共有七個人。我與大哥雄²⁹工作過，有社會經驗才進入修院，其他同學是來自小修院。我們的思想、性格，對人處事的態度都不同。你覺得誰是老大？當然是小修院的啦！他們是「地頭蟲」。他們也要適應，不過比我們容易。我們要適應環境，也要適應他們。

在一個大團體裡面生活，況且每個都是男性，都有各自的性格。這個經驗為我很好，就是人家上課我也上課，當大家玩樂的時候，我就要改作業，準備到夜校教書。有時我要提早吃飯，否則來不及。我放學回去，他們已睡覺，我就開始溫習自己的功課。

其他修生打籃球的時候，我要改卷準備上課。他們就說我沒有團體精神。「你沒有團體精神，不打球的話，就沒有聖召。」這是困難的，但我也要適應。那我便跑步做啦啦隊。……有一件事我非常樂意，就是每星期一次的勞動。我最喜歡用鐮刀去除草，特別是在靠近海邊一個小碼頭那邊除草。鋸樹除草都是我喜歡的。

²⁶ 嘉諾撒培德學校，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於1897年為香港仔漁民子弟興辦的學校，初期以私塾形式運作，日佔時期遭破壞而終止服務，戰後於1947年重建，續辦學至今。

²⁷ 徐倩玲修女（1915-1997）香港出生，1940年加入嘉諾撒仁愛女修會，1943年矢發初願，多年來服務不同的教育機構。徐修女於1973-75出任培德幼稚園及夜校校長。〈徐倩玲修女〉，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https://bit.ly/3f5ZSNi>〉，[9-4-2021]。

²⁸ 小混混的意思。

²⁹ 曾偉雄神父。

修院的人數眾多，資源怎樣分配？廁紙也分兩種，神父的廁紙質素會好些，修生的廁紙會差一些。吃方面也是，神父在飯廳有自己的餸菜，修生也有修生的餸菜。大家看到會有比較，當然會非常不開心。我記得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有修生見到工友拿著一尾魚到神父飯廳，便起來碰跌它，讓大家都沒得吃。人的內心和外在的整個文化都要慢慢變，不是一時立即就變，是有它的過程在裡面。我們要接納舊的，邁向新的，但沒有衝擊也是不成的。

人際間的適應在修院和班際的層面都要努力磨合，羅神父認為效果不錯。

修院有一個叫「卡」的聚會，是「長上」、「長下」的聚會。修院管理階層，叫做長上，我們便稱自己為「長下」！我們一起開會叫甚麼好？上下加起來便成「卡」字。好像是星期二晚開「卡」，大家一起聊天。這個聚會真的是很進步，很令人欣賞。因為開「卡」，可以坦誠地說話。我看見教會的「眾議」精神；大家都向著天主走，先行還是後行，都在彼此陪伴。

開「卡」真的很好。我記得有一位同學劉德慶神父³⁰；他已於十多年前去世了。他堅持原則，拿著鬧鐘來開會，時間到了，鬧鐘就會響，他拿起鬧鐘便離開，也不管你說完了沒有。你可以看到我們各人的性格，大家都要互相接納。

修院有早課、晚課、彌撒，此外我們還有小組祈禱，是自己班同學一起祈禱。這種班際祈禱也很重要，因為我們可在信仰裡溝通磨合；這磨合過程是在祈禱之中進行。所以不只是「卡」教了我們溝通，還有在小組祈禱中，天主救我們脫離私我，在諒解中，走向對方。大家都朝著天主，就沒有甚麼不能磨合了。

對於當年各位教授的循循善誘，羅神父至今也印象深刻。

我正式進修院的時候，已經讀哲二、哲三。我很記得當年的老師，有鄭志誠神父，還有陳日君神父、龍厚榮神父等。龍神父經常用白粉筆點在自己額上思考。他當時教 Metaphysics 形上學，我們聽不懂，便去請陳日君神父補課。

³⁰ 劉德慶神父（1954-2006），澳門教區神父，於 1979 年領受鐸品，2006 年逝世。

還有是 Fr. J. Casey³¹，他教我看事物要全面 the whole picture……不要死讀一個科目，每一科都要貫通。鄭志誠神父也是這樣教我的。當時我讀書希望自己每一科都出色，鄭神父就說應該從一科深入串連其他科目，才能融會貫通，否則每一科都只是蜻蜓點水。

還有很多教授，例如 Fr. McGovern，SJ 孟家華神父³²，他做過立法會。他教我們教會社會訓導。他很注意學生的反應；他的考試就是給我們全體拍照；「點相」給分數。

陳日君神父教我們無神論與共產主義。我記得當時的教授很多元化。可能因為徐誠斌主教真的很開放，栽培了許多教友神學人，所以有從比利時留學回來的教友給我們上課，例如鄧守成老師教我們解放神學；Fatima Lee 老師教我們《聖經》。

當時，修院管家是吳修女，人很好，叫 Jeanette Ng，我們經常取笑她「唔精叻」。³³

天主很好，讓我看書很快，而且我真的很感謝天主，我讀 Telecomm [電訊] 的時候覺得很難，怎麼我讀神哲學卻那麼容易？可能我的腦袋就在這一方面。《聖經》說：「你的寶藏在那裡，你的心也必在那裡。」(瑪 6：21) 當我渴望著神哲學，我便有心去學。讀書不是用摧谷，而是用心。

我一定要提楊正義神父，他年青又英俊，真的很用心。他與修生很合得來。他跟我們說：「多多祈禱，少少『竊線』。」即做人要多些幽默感，久不久有些「竊線」也是好的。楊神父也在修院發展方面，給了很多好意見。

³¹ 祈士真神父 (Fr. John J. Casey, MM, 1929-2019) 1951 年進入美國瑪利諾會初學，1956 年晉鐸。1971 年來港，在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教授哲學和神學科目，並在堂區服務。1984 年返回美國服務，直至 1993 再度來港，曾任英文公教報主編，至 2002 年底。

³² 孟家華神父 (Fr. Patrick Terence McGovern, SJ, 1920-1984)，六十年代初到港，1968 年創立「勞資關係協進會」，1976 年獲委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80-82 年間兼任行政局非官守議員。<<https://bit.ly/3u6vCWU>>，[8-4-2021]。

³³ 吳寶珠修女 (1928-2006)，天神之后傳教修女會修女，早年在澳門工作，1970-90 年來港服務，曾在聖神修院負責照顧神父、修生的起居飲食。〈吳寶珠修女〉，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https://bit.ly/3wiw9q2>>，[9-4-2021]。「唔精叻」意指不聰明，取 Ng Jeanette 的諧音。

楊神父教禮儀，可說是我的禮儀啓蒙老師。其實我對《聖經》和禮儀這兩科都很感興趣。我從小就很喜歡禮儀，披著毛氈扮神父。楊神父教書很引人入勝，特別是他給了我們很多新的知識；這個我很喜歡。

我記得 Fr. Kelly³⁴ 教我們《聖經》，我就用《聖經》的話去氣他說：「希臘人求智慧，猶太人求神蹟，我們信耶穌就得救，不用讀太多書。」把他氣得沒話說。

Fr. Hurbert³⁵ 是我們的舊約教授，他教我們用五隻手指去看《聖經》。第一要看文本。第二是要看文體是甚麼。第三是上下文的背景是怎樣。第四是字義有甚麼意思。最後是信息。這為我是很有用的工具去看《聖經》。傅神父不是塞一大堆東西給你，而是給你工具去了解《聖經》。事實上，他會揀選彌撒讀經來教我們，且要我們舉一反三；老實說，彌撒讀經挑選出來的，已是《聖經》的精華了。

還有，我很記得 Fr. Sean 嘉理陵神父。他是一個拿著一本希臘文《聖經》就可以跟你說一大堆話的人。我記得他叫我們去看〈若望福音〉，做一些研究，而我寫的是〈若望福音〉第二章 10-11 節，用 Raymond Brown³⁶ 的註釋法。到今天我還要感謝他，因為他真的帶領我進入了《新約》的大門。

然後房志榮神父³⁷ 也來教書。他的方法是叫我們翻譯一些著名的釋經文章。我很欣賞。他使我對保祿書信有一番新體味。

當時修院的禮儀生活很好，讓我們看到天上的美，不是那種藝術上的美學，是超越它，是天主的美，是一種靈修的美。

³⁴ 紀烈義神父 (Fr. James Kelly, SJ, 1921-2000)，1940 加入愛爾蘭耶穌會，1945 年來港，1954 晉鐸。他早於 1958 便在華南總修院任教，其後赴羅馬進修並擔任其他要務，期間受邀不定期到聖神修院授課，直至 1982 年。〈紀烈義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https://bit.ly/3oJENvd>〉，[9-4-2021]。

³⁵ 傅和德神父 (Fr. Hurbert Vogt, OFM, 1935-2005)，德國方濟會會士兼聖經博士，生前在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教授聖經科，也到內地多間修院教書。見〈傅和德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https://bit.ly/3ucTNmq>〉，[9-4-2021]。

³⁶ Fr. Raymond Brown (1928-1988) 是美籍 Sulpician Fathers 索比斯修會神父，著名聖經學者，專研〈若望福音〉。

³⁷ 房志榮神父 (1926-2021) 出生於安徽省，1952 年在西班牙加入耶穌會，1955 年晉鐸。他是首位獲得羅馬宗座聖經學博士學位的華人，被譽為「聖經大師」。2021 年 3 月 2 日逝世；享年 95 歲。〈當代神學家房志榮神父蒙主恩召，享年 95 歲〉，《鹽與光天主教傳媒》，2021 年 3 月 2 日。

我們修院當時在楊正義神父的影響下，每個修生都有自己的 Advancement board 進步評估小組；不是叫檢討，而是叫 advancement 改善、進步。每年一次或兩次，修院長上與修生個別座談，朝向要進步的方面來討論。你可以選一位神父，修院又指派幾位神父，然後大家坐在一起討論自己的成長。這是坦誠的，有紀律的。這是非常好的事，和衷共濟，使每個人都有進步的餘地。

當時修生的學習除了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的課程，也請來外面相關的專家和學者來授課。這些學習安排都令羅神父很欣賞。

還有一位張女士，是一位精神科醫生，她幫我們分析我們的成長。記得有一次，她叫我們坐在那裡甚麼也不要做，看誰會先說話。我們一言不發，呆坐了很久很久。她說：「你們整個心理狀態，是過分的 self-denial [自我否定] 了。」亦即她覺得我們之間存在某種壓抑。

修院的兩位神師也教羅國輝神父畢生難忘！

我們有兩位很好的神師，一位是明之剛神父，一位是姚崇傑神父。明之剛神父是身教多於言教。年輕的修生把明神父種的紅蘿蔔拔出來，好的便吃掉，不好的又把它塞回去。我還記得星期三晚上的神師訓話，我們叫作「山中聖訓」。明神父說，「天主賜的，要珍惜，把紅蘿蔔再插回去，它會死掉呀！」他那種忍耐、那種身教勝於言教，為我們很重要。

當修生在上課時，明神父就去耕田種東西。這是我喜愛的生活，「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墮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歸園田居》。我在明神父身上看到那種神貧精神，無欲無求。他穿上黑長袍到葛量洪醫院去探望病人，為他們開彌撒聽告解。他的生活就是那麼淡泊。

明神父給我看到一個修道人，懂得過著淡泊的獨身生活；沒有人在身邊，也樂得其所；在信仰之中，可以侍奉天主，可以繼續耕田，所以跟明神父訴心事是很舒服的；你不用說，他也能看透你的心。他心靜如鏡，看得通通透透，所以我很欣賞明神父。我晉鐸後，他還當了我一年的本堂神父。他常說不要用「忙」來逃避教友的需要。

至於姚神父，他是一位陪伴者。他很用心陪伴，願意聆聽。他身體很弱，很多病痛，但你可看到他堅韌的信德。

羅神父於夜校教書的生活，在神學二年級之後，終於結束了。

修院怕我有職業病。為甚麼？人之患，患在好為人師。Fr. Ahearn [楊正義神父] 問：「你不可以不教書嗎？」我答：「不成。我還要支援家人。」他就找來恩人，每個月給我兩百元讓我支援家人，那我就不用教書了。在這裡我要再多謝 Fr. Ahearn，他扶了我一把。

因為楊神父是美國瑪利諾會的，與瑪利諾修女有很多合作，於是以聖母醫院作為基地，開始有 CPE [醫院牧靈] 訓練，雖然不是很完整但很有用。我記得好像是在神一之後的暑假，我們數個修生住在培聖中學³⁸，在聖母醫院接受 CPE 培訓，辛苦至極。我自己很怕醫院那種味道。我也怕血。

有一次有病人要洗血。醫生說怎樣害怕也不要再在病人面前暈倒。我覺得自己應該行的，死撐看著那些血流落引流管。怎知原來靠自己的能力是熬不過來的，我想吐，然後說：「對不起，我想去洗手間。」一出門口，我已經暈倒在地上。我們的總監 Sr. Helen Kenny³⁹ 找我坐下來聊，跟我說：「我知道今天發生的事，沒關係的，我們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弱點，你知道了便面對吧。」她這一份陪伴精神，讓我跨越了，所以我現在不會害怕陪伴臨終者，陪伴病人，是她幫助了我。

我們在醫院也要驗身，怎知我的肺片有些問題，要重新檢驗。那晚上睡不著，很擔心我會不會也有肺癌呢？當然，後來天主保佑……。這個 CPE 使我可以更加認識自己。所以 CPE 不是教我輔導人，而是要我先輔導自己和瞭解自己。

雖然身體無恙，但羅神父又面對另一種衝擊，令他甚至想到離開修院。

我神學三年級時要升執事了。爸爸在電車公司工作，宿舍土地要用來發展，因此沒有房子住，家人很徬徨。我曾經考慮過，「愛人如己」就應該離開修院來幫家人一把。所以我就打算離開修院一年。當時的副主教林焯焯神父，為我考慮了很多，最後幫助了我一把，讓我可以與家人一起，解決了這困難。我很多謝林焯焯神父。這件事過去後，

³⁸ 天主教培聖中學早年校舍在九龍塘牛津道，1992 年遷入元朗天水圍，並由原來的男校轉制為男女校。

³⁹ 祁愛蘭修女 (Sr. Helen Marie Kenny, MM, 1932-2020)，1949 年加入美國瑪利諾女修會，自 1958 年起，數度來港服務，曾任聖母醫院護理總監，又為醫院引入善終服務。〈祁愛蘭修女〉，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https://bit.ly/34imrlx>〉，[9-4-2021]。

我感受到亞巴郎所說的：「天主自會照料」；我每次唱《聖母讚主頌》時，非常激動：「天主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字是聖的。」我也學到教會那份急人所急的心。

我記得我們很多修生都喜歡《聖經》。那時有些修生也在想，如果「文革」來到香港，那怎麼辦呢？所以當時我們說，不如每個人背誦一卷《聖經》。例如我背〈路加福音〉，你背甚麼甚麼。到時沒有《聖經》，我們也能背誦出來。

如果有一天香港變成大陸那樣子，我們修院是不是還能靠助外籍教授呢？是不是我們應該有自己的班底，可以在修院教書呢？這是大家的想法。所以我們這一代出來的，基本上都爭取機會去讀書進修。當時，Advancement board 問我：「如果主教叫你讀書，你會選哪一科？」我說：「禮儀。」他們也告訴我：你升神父兩年之後，如果教區需要，我們也建議你去讀禮儀吧！

我晉鐸離開修院的時候，與我進入修院之前，信仰面貌是完全改變了；既以人為本，更以天主為中心；以天主的計劃先行，人也不斷在祂的計劃中成長。

我相信是天主揀選了我，並以聖召造就了我。

羅國輝神父 1979 年晉鐸，之後服務於西環聖母玫瑰堂。1982 年赴羅馬聖安瑟莫宗座禮儀學院進修。1986 年學成返港，開始執掌教區禮儀委員會，並在各地華人教會的神學院授課。多年以來，羅神父亦先後服務過四個堂區。自幼在灣仔堂區成長的羅神父，現為灣仔聖母聖衣堂主任司鐸。

曾偉雄神父



- 1973 進入聖神修院先修班
- 1974 聖神修院哲學部
- 1975 聖神修院神學部
- 1979 晉鐸

在 廣東省興寧縣出生的曾偉雄神父，因內地政局起了變化，於 1949 年離鄉到港，並因教會派發救濟品而領洗入教。

我父親在鄉下是地主，經營漂染及燒瓦生意，1949 年共產黨統治中國，有同鄉告知父親，共產黨要抓他，父親立即帶同母親、我們四兄弟及一個養子，離開鄉下到香港定居。剛來香港時家境清貧，住在東頭村。瑪利諾會神父被逐出大陸後在東頭村傳教，派發救濟品給難民，因而吸引我們也去領取，後來信仰了耶穌，全家學道理，加入天主教會。

以前的神父兇一點，我遇到的是瑪利諾會涂挽靈神父⁴⁰，他現已去世，人有點古怪，但非常有愛心，很多難民受過他的恩惠。他當時在福德小學，我 1953、54 年透過神父到福德讀書，55 年八歲時領洗，之後在堂區參加輔祭班，平時及主日為神父輔彌撒。60 年小學畢業。李志源神父是我的同學。

福德是瑪利諾神父管理。說真的，當時的神父很好，有診療所、有救濟品，我們讀書只需交五元，沒有其他費用。神父又會去探教友，堂區有很多慕道班給難民參加，每年有成千上萬人學道理領洗入教，他們都是為領取救濟品過活。

我領洗後的青年時代很活躍。我 67 年中學畢業之後開始工作，福德的小聖堂也結束了，交給新蒲崗善導之母堂，我便到了那邊服務。

⁴⁰ 涂挽靈神父 (Fr. Howard Daniel Trube, MM, 1913-1995) 1940 年晉鐸，同年到大陸傳教，曾在伍華縣服務，1952 年被逐來港，1953 年創辦福德學校。見〈涂挽靈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https://bit.ly/3fBnHeK>〉，[1-4-2021]。

我在善導之母堂參加讀經班及聖詠團，成立青年會擔任會長，負責主日帶經，宣讀天主聖言，很活躍的。PIME 覺法治神父是本堂，1970年夏其龍升了神父派來當助理主任司鐸。我負責青年會的工作，夏神父是神師，我們有很多靈修活動，像研經和看聖書分享，又有很多團體聚會。跟夏神父合作了兩三年，與他相熟一點，覺得他很友善。他有一次跟我說：「你想做神父嗎？」

我問：「我可以當神父嗎？」我的學業成績不好，連會考也考不好，沒有信心去讀書，學做神父。他說：「不要緊，如果你想做神父，可以嘗試在修院讀書，因為修院有好多時間讀書。」

但曾神父的家人並不贊成；而他在電燈公司由抄錶員做起，又因為工作勤快得到晉升，當決定辭職進修院時獲上司加薪挽留。

我問父母及家人，他們都不贊成。因為我當時已經工作，薪金跟政府初級文員差不多，每月約三百五十元，有給家裡「家用」⁴¹，而且電燈公司的員工福利好，有大假、每年有雙糧、又有醫療及電費津貼，家裡當時不用交電費，所以他們不同意我入修院。

部門主管很喜歡我，他對我說：「John，我今年又為你申請加 increment [加薪]」。……那時我已經升了級做抄錶幫辦，薪金加到一千元，是抄錶員的二倍多。做了五年至 73 年離開，我辭職時，上司挽留我，想以多加一年的年薪增幅，著我考慮多一個月，但我沒有再考慮，立即遞信。

夏神父帶我去見李宏基主教，那時候並沒有像現在需要檢查身體、心理之類。我是 72 年 8 月見主教，他大概是講聖神的事，可能因為受聖神感動，之後主教就問我甚麼時候入修院。

那時期聖召較多，社會還未發展起來，人們經濟上不大富裕。和我同一年升神父的，連我共有五個，陳志明、閻德龍、羅國輝、關傑棠。我這一屆教區神父晉鐸的人數最多，如果加上修會的神父，只有一兩屆人數比我這一屆多的。

⁴¹ 家用是家庭中的生活費用的意思。

我是1972年暑假入修院，一共要讀七年，一年是先修班⁴²。我說先試一年，入修院之後，又覺得不錯，相當開心。之後院長問我繼續嗎？我便回答「繼續」。

曾神父屬於梵二後的神父，修院各方面已出現明顯的變化。

先修班會做神修的培育、講解神父的工作、信仰要怎樣等。神修有退省、講道理等。

修院由中國人負責管理，曾慶文神父是院長；教授仍多是耶穌會士，用英語授課。湯漢樞機，當時是神父，從羅馬讀書回來，負責教授神學。還有陳日君樞機，當時也是神父，任教哲學。

我入修院時，拉丁文已經是選修科，我讀過一年拉丁文，都已忘記了。現在修院反而又回到從前，要讀要懂拉丁文。

禮儀上完全改革了，彌撒已經不同，神父不再面向祭台。其實65、66年已經改變了，梵二會議65年結束，66年已經轉變了。彌撒以前是到講道才用中文，其他就用拉丁文。我輔彌撒時都是用拉丁文的，這是65年之前的事，梵二會議後約一年就轉為中文彌撒。

當然需要時間準備中文禮儀書，66年一定有了中文彌撒。

每年暑假有安排不同工作去渡過兩個月的時間。哲學第一年的暑假，到聖瑪利安老院服務長者，在修院時每周一次，暑期每周三次，幫忙餵飯，甚至洗澡，其他時間就到附近堂區協助。也有到工廠工作，了解工人生活。哲學第二年晚上去教理中心上課，暑假便到堂區傍聽及實習教授要理。

到了神學第一年是去「明愛」實習，由明愛主任講解組織的架構，社工教導探訪及輔導技巧，之後去實習或輔導有需要的人。第二年是去教會醫院學習牧民，了解各部門的運作和探訪病人。第三年就到堂區服務，住在堂區，與善會及教友接觸。到了第四年，仍在堂區服務及做聖依納爵神操一個月，之後準備升執事，接下來就是升神父。

當時已不用像以前那樣每月見院長，只需要去見神師。跟神師談的都是關於神修，沒有特別。

⁴² 先修班在六十年代末稱為預備班。

以往的神父訓練是使他們感覺高高在上，遇到修生做得不對便責罵。現在應該不同了，最多是警告，不會太厲害。

現在亦好像沒以往那麼重視聖統制的事。以往重視的是權力的問題，好像有特權一樣。現在神父要靠自己的表現，有沒有愛心、做事是否為了別人。現在神父如果責備教友，只會令人遠離。神父都要尊重別人，不能隨意亂來。如果教友去彌撒遲到，神父現在會勸諭，主要是語氣的問題。

我在修院讀書的時期，修院比較寬鬆一點，神父很好的，不會迫你，見你未夠水準，不會揶揄你，或不給你繼續讀下去，或勸你出修院，沒有的。只會鼓勵你，如果不行就嘗試。

我讀哲學第二年遇到困難，因為我只是中學畢業，讀書不精，要慢慢讀。我認為形上學最難，其他大概都是歷史，主要靠記憶，有人指導，就不會有問題。

令我最深刻的，是教授是看你的為人，並不是看你的表現。如果覺得你有聖召，就不會計較成績，鼓勵你繼續下去。而且遇到甚麼不對的地方，會提點你，你改過就可以。

閒暇時間要掃地、打籃球等。我入修院時年紀大，不喜歡踢足球，我就隨便去散步。如果沒有甚麼活動，我便去聖堂祈禱，又或者去找書看，溫習課本。

每個人的喜好不同。不踢足球，當然跟團體的關係就沒有那麼要好。我記得當時有修士對我講：「你不喜歡踢球，就是沒有聖召」，跟以前「不懂拉丁文，就沒有聖召」這句話相似。

相對過往修院保護式的培育，修院仍然與外界社會有些少脫節，但曾神父在修生時期開始有稍稍鬆綁的情況。

修院的生活很單純，學習、服務和靈修，跟世俗的生活有少許脫節的。修生不能隨便四處遊走。原則上晚上不外出，有特別事情需要晚上外出的話，要通知修院。

我們這一屆開始可以每星期回家一次，星期六下午離開，星期日黃昏返回修院。以前是一年一次，遇到白事都未必可以回家的，父母身故可能可以回去，兄弟有事都未必可以。

圖書館裡的報紙遇上一些色情的版面，會被剪去。我是修生時，修院已經開放了一些，已經接受了不過分的版面，如果是非常過分的版面，可能會撕走。我覺得是神父在吃早餐時，看到不適合修生看的內容就剪掉。

我的看法是不用以這些方法去禁制。如果修生覺得不合適修道，應該盡快離開，不要到畢業才離開。如果修生想結婚，就隨他去，不需要勉強。

在修院的日子裡，曾神父覺得自己不單有個人成長，也充滿喜樂。

修院培育是多姿多彩的，既培育人格及處世待人，以基督精神去服務，又認識到自己的長處及缺點。透過神師訓話及輔導，每月一次避靜及每年七或十日的周年避靜，與主與人共融合一，準備好自己去服務教友，宣揚福音。所以整個七年的修院培育，大致是喜樂的。至於個人問題，神師會輔導我們，幫助我們去克服種種困難。

成為神父後，隨著社會發展，神父的身分和角色也出現了變化。就算是作為標記的服飾，梵二前的神父一般都會穿著神父袍，但這種傳統亦逐漸隱沒。

我升神父初期星期天都會穿著的，目的是令人容易識別，亦會以此時常警惕自己。

以前香港社會很多人會重視神職人員，人們碰到神父會打招呼。現在社會人士不重視，反而覺得是傻呼呼的，看待神父只是普通人一樣。我現在只會在一些場合，像殯葬、婚禮、到醫院探病等等戴神父領帶，其他時候就不戴了。

自晉鐸初期以來，曾修父都是邊做邊學：

在修院的學習只是開始，最初神修、講道都是模仿的階段，到現在數十年功力深厚，講道比較能打動人心。這個要靠自己的牧民經驗。

曾神父 1979 年晉鐸後，服務多個堂區，四十多年以來工作都是有關堂區牧民工作、兼任中小學的校監。2016 年開始在香港仔聖瑪利安老院當駐院神師，關顧院內長者的信仰需要。但他仍然不忘補上一句：「我較為喜歡在堂區工作！」

周景勳神父

- 1966 進入聖神修院的小修院
- 1972 台灣天主教輔仁大學修讀哲學學士課程
- 1976 聖神修院神學部
- 1980 晉鐸



全因母親的一個夢境，周景勳神父全家加入教會。父母信教後都很熱心，使他從小就在聖堂的環境中長大，一直做輔祭。即使這樣，他從未想過要做神父。

我連修院是甚麼都沒有概念，甚至連神父從哪裡來也不知道。當時很多外國神父，因為他們是從外面來的，我以為神父是從天掉下來的。後來中國神父才多起來。

周神父第一次到訪修院，是因探望輔祭會的前神師胡德神父（Fr. Uda Antonio, PIME）。他和兩位輔祭在升五年級的暑假時，約好某天清晨出發，去看望這位被調到田灣聖高弗烈小堂（今明愛中心）的意大利傳教士，途中卻遇上預計不到的交通情況，到中午才抵達。

胡德神父當時嚇得要死，因為一個早上仍未見到我們三個小朋友，便四出去找，他回來的時候把我們罵了一頓。經過我們的解釋，便知道其中的糊塗和交通意外的改變，便急急忙忙帶我們去吃飯。飯後神父就說，要帶我們去一個地方。我們便由田灣行去香港仔工業學校，再坐艇仔去修院。

這樣我才知道有修院的存在。當時的意大利神父都有不斷的推行聖召。

當年是 1964 年，華南總修院剛剛轉為聖神修院的第一年，院長是唐多明神父，是他接見我們。他不停說服我們入修院讀書，我們三個小朋友帶點驚恐，挺立成一排，聽唐神父說話，有點像訓話。我們因為不懂甚麼是修院，所以都沒有答話，只知道在小修院可以讀中學。他見我們不回答，就用手指敲我們的頭。直到我們說入修院，他就不敲了。之後神父帶我們參觀修院，以及帶我們去坐船回家。

這件事沒有下文，我也沒有想起過，直至後來我要升中學。我回想起已承諾了去修院讀書，便向爸爸提起此事；我爸爸是很守承諾的人，

答應了的事就一定會做。我受他的影響，抱著同樣的信念，便告知爸爸。爸爸知道修院是甚麼，馬上說好。然後我們就找本堂神父，請他介紹入修院，但他推說未知我的意向，要等到第二年。我因為只想著入修院，甚麼學校也沒有報考。

爸爸因為在聖老楞座堂工作，認識一些神父。林志遠神父和我們一家很熟稔，就由他介紹我入修院。當時還有一位李若安神父在恩理覺主教紀念堂，公主道油站附近的小石屋，照顧堂區教友和潮州教友。李神父是潮州人，我一家也是潮州人。如果是大節日，大家都會聚首於該堂探望李神父，所以林志遠和李若安神父當時就帶著我，那時我名義上是汕頭教區的。到了我讀大修院的時候才轉回香港教區。

周神父進修院的時候正值新舊制度更替的時期，初期仍是梵二前那種保守嚴格的制度。

大公會議是62年開始至65年結束，我讀的是大公會議前的東西，制度上也是，我入了修院就不能回家。當時舊制度是非常嚴格的，家人可以星期日下午二時至四時來探望我們，地點是圖書館櫃位的地方，在那裡叫修生的名字。爸爸因為是在聖堂工作，星期日不能放假，不能來看我。媽媽因為要照顧弟妹和患病的兄妹，所以都沒辦法前來探望。

1966年8月中入小修院，直到12月25日早上大禮彌撒吃過早餐才第一次回家。由香港仔黃竹坑小修院返黃大仙，先拿成績表給本堂神父簽名，再拿去何文田給李若安神父看，中午十二時多才回到家。下午五時便要返回修院。在家裡吃一頓飯，將要縫補的衣服全部交給媽媽，大概下午二時便要離家返回修院。農曆新年有五天假期：年三十晚回家，年初五回到修院。第三次回家是復活節早上大禮彌撒之後，拿期考成績表回去。小修院的學制分初中和高中，一年分二個學期共四次考試，聖誕節前和新春前、復活節前和暑假前。學習的課程跟一般中學一樣，但偏重拉丁文和國文，英文每周只有兩三課，拉丁文則天天都上課，不及格便要離開修院。每年見院長時都很緊張，害怕不能升班，被趕出修院，所以很努力讀書。

初入修院，因為要離開家庭，多少有些不適應。小修生都是中學生，要一起生活，跟寄宿生一樣，互相欺負的情況總會有，躲起來哭也有，只是多了祈禱，多了訓話。

我家裡的經濟狀況普通，飲食簡單，修院吃得還好些。小修院的伙食只有少量肉類，有同學曾說：「自己吃到像菜一樣。」但為我來說，我家裡不是每一頓都吃飯，過節的餸菜才豐富一些；而修院每天都有餸菜有飯也有茶點，每星期有兩次糖水，非常不錯。

探訪方面，如果家人居住較近的，會常常來探修生，修生會收到很多家人帶來的補充品。我就絕少有家人的探望，所以沒有甚麼補充品，餅乾也沒有。有人探望的時候，會喊修生的名字，我也不會期望會聽到自己的名字，所以我時常很羨慕其他修生。我理解爸媽不能探望我的原因，但也會心酸。

學長曾說明，送來的食物要放在飯廳，不能收藏起來。有一次大瞻禮，很多家人帶來糖餅之類的禮物，有些修生就把它們藏起來。後來，學長在睡房和自修室把禮物全找出來，放在枱上「展覽」。他說：「已經說過不能收藏食物，現在你們這樣做，要全部沒收。」當時中一至中三的修生很多人哭起來。我就心裡暗想，沒收了大家可以一起吃。

我們睡覺的地方是一個大廳，有四十個鐵床鋪，兩尺半大小。有一個小櫃放衣服，一張椅子，就是我的世界。我周圍的修生都是這樣的家具組合，沒有間隔，很密集的。大家都要把床鋪得整齊，床單是藍色格子，放眼看整間房都是藍色，整齊齊頗漂亮。我入修院前，都是睡在地上，在修院自己擁有一張床已經很開心。但因為不習慣睡床，試過從床上跌下，跌過痛過就警醒一些。

周神父在小修生階段往後的數年中，經歷了修院在梵二後的重大變化。學習上由以往側重拉丁文和中文轉為英語，小修院亦分為中英文部，並由以往在小修院讀書，轉為外出到中學上課。教區自 1841 年起已有的小修院，最後也完成歷史任務，於 1976 年正式停辦。

我在小修院 66 至 68 年是第一、第二、第三年……我們那時是在修院讀中學，修院有初中和高中，分低班、中班和大班，大修院是大班，高中是中班，初中是低班。低班住在西邊的西樓，飯廳樓上一整層，住在現在圖書館那一層是東樓。三樓是睡房，二樓是自修室，東樓地

下是大會客廳和圖書室。⁴³ 我們西邊樓下是飯廳，二樓有一個生物、化學的實驗室。67年入小修院的修生，因不必讀拉丁文，改為英文，便送修生們到香港仔聖伯多祿中學讀書，至小修院結束停辦。

69年9月，中四那一年修院開始轉型，小修院只餘高中三班，人又不多，請不到老師。修院結束中學，我們這三班全部去了慈幼中學。我讀拉丁文，屬於中文部。小修院仍然存在，但沒有中學了。我們每天都要前往筲箕灣慈幼中學讀書，當年有三班，修院僱用一輛校車來接載我們，由香港仔去筲箕灣，但這校車常因誤時而遲到，令我們感到惆悵。早上仍然要早起，放學就趕回修院。

我下一屆新入的修生已不讀拉丁文，轉讀英文，屬於英文部。因為人少，只得一班，為他們請英文老師很困難，所以我下一屆的小修生開始就全部每日早上坐船到香港仔聖伯多祿中學上學，不在修院裡上課。當時英文有水平的高中同學，也給他們插班進去聖伯多祿中學。可能是為了有人帶初中修生外出讀書。兩年多後，閻德龍由聖芳濟書院轉過來，他與我同班，我們都稱為同屆，因為閻德龍是讀英文學校的，修院也送他到聖伯多祿中學讀書。

中五的時候，修院對我們修生又有新計劃，中六那一班全部到了九龍塘牛津道的培聖中學校監宿舍作修生宿舍，認為修生應該外出認識社會，所以在外面讀，外面住。他們當時每月只回修院一次。我們中五一班約十二人仍在修院，修院沒有租車接載我們，要自行坐車外出上學。……我們沒甚麼錢，買巴士月票坐車上學，一天打四個洞。我們這十多個修生從黃竹坑坐7B巴士到中環，再轉2號車去筲箕灣。晚上放學，要趕回修院。慈幼修院外面有大斜路，我們放學就衝下斜路趕回來五點多念晚課。

到了我中六〔1971-72學年〕的時候，我們全部轉到長沙灣的南華中學。當時的薛秉坤校長很好、很熱心。因為我們搬到南華中學寄宿，神師姚崇傑神父便與我們一起住。修院內只剩英文班的修生，四屆全部約五十人。

⁴³ 聖神修院採用中式四合院的設計，但當年因經費問題只建成主樓，即有廣東門穿越的南樓。南樓兩側的中式建築稱東樓及西樓，東樓與後來新建神哲學院新翼相連，而向著深水灣一方的建築為西樓，牆上有大型壁畫。

我入修院的時候，連大修院有一百多人，地方不夠住，所以需要建新翼。到我們需要出外讀書的時候，只餘下十多人。高我兩班的關傑棠神父，他那一屆有四十五人入修院，我的一屆只有十五人。他那班是最多人的，最後全部離開了，只剩下他一個。陳志明比我入修院遲數天，但為甚麼我比他遲一年晉鐸呢？我們十二人是一起在南華中學考大學，其中有六人考上大學，兩個考上輔大，四個考上中大。我去輔大讀哲學，要四年時間。修院的哲學只是兩年的課程；回修院讀哲學的同學要讀一年先修班、兩年哲學，而我要讀四年，所以我便比他們遲一年讀完。

我們修生開始在慈幼中學讀書的一年，小修院就停辦。我之後應該還有四屆，可惜讀完中學的修生全部都離開了修院。這樣算來，我和劉富根是小修院升神父的最後兩位。陳志明跟我同年入修院，如果把他和閻德龍都算作我們那一屆，就變成四位。因為當中有些轉變，我們並不是同一年晉鐸。

在修院的改革中，「回家」的安排也跟以往完全不一樣，使得修生要不斷適應。

因為梵二的改革，修生由不能外出變為每個星期都要回家和在堂區接受牧民訓練。我記得在聖雲先堂幫忙小朋友暑期補習班。由中二開始教導到中五、中六，每年暑假都在堂區負責。

中二那一年〔1967-68 學年〕，每星期六回家，星期日才回修院，為會考班的修生，這種訓練，影響了當年參加會考的修生，成績下跌了很多，院長見到考試結果，覺得不行。我中三的時候就改為一個月才回家一次。我們修生適應也非常辛苦。

我們中五的時候還有一個特別訓練，是其他班級沒有的。那時候，因為離家已久，修院主張修生要和家人打好關係，嘗試在聖誕節放假返家住宿。整整兩個月，由聖誕節至農曆新年。當年我們把會考的書籍全部搬回家溫習。我家住黃大仙徙置區，沒地方怎樣溫書呢？曾經問過可否返回修院，修院又不准許。我要找地方讀書，最後變成每天早上上學，放學後到大昌大廈的圖書館讀書，直到晚上回家。

修生在修院要擔任不同職務，由於在小修院任管堂多年，使周神父對丟失的修院聖物瞭如指掌！

修生要分擔各項職務。我還是小修生的時候，被派去管理聖堂。……所以我知道很多教堂的東西，對舊禮儀用品很熟悉。管堂特別職務，是有制度的，由三管堂升二管堂，再升大管堂。我中一開始已經做三管堂，一級級的升上去，如果不學習就不知怎樣做。因為後來沒有人做，我便一直做下去，差不多直到我離開修院。

不單是禮儀，三管堂要清潔聖堂，放假前要打蠟，真是要用雙手去磨每一格階磚，然後用機器拋光。聖堂裡的蠟燭台要擦得閃亮，不然會被責罵。聖堂門口有個十字架，中間是一塊銅片，銅片及門鎖也要擦得亮麗。上面有很多手指印，每個星期都要擦。但後來小的管堂懶得擦，擦一次閃亮後，就髹上「叻架」⁴⁴光漆，髹完才發現大問題。「叻架」侵蝕了門鎖，不能再擦，到現在變黑了。

建修院大聖堂的時候，修院聖堂內部的設計是中國式的，配上十幅拿著不同樂器的天朝神聖天使的馬賽克畫像、聖若瑟和聖母的馬賽克畫像各一幅，和一個十字架馬賽克畫像是一套的，由百理達神父⁴⁵帶領大修生一起砌成的，本來放在祭台前面，後來全部要移出來，放在後面或被拿走了。⁴⁶

還有修院聖堂有一個「十字聖木」聖髑，因為我曾做管堂，所以知道原先的跟現在的不同。十字聖木對修院相當重要，最初申請它是希望修院興隆，十字聖木是教會最重要的聖髑，是PIME神父申請的，相傳是耶穌的十字架。那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媽媽，把十字架拿回來，然而十字架已經瓦解，十字架聖髑很細小，像一支針的模樣，用盒裝起，再鑲嵌在聖髑座內。修院將十字聖木聖髑座放在夾萬內。後來，被一位曾任修院院長的本堂神父拿到香港仔聖伯多祿堂。本堂神父離任後，新本堂不知這殘舊的聖物是甚麼而不要，管理聖堂的工友便用報紙把它包起來，擺在一邊。偶然一次，我跟聖伯多祿堂的管堂聊

⁴⁴ Lacquer 的粵語發音，一種光面油漆。

⁴⁵ 百理達神父 (Fr. Enrico Beretta, PIME, 1919-1988)，宗座外方傳教會士，1965-69年在聖神修院教授教會史，以及藝術及音樂等科目。〈百理達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https://bit.ly/2VJaSZP>>，[7-8-2021]。

⁴⁶ 依中國人的建築傳統，重要的會放在中間，不重要的或次要的，才放在側邊叫做偏房。在梵二禮儀改革後，修院的大聖堂也重新裝修，認為十字架太大而不用，後來聖伯多祿堂裝修，本堂神父曾是修院院長，便將十字架拿到聖堂，所以聖伯多祿堂現在中間的十字架就是原本在修院大聖堂中央的馬賽克十字架。

天，提起「十字聖木」座，他記有一件聖物不敢掉棄，但忘了放在哪裡。後來我請他找一找出來。感謝主，我們祈禱後，他便找到了。我告知這是修院的，獲本堂神父批准，我便拿回修院。之後，修院給了禮委會作展覽。到夏志誠主教做院長，我跟夏主教說，要快一點從禮委會拿回「十字聖木聖髑座」，否則修院就沒有聖召了。現在夏主教已將聖髑放回修院的大聖堂內。

至於禮儀方面，梵二前的禮儀上都以拉丁文為主，神父開彌撒皆面向祭台，背向教友；當時「中國主教團」⁴⁷ 禮儀委員會已出版了中文版《彌撒經書》給教友自讀，但不普及。梵二後，約在 1968 年香港教區在徐主教推動下，禮儀改革，將祭台移向教友，所有聖堂的祭台都拆毀，重建向著教友的祭台；同時，開始轉為中文彌撒，為方便教友，教區印製《爾國臨格》單張。

1968 年，徐主教指定由聖神修院先作有關禮儀改革的嘗試，便把修院的祭台全部砸碎，把它改建。我很喜歡舊式那些祭台，很漂亮，也很莊嚴。梵二強調改革，拆掉舊祭台就象徵破舊立新，可能並非為需要而拆。拆掉之後，祭台全部變得非常簡單。修院、主教座堂、聖瑪加利大堂、聖德肋撒堂、尖沙咀玫瑰堂等等的舊祭台都全拆掉，感覺很可惜。

1967 年，徐誠斌神父出任為香港教區輔理主教時，本著梵二會議培育修生和教友的精神，更強調神學的本位化，鼓勵小修生中學畢業後，參加香港的大學公開考試和台灣的大學聯考，考上大學的修生，都送去進修；至於投考台灣大學聯招的修生，只能報讀天主教輔仁大學哲學系，並委託輔大旁邊的聖多瑪斯總修院培育，白天在輔大上課。

徐主教於 1969 年，更作出嶄新的決定，希望修生學習教會的傳統神學外，更能學習中國的本位化神學，便將已在聖神修院完成哲學課程的修生送往輔仁大學附設的神學院修讀神學課程。同年第一批去的五位修生，其中包括劉德光神父，不過只是一年的時間，他們被召回港，希望他們在新成立的神哲學院繼續神學課程。

⁴⁷ 這裡是指台灣的「天主教中國主教團」，此名稱於 1998 年改為「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

我當時考到輔仁大學，住在台灣的聖多瑪斯總修院。我是 72 年通過台灣聯考而前往台灣讀書的，有正式的學籍，一去就要留四年。至於神學生在輔仁大學附設神學院讀神學，是沒有學籍的，便以旅行簽證去台灣，每三個月就需要延辦居留證一次，半年要回香港一次再申辦出入境證。如果簽證不順利，便要留在香港等候。

1969 年徐主教上任香港教區主教後，看到華南總修院停辦了，大修院的培育要配合梵二的方向，就開始計劃怎樣培育修生。由於徐主教是香港教區首位華人主教，加上他在學術上的成就，與台灣學術界有接觸，尤其是與于斌樞機、羅光總主教、中華民國駐梵蒂岡的吳經熊大使等有聯繫，並被邀請加入「中國主教團」，成為主教團的一分子。主教團的主教全都是輔仁大學的校董，徐主教也被邀請作為輔仁大學的校董。徐主教在華南總修院結束後，必須考慮怎樣培育大修生，去羅馬讀神哲學，還是去台灣讀神哲學？他很希望發展中國本地化，認為中國人在中國地方傳教，應該多研讀中國文化的知識，便決定送大修生到台灣輔仁大學附設神學院讀書，但因為簽證問題要每年來回台灣和香港，徐主教嘗試一年後，覺得情況不理想，才發展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徐主教除了關心修生的培育外，更以梵二精神關心教友的培育，其中一位是鄧守城，他是教區送往歐洲讀神哲學的教友，學成歸來便在修院學院教書。因徐主教很著重培育，常鼓勵小修生投考大學。1970 建立聖神修院神哲學院，並申請成為羅馬傳信大的海外屬校，頒發神哲學學士學位；又因徐主教希望修生除服務本地教會外，也當有服務中國教會的精神，所以要神哲學院開設中國哲學與文化的內容。

本地化很重要，會幫助我們融入文化。梵二時，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保祿六世都很注重宗教交談、思想交談、文化交談。接著的若望保祿二世、本篤十六世和方濟各教宗都很注意神學本位化和宗教交談。這是教會近五六十年的路向。

1976 年，周神父從台灣輔仁大學完成哲學課程回聖神修院，得到院長曾慶文神父批准，直接開始讀神學。在讀神學的時候，他更一邊讀書，一邊著手兩件事情。

1976-78 年的時候，還是神父的湯樞機是神學部主任，增設校外課程。我剛從台灣回來，他叫我用大學的系統，設計一個兩年制的神學證書課程，由我和羅國輝神父負責。還有一個人要提及，就是林瑞

琪⁴⁸。他是第一屆神學證書課程的學生，我在 1979-80 年神學四年級時，因要考畢業總考，神學證書課程就由林瑞琪接手幫忙，該課程發展成現在的「夜神」，即現在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的夜間宗教學部。

另外，徐主教做了一樣很特別，沒有多少人知道的事。在梵二大公會議後，教會著重於宗教交談。徐主教便開始了關心香港宗教界的聯繫，找了杜逸文神父、謝鳴之神父、聖貞德中學冼梓林校長等，於 1972 年成立了「非基督宗教聯絡小組」（現在的「教區宗教聯絡委員會」），小組積極地跟不同的宗教聯絡，多年的拜訪接觸與聯絡，六宗教互相有密切的交往。1976 年，胡振中主教找了神學部主任湯漢神父⁴⁹，與教區「非基督宗教聯絡小組」負責人冼梓林校長，與其他五宗教代表成立宗教思想交談會的籌備會。當時湯漢神父因工作關係不能出席籌備會，當時我剛從台灣回修院升讀神學，他便跟我說：「你從台灣輔仁大學修讀了宗教哲學、中國哲學、佛教和道教，你代我去宗教思想交談的籌備會。」我便聽命，代替湯神父到大昌大廈去開會。我由 1976 年底到 77 年頭，便跟冼梓林校長出席六宗教思想交談的會議。冼校長很照顧我，我便跟著六宗教代表開會，直到現在。

修院是培養神父聖召的地方，小修生六至七年的中學陶成，大修生七至八年的先修班、哲學神學和牧職學與牧民實習，修生們都有可能因各種不同原因離開修院。

中四那一年，因為爸爸工作上遇到不公義而失業。我當時認為爸爸沒有工作，我是否需要幫助家庭渡過難關；我考慮是否要離開修院，如果我離開修院爸爸會更加擔心，因為我還未畢業，他會擔心我的將來。幸好，當時得到林志遠神父的幫助轉做小販，我們一家都很感謝他。因此，我打消離開修院這個念頭，才繼續讀下去。由於這個離不開修院的考慮，使我在學習上受到影響，加上中四轉到慈幼中學，又要適應新環境，成績變差了，只能試升中五，修院院長便警告說：「成績差，如何考會考？會考不及格，便要離開修院！」由於父母一起做小販，有了工作，中五那一年，自己的心安定一些，便很努力讀書，最後，會考成績算不錯，中文科考得很好。其後，我便向著中文

⁴⁸ 林瑞琪博士，自 1980 年在聖神研究中心任職研究員，直至 2020 年退休。現於樹仁大學任職助理教授。

⁴⁹ 胡主教希望湯漢神父以神學的角度給宗教交談會提出意見和建設。

這方向發展，然後覺得中國文化很難了解，卻很有意思，加上我考上台灣天主教輔仁大學哲學系，便決心到輔仁大學修讀哲學，更把副修的科目，全修讀了中國哲學。

另外，輔仁大學有很多漂亮的女生，也想過要不要「識女朋友」，但因心裡的責任感很強，輕輕的便過渡了。在神學時期也有些思想，但是我想到答應入修院，就有一份責任。我知道當時有女生對我有意思，我也清楚表明，我要做神父。天主很微妙，在人的心中種下種子，當你心中有一件很重要的東西時，就會排除其他的可能。但如果信念動搖了，天主是容許的，甚至升神父以後，你也可以動搖，天主不會把你綁得緊緊的。所以我對離職的神父是完全接納的，我們應該要有這樣的寬心。

周景勳神父認為，由於教友的學識都很強，神父需要更多的學識，所以他在晉鐸五年後的 1985 年，報考輔仁大學哲學碩士班，獲錄取後便繼續進修，1987 年獲輔大頒授哲學碩士和 1990 年考獲博士學位。教區當局原覺得沒有需要讀中國哲學，但他仍爭取去讀，並得到已逝世的梁佑忠神父⁵⁰和當年的副主教林焯焯神父的支持和幫忙。

即使已獲碩士班錄取，當初教區認為沒有需要，不批准我的申請，加上我不是教區要培育的人，而且修讀中國哲學沒有大用。我很感謝林焯焯神父，不僅因為他爭取送我去進修讀書，而是他是一位有德行的人。

我在修院中一、中二的時候，對林焯焯的印象已經很深，他當時是執事，我覺得他為人慷慨大方。那一年大家要湊錢歡送唐多明院長返回意大利，雖是十元八塊，但為我是很需要。因為我的鞋子破爛了，這少許的錢是用來買鞋的，交出了便要等家人給我錢才可買鞋。林焯焯知道便買了一對鞋給我，所以現在我常跟他說：「神父，你不記得，我終身難忘的。你當時還是大修生，看到我的需要，買了一雙鞋給我。」林焯焯神父現在已近九十歲了，他人品很好，很懂得照顧人。他是能幹的人，為教區默默的奉獻了一生。

⁵⁰ 梁佑忠神父 (1934-1994)，1964 年晉鐸後，在海外進修及服務，1971 年回港，1985 年起獲委任為香港區主教代表，直至 1992 年因病休假。〈梁佑忠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https://bit.ly/3CzRTBB>〉，[7-8-2021]。

對於神父到外面進修的培育，我極贊成，若所有年輕神父都獲給予機會到外地進修讀書，學成回來，必有強化教會之效。如果進修讀碩士或博士學位更好，可在修院裡教書。故安排進修的神父選讀不同科目，這樣神哲學院就會有教授了，大家分擔一兩科，藉此影響修生、影響教友。當你教書的時候，你要準備，不能隨便說，因此思考必然要有進步；加上教書會接觸不同年輕人，增強自己的活力，實在很有價值。

周神父完成神學課程，1980年晉鐸，2020年剛好四十周年。周神父自1990年考獲哲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回香港後，便被胡振中主教委派到聖神修院神哲學院，長期從事教學工作，期間擔任哲學部主任長達二十年，宗教學部主任九年。他同時先後服務多個堂區，現為聖瑪加利大堂的助理本堂。自升神父以來，周神父奉派與香港不同宗教聯絡，現任香港天主教宗教聯絡委員會主席，及教廷宗座宗教聯絡交談會的顧問。

劉富根神父



- 1966 進入聖神修院的小修院
- 1973 聖神修院哲學部
- 1976 聖神修院神學部
- 1980 晉鐸

踢 足球可說是劉富根神父生命中重要的一環。不論是當輔祭、修生、神父的時代，足球都是常伴左右。他熱愛踢足球的程度，直教他有意到德國進修做足球教練！

我在恩理覺主教小堂做輔祭的時候已經喜歡踢球。輔祭開會後就問神父要零錢，去士多買膠波就踢起來。……到下一次又叫神父給我們一元去買膠波。李若安神父很好的，他又給我們一元。就是那時開始有興趣踢球，不懂的，只是在那裡把球傳來傳去。

我的本堂是李若安神父，他是潮州神父，已去世很多年。我們一家遇到火災後大概得到瑪利諾會修女的幫忙，安排住在京士柏的平房。我們感謝修女，那很自然學道理領洗，只差爸爸沒接受洗禮。然後便去了恩理覺主教紀念堂，即現在的教區傷殘人士牧民中心。我小學畢業那年，李若安神父要外遊，把工作交下給林志遠神父，並著他暑假時跟我媽媽說我要進修院，之後媽媽便把東西收拾。與我同一天進修院的，還有周景勳。我二哥帶著我，他就由他爸爸帶著，我們一起拿著行李箱去修院。

我記得爸爸最不開心：「為甚麼我的兒子要去做和尚？」我當時讀書不成，我媽媽就說：「總好過他去做壞人。」

修院是劉神父在聖召旅程的起點，他視這裡是踢足球的訓練期和成熟期。

如果你問我，我覺得 66 年是最開心的。那時家裡沒有甚麼，到了修院的生活很有規律，雖然不放假，只有暑假才出外，但我們也不覺得有甚麼問題。回家反而覺得不習慣，從家返回修院吃飯，之後會看電影。我最記得那一套黑白電影叫《碧血長天》，很好看。

最初進去修院的時候有人會哭，自己也想哭。聽到學長說：「有甚麼要哭，睡覺吧。」但和其他修生一起上課很開心的，老師會來修院教書。上課後就做清潔。工作之後就是玩耍。

修院很重視三件事。第一品德，第二讀書。聽人們說，品德和拉丁文一定要及格，及格是九十分以上。然後是健康，沒有健康做不成神父，所以很重視。我們差不多每天都做運動。第一天踢足球，第二天打籃球，第三天游泳，然後，星期六去行山。有時星期三沒去游泳，便由學長帶我們去附近的鄉村俱樂部行山，我們玩得很開心。星期六又去跑山，由南風道一直沿著山上去，一直跑去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就是聖伯多祿堂那裡。

從小修院開始便有靈修培育。那是很辛苦的，特別是第一年，主日彌撒也要多望一台。當時意大利神父唐多明做院長，而神師是明之剛神父，我跟他去大口環，看他照顧長期病患，總是聽到：「明神父，你是我們的大乞丐。我們是小乞丐。你乞東西給我們。」

現在昔日的同學不時會出來聚舊，聊天的時候就提起往事，像將到暑假的時候，院長會對某位同學說：「你不適合做神父，快快收拾東西離開吧。」同學便收拾東西離開。但修院不會把事情告訴我們。當九月的時候見不到同學，便知道他離開了。這位同學後來說，他也不知道原因，院長說他不適合便離開。

我中一時大概有十五個人。中班好像是關傑棠神父他們，然後就是大修院。中途插班的也很少。院長姓馮，是中國人，因為他覺得香港已經有英文中學出現，修院便開設英文部，所以我們下一屆就開始有英文部，而拉丁文變得不重要。

不過，英文部的修生後來全部走了，只剩閻德龍神父一個人。而他本來是聖母昆仲會的，後來插班進來讀中四，我剛好與他同級，他就帶著那些英文班修生坐艇到香港仔聖伯多祿學校讀書，所以其他人叫他做「大佬」⁵¹。

我們讀拉丁文屬於中文班的，中四的時候到筲箕灣慈幼學校上課，每天都繞一個大圈。早上有車送去上課，下課從赤柱那邊回來。關傑棠他們畢業後，只剩我們一班就不是這樣了。早上時間比較趕，有車送去，但回來就要自己坐巴士，坐2號車到中環，然後再轉71或者7號車，回來剛好是踢球的時間。

⁵¹ 多指資歷深，在某方面有話事權的人。

如果上全天課的話，我們就在慈幼寄宿部吃飯。我們修院去的都是吃最多的。我們平常習慣吃飽就算，但去到人家那裡好像很久沒吃東西那樣。慈幼的李北泉修士經常望著我們，時常把寄宿生剩餘的餸菜也給我們。我們吃完飯便到修院圖書館看看報紙休息一下，再回去慈幼上課。下課便立即坐車回來，所以我記得慈幼的學生會看著我們在搞甚麼鬼，一下課便衝下山坡。他們也跟著我們衝下去，跳跳跳，然後我們便跑去搭車。

中班外出讀書那段時間，也要有團體生活和祈禱。回到修院便一起，但只是一起祈禱，慢慢地便沒有了那種規律。運動的時候，有些人不喜歡踢足球便在一邊，有些就跑跑步。最早期，有些不會踢足球的也要下場踢。我們也會鼓勵他們玩一下，不會的可以學一下。孫英峰神父是一個例子，楊鳴章又是一個例子，一個說：「你踢啦，你踢啦」，另一個又說：「你踢，你踢。」被他們兩個笑到不行。大家一起玩，沒關係的。到現在修院對踢球也無所謂。

「私愛」這個觀念在劉神父小修生的時期仍然清晰存在。

在小修院時團體感是有的。1966年時雖然很古舊，但團體感很強。不過長上他們又害怕，不准兩個人經常走在一起，害怕「私愛」，要團體一起。所以行山要一起，甚麼都要一起做。

他們有說，不可以有私自接觸，學長會看緊的。你有甚麼事就跟學長說。若你經常兩個人走在一起，他們比你還害怕，有這些事便「死定」，立即被趕出修院。

相對於早年修生和神父於日常都會穿著神父袍，劉神父當小修生時已經出現了變化。

1966年往後已經不用穿長袍了。入修院的第一年多些機會穿，第二年只有在參與禮儀的時候才穿。現在有些神父仍然穿著，很方便的，穿一件內衣，再穿長袍便可以。我覺得很有型的。我當神父之後就沒有穿了，只有一些神父繼續這樣穿。

這是身分的問題，collar〔羅馬領〕也是。我也很佩服以前去羅馬那一群修士，穿上綑紅邊的黑袍很有型。羅馬當時很守舊，要這樣穿著才能外出。他們要出外到大學上課，人家見到便叫他們修士。

中五的時候，我是修院足球隊的代表，特別是對外比賽的時候。有一次與慈幼會修生比賽，我放學後便立刻衝回去踢足球。當時輸 3:0。隊友說快點去換球衣。我便下場，追回 3:3。當時很好玩的，所有人都圍著看。那個時候已有澳門的修士來讀書。

放暑假回家一定要先告訴本堂神父已回來。如果堂區沒有地方住，才回家裡住。聽說以前是不可以的，要住在堂區。現在已不是了。田義神父在小修院教書，後來做了院長，之後差不多一個星期回家一次。有些人回家多了，便不修道了。

在中文部的中班修生都在南華中學讀書，後來各散東西，只剩劉神父一個，搬往培聖與英文部的修生一起生活。

中六時，姚崇傑神父陪伴我們十多個中文部的修生，在南華中學上面寄宿，他找人為我們做飯和照顧我們。那時有三個修生因為會考成績不錯，在巴富街何文田官立中學讀書，我就在南華中學讀書。後來那三個考到大學，當時修院就討論一個問題：讓他們讀大學嗎？自費還是修院負責？據聞如果他們家裡沒有錢，就由修院負責付錢。如果讀不完又不做神父，就要還款。但聽說有些神父反對：「不，他們出去外面讀之後就不會回來。」但修院都要試一下，終於真的大學畢業後一個都沒有回來。

在南華中學時，下課後可以打籃球的話，便在學校打籃球，打完便回到宿舍上面洗澡、吃飯、祈禱等。住宿舍還是有培育的，一樣有靈修，早上望彌撒。我們住在學校上面一層宿舍，上面有很大的地方住和開彌撒的小堂，宿舍以前好像是校長住的。

中五的時候，印象比較深，因為會接觸外界。上課有男女同學，都有惦記著。記得中六的時候有時回修院，一天馮院長說：「阿根，你要考慮是否繼續做神父。考慮回不回來。」那時候是聖召的關鍵，我便開始想，而我又很幸運，因為這個院長也喜歡踢球，他說你想想吧。那我又再想想。我就回修院。

後來中文部剩下我一個，便搬到九龍塘培聖，與英文部的人一起住，上學就回南華中學，我們很少會在修院的。當時陳志明神父就已經回到修院讀哲學，縱然大家中一時都是一起讀書，我比他遲一年晉鐸。

我又「衰」，不喜歡到台灣讀書，沒有去考試，讀完中學之後便回到修院讀先修班，讀完先修班便繼續讀哲學。

大修院跟以往一樣讀七年，但內涵有所改變。先修班一年，兩年哲學，四年神學，便剛好七年。進大修院後有很多改動，培育團也變了，仍然有外國人，但所有事情都不同了，不同於小修院的時候。但仍是重視靈修的培育，開始有醫院的牧靈訓練。你知道在修院住的人負責培育工作，所以楊正義神父也住進了修院裡，還有姚崇傑神父等人。

我神學第一年的時候，周景勳神父已經在台灣完成哲學課程，又回來香港了。教區不讓他在那邊讀，要回來修院讀神學。因為教區會覺得修生在外面讀書很危險，隔一段時間就不會想做神父了。

在大修院階段，院長也會與修生單獨面談，討論是否要做神父。

見院長的時候，他可能會告訴你要走，那你便要走了。

我算起來幸運，少時讀書不夠聰明。我真的想把成績表全部都燒掉。那些成績表，要本堂神父簽名的。我小學時候已經那麼懶惰，只顧玩耍都沒有讀書，讀修院時成績又怎會好呢？我物理不及格，數學不及格，化學也不及格，成績表交給本堂神父，他說：「哦，這一科對你將來做神父沒有用的。這些嘛，也沒有用的，最重要是品行好，有九十多分。你會拉丁文，又及格。」他說：「你那些科目如果都及格了，反而不會做神父。」

我知道我不能不懂拉丁文的。教我們的是一位修士，已經離開修院很久，他回來教我們。很奇怪我又可以應付到。有時我們讀到很困難的時候，他也會「放水」⁵²。……因為大家都知道不可以不及格。為甚麼呢？因為將來讀神學要用拉丁文，拉丁文不及格又怎去讀書？這證明你沒有聖召。

早期做神父身體不能殘缺。不單是這樣，私生子也不能。健康也很重要。長上會說：「你健康不好怎樣傳教？」獨生子也不成。如果只有你一個，家裡又怎會「捨得」⁵³？你又要負擔家裡的責任。在早期，

⁵² 俗語，意指出考題時淺易一些，或打分數時沒那嚴緊。

⁵³ 願意的意思。

獨生子是沒有商量餘地，想也不用想。但社會轉變了，現在不是了，你與家裡安排好再說。主要是你真的有沒有聖召？有沒有興趣做這件事？

醫院牧靈的經驗令劉神父體味人生。

大修院時期我們要去醫院實習，由楊正義神父與瑪利諾 Sr. Kenny 祈愛蘭修女幫我們安排。以往是在聖母醫院接受訓練。我那一年很特別，由一位牧師 Benjamin Pao 在聯合醫院訓練我們。我是跟一些基督教徒及一些教友一起接受訓練。這位牧師是從美國回來寫論文，順便幫忙訓練。我在聯合醫院，故意試一下當夜班，因為到晚上是很刺激的，你要知道在觀塘經常有斬傷人事件，很厲害。時常聽到醫院那些病人服務助理說：「醫好也沒有用，又會再斬過。」很恐怖的。我們又扮做醫生，我們穿上白袍。我試過有醫生問護士我是誰，護士便告訴他。

我又去過明愛醫院做實習，那時由嘉諾撒修女負責。我最記得曾經在四樓內科工作，有些人以為我是醫生，對我說：「醫生，你幫我一下，我很辛苦。」我回答他說：「我不是醫生。」我試過把藥錯給了一位老人，護士知道後說沒關係，病人吃錯了藥不會有大礙。但我越幫越忙，便不用我了，只是探望病人，與他們聊聊天。

醫院的經驗讓我覺得生命很兒戲，所以我現在會告訴別人，錢是帶不走的，應該用在該用的地方。

劉神父在七十年代修讀神哲學，在提及教會觀的時候，從他的回應顯示，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和聖神修院已明顯形成兩個不同功能的系統。

只有神學課程裡培育教會觀，修院只是培育靈修，做神父的方向，不會理會你的教會觀甚麼的，而團體生活是將來你在堂區的生活。

修院過的是團體生活，踢足球講求團體精神，讓劉神父更容易在聚會中，觀察到做了神父之後，神職班在團結精神方面的問題。

最早期有一起的活動，大家介紹一下有沒有新人和修會會士。然後玩遊戲。遊戲完畢便吃飯。之後，神父可以隨便去游泳。我當然帶領大家踢球。……但楊主教的時候開始改到明愛白英奇賓館，漸漸不再借用喇沙學校場地，空間小了。有些人一開完會便走，吃飯也不留下來，那我倒不如與一些教友去飲茶。

梵二於 1965 年結束，但因翻譯及推廣需時，故此其帶來的轉變，在七十年代仍然在進行當中：

修院在七十年代的培育已完全不同。65 年梵二會議結束後還未開始有影響。後來的牧靈工作都是往後開始轉變。以往看重的拉丁文讀神哲學的已不再用，英文變得很重要，因為上課都是全部用英文。我英文不大好，有時要找修士幫助。

當時因為台灣翻譯比較快一點、很謹慎，香港教區沒有翻譯，我們是看台灣教會的翻譯，開始用中文祈禱。以前用英文日課，後來用中文日課。不會不適應，因為始終這個是祈禱時間，不是學英文，有中文更加方便。

劉神父踢足球的興趣從小延續到成為堂區司鐸的牧民工作上，以踢足球連繫輔祭。

如果我負責輔祭就很簡單，不會踢球的也要踢。我在沙田華福堂改了一點，他們打籃球比較多，我便與他們一起打籃球，也踢足球。我要尊重那些輔祭。

我一定會負責輔祭會，因為我經常取笑說，這些輔祭將來是「替死鬼」。我會叫他們：「將來要做神父。」

從聖老楞座堂開始，劉神父除了是本堂神父，還需要兼任校監，2020 年是三間天主教中小學的校監。

我教小朋友，品德是最重要的。第一品德，第二學業，第三體藝。由我開始負責學校，便強調這三件事學生一定要得。其實，它們是我在修院的培育，只不過再作融合。體藝，沒有好體力又怎樣？你要付出心思。心思又從何而來？你以為踢足球很容易？踢得好，是磨練來的，體藝是訓練人有信心、鬥心、恆心和要有毅力。網上有些運動員訪問，我說：「你看看那些運動員，很辛苦的。他們的磨練不只是為了獎牌。獎牌只是他們其中一個目標，更重要的是發揮自己！」

劉神父 1980 年晉鐸，四十多年來在不同堂區服務，帶領青年，關顧長者，喜與他們結伴出遊。至於足球，近年劉神父因眼疾，踢球時要格外小心。他現時為九龍新蒲崗善導之母堂助理主任司鐸。

伍國寶神父



- 1974 進入聖神修院先修班
- 1975 在聖神修院哲學部攻讀
- 1977 開始聖神修院神學課程
- 1981 晉鐸

出 生於公教家庭的伍國寶神父，深受家人的影響，即使幼童時宗教生活並不太活躍，聖召的種子原來已常隨左右。

我的聖召是受三個人影響，第一是我媽媽，她是九龍聖若瑟小學的老師，媽媽很欣賞當時的校長 Br. Paul Sun 孫保祿修士⁵⁴，常常讚賞他，那變得我也覺得他很好；這樣，神父在我心中有一個很好的形象。他是我的校長，常常站在校園門口，看著我們返學放學，他是外省人，不懂我們的廣東話，所以沒有怎麼與他說過話。

第二是我姐姐，她就讀嘉諾撒聖心書院的時候，曾考慮當修女。她是我最年長的姐姐，常常要求我們去教堂，要我們祈禱。可能我是最年幼的，她常常帶我逛街、到工展會等，又送一隻小狗給我。她曾跟我聊天說日後入修會，並帶我去她的學校後園說她將要入這個團體。……小時候的世界很簡單，我從來沒思考過，原來有這樣修道的生活。最後我姐姐沒有進入修會，而是做了老師。

第三是最小的哥哥。他讀香港浸會學院，是天主教同學會的領袖。他在聖德肋撒堂參加歌詠團，他指揮及唱歌都很棒。我最初也想過跟他去唱歌、開會，擔任輔祭，但我常常都不記得自己在做甚麼，去了兩次都不夠準時就沒得再去了，被淘汰出來。

我比哥哥低兩級，這位哥哥曾經思考聖召，他那時想過入教區，便來聖神修院看看，所以他也帶我來看這地方。後來他有機會到外國讀書，便放下了聖召。

⁵⁴ 孫保祿修士（1907-1986）在中國熱河出生，畢業於輔仁大學後，以辦學為畢生願望。卅三歲成為耶穌聖心門徒會首任會長。1949 年來港，任教喇沙書院，1958 年創辦聖若瑟英文中小學。〈孫保祿修士〉，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https://bit.ly/3eWFduS>〉，[16-4-2021]。

步入社會後，當時也發生了一件事，催促伍神父思考自己人生的方向。

我讀完中七，在黃大仙民政署工作，就是現在的政務處，很多時要舉辦社區活動，就是因為舉辦活動，跟新蒲崗伍華學校、善導之母堂的領袖開會，拉上關係。……有一位 Fr. Tappella 達碑立神父⁵⁵，他是善導之母堂的副本堂，做很多青年工作，又主辦一些夜校學生活動，我跟他合作，維持了差不多兩年。看到他的工作很有意義，明白他的工作，才知神父是甚麼，就開始思考，沒有繼續去讀書了。

我當時覺得自己在社會上的工作很有意思，撲滅罪行運動、清潔香港等，也要組織現在叫區議會的架構。晚上開會，邀請一些街坊首長、校長、警探、幫辦、督察來一起商討如何改善社區。在這段時間有兩次在晚上去樂富開會，當時叫做老虎岩。突然間「嘍」的一聲，有青年從七層高的大廈跳了下來，死了。

這事情很恐怖，因為親身經歷，有很大的衝擊。警探說他曾見過這個青年，拘捕過他，他又再次犯罪，可能是吸毒、販毒，變成被仇家追斬的人。

我那時體會到了罪惡，所以就從宗教方面反思。有時不知道是媽媽、姐姐，還是哥哥的影響。

原本我喜歡醫學，做醫生或者護士幫助他人有好的健康，當我看到社會的另一面，即是靈性，即尋求善那種力量沒有了，便更加體會到有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所以就開始思考聖召，就這樣，大約廿三歲進入修院。

雖然已經差不多是梵二後十年，但神父離職的現象使伍神父的媽媽擔心。不過，伍神父眼中，修院是一處不受限制的自由地方，更是開啟他人生的地方。

1974年那時院長是曾慶文神父，我們叫他「細曾」，有一個「大曾」，曾慶霖神父就是大曾。我進修院的時候，大小修院合起來約有四十六名修生，人算是多的。除了正式升上神父，每年都在遞減，有六至七人離開，所以我媽媽說得對：「現在每個人都不做神父，你卻現在去

⁵⁵ 達碑立神父 (Fr. Eneas Tapella, PIME, 1929-1977) 1955年晉鐸，1977年一次為智障傷殘人士找尋康樂場地的時候，遇上交通意外，身受重傷，七天後逝世。〈達碑立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https://bit.ly/3hBUPT>〉，[16-4-2021]。

做，還有你能否讀得成功？因為修院的神哲學訓練要求都很高。」同班的同學有七個，慢慢到最後只有我讀完升神父。

跟修會不同，修會有發願。我們進修院後沒有發願的要求，做 seminarian，是教會學生，你隨時說離開就可以離開，沒有一份合約。……不過那時自己知道，是自己選擇了回應天主的。

我在修院裡慢慢覺得，明白了生命的奧秘，對於整個世界的了解是一步一步，所以我覺得修院開啟了我的人生。

以往最令我反感的是《聖經》，但在修院學習的時候，它不再是停留在神話故事的領域……一直讀下去才發現「這句原來是這樣的意思」，顛覆了我以前的認知，一邊讀《聖經》，一邊需要刪除或者清洗舊的記憶，然後再重新輸入。

成人聖召在修院首先要經過一年的先修班，這一年開始選讀部分哲學科目，讓伍神父打好思維系統的根基。

我讀先修班一年，之後兩年哲學。先修班的時候，常常避靜、祈禱、讀聖典、見神師及聊天。因為我屬於大修生，即是成年人，可以選擇一兩科哲學。人家讀兩年的，我之前已經讀了一點點，在先修的時候多了些學分，所以在讀哲學的時候我已經讀教理中心的課程，然後又到社區裡去傳道、教道理。

修生七年的生活一直都在變。先修班主要上課就是聽神師的教導。一個星期有兩次，半小時至四十五分鐘，然後祈禱，人家說念玫瑰經，我也不是常常念，團體念就念，自己一個只念聖母經就可以了！每個月有兩天去避靜，避靜也是祈禱。我當時只知道星期日最重要，吃飯的時候劃十字，做這些基本的東西。我自己喜歡看書，很多時候神師叫我們祈禱，因為不是太懂得祈禱，我便問閱讀《聖經》算不算是祈禱？他們說算。因此先修班的時候我已經讀完整本《聖經》。

我看完了整本《聖經》之後，到哲學神學的時候，發現原來很好用。甚至後來我一直讀《聖經》，發現原來很多人不知道《聖經》，然後講很多高深的神學東西，原來沒有用的，全部都「離地」⁵⁶。

⁵⁶ 形容人們的想法、行為脫離大眾。

到了讀哲學時，修生的日常又是怎樣的？

原來這裡讀的哲學不是上那麼多課的，給你很多時間看書、去圖書館、晚上自修，祈禱，有彌撒、有早晚禱、有時朝拜聖體，這些是恆常的。

星期一、二、四、五要上課，上完課後就會打籃球或踢足球，不同修會的人會一起上課，他們也會一起踢足球，一起玩。星期六、日是休息日，不過我們會到堂區服務、教道理、幫忙一些善工。星期三是自修日 study day，因為沒有了星期六、日的時間，我們在 study day 自修、看書，因為要考試，又要考學位，成績不達標可不行，我知道自己的成績也是「掙車邊」⁵⁷。

我覺得修院的訓練是可以的，實際上在修院的時候，讀了教理中心，又在堂區教道理，又在神二、神三的時候去培德學校做夜校老師。那時有夜間中學，工人會在晚上讀書，主要學英文，學簿記，我會去教他們倫理和信仰上的培育。

我進來修院的時候，修院生活已經比較開放，報紙就是報紙，沒甚麼改動的或抽起部分的新聞，有電視室可以看電視，即正常的娛樂生活。放假的時候，星期六日可以出外服務，又可以回家探望家人。我會定期回家，定期聯絡。

因為修院上課採取循環制，會出現低年級與高年級合班上課的情況，大家的知識層次不同，為伍神父形成困難，靠師兄們的讀書小組補救。

修生的團體，大家是「老友記」，跟自己一個班級的會比較熟落。不過我的思想是比較緩慢……不懂得找一個方法自己做，多數都是先看看人家怎樣做。哲學又好、神學也好，都是沒有那麼快能掌握，所以很多時都找一些高年班的同學去請教，因為我們是混合上課。

例如神一有跟神三、神四的同學一起上課，變得我們不知道教授們說甚麼，以為我們必定識的！比如你讀恩寵，沒了其他天主創造論及認識論，就讀這些救恩論，都不知當中的原由。不過我們稱為師兄的，他們在差不多的時候就會「捉題目」，猜教授會出甚麼考題，……高年級的同學會有一些 study group [讀書小組]，我就順著風，我聽同學的解釋比教授所說的更能明白。

⁵⁷ 僅僅及格。

我覺得 study group，尤其有一些高年級的同學，因為他已經讀完了其他的一些科目，但我卻沒有，好像缺少了一些維他命，吸收較困難。但是當他們講解，連繫起來，我才開始捉摸到訣竅論點。他們知道教授這樣說，考這些題目，預早告訴了我，我就可以準備，朝著那個方向去讀，這樣就容易得多了。

所以團體生活有感情，大家在學理方面和研究問題上交流，這樣思維空間闊了，理念也開啟了。因為我自己讀哲學，讀的時候比較趨向架構性 systematic 些，這些活潑的 study group，這個同學這樣說，那個同學那樣說，我很多時都是聆聽，然後請他們幫我改正自己做的總結，中空了的都填回了，自己就覺得受益多了。

當我成為高年級學生的時候，因為自己認識多了，我也會告訴低年級的同學知道。……實際上也是好的，有時看參考書也是亂來的，不懂的，但作為學長要有些權威，迫著查找多些，提供給低班同學，實在已是一個很好的小老師。

伍神父在不同的場合開始留意和觀摩不同的教學法。

因為教授都是外國傳教士，上課是用英文的，有耶穌會，有瑪利諾會，慈幼會或方濟會的。每個教授都有不同的教授方法。我後來去外國讀書，才知道方法論很重要。

我要教書及公開講道理，但沒有讀師範，又沒有學習教授的方法，要自己摸索、找出來，所以開始留意教授怎樣表達他的題材，每個教授有不同的表達。為何會這樣 present [表達]？分析了之後，自己就建立了他們原來用上甚麼步驟及方法，我是很慢才懂得這樣，因為我們沒有接受正規教學訓練……即不同於修會，比如有些修會會士一定要接受過講授訓練，他們通常都讀過教學法。

我沒有學過那些方法，但神二、三、四時，我有一個機會。那時湯樞機是神哲學院的校長，有一些教友的夜間培育，借用大昌大廈，學院於是找我幫忙替同學點名，執拾桌子。本來神學這些東西很多時都是做神父、做修女才會讀，不過梵二開放了神學的訓練，使我們有一批較為前鋒的教授，他們除了在日校教學，也會晚上在外面教授教友領袖，我就是去做他們的「書僮」。

這樣，我就聽到不同教授他們講的內容，把他們當師傅，因為我只是做教友領導的「書僮」，所以不是太專心聽，也不知道說甚麼。但慢慢發覺原來神父講話不是那麼容易，要做很多的準備。

在伍神父眼中，縱然修生數目一直流失，但教區對修生的培育，既慷慨，又無條件支持。

我 1974 年進來的時候，之後約有三年仍有一些在中大、港大或台灣大學的修生在這裡住宿及回大學讀書。他們叫修士生，但很多讀完了，拿到大學學位之後都離開了，沒有再做神父，即沒有向著天父召回的方向去做神父。他們就好像日校生，但人數一直減少。

到我 80 年畢業的時候，修生大概還有十多人，沒有小修生了，全部已經是成年才入修院。還有澳門的修生也來這裡接受培育，但他們讀完也是離開的，沒有做神父。我看上去，進來的有四分之一做到神父，但每年都可以離開……我們說好像「無掩雞籠」⁵⁸，任你甚麼時候走。我自己覺得教會對我們很好，給我們很大的自由，會無條件給機會培育你，我們沒有交學費，沒有任何食宿費，教會對我很慷慨……我覺得好像當自己的兒女，以我所知各學兄學弟，隨時走都沒有條件。

好像我有那麼多昔日的同學，看著他們現在投入社會也是在很高的社會位置，但是教會沒有要求過他們任何東西，這是我自己欣賞的，栽培聖召就是栽培聖召。

整個修院生活，實際上每一件事也是很難忘的，看得到有些同學離開也不是失去聖召，實際上是家裡嚴肅要求，或是有更高情操的理想。大家都是青年，都在追求自己夢想的，我自己最後體會到這些同學都是天主給我的理想陪伴者，曾經得到他們的陪伴也是恩寵來的，沒有那麼孤獨。若沒有他們一起走，自己可能早已迷失，比如讀《聖經》，很明顯不是我自己喜歡讀的。

伍神父因為陪同學聽課，把多年以來自己對《聖經》的觀感打破了。

我喜歡讀哲學，但我升讀神學一年級的時候有機會讀《聖經》，以前是要自己讀，當作聽人生哲學的故事，但我有自己的世界。有一個地

⁵⁸ 歇後語，自出自入的意思。

方不好，自己「砌」⁵⁹的與正式讀的就有分別，所以就很大的不調適，要常改革，打倒自己建築的 shelter [框架]，舊的信仰框架全部倒下了。

神學第二年的時候，有兩位同學很想讀《聖經》的原文，教授就說只兩位同學並不划算，他說最少三個。同學們要求我一起去修這些《聖經》原文，因為他們兩個常常教導我，我不好意思推辭，所以就說好吧，實際上我是沒有興趣讀那些語文的。

教授是德國來的，他教授《聖經》，又懂希伯來文、希臘文及拉丁文，教授法也很棒的。我就上課聽書，打破了自己的所有紀錄，打破了以前自己砌的《聖經》世界、《聖經》觀念，自以為是的都全部被破壞了。

當時自己也不知道，不過回頭看是受過這樣根本的衝擊。

而且在神三時，伍神父遇上了一次泰國南部管理難民營的體驗。

柬埔寨那時有很多難民湧了出去……我們暑假去泰國，好像是在一個平原中，在那裡管理一個中轉難民營，我、孫英峰神父和蔡惠民神父等……最後真的只有我們三個繼續做神父。其他的都走了，都沒有升做神父。我當時是神三，是修生當中最大的了。

院長關俊棠神父帶領我們七個修生去，我負責做領隊。紅十字會可能需要義工，這特別工種是關神父找回來的。他安排好我們七個修生住宿的地方後就離開了。我們是住在一位教友家中，整座兩層房子。每天去隔壁的聖堂祈禱、參加彌撒，吃過早餐之後便開始工作。

那些難民事實上都有很高的教育水平、知識和技術。他們不斷湧進來，我們要幫他們分流：醫生、護士、老師或者懂得書寫英文，很多其他社會服務都可以的。我們第一樣要管理好衛生，我記得下大雨時要掘去水渠，要不然會水浸；要倒垃圾，做這些工作等等。起初是輕鬆的，在建立系統後，就由難民他們自己輪流負責，我們退出。除了我們七人之外，有一位是從香港派過去的衛生幫，督導我們，管理及教我們管控那裡的衛生。還有兩個護士，管理醫院行政事務，加上兩位法國傳教士，加起來有十二人在那裡工作。

59 鑽研。

我們需要去運作管理整個難民營，我自己的經驗是頗不錯的。首先做好個營地，然後由難民接棒，自己管理。然後，我們就再走第二步，找回一些老師，幫他們組織學校，之後找護士，幫他們組織醫院；我們需要的所有物資紅十字會就立即提供。其他的那些就慢慢組織，一個暑假的時間，約一百天，我們就走了。

這個體驗很深刻。那三個月，沒有統計處理過多少難民，總之我們做了很多他們很需要的東西，他們有些去了美國，有些去了歐洲，有些去了澳洲，體會到他們很開心，整個過程充滿希望。他們留下聯絡，但是我們當時盡可能不再影響他們，所以我們銷毀了全部的聯絡地址及姓名。

我去做這些服務，體會到的是需要幫助別人，尤其是那些沒有了自己國家的人。打仗使人民要各奔前程，他們在這段時間是最困難的。

回來之後，神四就準備升做執事，1981年1月升執事，6月完成所有神學課程及半年在堂區與修院之間的牧民實習。在那段時間後，院長說可以申請晉升神父了，自己就去申請，但其他同學卻沒有申請，這樣變得只有我一個人升執事、升神父。孫英峰神父是後我三年才升神父，其他有些則去了羅馬作一年的生活體驗，也沒有升，有些同學原本是想晚幾年才升，但最後也離開了。

最終81年升神父，86年到外國讀《聖經》期間，得到教理中心邀請，給我機會去學習怎樣講授教理，所以在教理中心教傳道員四年。……實際上我在修院第一、二年的時候已經修讀了教理中心的課程，升神父後我又在堂區教道理班，算是正式訓練過，之後又有哲學學位，又神學學位，所以大膽承擔。

在晉鐸滿六年之後的1986年，伍神父遂赴美國修讀聖經碩士課程，再兩年後再到羅馬修讀宗座聖經學院攻讀聖經碩士（Licentiate in Sacred Scripture）課程，即有授業資格可以在修院和教會大學教授《聖經》。回港後，一直在聖神修院任教有關《聖經》的科目。2020年9月出任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宗教學部主任。此外，伍神父四十年來也曾服務不同的堂區，在擔任修院全職工作前，他是荃灣葛達二聖堂區的主任司鐸。

孫英峰神父

1972-76	到美國攻讀哲學
1976	進入聖神修院先修班
1977-81	聖神修院神學部
1981-83	社會體驗二十七個月
1984	晉鐸



孫英峰神父的父母為了讓這個獨生兒子得到最好的教育，認為天主教辦學出色，先後將他轉到不同的天主教小學，期間給他遇上在信仰上影響他的一位天主教徒老師。

我對天主的感覺，應該是二三年級的時候。我很懶惰的，又學了爸爸的臭脾氣，我媽教不了我，有兩次帶我去彌撒，讓天主來教我。我感覺到耶穌很神聖，很崇敬的，產生深刻的宗教經驗。

我的信仰是天主教教育給我的，影響我最深的是小三時候的一位女教友老師。她很賢淑，很有愛心，很好人，又有《聖經》精神和態度，就好像她所講的耶穌一般。那時候她令我對天主教信仰有很好的印象。那位老師後來也做了修女。

孫神父在天主教中學就讀之時，學道理準備領洗，但遭家人反對。

中一下學期可以領洗，爸爸反對，不讓我領洗。他那時不是信天主的，臨終前才改信天主教，但他都感覺到宗教給人很大的感染力，可能他受過觸動，他便說：「你還小，不要讓這些影響到，好像荼毒一般。」以前中國貧窮，爸爸因為生活艱難曾經被送去做和尚，不是真出家，以為是有生活有飯吃。但他在和尚寺的經驗很淒慘，沒能吃飽飯。

孫神父對宗教的虔誠一直有增無減，一方面是感受到耶穌的愛，另一方面為了改掉自己的惰性，積極地祈禱。

這份對宗教的虔誠是有所增加的，中二的時候，在紅磡聖母堂，有一位神父特別熱心，星期五的彌撒之後有一小時朝拜聖體，我在那裡有最深刻的宗教經驗，我感受耶穌有多愛我，我也很愛耶穌，從中我找到自己是誰。這個體驗是很難解釋的。

中三下學期的時候，雖然我算得上是聰明，但比較懶惰，不願讀書。因為良心上不安樂，結果我天天祈禱，每晚參加彌撒，我真的求天主幫助我。

中三下學期那個復活節，孫神父在聖堂看到入門聖事，矢志翌年這個時候要領洗，並且真的實現了！

中四的聖誕節，我對教道理的 Br. Columba⁶⁰ 說我想領洗。他就說，「好啊，不過你要先問准父母。」

之後的事情發展很有趣的：爸爸在廳中吃飯，媽媽在房間，我坐在媽媽身邊，門是打開的，我很大聲地說：「媽媽，我想領洗。」媽媽不知道為甚麼也很大聲地回答我：「你為甚麼想領洗啊？」大家對答一會兒，她大聲問我：「你是想清楚了？」我說：「是啊！」她再問我：「你真的準備好？一輩子的啊，不要後悔！」我說：「不會，天主很好的。」總之我倆沒有約好，大家明明坐在身邊，卻很大聲地對答，好像演戲般，讓爸爸都聽到了。不知是否聖神安排。她說：「好吧！」然後領洗那天晚上，媽媽來了觀禮，爸爸很兇的，沒膽量告訴他。

我領洗後，爸爸不理睬媽媽整整一星期。我沒事，沒受苦，爸爸只是不理睬媽媽。

由於七十年代香港只有兩所大學，競爭很大，孫神父便到了美國讀書，在當地遇上改變他生命的神師。

在美國讀書，有位修女介紹我認識一位耶穌會神父 Fr. James Burke, SJ 做我神師，原來他是神學生的神師，專門負責輔導他們、聽告解、照顧他們的靈修。他六十多歲很仁慈的，我在他面前甚麼都敢說，四星期見他一次，每次半小時至一小時，我想到甚麼就說甚麼，他總是聽著，有時會給我意見，講的東西都是我內心的需要、表達，這就是 spiritual direction 靈修指導。

我跟隨著他四年間不知不覺地變成一個很勤奮的人。信仰改變了我，從一個很懶惰的人，接觸到天主，變成一個很勤力的人，並開始考慮做神父。信仰變得很真實，沒甚麼能比我自己的改變更真實的了。

⁶⁰ Br. Columba Tarrant F.S.C. (1928-), 1960 年來港，並在聖若瑟中學任教英文科及宗教科，至 1971 轉教他校。 <<https://bit.ly/3bCE7IU>>, [23-4-2021]。

我大學四年級上學期的時候，用了一個學期以耶穌會依納爵的方式來辨識，最後在聖誕節子夜彌撒領完聖體後做決定，在心中答覆耶穌我會做神父。

首先一個大決定就是要入修會，還是當教區神父？另外一個大決定就是在香港還是美國？在修會還是教區也做了很多辨別，最後回到香港才確定。那時候七十年代，外國生活舒適，人人都嚮往美國的生活，高物質、高質素、高科學、高文化等等。回到香港，我覺得很少中國人神父，都是外國人來當神父，我覺得我是中國人，去外國做神父不是很對，一定要回香港做神父。

然而，孫神父的爸爸是希望他完成大學之餘，能在美國落地生根，迎接雙親到美國；而他媽媽以為自己的孩子已轉讀工程，為他想好了一個美滿的人生計劃。豈料孫神父一直留在耶穌會的大學 St. Louis University 讀哲學，直至畢業。他媽媽到美國參加畢業典禮，才驚覺真相！

我爸爸是很兇的人，我做決定的時候都不知道要怎樣面對他。但天主使我爸爸從未因為我做神父而罵過我一句。他在台灣寫信跟我媽媽說，他以淚洗面，很難過痛苦。不過他們都知道我這個兒子是勸不來的。

幸好爸爸那時在台灣做小生意走不開。76年8月我回到香港，月底立即入了聖神修院。

雖然讀了哲學的學位，孫神父仍要讀一年先修班。不愛說話的他，不乏對修院一些觀察。

先修班有三個學生，我、林祖明及另一人，但他入修院後覺得很不舒服、很不開心，聖誕節時就離開了。

我入修院的時候，有四十個修生，還有些是小修院升讀上來的，然後我一直升班的時候，人數越來越少。我們做值日生要報數給廚房，最初是四十人，沒多久就卅八、卅六、卅二，一年比一年少，後來我離開修院的時候只剩下十八個，已經少了超過一半。

那時代教區修生很多都是小修院讀上去的，或者有些成績不行，很地道的「香港仔」，有時有些比較粗獷。但修院給了他們很好的教育，很多人去了深造。

我特別覺得小修生升上來的是另外一類人，例如陳志明、閻德龍，他們是我的師兄，是修院的主流；但師弟的小修生給我感覺是內向一些，自己有自己的世界，我認識的兩個師弟都沒轉到大修院。他們那時可能也在想自己的前途，沒有投入團體，給我一種不太積極的印象。結果他們讀完中學，在修院住，直至完成大學課程，就離開了。

那時修院正處於本地化的時候，最早期的教友在外國讀完書回來，會來神學院講學，總之最早的風氣是在修院裡吹……有甚麼新觀點當然先走來神學院，神學院會邀請教授、講者，假如有研討會，神學院會早著先機。他們那時候很先進……屬於社會神學、解放神學。

自從「大關」神父做了院長，他花很多心血培育團體，很用心的。他有很多「院長時間」，每星期都有訓話，而且說得很好。現在也是，他說話是很動情、很有一種深度、又很有反省、很有感覺，嘔心瀝血一般將自己的心事跟你說，所以我有很深刻的印象，我覺得他是很用心去管理修院，是很好的院長。

孫神父適應在修院的生活嗎？

在修院的生活，我有一個很大的困難，是我管理不好自己的時間。舉例來說，我的論文至少都遲交一個學期，但感謝天主，我寫出來的東西還可以的。在美國的時候我讀書反而容易一些，我有自己的規律，一個人自己管理自己。

這是因為一方面我是很完美主義的。一個小小的題目，我會想二十個論點，每個論點要看很多書才動筆，結果就永遠沒法做完。……修院也不是給我們很多時間讀書的，因為有院務時間，有團體時間，有打球時間，有周末出去工作的時間，晚上又不可以太晚睡，總之他們幫你分配好時間，如果你願意在已規範的時間裡做好事情，那就行了，但如果像我這樣不太現實的人，計劃這麼大，那就不行了。

我在團體內，也沒甚麼問題的，有一件事很有意思的，「大關」神父經常叫我們找知己朋友，因為他認識有神父離開鐸職、中年老年不開心，主要理由是他們沒有朋友，沒有知己。堂區生活有起落，有些教友不接受他們的神父，或者不是常常有成功感，有時就很失落，覺得一事無成。因為一生漫長，他覺得神父兄弟很需要有一個很得力的支持。他就很鼓勵每人都要找知己朋友。

我跟自己班的同學關係很好，其他班的就普通，因為我不是很會社交。……我都有踢足球，負責 mark 人 [釘住人] 的角色，好像後衛一樣；還有我會看誰人最有機會射球，那我就經常在他身邊，這就是我的角色。

我有一點特別，修院准許我大部分的周末都回家住。我想因為修院對我的印象是獨生子的關係。

完成先修班後，孫神父跳過兩年哲學課程，跟神學一年級的師兄一起上課。

當時有伍國寶，還有兩個很了不起的同學，耶穌會的勞伯堽與慈幼會的林仲偉。林祖明因為要讀哲學，所以他遲我兩年。

不過，在神一神二的時候，孫神父察覺到，原來修院已經蘊釀要他離開。

修院對我最重要的意義，是讓我學到團體生活。因為我自小一個人長大……我小時候在香港很靜、很畏縮、很內向。但我去到美國，住在宿舍，在那裡我要求生……見到人就會談天說地，很能社交，街外人都能輕鬆交友，十足美國人一般，所以很多人都說我是「鬼佬」來的。我的成長、social learning [社會學習] 是在外國。我的作風、態度都是美國化的，我在香港沒有成長沒有社交。回到香港，很有趣的，我又變回內向畏縮。回到這個環境，見到以前同一批人，又記起小時候爸爸很兇，我就變回以前那樣。

所以在修院用膳的時候，人家談天說地，我並不參與，自願自吃飯。修院想趕我走，但是有一次吃飯之前，我到聖堂祈禱，有一個小時在修院的大聖堂祈禱，打開《聖經》就是看到〈若望福音〉，有個跛子在所羅門門廊那裡乞討，然後聽說水有神力推動，水動的時候第一個下去的人就會康復，雖然他一輩子都在水池附近，但沒有人抱他下去，所以從來沒有康復。然後耶穌路過，耶穌就醫好了他。

我用那段福音祈禱默想，然後我出來吃飯，突然有很多話說，爆炸一般，好像現在這樣，很活潑，完全另一個人一樣。本來神父都要與我約談，但見到我這樣嚇到「眼突」⁶¹。

⁶¹ 覺得駭然。

我真的是在《聖經》裡與耶穌相遇，就好像耶穌幫了那個沒人扶落去的人，使到他能再次行走。我就祈禱說：「主啊，別人談天我搭不上嘴，人們聊天又不會拋個話題給我講，他們談得這麼開心，沒有人想起我，水動的時候都沒有人記起我。」我讀《聖經》就是耶穌跟那人說：「好吧，那我醫治你吧。」我就全好了，不用離開了。

然而，孫神父意想不到當他完成修院神學課程之時，要面對被拒絕升神父的情況：

我讀完神學不能立即升神父。他們始終覺得我不適合做神父，這就牽涉神二那個暑假，修院安排我們去泰國，管理柬埔寨難民營。

在我印象中，當時修生之間弄得很麻煩。我們第一階段是去做清理難民營，很好的，收拾垃圾。我們站在垃圾車上面，每走過一個營，人們就剷起垃圾倒進來，我們便會踩住那些垃圾，甚麼都有的，屎尿都有，總之是不要的東西。我比較挑剔好乾淨，而我在那裡竟然可以站在垃圾車上，我覺得有很釋放的經驗，對我來說是很好的。

後來第二階段是探訪營友，好像社工般訪問他們，做些記錄資料。在我記憶中，或者那時候我是比較著重團體感。我跟伍國寶同班，兩個大師兄，一個團長一個副團長，但在這階段，我被拉下去，換了副團長，有一種政治的感覺。還有就是我割傷了，要去縫針。我在那裡很不開心。

據我所知，我後來得了一個 very bad report [很不好的報告]。結果呢？加上種種過去的事情，修院就覺得我不適合做神父。但沒有用簡單直接的說話來告訴我不適合做神父，只著我往外出住，找份工作，我美國人的性格聽不懂當中的意思。

那時有兩個神父很幫忙我，一個是耶穌會余理謙神父，一個就是瑪利諾會高培理神父⁶²，就是他們接濟我。結果我在余神父的青年職工宿舍住，每月一次見高培理神父，好像神師一般。

⁶² 高培理神父 (Fr. Vincent Corbelli, MM, 1934-) 1960 年晉鐸，1964 年獲派來香港，服務不同堂區超過六十年，2020 年退休。〈跟隨耶穌美麗的腳步 記高培理神父晉鐸六十年〉載於《公教報》，〈<http://kkp.org.hk/node/22224>〉，[21-4-2021]。

我大概工作了廿七個月，我先做工廠，包裝、原子粒裝嵌等……那時瘦了很多，因為人工又少，又要交租，由肥仔變瘦仔。但我那時是很開心的。

因為我們宿舍有六十人，日間上班，晚上我沒事可做，又沒有自己的家庭，他們很多人讀夜校，我又不拍拖、又不讀夜學。那我閒著做甚麼？結果我第二年就做了宿舍的主席，每星期搞很多活動，很像社工那樣。那個年代人們很多時要加班，但我放工後，很多人找我聊天，我做輔導員兼宿舍主席，我作為一個青年人，這麼忙這麼多人需要我，當然很開心。

我赤子之心，想著要體驗生活，當然要到社會的最低層。我在工廠做過，又在寫字樓做過。最「搞鬼」那時去做影印機推銷員，同事叫我去「沖涼」⁶³，但我從沒去。又試過有一個伯伯想做媒人，但我很清楚要做神父，所以沒影響到我。

我有一點是獨特的，就是我真的到了基層的職工宿舍，和他們一起住，他們很多都是大陸來的，父母都在大陸，有些是新界仔，但在九龍港島上班。我跟他們生活，融入當中，見識很多，跟他們打成一片，所以我沒有架子就是因為這樣，我也有一種低下層的角色，跟他們做朋友是平等的。

不過工人們會焦慮，要找出路，要想很多計劃，我就完全沒有，體驗不到這個。我從頭到尾都覺得自己很有保障，我從來沒憂心過自己的生活，從未為自己前途擔心。我根本只是找個工作去體驗。

一年之後孫神父回去修院，打算向院長報告實習情況，才明瞭到修院其實是要他離開修院。

我回去跟余理謙、高培理兩個神父說，他倆就說不行！余理謙很有社會正義感的嘛，他服務工青、還有儲蓄互助社、大專青年聯會等等，他要為我伸張正義。高培理也是，他那時是瑪利諾會會長，也覺得修院沒公義。總之他們為我出頭，令院長很生氣。

最後，院長就讓我去堂區實習一年，之後再檢討是否適合做神父。我記得是1983年10月4日方濟各五傷瞻禮那天，黃昏六時正，我按柴

⁶³ 桑拿浴室。盛行於八十年代的香港。

灣海星堂的門鐘，黎和樂神父⁶⁴開門給我，我就在那裡住下來。那時是石屋，第一年是住在樓梯轉角位的小房間。

孫神父在堂區的積極服務，大家有目共睹，從根本上推翻修院不接納他的決定。

黎和樂神父是我第三位恩師神父，還有關院長的弟弟關傑棠，他是副本堂。我在那裡做得很好，我一星期七天、廿四小時做全職修士，等待檢討升神父。我那時活出美國性格，很活潑投入，四處探訪、跟人聊天，很好的，到最後「細關」就去責備「大關」，為甚麼不讓我升神父。黎和樂很聰明，是很資深的神父，他不想自己跟「大關」衝突，就派副本堂去跟「大關」講，等他們兩兄弟商討。

還有很傳奇的，我是 1984 年 5 月 4 日升執事，本來我按《天主教法典》的規矩，執事要做半年，我應該要 11 月才能升神父。剛好我在美國的恩師 Fr. James Burke 6 月最後一個星期來香港跟善牧會講避靜，剛好 6 月 30 日他有空閒，再過兩天才離開，我就靈機一觸，不如我 6 月 30 日升神父！

我去申請，倒是沒人反對，所以我是香港教區做執事最短、只做了一個多月的人。

最終，孫英峰神父於 1984 年晉鐸，多年來服務不同的堂區，在港島服務十九年之久，現時為油麻地聖保祿堂區主任司鐸。

⁶⁴ 黎和樂神父 (Fr. Gabriel Lajeune, MEP, 1926-2018)，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早年在越南工作牧養華僑，1977 年來港先後在多個堂區服務，見〈黎和樂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https://bit.ly/3iy16F6>〉，[21-4-2021]。

林祖明神父



- 1976 進入聖神修院先修班
- 1977 聖神修院哲學部
- 1979 聖神修院神學部
- 1983 晉鐸

無心插柳柳成陰，天主教學校的氛圍，加上同伴的鼓勵，促成林祖明神父中學領洗，並加入聖母軍，開啟了他的聖召之路。

我在玫瑰崗學校讀書，從幼稚園讀到預科畢業，學校整個環境很有宗教氣氛，有獨立聖堂，每天有早禱，放學念經，《聖經》課是少不了的，聖誕聯歡會很是開心，還有花地瑪聖母敬禮。

我入學時不是教友，神父每年都會詢問哪位同學想學道理，我都沒理會。我為甚麼會成為教友呢？記得在中學三年級左右，有同學想學道理，但沒有人陪伴，問我有沒有空。我說好啊，就陪同學上慕道班，那時只需要數個月，很快的學成領洗，回想都覺得很「化學」⁶⁵。

因為加入了聖母軍，啟發了林神父思考自己的未來，並開始探索聖召的可能。

其後又有同學詢問我加入學校的聖母軍，我因放學後沒事做，就答允加入聖母軍的行列。我漸漸體會到聖母軍的服務精神，還有工作和祈禱。這令自己覺得將來畢業是不是要像普通人一般生活、組織家庭，勞碌過一生？

適逢那時學校舉辦「中國周」，使我開始思考自己的身分，中國的版圖這麼大，為甚麼我會在香港這細小的地方出生？現在又成為教友，在聖母軍服務。我感到生命不是偶然，那時開始想，天主為自己的生命是不是有甚麼特別的計劃呢？我如何去善用自己？自己怎樣可以回應祂呢？

後來我就開始想，做神父又如何呢？並跟學校熟悉的神父傾談，我向他提及自己的想法，他就說好啊，鼓勵我祈禱。那時候已經有跟家人說，他們當時還未是教友，當然不接受。他們說：領洗就領洗，做甚麼神父呢？所以之後都不敢作聲，唯有自己繼續探求。

⁶⁵ 兒戲的意思。

年多之後，見到教區有一個「聖召營」，就去參加看看。參加者廿多人左右。當時有不少的修生協助，今天我們都在教區共事。去了聖召營開始認識多些甚麼是神父、教區、修會。

預科畢業後有一段時間很清閒，有人介紹我去大澳永助學校代課。老師一般都在大澳找地方住。校長跟我說：「不用找，這裡有神父宿舍。」我就住在那裡。那裡環境很不錯。在大自然之中，內心那種接觸天主的機會多一些，很自然的，可以說那裡是一個轉捩點，完了之後發現天主的召叫很澎湃，之前又入過聖召營，出來之後覺得是天主的召叫。

林神父在大澳這數個月下了決心，家人不接受他的選擇，卻相信他的決定。

我那時也在考慮入教區，還是修會。入修會的話，因為香港沒有初學，就要往他處走。最後，家人答應，不過希望我不要離開香港。我說好吧，所以就跟聖神修院聯絡。

家人不知道甚麼是教會，但又讓這個兒子去做神父，某程度上他們也很相信我。他們讓我在教會學校讀書，雖然他們不是教友，但知道教會是善的，不會教壞人，你要信教就信吧，就是這樣的心態。應該是覺得我可靠吧，不會認為我是魯莽地決定而去做神父，就給了我這個機會。不過他們也說，不要強逼自己，受不了的話就回來吧。

我找姚崇傑神父，他說了一句話：「感謝天主」，就安排我去錦田八鄉找區成賢神父做一星期的避靜。在那裡度著類似退隱的生活；小石屋樓上有小聖堂可供彌撒、明供聖體和祈禱之用；晚上就在隔壁另一間小石屋睡覺……在矇矓中常感到有小爬蟲爬來爬去。日間，區神父叫我在農田間清除雜草，誰不知整天也一事無成，因為不能分辨哪些是菜苗，哪些是雜草，為一名城市青年來說，這種生活真難忘，講起來真的回味無窮。

新學年的九月，林神父正式進入修院。早年入修院，只帶隨身物品，林神父入修院的時期也沒甚麼改變。

我入住修院的時候，真的沒帶甚麼進來，只帶了一個袋，在修院有自己一間房，有床、書櫃、書桌。書櫃有一本《哲學導論》，是前人沒拿走的，就這樣開始了修院的生活。空洞的書櫃慢慢就越來越多東西了，最可憐就是搬家的時候。

那年，1976年，神哲學及先修班共有卅人，先修班有三人，有一名青年不久便離開了，剩下我跟另一位青年，就是今天的孫英峰神父渡過先修班。因為他入修院前在美國修讀了哲學，所以完成先修班後，就升上神學。往下的日子，就剩下我一人。

先修班的培育有靈修課、服務和祈禱，藉此分辨聖召。每天跟其他神哲學生共同生活，在起居中，最享受的是默默聆聽神哲學生在茶餘飯後的辯論，使我大開眼界，亦樂在其中。

為當時的修生培育來說，不像現在這麼有系統，有些少鬆散，七十年代的時候，很多東西都在轉變，那時修院還有三位小修生，都在考完A-level⁶⁶後就沒有繼續了。

我們神哲學修生住在現在的學院大樓最高的兩層，五樓（現在的聖神研究中心），就是哲學班與先修班，下一層就是神學班，外面有大廳和兩側的房間。現在變成了學院的大班房。

七十年代中後期，修院生活大概是怎麼樣的？

修院生活分兩部分，一是修院，訓練教區修生；另一部分是神哲學院，負責學術範疇。因為當時建立神哲學院是為了修生神哲學的訓練，不開放給外人及教友，所以會遷就修院日程。星期一二四五是上課日子，星期三通常是修院生活日；現在學院的安排也是這樣；星期三修院安排修生避靜、團體日和其他與修院培育有關的活動。

當時哲學是兩年。哲學部已得到羅馬宗座傳信大學許可，頒授哲學學士證書。今天若要有哲學學位就要滿全三年的課程了。當時，哲學教授大部分都是外國神父，瑪利諾會、耶穌會等。

昔日修讀神學學士就要四年，那時日間神學已經有教友來讀了，但為數不多。教友何愛珠小姐跟我也是同學，她成為日後香港第一位在非洲傳教的女教友。

其實在過去我的信仰生活都來自學校，雖然也有去堂區彌撒，但也是做一般主日教友，沒有堂區服務的經驗。所以對堂區是陌生的，所以修院當時刻意安排我多到堂區服務。

⁶⁶ 高級程度會考 (Advanced Level, 簡稱 A-Level), 當年中五以後需修讀兩年制的預科課程, 參加此公開考試, 作為投考香港大學的資格; 它有別於修讀一年制的預科課程, 作為入讀香港中文大學資格的高等程度會考 (Higher Level, 簡稱 H-Level)。

林神父對梵二前嚴格的修院生活都略有聽聞。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前，修院生活非常嚴謹，據聞長上不時會塗掉或者剪走報章某部分，他們覺得不宜給修生看。我對梵二會議結束後對香港教區的影響，所知不多，但都聽聞對當時修院的培育也有很大的震盪……到了我入修院那時候，已開始穩定下來，例如報章也沒有被剪掉和塗掉的情況，在周末回家與家人共聚也是自然的事情。

其實，我入修院那年，修院培育還是在摸索，但已因修生有不同的需要作個別安排。例如，我最初入修院時比較沉默內向，不懂表達自己。修院便安排我去上心理輔導課程，連續個多月晚上，我想這安排是修院培育的首次。

修院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隨著社會變化也開放起來。這樣開放的修院生活對修生培育也有好處。

據聞以前長上和修生用膳是分開地方，甚至飯菜也有不同。在我們的年代，這情況已不再，長上和修生漸漸在這方面也無分你我了。這便體現修院生活是塑造信仰的生活團體而設，建立兄弟友愛的關係，而並非寄宿地方。

我亦曾經在某個暑期，與幾位修生結伴，暢遊大陸的湖光山色，增廣一己見聞。現在長上也會讓修生間中出外辦理私人事務，做有益身心的運動，如游泳等。

修院的學術訓練在七十年代中後期亦更見有系統。

我進入修院的時候，修院培育已有系統，且在不斷在摸索中完善。始終修院生活是辨別聖召的時刻；修院團體成為塑造成熟人格的平台；還有修院的禮儀生活、靈修生活是為建立人與上主的關係，彼此分享上主在每人身上的化工；所以修院生活是為培育人的成長而設，而神哲學院就是處理學術的範圍。

神哲學幫助修生思考人生和理解信仰，對教會的神學有系統的認識和探討。七零年代初，大部分教授都是外籍傳教士，教學語言均以英語為主；漸漸在八十年代開始有海外讀書歸來的教授，廣東話授課便普遍起來。不過現在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因為要在頒授「宗座傳信大學」海外學位的事宜上，為符合香港和羅馬方面的要求，申請入學者是要有可符合入讀香港的大學資格，而論文試題亦要以英文作答，以方便宗座傳信大學的批閱。

林神父在神學生時期可以一嘗香港之外的體驗。

在修讀神學期間，有一年暑假，剛好楊正義神父的禮儀「師父」在菲律賓有個講座，他就帶我和麥景鴻去菲律賓聽課，當然包括探訪他們在當地的瑪利諾會院；特別去了位於棉蘭老島的會院，當地人民以信奉回教為主，感到當地氣氛的張力。在香港過的是太平盛世生活，很不習慣處處有軍警，而且不少房屋都有保鏢拿著槍枝守衛。總之這些是香港未見過的——原來世界可以是這樣的。

林神父回想他在修生期間或多或少也受到不同人的正面影響。

大體上人與人間是會互相影響的……例如有些神哲學的師兄，他們均會在閒談間，分享他們學習的心得。我讚嘆他們的口才、博學和熱誠——幻想將來自己又會如何呢？會不會有他們一半的才幹呢？

現在新樓學院的小聖堂，對上兩層就是當年我們修生居住的地方。我進修院初期，留意到有修生，每逢從外面回來時，路經小聖堂，皆會走進去向耶穌問好。我看在眼，放在心；從那時開始嘗試培養這習慣；所以，不同的修生，有著他們的特質，都是我學習的對象。

在錦田的耕田經歷，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修院地方很大，樹木花草很多，但仍有些地方空置著，好像浪費了，所以便嘗試開始種植——像沙律菜、蕃薯之類；收成時真的得到滿足和喜樂。

就在開墾地方時，原來有一番體會：土地就像一個人，要讓種子得到豐收機會，就要做事前工夫；除石挖泥鬆土，施肥灌溉；未被挖掘的土壤，常藏著無用的東西，而且土質常常堅硬，不能保存水份，更沒有合適的養料，不合種植。挖掘土地時才發現大大小小的石頭，就要下工夫把障礙清除。

這就跟培育和陪伴人成長的經歷相似，要把障礙他成長的石頭移除，細心鬆土，在合適的時候加上適當的養分，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耐性和關懷是少不了的成份。樹木如樹人，聖召的培育就是如此。對萬物是這樣，對世人也是如此。

林神父於 1983 年晉鐸，先後服務多個堂區，1998-2000 年擔任聖神修院神師，2001 年在羅馬宗座天使大學取得靈修學的碩士學位後回港服務，2009-15 年曾擔任聖召委員會主席及聖神修院院長。在楊鳴章主教任內，曾是四位副主教之一。

01



02



03



- 01 李宏基輔理主教 (坐)、明之剛神父 (後排右二) 及修院其他教授
- 02 神哲學院校董會會議
- 03 徐誠斌主教 (後排左三) 探望在羅馬進修之修生 (1970)

04 神哲學院的教授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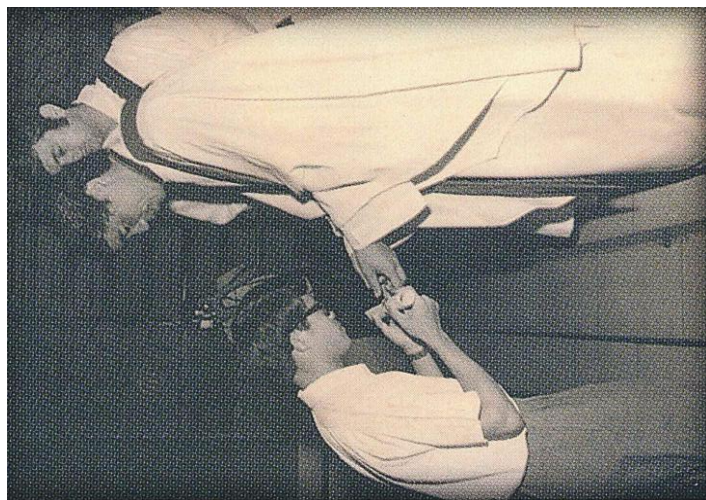
04

05 神哲學院迎新日



05

06 林焯焯署理主教頒發證書給當時仍為修生的李亮神父



06

1980s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期 1978 - 2005，2014 年宣聖）

胡振中主教（任期 1975 - 2002，1988 年擢升為樞機）

聖神修院院長

關俊棠神父（任期 1980 - 84）

林焯煒神父（任期 1984 - 93）

- 1984.9** 「中英聯合聲明」在北京草簽，胡振中主教發表有關香港前途之聲明。
- 1985** 胡振中主教應中國國務院宗教事務局之邀請，率領五人代表團訪問北京與上海。
- 1988.6.28**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擢升胡振中主教為樞機。
- 1989**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開辦專為教友而設的「夜間神學學位課程」。

導言

是項口述歷史研究計劃，研究時期雖然定為 1931 至 1980 年，然而神職培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藉著本章神父的訪談，從中可窺探修院培育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延續性。

在八十年代初，修院為了要培育一群切合時代需要的修生，曾經作出一個非常仔細和清晰的規劃，至今大部分的理念仍為聖神修院所採納，作為培育的藍本和大方向。當年負責規劃的大旗手是誰呢？

聖神修院從六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不經不覺已有超過二十年培育修生的經驗，在不同方面都隨教會的要求及社會的演化而蛻變及本地化。如果與昔日的修院比照，變化更顯得清晰與深刻，此亦是本章的用意所在。趨向現代的修院，在教學、牧民體驗、以至參與社會事務等方面，會有甚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簡單舉個例子，以往華南總修院的院長均由外籍耶穌會士擔任，但細算聖神修院由 1964 年成立以來，除了最初三年及六十年代末的一年由宗座外方傳教會士任職院長外，其餘均由華南總修院或聖神修院畢業生擔任，不但至八十年代如是，直到今天也如是。

至於社會環境方面，八十年代上旬的政治經濟狀況相對穩定，但市民大眾已開始面對九七回歸的討論。修院曾經因政治動盪而一批一批的把修生送到羅馬，這時又如何作出準備？上述的多個問題，就由三位受訪者為我們解答。



蔡惠民神父

- 1979 進入聖神修院先修班
- 1980 在聖神修院哲學部攻讀
- 1982 開始聖神修院神學課程
- 1986 晉鐸



從小在教會環境的薰陶下，蔡惠民神父在中學畢業後就進入聖神修院攻讀神哲學。

我自己本身在公教家庭出生，小學就加入了堂區輔祭會，所以每逢主日都在堂區幫忙、輔彌撒、參加一些堂區活動等等。先後就讀觀塘聖若翰小學和華仁書院，然後就入修院。

當時堂區是觀塘聖若翰堂，主要是一些美國外方傳教會，即我們叫瑪利諾神父管理的，所以我接觸的很多都是瑪利諾神父，全都是外國人。印象中他們很有熱誠來到香港服務，又很努力學講廣東話，以便跟我們溝通。

中學時，我接觸的主要是耶穌會神父，他們給我的印象都是老師和學者。

因為瑪利諾神父工作的地方都是集中在東九龍，都是一些貧困、或者新的徙置區域，這些神父又很盡心去幫助他們找學校、牧養等等。總之我當時見到他們很願意幫助人，受到他們的感染，就覺得他們這種生活方式很有意思……不知不覺中受到薰陶。

所以中學畢業的時候，一個階段完結，很自然就會考慮自己將來有甚麼選擇，我當時就有一個想法，自己都有這個興趣、這個召叫，就開始去接觸。

家人沒有很明確地支持或者鼓勵我，但沒有反對我入修院。他們並不明白，覺得修院這條路不容易、很難行，會擔心、關心我有沒有想清楚。

七十年代的修生，都已是成人聖召，修院設有一段緩衝期，讓有志入修院的人先接觸和認清路向。

我 1979 年正式進入修院，之前開始接觸修院，他們會跟你慢慢做辨別，甚至會邀請你去修院做體驗，不會貿貿然就入修院的。

當時修院整個培育為期七年，第一年是先修班，然後兩年哲學，四年神學。

初期入修院，當然很有新鮮感。修院是一個很神聖、要求很高的地方，無論是品性，還是靈性，都是要求很高。進去的時候會戰戰兢兢，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適不適應這樣的感覺。

當時神哲學根本不普遍，就算在教會裡面很活躍的，充其量就是投入去辦活動，但說到真正對神哲學很多認識或者很了解，我想對整個教會來說都是新鮮的事。

就是這樣，蔡神父懷著好奇忐忑的心情展開修院培育的生活。

第一個印象，修院生活就好像寄宿生活。七年裡有一個課程，要讀書，然後又提供住宿、團體生活，要跟隨這些生活規則；如果撇開靈性角度，其實就是一間寄宿學校。因為 seminary [修院] 跟 monastery [隱修院] 不同，monastery 就是生活的地方，你進去就在那裡生活了，不會有畢業或者時限。如果我入 monastery，是選擇了生活的方式；但如果我入 seminary 就是準備自己的一個地方，但我將來不是住在這裡，我準備自己是為了將來在堂區服務，所以那裡只是一個受訓、受栽培的地方，就相等於你想做警察要入學堂受訓半年，要上課，又在那裡住宿，有一種團體訓練這樣。

修院當然有些生活的程序、方式，這是一定的，有祈禱時間、早晚課、彌撒，又有團體交誼時間、運動、院務等等，當然也有個人空間，要讀書、做功課。團體生活那部分就是這樣，很多就需要在學術、牧民、靈修、實習、個人需要、興趣、團體、禮儀之間作出平衡。

星期六日會到堂區牧民實習，具體的安排是越低班，越多留在修院；越高班或者準備畢業的，實習的機會越多。從入修院開始幫助你內斂，然後經過一段時間培訓，就要準備出去了。通常到第六年 [神四]，就是執事年，有些師兄甚至主要是住在堂區，反而可能一星期才回修院一天，主要時間就在堂區做執事。

他們回來修院上一些最後期的課，做一些反省、掌握一些實際的技巧，可能是怎樣施行禮儀等，這些是你做神父的時候，要單獨去面對、執行的。其他的修生就只是暑假的時候才全日外出。平常就盡可能一個月內，只有兩星期外出，另外兩個星期留在修院。

人與人之間怎樣去深入溝通、彼此分享，其實沒有一定的訓練，是「人夾人」¹ 為主，當時修生廿多人，最自然的組合，或者感情建立，就是你的同班同學。進來修院，除非你真的不喜歡這個環境、很不投入，不然的話，你自然就會交到朋友，有些同學是特別要好，可以分享多一些的。

跟我同屆有三個人，但最後成功成為香港教區神父的話，就只有我一個。

修院自七十年代成立神哲學院以來，學術訓練與靈修栽培便有了清晰界線。

從 1970 年開始，修院訓練分了做兩部分，一是學術訓練，即兩年哲學、四年神學的課程。另一方面就好像一個住宿的栽培。聖神修院跟耶穌會、慈幼會、方濟會、澳門教區，五個團體一起合辦神學院，意思就是如果大家有學生，就全送到這裡讀書，如果有師資人才，亦都送來這裡，避免每個團體都開自己的神學院課程，攤薄資源，所以就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的出現。我是 1979 年才進去，基本上日間上課的部分，除了其他會士，其實已經有平信徒一起上課。不過課後，教區修生就留在聖神修院，其他人如果不需要這個團體，放學後就離開。

印象中，當年學院的教授都是以耶穌會的神父為主，因為聖神修院前身的華南總修院，基本上是教廷交了給耶穌會打理，而耶穌會事實上一直在這方面有比較多人才資源，所以我進去修院的時候，教書的教區神父其實不是很多。現在回頭看，正正在我讀書的階段，教區慢慢開始準備人手本地化。

老師都有自己的教學方法，不會很活潑、生活化、沒有活動教學，都是很歐洲式的講學。老師上課比較單向，比較理論。還有，可能梵二之前的神學表述都是形而上的，很著重概念原則，跟梵二之後著重本

¹ 意指人與人之間是否投緣。

地化神學有些不同。本地化神學意思就是嘗試用有血有肉的經驗去表述信仰。

然而教學當中也出現了較靈活的教學方法。

小部分老師開始有些「活」一點的教學方式，例如禮儀，因為牽涉到人與人的接觸，不是死的東西。禮儀是崇拜的行動，加上當時老師很有心，以一些活動教學方法，甚至是跨學科的，幫助學生做一些綜合。

我修生的時代已是梵二之後十多年了，當時我們感受最多、最直接的就是禮儀方面，因為這些最明顯、最快看到分別，還有效果是怎樣。當然更長遠的就是神學本地化、或者整個教會信仰本地化。

蔡神父稱在修院遇到的困難不是來自外在的，而是來自自己內在的掙扎。

困難不在於很多功課要做，要求很多那種外在的因素，我想是那種整合吧！我想說的困難是內在的掙扎。我當初想進入修院，或者我想像做神父就是某些形象，到我讀書多了，了解教會的歷史、文件、各方面的時候，才明白並不是我當初想像的簡單，這就是內在的掙扎，這條路是不是我應該走下去的呢？

另外一些困難就是我自己讀了這麼多東西，以前不知道的事，現在知道了，那我要怎樣去整合，意思就不止學了這一套東西，這套東西應該會影響我的生活方式，價值取向。這整合的過程中，有些發現原來做不到，這個理想很難做，我想每個人在這七年裡面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情況。

在當修生期間，蔡神父嘗試過兩次的海外牧民的體驗。

我們那個年代，神學生至少有一個機會到海外牧民。我試過兩次，一次是哲學二年級暑假，去泰東邊境的難民營服務。我們那次有六個修生，跟隨「香港明愛」到那裡做為期一個月的服務。由於語言不通，也不懂醫療救援，我們被安排負責營內的衛生打掃，每天收集垃圾。在烈日之下，工作雖然辛苦，但面對這些逃避戰火的難民，這是我們僅能提供的幫助。

另一次是神學一年級去馬來西亞，體驗當地香港稱為基基團的培育。因為馬來西亞是回教國家，基督徒人數不多且很分散，教會牧養方式

就以基基團來進行。神父只能一個月才去探訪一次，主持聖事及彌撒，平時教友就是聚會研經。表面上當地的教會發展受到很多限制，外籍傳教士也不容易進入當地傳教，這樣反而激發教友的主動性，積極參與教會的培育和福傳工作。

在修院七年間，蔡神父感謝眾多的培育者，並為他留下良好的影響。

大部分修院的神父對我都有深刻的影響：關俊棠神父、姚崇傑神父、林焯煒神父；讀書方面就有嘉理陵神父、已逝世的傅和德神父、楊正義神父等很多老師，我在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我那年代的院長主要是關俊棠神父，把他放回八十年代來看，他是很有創意的。他當院長的時間不是很長〔1980-84〕，但對於修生七年培育計劃，曾經做過一個很清楚的規劃，所以他後來雖然沒有繼續做院長，但直到現時修院的培育仍然大概跟他的規劃去做。

我入修院沒多久，他曾說：「真正的院長不是我，真正的院長是耶穌基督。」他一直提醒我們應該聚焦在甚麼事情上，入修院的目標是甚麼，耶穌才是這所修院的院長，或者處理甚麼問題就回到信仰去尋求答案。如果耶穌是院長，他會怎樣去做決定呢？

另外姚崇傑神父，一方面給我們很深刻的靈修經驗，同時也是很人性化的。靈修很多時給人感覺都是長時間刻苦、祈禱，但是靈修其實也在日常生活中，這種整合對我一生都有很大影響、很受用。

修院為神職訓練而言，是一個初步的準備，蔡神父認為要有持續培育的心才能面對世界的轉變。

在修院學習掌握的，都是教會基本普遍的教義，但世界不是單一的，具體的轉變、情況、挑戰，需要日後不斷持續反思及應用，所以自己一定要有持續進修的心。例如你會發現，不同教宗上任之後都有不同文件、新指示，這些就是因應社會轉變，教會作出一些適時的指引、訓導，我們就是需要這樣去學習。我讀書的時候想都沒想到會有新冠病毒，竟然沒有公開彌撒，那時讀書根本預視不到這種情況。面對這個環境便要反思，參考資料，看教會傳統裡面可以怎樣面對呢？

蔡神父認為，神父的日常工作涉及行政，但在修生的培訓中，似乎欠缺管理的知識。

神父給人的形象最重要是有靈修，對人要友善，有愛心。這些先入為主的形象在我們腦海之中，但在行政管理方面，就沒有得到重視，或者不知道怎樣做好管理的工作。可能我們過往很強調做神父就是做牧者、做好人、做一個有靈修的人，但很少強調管理的角色；加上有些學生根本就沒有興趣，又或者管理其實就是處理人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很麻煩，便攔在一旁。

如果教區神父兼負行政職務——校長也好、本堂也好、機構主管也好，是無可避免的話，其實我們是需要認真看待的。方法不是在神學院裡加一項「行政管理」的科目，而應該在修士的培育階段，開始加強這一方面的要求，甚至要釋放一個很強的信息：做神父不是只懂祈禱就可以，也應該要懂得組織帶領團體。如果你是堂區神父，那麼，堂區大大小小事務，你也得關心，也有人行政的事要處理，有些事情你要跟大家交代，你要面向群眾。

院長各有風格，會否影響到培育的一致性？會對修院帶來不同的面貌嗎？

無論院長是誰，教會對神職人員的期望，都是客觀一致的。至於院長不同的風格，可能只是不同的表達方式來切入而已，比如有些院長比較嚴肅拘謹，沒問題的，可能對於整個修院來說就很井井有條。那種表達方式是有規有矩，但不代表人與人之間的彼此關心會變得冷漠。有些院長外在不拘小節，或者神父修士之間關係打成一片，但不可能會把修生教到沒規沒矩，不懂得尊師重道。

蔡神父於 1986 年晉鐸。在北角聖猶達堂服務兩年之後，1988 年赴羅馬修讀神學碩士課程，1991 年再赴羅馬修讀神學博士。

當時教我的老師大部分都是耶穌會的外籍神父，但很多都年屆退休，所以可能當時教區已經做準備，揀一些適合的人去讀書，回來接手神學院的工作。

我 1993 年底回港，一直就在修院或神學院工作。星期日則到聖本篤堂幫忙，直至現在都是。修院方面，我曾當過副院長。在神學院我就做校長、主任等。

陳德雄神父

- 1981 進入聖神修院先修班
- 1982 在聖神修院哲學部攻讀
- 1984 開始聖神修院神學課程
- 1988 晉鐸



人稱「大眼神父」的陳德雄神父，家裡是老教友家庭，中學時代參加過學校的聖母軍，亦投入於堂區生活，但直至投身工作後也不覺得自己會做起神父來。不過一次為敷衍副本堂的邀請而參加了堂區的聖召營。在第二天的彌撒裡，出現了他人生的轉捩點。²

我記得爸爸去世時候，我只是流了幾滴眼淚，男人大丈夫說忍就忍，但是那一次我竟然控制不到自己的眼淚，由懺悔禮那一刻直到彌撒完結，都未有停止！

我看到自己不像一個教友，我看見自己的罪。但同一時間我又感受到天主的愛。我就是在這十秒八秒真真正正直接感受到天主的愛！

陳神父在聖召營之後第二天上班，但食慾一天比一天減少。

我每天都渾渾噩噩，覺得自己好像站在十字路口，要決定下一步是向左走還是向右走。我想如果再不決定，我就會死。

為了解除心裡的疑惑，陳神父不斷祈禱，而且找堂區的本堂神父和副本堂傾談。

聖召營五天後，我就決定去馬！一下子決定了之後，我的食慾就回復正常了！

當時父親已經離世，陳神父告訴母親自己入修院的意願時，她就說：「都預了。」

她為甚麼已經預了，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在教會參與的事情太多。我有八兄弟，兩姊妹。媽媽說有那麼多兒女，讓我做神父也無所謂。

我的年代開始，入修院的要求至少是中六程度，工作過兩三年。我是做銀行的，做了五年。修院通常是九月開學。當時我是早一年的十月

² 陳德雄神父訪問的部分內容，來自香港教區視聽中心2012年3月23日上載於Facebook專頁的口述歷史訪問，已徵得視聽中心及陳神父同意使用。〈口述歷史·陳德雄神父〉，教區視聽中心網頁，<<http://hkdv.com/historial2/chan02.html>>。

左右申請，要去聖召營，就是給那些有興趣進入修院的人。換句話說，從正式入修院之前的大半年時間，是有些人一起的。

在那個營的，肯定有李志源。有沒有倪德文、馮賜豪，我不敢肯定。他倆比我遲一點，晚兩年才進去。另外也有一個是同期的。

陳神父於 1981 年進入聖神修院。對於一個已在社會有一定工作經驗的年輕人，會出現不適應的情況嗎？

沒有甚麼大困難的。已經有準備，也懂了一些，要祈禱、要早起床、要早些睡，團體生活那些，沒甚麼難適應的。那時又可以一個月回家一次，不讓你留在修院，要回家，覺得你應該在假期回家陪一下家人。

我進入修院時有十四人，離開時也是十四人左右。中段曾試過有廿四人。因為我進去兩年後，有一班九個人進來，七個是本地，兩個是澳門。我進來時有十四人，再加九人已經是廿多人了。

澳門修生培育一直都在香港。他們人少，培育不好做，所以就到香港。後來到神學時，也有些墨西哥外方傳教會的來這裡讀書。

從陳神父的憶述顯示，修院生活的規律相較早期似乎變化不大。

讀書、祈禱、早禱、晚禱、自己個別祈禱、彌撒，還有上課及院務，每天早上都要上課，下午有時也有課堂。然後每天到下午四時左右就有不同的院務工作，清潔宿舍、洗廁所等。又規定要運動，主要是踢足球。

神師是姚崇傑，他負責修院整體的神修培育。他會接見我們，但我們也可以選擇見另外的神父。例如辦告解，你不想找修院的神父可找另一個神父。在修院有神師訓話，給你一些提醒。個別培育導師又會找你聊天關心你，作靈修的個別指導提醒。

院長的角色是有關整體的培育，會看看你是否適合做神父，與其他人關係如何，讀書又怎樣。院長會叫我做「死仔」。「點呀？你個死仔。」院長叫我的「花名」，不是叫我的真名。院長叫我做「大眼修士」，反而有時記不起我的名字。

我在修院已經「沒大沒小」。經歷了三個院長，曾慶文、關俊棠和林焯煒。我那時不一樣，因為我經常與他們說笑。林焯煒不苟言笑，正

正經經，只跟我說笑。他在修院的時候叫我做陳修士，叫的時候「笑笑口」。但他叫其他人是叫名字的：志源、德文。若其他人叫我做陳修士，是會被人罵的：「陳修士是你叫的嗎？是院長叫的。」

除了學術上和靈性上的培育分別由神哲學院及修院肩負，陳神父指出，長上也關注修生人際關係的培育。

聖召各方面的培育，知識層面的，都是在學院那邊學的，像技術上怎樣舉行禮儀，關於聖事、《聖經》的知識等。而精神上或心態上，我們開彌撒要怎樣，做神父又要怎樣，這些可能就會在修院神師訓話、院長講話的時候說。

修院的培育主要是學習怎樣與人相處。修院在我們的年代，就算有足夠的房間也不會讓你入住單人房，而要與其他人一起。先修班第一一年要住大房，有三人房，四人房，九人房。過了一年後，每年要選與一個人「孖房」³。「孖房」的人不可以是同班的，也不可以與前一年的一樣。如果你曾與他同房，你要選另外一個。我猜它的作用是讓你適應與不同性格的人相處，學習遷就。

其實沒有多少人可以让你選，但就不想硬性規定你與誰人同房，給你一些空間去挑選。如果那麼多人你都選不到，你就活該了。如果那麼多人都沒有人願意與你同房，你也活該，自己應該知道自己有甚麼事。

同學中當然有些不大喜歡的，一定會有「難搞的」⁴，有些人一定會亂講說話，有些性格比較奇特，難相處一點。

這種安排不錯，你將來升神父不會與其他神父同房，但在生活上有很多事情要與人相處和遷就，都是學回來的。不過，如果你沒甚麼問題，沒有這些培育也不會有問題；你若有問題，有這種培育你也會有問題，會有這樣的可能。

升神父之前，長上都有會見修生，要寫報告。培育團內部會商量，讓修生升還是叫他走。

³ 兩人一房。

⁴ 難相處的。

關俊棠神父當院長的年代，引入一些中國文化的學習，也要認識其他宗教。

他找老師教我們書法，又教「四書五經」。我們甚麼都讀，《詩經》、《史記》、書法，「知少少扮代表」。每年大假、長假期，要寫中國名著的讀書報告。

學院也會學佛學，只是一點點不是太多。我們要認識其他宗教。

修院每年暑假都安排修生到不同的組織和機構體驗實習，接觸教會和社會。醫院牧靈此時已成為必做的項目，藉此讓修生認識自己。

那時每年暑假我們都要做培育，即實習。不同的年份有不同的學習，可能會就著你缺少甚麼就給你甚麼。你可能進修院之前缺少堂區的生活經驗，沒有參加善會，便安排你做堂區工作。雖然我有很多堂區工作的經驗，但我有兩年都獲安排做堂區工作。

我也有安排做外展社工方面的工作。資深的外展社會會與你分析和分享青年為甚麼會流連桌球室、球場、沙灘等地方，還有青年文化，社會會跟你說；我們的教會，要透過那些工作去認識青少年，認識社會。

另外有一年去醫院做醫院牧靈。醫院牧靈也是幫你認識，第一是認識自己。病人的反應會看到你自己內心的狀況。舉例說，你見到一個青年人斷了腳，覺得他很可憐。為何你覺得他很可憐呢？因為你覺得，如果你斷了腳你都會很可憐。病人是一面鏡子，一來透過課程多些認識自己；二來我們也多認識到病人是很辛苦的。我最記得我當時跟別人說：「你知道男人中風比女人中風淒涼很多嗎？」特別是我的年代，因為男人要養妻活兒，他的價值就在於工作。他中了風不能工作，就沒有了價值。若家人少去探望他，就會很敏感，覺得自己是不是沒有了價值？所以我覺得男人中風會比女人更慘。現在這年代不是了，男女都一樣。

還有一年是做勞工的事情。我扮作暑期工去做包裝工人。好像還有一整年每個星期外出認識社會，由導師帶領我們訪問不同的議員、NGO、關心社會的團體。我們那時多樣化一些，現在好像沒那麼多。認識社會後，要在暑假的時候寫報告。

梵二會議使得教會出現重大變革。早在進入修院之前，陳神父在一些領袖訓練課程中已對梵二和教會有所認識。

那時的拉丁文已是選修，是學院的科目，我之前的年代是必修的。

我認識梵二，認識教會，主要是在進入修院之前，七十年代末在教友總會參加領袖訓練課程，都有數十人參加的，說很多梵二的事。我記得駱鏗祥、徐錦堯、鄭生來都有做講者。那個課程很長，好像是一年的。因著那個課程，我覺得我對教會的概念、教會觀、教會是甚麼，已經有一個比較 update [新] 的態度和看法。

以前的年代，教友是很單純的，做聖母軍，做服務，對於教會的事不是很清楚，也不太理會。參加一個善會，做一個善會教友，不會理會很多堂區、教會的事，所以當時不太知道甚麼是梵二。在過程中，學到的東西也不知道與以前有多大分別，以為是學一些新的事物。

七年的修生生活，令陳神父最難忘的莫過於與修院弟兄玩樂的片段。每逢修院砍枯樹的時候，修生們都會用燒枯樹的灰燼煨雞、栗子和蕃薯。

難忘的事都沒有比玩更難忘。玩得很「離譜」的。

每次有修生生日，我們都會送份「大禮」給他。就是趁他不知道的時候，將鹽塞進他的牙膏裡面，牙刷就浸在鹽水後弄乾，等他睡醒刷牙時幫他提一提神！有時，我們會將蛋糕上的士多啤梨切開，把辣椒的種子放進去，然後再用蛋糕的忌廉把它們重新黏在一起。通常蛋糕上的士多啤梨都是給生日的人品嚐的！

院長有兩句話也使陳神父至今難忘，但並非開心之事，甚至曾令他憂慮是長上暗示他要離開修院。

我可能比較難瞭解一些，院長有一次跟我說：「我們培育團每一個人都不都很瞭解你，不知道怎樣幫助你。」這一句是我經常記得他們說過的話。我就想，他這句話是甚麼意思？是想我離開嗎？但他又沒有說我不適合。我有和神師說過這事的。後來我想一想決定：修院要我走我便走，如果不叫我走就不走。

第二句最難忘的是……我們不是很勤力的學生，不是很用心讀書，臨急抱佛腳。有次考試前我把一大疊書放在桌上，坐下來比我還要高。院長看見就跟我說：「那些師弟見到你一大疊書放在枱面，說覺得很

害怕。」他說我嚇壞他們。我只是讀書罷了，我覺得這肯定不是我的問題，是他們的問題。院長跟我說這話，是院長的問題。

可能是個性使然，陳神父在修院未有感受到誰對他有最大的影響。

沒有，沒有誰。我不太受人影響。如果說無形中受了影響就不知道了。曾慶文擔任神哲學院院長的日子比較上短一點，好像兩年便到關俊棠。關神父任期比較長一點。關神父的說話很吸引，是否有這樣的影響呢？如果說是人的影響，就沒有了。

有別於早年一些神職從小修院至大修院多年一起成長的經歷，陳神父視修生的團體感是大家日後互相支持的動力。

修院培養團體感是因為大家將來成為神職班，這是其一。其二是作為一群志同道合的人，這是互相支持。一個團體將來的弟兄都要認識，未來在教區裡面一起工作。

修院的團體感其實也不是很強，只是一起生活、吃飯、運動，也不是經常一起玩，一起聊天。與誰人熟稔一些也是很個別。現在離開了修院到堂區，與其他神父一起分工合作去做事，神父有自己個別的聚會。

例如：我們每個月第二和第三個星期三也有神父聚會。你可以選擇來不來。每月第三個星期的「國籍司鐸協會」聚會，很多年了，也不是每個人都來。有一批經常來，有一批經常都不來，有一批是有時來有時不來。另外，每月第二個星期有個叫「青鐸」聚會，是劉德光年輕時候開始的，現在主要由我負責。有時我們會討論一些嚴肅的話題，也有輕鬆的話題，聚會前後又會聊天。我們之後有一批叫「青青鐸」。他們年輕一點，我們是「老餅」⁵。他們也有聚會，但不是那麼定期。

八十年代香港踏入回歸祖國的前期時代，經濟起飛之餘，漸見人們關注政治議題。

香港八十年代的社會環境不錯，當時剛好經濟起飛，是經濟最好的時候。我以前做銀行，我最記得，那時利息不錯。離開銀行的數年之後，「簿仔」⁶利息仍很高。

⁵ 年紀大。

⁶ 銀行存摺，或稱存款簿。

當時社會已經有了民主派，已經有了高山劇場那些社會運動⁷，有些神父也會參與。

我記得在最後數年修院開始講及九七⁸的事。我是88年升神父的，所以是早一兩年左右開始講。修院請一些人回來講話，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說，回歸之後一定會收緊教育和傳播媒介。這個概念為我是很強烈的。在修院那時，我覺得這個思想已經開始孕育。是不是修院的講座或者講話時引發出來，我不敢肯定，但肯定是在修院的時候。大家討論中已經知道會收緊這些事。現在教育及傳媒收緊，其實我在修院的時候已經預料了。

陳神父於1988年晉鐸，三十多年來曾經在多個堂區服務，現時為善導之母堂的主任司鐸。他為人風趣幽默，興趣廣泛，包括寫笑話、製作聖像畫和小禮品等，並曾出版《真人真事真笑話》。

⁷ 中英政府於1984年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1984年9月，有八十九個團體集會於土瓜灣「高山劇場」，要求漸進「還政於民」。

⁸ 指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

李志源神父



- 1981 進入聖神修院先修班
- 1982 開始聖神修院哲學課程
- 1984 在聖神修院神學部攻讀
- 1988 晉鐸

李志源神父自幼接觸基督新教，對信仰已開始萌芽，而由於家裡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故可以自由地選擇。直至升讀天主教中學，看到來自意大利的傳教士校監，受他的犧牲精神感動，並在一個契機之下慕道，從而展開了他的修道之路。

我的第一個聖召是天主先召選我成為天主教徒，自幼與基督徒鄰居常去禮拜堂，參與主日學及團契。但由於家人沒有信仰，亦沒人催迫要接受洗禮，一直都在尋找上主。有幸當年插班天主教福德小學，在那裡對天主教產生好感，尤其在玫瑰月，學校安排其中一堂去念玫瑰經，那次經驗令我感到很舒服及平安。

及至升中派到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首次近距離接觸到校監雷志遠神父⁹，內心不期然與我過往認識的牧師作比較。雷神父漂洋過海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傳福音，更是獨身無家庭之顧慮，可以全心全意全力為主服務。

在中三那一年，學校有一個特別安排，凡想慕道的，可以在聖經堂去另一個課室學道理。由於想逃避用英語上聖經課，我便選擇了慕道班，當時由達碑立神父主講。1970年，經過一年慕道，並在家長同意下，我便在聖母領報堂領洗，開始做一位「主日教友」。

中學畢業後，便在電子廠工作，工餘時間有機會投入堂區善會，慢慢變得積極和熱心，信仰生活也豐富了。年紀漸漸長大，就開始思考自己未來的人生大事。當時亦沒有向任何人或神父提及，故沒有人幫自

⁹ 雷志遠神父 (Fr. Luciano Aletta, PIME, 1910-2000)，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1934年晉鐸，同年來港，早年在廣東海豐縣傳教，直至1952年被逐離，回港在堂區服務，並在港逝世。見〈雷志遠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https://bit.ly/3CDoGpx>〉，[21-6-2021]。

己去辨別聖召是甚麼一回事，更遑論作出決定，唯有向上主祈求。當時得悉去到一間新聖堂，可以作三個祈求，修道聖召亦成為必然的意向。

我自己考慮有三條路可走，第一是獨身生活，第二是婚姻生活，第三就是修道生活。以排除法去尋找人生的方向；嘗試過拍拖，但之後心靈仍感有所欠缺，所以嘗試去尋找聖召。想到入修院要繼續讀書，我年紀大，記憶力減弱，讀書會有困難，於是催迫己要做一個決定。

他回想第一次到聖神修院避靜，卻遇上身體不適。

那一次，因為是新年期間，公司放假，我就自己一個人去避靜。我自幼有哮喘，怎知去到修院就病了，還記得當時孫英峰修士帶我去黃竹坑看醫生。那次因為選擇是個人避靜，沒有找神師輔導，在修院體驗了兩天。傳說中，如果在修院生病就是沒聖召。那就糟了，是不是天主預告說我不行呢？第一次在修院的經歷，以為自己沒有聖召，便放下了。

我也曾參加過慈幼會孔志剛神父帶領的三日兩夜聖召營，但過後不了了之。最感疑惑的是，堂區前後兩位本堂神父，年紀都不輕，卻先後「還俗」，對正尋找聖召的我產生一種疑惑，心想「有人辭官歸故里，我卻漏夜趕科場」，究竟是否錯誤的選擇呢？

及至 78 年，教區派了關傑棠執事到堂區，堂區整個景象起了變化，變得活躍起來，又重燃我對聖召的渴求；更遇到修院開辦信仰生活營，他們招募的大多數是在職青年，他們曾在社會中工作過，可能成熟一些。還有，他們盡量找那些之前參加過聖召營的青年，逐一打電話去聯絡。我起初亦因堂區事務一次又一次的推卻。難得的是當時陳國輝修生，不厭其煩地致電向我邀請，感到盛情難卻，勉強地答應安排出席一次。

天意就是天意，由那一次開始，每月首主日都會去修院參加。如果他不再打電話來，我大概會當沒這一回事了，故事可能會很不同，不知道會變成怎樣，所以這是最關鍵的。

信仰生活營由副院長梁達材神父及那時先修班的修生負責，每月第一個周末就去修院「過夜」。星期六去，星期日下午離開，每次至少有

十幾人，令我發現原來自己不是孤軍上路，有很多有志青年都想回應聖召。

生活營多是靈修培育、信仰分享這些，尤其是梁達材神父，他是 Focolare 普世博愛運動的熱心成員，「聖言生活」那種方式，有祈禱、彌撒、念玫瑰經、朝拜聖體，很寧靜，很舒服。幾次之後，他們當然想知道誰有意思入修院，便一直在談、一直在想。

聖召營大概 9、10 月開始，但最初兩次我沒去，所以算起來我應該是 11 月才加入，直到復活節後，梁神父就開始問每一位參加者，是否有意入修院。最後在梁達材神父的鼓勵下，作出了人生最大的決定，入修院潛修而有今天的我！

在幾經掙扎下，終向家人表白要入修院；家人沒有給我太大壓力，只是為我擔心，怕入到修院要捱苦，會堅持不了，到時離開修院便會很丟臉。

最後李神父於 1981 年入讀修院先修班，當時他二十五歲。

第一年是淨化我們，因為我們在外面打滾了多年。我們三個新入修院的，真的打工起碼六至八年了。陳德雄神父就是讀完預科出來打工的。

那時副院長梁達材神父專責先修班。神哲學院和修院已各自獨立運作。曾慶文神父做學院的校長，修院院長是關俊棠。

先修班一般的生活節奏，有兩天會到安老院做服務訓練，做的服務也是基本的清潔樓層及房間。以往有些修生幫老人家洗澡，但我們那一屆沒有，星期一、四過去洗刷房間，把床搬開，擦地、掃地、清潔，做完之後就洗刷走廊，然後回修院吃午飯。看似很容易，但那些長者的唾沫及尿味，亦實屬難以忍受。

其他時間都是跟修院時間表，比如說運動，星期二踢球、星期四是院務，這都是與其他修生一起的。另外，梁達材神父經常帶我們出去探訪，也會請一些神父修女跟我們做講座，與我們先修班分享，內容與信仰有關，大多數是靈修方面的。

81 年的時候，其實修院修生都不算太多，大概八個。林祖明神父當時是最高班的，他下一班應該是麥景鴻神父，還有葉祿標、張志堅、蔡惠民，接著就是陳國輝、方浩為及澳門教區的吳家聲。與我同班的

有陳德雄、何小強及澳門的歐陽澤光。之後有更多的青年加入修院行列，尤其澳門教區的也有兩三位修生，團體相當熱鬧。

關俊棠神父任院長的時候，除了基本的修道生活，他還很注重中國文化，拓寬修生的知識面。

關俊棠神父以國學、中國歷史這些培育我們。我們進去那一年，他為先修班請來老師教我們普通話、寫書法、《論語》、《詩經》，星期六還特意找師父來教我們打太極呢！

他很喜歡中國文化，特地找了一位大陸過來的講師教我們中國近代歷史，由 49 年之後中國的歷史發展。只在他做院長期間有這方面的培育。時間很短的，一兩年左右。

我與另一個同學英文不太好，星期六又找一個英文老師幫我們補課。初時是一位修女，後來修女沒空，就找了另一位老師。

我記得也有老師教我們學管風琴，有興趣的就跟他學。因為也要服務修院，剛好我又有車牌，有時便輪流做司機。第一年的生活就是這樣。

修院都是讀教會傳統那套士林哲學，當然科目也多，例如林仲偉神父教哲學史；Fr. Casey 教形而上學 Metaphysics，嘉理陵神父主要教與哲學有關的邏輯，龍厚榮神父的 Philosophy of Man [人的哲學] 諸如此類，白神父的倫理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等。劉健教授就教中國哲學，還有一科就是佛學。所以基本上這兩年的課程相當豐富。

我當年讀書就一定辛苦，因為哲學這一門，除了 logic 這一方面中學讀過，有些興趣之外，社會學也有些興趣，其他那些形而上學、Being [存有]，真的是「一嚙雲」¹⁰，也很辛苦，哲學史那些也有完全不明白。當時又沒有電腦，用打字機打論文，打錯了又不能改，要從頭再打。

試過有一次，Fr. Casey 教 Being 的時候，他畫了一個人頭、一隻狗、一棵樹，接著問我們問題，幾個人都答不到，他生氣得走了出去。當然，他還是會回來的，從頭再教一遍。後來當然就明白了，相對於一隻狗或一棵樹，人跟它們屬於不同類別，更讓我們明白不同的存在，

¹⁰ 不明白，不瞭解的意思。「一嚙雲」是常見借字，正寫為「一泉雲」。

由這些所謂細 being 去到大 Being (即天主) 的存在。這些知識回顧起來，也挺有趣的，但經歷好不容易。

接著讀神學，你說難不難呢？其實不是不困難，但困難得來很多是我們似曾相識的，過去也一向有接觸禮儀、《聖經》。讀起來就不覺得枯燥或者太難，所以分別在這裡。

整個神學課程，我覺得就是著重理解與反省。我以前也曾試過寫一篇論文討論修院培育，就是說整個修院的培育裡，那個學術方面，欠缺的就是一些牧民反省。因為我有很強烈的感覺，他們只是著重教學，我覺得太過學術性，但進修院不單是為了學術，還要牧民反省嘛，但這方面，教授很少跟我們做。

我們沒有牧民經驗，教的時候只是知識層面，認知上是有的，但進一步與實際牧民方面的關係是欠缺的。現在我知道後來的修生，他們在神學課程中有一整年外出做牧民，然後再回去讀一兩年才畢業，那時候我們沒有。這也是好的，因為多一些牧民經驗來反省。

從李神父的憶述，修院團體生活的樂趣，蓋過讀書的所有困難。

在修院團體裡，大家都是同道人，當然有不同性格，這也是一種磨練、學習，但是一般關係都不算差，特別我那個年代，所以氣氛是不錯的。但說及私下的交情，就比較個別，有人好動、有人好靜，例如麥景鴻神父就比較喜歡獨個兒在活動時段跑步，大夥兒就圍住踢足球，各自照顧自己的需要吧。閒時亦會一起打籃球、踩單車。當你認真起來，踢足球就一定有一些意見，一定有衝撞，一定有爭吵，其實沒事的，所謂爭執都是一時的，不會放在心裡。

團體生活真的是美好的，有時一起外出遠足、旅行，試過一次我們修院整個團體到大尾督踩單車、燒烤、玩樂、划艇仔，那時副院長是閻神父。他又很愛玩，那次最有趣的是甚麼呢？活動完了，他說：「不回去吃飯好不好？」當然好啊！他接著就說：「身上有多少錢？通通繳械清袋！」我們便說笑道：「下次再與閻神父外出，身上一毫子都不要帶。」很多趣事的，一點都不悶。

那七年很開心，尤其是我班的陳德雄（陳大眼），有他的地方肯定不會悶，我們也常說那七年不是去讀書，是去了玩樂，有很多有趣的事做。一鋸樹就很開心，因為可以煨蕃薯、栗子，甚至煨雞也有。

我又有養白鴿，做了個白鴿籠，後來因為很多蛇，有些被咬死了，無法養。蔡神父養兔子，兔子死了之後就火葬。他又喜歡養魚，培育錦鯉，不過有一次被人從後面山的通道走入魚池。他們偷錦鯉又不是整條偷走，竟然是割開魚肚取走魚卵，魚就留在那裡。那兩天就初試薑蔥炆錦鯉！

到了八十年代，教學語言由往昔的拉丁文，轉換成主要是英語，更有華人教授選擇採用廣東話，本地化的趨勢基本成形。

我的年代很多科目都以英文教授，教授們多是說英語的。拉丁文也要學，四個學分，那時是嘉理陵神父教我們。他以《新約聖經》教我們學拉丁文，很用心教我們的，讓我們容易一些；不是純文法的學習，算是學過，知道甚麼是拉丁文，但不是很深入。

本地化這樣的模式去學習是容易一些，容易看、掌握和理解，有中文就更好，更方便我們。例如吳智勳神父教我們的倫理神學，他也是用廣東話教授，變相我們更容易理解。

第一年暑假已能離港出外做牧民訓練，令李神父感到很幸運，而相關的訓練能配合對八十年代社會的認識。

我覺得那個訓練是很配合我們那個年代，特別是先修班完結那年，我們很幸運，幾個修生和幾個教友一起到尼泊爾做體驗，那個經驗很好。我們第一年已經有機會去，平常很少安排的，一般兩三年後才去。

那時瑪利諾會在尼泊爾不同地區有些中心，稱為 Hands Centre，主要照顧自閉、弱智的小朋友。我們就到不同的中心參與和體驗，又到一個村落幫忙，重修一間學校校舍，我們平整了一塊地讓他們做活動，有幾個負責房間重修，很有系統。

接著下一個暑假就到「明愛」實習，跟那些社工工作。每個修生的經歷都有些不一樣，我那時有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外展 outreaching 到新蒲崗東頭邨。剛到的時候，那個計劃快結束了，跟了一半就轉了另一個項目，是社區發展 community development。這個訓練對我有甚麼幫助呢？就是當我其後到堂區工作，我第一時間是視察整個社區，瞭解與認知社區，這是挺有用的。

另一年暑假就到基督勞工堂，暑假結束之後接著每個星期六日也去那裡，是一整年的牧民訓練。

我們曾跟隨那時黃大仙的盧匡平神父去做基基團的領袖訓練班，也試過由張家興先生帶我們去做社會分析，那次是我們三個同屆修生及三位寶血會修女一起的。基本上我們那幾年的牧民訓練就是這些，直至升神父就到堂區了。

成人聖召一般都要求準修生有一定的工作經驗，李神父認為這有助聖召來源更穩定，也更有助他日後處理各式各樣的工作。

有社會工作經驗的基礎是重要的。進修院之前做過幾年工作是真的有點不同。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因為有了工作這個過程、經驗，起碼知道、明白事情，有同理心，有深刻的經驗，與別人灌輸給你的不同。

例如：中學時我需要四處找學校，很痛苦、徬徨和無助。因為我經歷過，所以現在如果有人找我幫忙，我是很願意的。

尤其是我做過工廠，基層出身，明白民間疾苦，明白社會的需要。修院給我們是信仰神學方面的訓練，如果沒有這些社會經驗，單靠那些，我覺得是稍有不同的，你看事情的觀點，不會只站在教會角度來看。

成人聖召相較於往昔，最大的不同，是動機不一樣。以前父母送子女入修院……再後來的時候，好像我們工作過的，就有得選擇，自己選擇要走的路。我們的年代自然會少一些人。

以前年代的修生他們沒得選擇，都已經定了行車線，沒得選擇的自然不會選擇。而我就多了個選擇機會，是不同的。當你知道這是你的選擇時，就會認真負責了。是你的選擇，沒有人逼你，家裡沒逼我，他們不反對，我已經很感恩了。沒說哪個好、哪個不好。用數據分析，當然是小修院成效低一些。

院長和神師都是修院非常重要的人物，李神父認為後者對他影響力較大。

影響最大的是我們的神師。院長是有影響力的，但每一位院長都很忙，真的很忙，身兼多職，好多時都不在修院。我們那時候有些微

言，一年才見我們一兩次，跟我們談談天。正式那兩次，看看你的成績怎樣，其他時間都很少接觸到。

神師因此就很重要了，我們那時很幸運……特別是姚崇傑神父是我們修院神師，他很有經驗也很好的，很明白我們。明白甚麼呢？有一次我們學期末考試，修生們溫習壓力大到要發洩。有一個晚上，某修生一時興起，叫大家到球場踢足球。我們嘈雜起來，姚神父就出來看看，也沒說甚麼，沒責問，只看著我們搖搖頭，便回房間。我們就「識做」¹¹，把球收好回房間去。

一個好的神師就是這樣影響我們。我們因為踢球「破壞」了那個讀書時段，他是神師，可以破口大罵，第二天懲罰我們也行，但他的方法不是責難式、規管式。

我們每個修生都這麼大，應該要懂得思想，所以用甚麼方式管教呢？如果你強硬，我們便會離開，尤其是我那位好朋友陳德雄神父，他是很固執的。換了是從前，不聽話、不服從的話，老早就被趕走了。

先修班那年，關俊棠院長安排我們去暨南大學與那邊的大學生交流。陳德雄說不去就不去。但院長容許他。分別就在這一點。修院原本可以趕人走，卻又容許他、容納他，不就是幫到他們嗎？所以這是不同的概念、不同的方式，就訓練到不同的人出來。

香港八十年代的社會氣氛比以往的開放，修院也相應調適，修生受的規範也較過往少。

規限有規限的好，但變成極端就有問題。因為堂區、社會不是那個樣子。時代變了，教友都變了，不能用舊的一套放在堂區。

讓我們有些自由也是好的，因為自由也是一種訓練。我覺得修院的生活應該是與社會同步的。修院不是一個烏托邦，不是一個很特別的圈子。

所以我一進修院第一個概念便是想與社會繼續有連結，而不是抽離。一旦習慣了一直不關心社會上的事物，再出來的時候就很難適應了。雖然不是全都能關心，但我也選擇性地關心一些議題。你可以完全抽

¹¹ 會做人。

離的，可以真的進入一個全修道、隱修的狀態。但面對社會轉變是不可行的，尤其是我們要跟著社會的步伐前進。

我自己不想有與社會脫節的感覺，所以特別找了一些主題做剪報，特別是長者那些，有資料我就集結起來，希望自己與社會、社區有連繫。這是我自己的計劃。逢星期六放假我就去田灣探安老院。這不是修院安排和要求的，但我會在回家之前去一趟再回家，希望與社會有一些接觸。探老人家是當義工探訪，希望保持著與社會的關係。

然而，李神父卻沒有像其他神父般出外進修。

新神父若要進修，便要經過教區的讀書小組批准。教區覺得適合、有需要才派出去。當然我們可以要求，但我看不到自己是讀書的料子，故在這方面沒有這麼大的興趣。當年教區神哲學院也曾辦碩士班，我有去旁聽過一兩課。

我是這樣看的，因為那時教授多，修院就沒打算找人去接班。後來發覺真的要後繼有人，教區自己也要訓練一些教授人才，便陸續比較多些修生升神父之後，獲安排做一兩年堂區——也有些沒做過堂區——便送去外地深造。

這個安排要兼顧很多方面，教區的需要、人選、發展方向，也不能全部去讀書，還要看那人選讀不讀得來。

李神父於 1988 年晉鐸，三十多年來曾服務香港多個堂區，現為天水圍聖葉理諾堂主任司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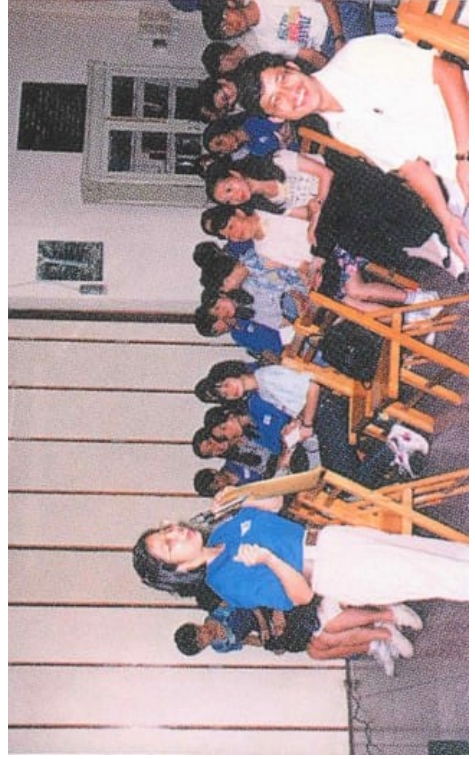
03



01 1983年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交流
02 從神哲學院迎新活動可見已有平信徒修讀
03 宗教交談活動



01



02



八十年代 333 國籍神父聚會

院長神師篇

聖神修院自香港教區接手以來，歷任十二位院長中有一半是華南總修院的舊生，另外兩位完成薄扶林小修院培育後，便直接留學羅馬，有一位則是聖神修院的畢業生。除了唐多明神父及田義神父是來自意大利的外籍傳教士，其餘的院長都是國籍司鐸。

當初是接受陶成的修生，在前面的篇章已出現過。在這裡，他們以培育者的身分和視角，講述自己作為修院長上，在任內的發展、理念和點滴。



田義神父

- 1958 於意大利米蘭晉鐸
- 1962 社會學博士畢業，同年 10 月到港
- 1966 開始在聖神修院任教
- 1968-69 擔任聖神修院院長
- 1969-71 回意大利服務
- 1972 回港在工廠打工
- 1990-91 任羅馬傳信學院院長



(圖：贖世主堂)

田義神父 (Fr. Carlo Tei) 早於梵二會議召開前已在香港服務，他於 1966 年開始任教於聖神修院，1968 年擔任院長一職。本研究的受訪者當中，有些不太認同田神父對修生過於自由和寬鬆的政策，但田神父有自己的看法和經歷在裡面。

我當修院的團體是一個家庭。我讓他們覺得我是爸爸，讓他們覺得我是他的家人。我在香港這裡、在米蘭和在羅馬做院長都是一樣。叫我去做院長的人都說，我對修生他們太好。我在羅馬做院長的時候，Tomko 董高樞機叫我離開 Urban College 傳信學院，那不是修院，是給神父的。因為第一次，我到羅馬第一件事是探望 Tomko。他第一句是怎樣說？他說：「你要當那些修生士兵一樣，特別是那些非洲的。」我說：「這樣呀？當修生是士兵？」因為他們覺得皮膚越黑的，對待他們越要嚴謹。我心裡面想，不是這樣啊！

聽完那些說話後，我心裡說：「我會對他們特別好。」尤其是他們離開家庭，又都已經三十歲，假如他們不是做神父，已經結了婚，有了家庭，他們沒有理由不成熟。所以我對他們很好，當他們是兒子，但當時的長上沒有這樣的看法，認為你做院長就必須要很權威，修生才會聽你的。聽是會聽的，但不是心甘情願，就沒有意思，沒有價值。所以我們的關係不是要逼人聽我的話，是愛。所以我要改變，有時有些長上見到我對人太好，他們不是很滿意。

九十年代，董高樞機負責在外國傳教的傳教區¹，他來找我，因為我對讀神學的神學生太好、太仁慈，他說：「你把那些修士當作神父一樣，不如你做另一間修院。」我說：「不好，不如返香港做好些。」他說不好。為甚麼？他說：「我怕你將那些神父當作主教一樣。」

之後總會長對我說：「好啊，好啊，你回來米蘭。」他要我打理米蘭的神父宿舍，安排他們的彌撒。當時我回意大利只做了一年，還有兩年，所以我留在米蘭工作。

過了兩年便回來香港。1993 至 1997 年，在不同堂區做本堂神父，直至 2019 年 12 月，因為滿了八十五歲，正式退休，在屯門堂區做住宿司鐸，沒有本堂神父的權力。

田神父回想父母以前每天做家庭祈禱，並許願三個兒子中奉獻一個做神父。九歲的田神父見到哥哥好像沒有聖召，而弟弟年紀太小，便認定自己應該要做神父，因此加入了教區的修院。

我的聖召是分兩段時間。教區的修院是因為我們在祈禱中求三個中最少有一個，我說就是我了。然後是認識了從緬甸傳教回來的二舅父，他在意大利留下來兩年，做一間小修院的院長。我在那兩年不時去探望他，覺得要好像他那樣，到外面傳教，之後便入了米蘭會²。然後 1958 年升神父，1962 年來香港。

我只想一升神父便離開，去哪個地方就不是我們決定。當時我希望派去緬甸，因為我舅父在那裡。但院長要我去羅馬讀神學。到了羅馬，總會長說不要讀神學，去讀社會學。博士畢業後，總會長就叫我來香港。因為他知道香港社會是怎樣的，說社會學對我來這裡有益處和幫助。但來到學了中文後，白英奇主教叫我去修院，不是教社會學，而是教神學。本來院長叫我讀神學，怎知總會長叫我讀社會學。但來到聖神修院卻教神學。這是不是天主的安排？

¹ 董高樞機，又譯作唐高樞機（Cardinal Josef Tomko, 1924-），1985-2001 年擔任教廷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舊稱傳信部，專責全球傳教區的事務。

² 「郎巴地外方傳教修院」於 1850 年在教宗比約九世鼓勵下於米蘭成立，簡稱「米蘭會」；1874 年，羅馬也成立了「羅馬宗座外方傳教修院」。教宗比約十一世於 1926 年將兩者合併，成為現今的宗座外方傳教會。

我的博士論文是教會可以為社會做些甚麼？亦即是說社會的問題與教會有沒有關係？因為有一段時間，教會將焦點集中在禮儀，教道理等等，沒有太關心社會，1965年大公會議之後才有轉變。但我早已經想教會與社會的關係；提出除了聚焦在教堂中的禮儀、教道理之外，需要關心社會嗎？

我教書的時候也有機會向學生解說，不是集中在抽象的道理。講某些議題後，就會跟他們說這些問題與我們做神父有甚麼關係，怎樣影響我們所聽的道理，所以讀社會學怎樣也有些幫助，尤其是我博士的論文是集中論述這一方面。

作為傳教士，田神父只有數個月時間同時學習中文和英文，最後他以甚麼方法克服語言的障礙？

我學中文的方式沒有現在那麼理想。他們沒有教我寫，沒有教我讀那些字，只是教我讀譯音。我在聖神修院新年的時候，徐誠斌做主禮，我做共祭，到彌撒第二部分聖祭禮儀，部分經文共祭的也要讀。到我讀的時候，徐主教看到我不是在讀那些中文字，而是讀拼音。禮儀完結了，他對我說：「你是半個神父。(You are a half priest.)」我問他為甚麼？他說：「你不會看中文。」我跟他說：「主教，若聖保祿來這裡，他要講福傳的說話，他也會用譯音，與我一樣，快一點。」廣東話很難學。當時真的不幸運，因為現在來的傳教士，至少有兩三年時間學中文，學讀學寫，所以我有這個不足。

因此，在修院教書時，我是兩種語文都用。我盡量用中文，但有些名詞用拉丁文，然後慢慢解釋。

修院教育最重要的是甚麼？修生最理想要學到些甚麼？田神父是接受梵二前培育的，但他早在梵二前已有關心社會的心思。

因為修生要準備升做神父，他們既然要福傳，所以要認識福音，因為要做耶穌的見證人，你不認識耶穌，如何做祂的見證人？不過，不是單單恭讀福音，還要讀書，要看《聖經》，增加對耶穌的認識。怎樣將你學到的道理說出來？你所學到認識到的道理要成為你的生活、思想、說話、行動。不過以前教會沒有太多這方面，但大公會議之後，我們不單止要認識多些道理，還要知道怎樣講出來。只講也不成，還要度這個生活。

所以教授應該幫助修生，教他們怎樣講，然後再教導他們也要成為所宣講的。跟著，講完道理，給一些時間停一停，想想如何在香港的社會情形實踐，聽的道理有甚麼意思？我情願怎樣？所以怎樣以身作則是最重要，大公會議特別集中在這方面。

為何我 1972 年回來的時候去了紗廠工作？因為當時我覺得教會不太關心工人的問題。可能他們當時覺得自己的工作為教友，不是關心社會。

我不是月工，是日工，搬布匹，日工會被月工的工友輕視。那時掙很少錢，只有數百元用來做生活費。與同會的恩保德、田英傑兩位神父一起，晚上在葛達二聖堂幫忙，但睡覺是在一間舊聖堂，現在好像已不在了。

多謝天主令到教會改變自己對自己的看法和使命，但到現在仍有好多人反對，現在有很多人想復古，回復到以前。但如果教會想繼續見證，繼續其使命，一定要瞭解大公會議的文件。看完之後，你就會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不接受大公會議的人，是不接受耶穌基督。不要判斷，不過他們更需要我們的幫助，有這樣看法的基督徒也需要我們的關心，幫助他們。

我相信我不是被大公會議影響，我讀神學的時候已經有這樣的想法，因為我們修會的名字是「外方傳教」，要去哪裡呢？我們要離開，去關心那些還不是基督徒的人。不過我們要強調愛，不單單是未信基督的人，讓萬民成為門徒，這是耶穌給我們的使命！

田神父來港數十載，先後服務多個堂區，最後擔任西貢聖心堂主任司鐸，2019 年開始退休，現為屯門贖世主堂的住宿神父，協助一些牧靈工作。

余福綿神父

1969 聖神修院助理神師及副院長
1974-77 聖神修院副院長，74-75 年為署任院長

余 神父從羅馬晉鐸回港後，旋即在聖神修院工作，擔任助理神師及副院長。

我從羅馬讀完靈修回來時，只想做堂區，白英奇主教認為最好是打理春磡角的避靜院，後因修院有些人事變動，我就做了修院的助理神師，而且身兼三職——修院、教《聖經》、到堂區服務，要了我的命！

那時修院的修生有大〔神哲學生〕、中〔高中生〕、細〔初中生〕四十二個修生，我是助理神師，好像祿母般要打理他們。因為修院限制看電視的時間，小修生放學後會到店舖看電視，我就騎電單車四周查看，著他們返回修院。晚上他們睡好我才能睡，早上要跟他們講默想。大修士找我原則上都可以的。

當年小修生分中、英班，英文班 F1-F4 就去聖伯多祿中學。平日早上我要到中學教十二節《聖經》課。F4 其實只有閻德龍一個修生，升神父也只有他一個。其他低班的小修生因為種種理由相繼離開了修院。

我是用英文教《聖經》的，但後來發現小修生的水平不成，我跟院長說：「你想他們學英文？還是學《聖經》？」我建議用中文教《聖經》，目的是要他們明白。

至於星期六、日，就在聖伯多祿堂區幫忙。我還要到中環大昌大廈教授教友教理神學班，當年未有香港仔隧道，我要騎電單車上山下山，真的忙透，過了一年我就病了，入了醫院。

我康復以後，便被調到長沙灣基督君王堂堂區工作。李宏基當了主教後再找我入修院。第二次入修院是做副院長，我主要做行政，兼顧先修班。當時沒有了小修院，變成先修班。我主力不是教書，是做行政、修院的膳食、財政等。其中一年曾慶文院長出外進修，我就擔當署任院長，四年之後又調了出來到北角聖猶達堂任本堂。

曾慶文神父

1971-73 聖神修院副院長
 1973-74 聖神修院署理院長
 1974-80 院長

徐 誠斌主教去世後，接任的李宏基主教忙於教務，將原屬於自己的院長職務交給了曾慶文神父，讓他肩負起這份對人的艱鉅工作。

徐誠斌做主教時，李宏基做輔理主教，徐誠斌就派他入修院做院長。我與康建璋做副院長，我負責神學那邊，康神父是哲學那邊。

然後徐誠斌過了身，李宏基要處理教區事務，我就做了院長。那時候，修生也是可以的，沒甚麼大問題。反而在我之前，徐主教未去世之前，曾經送了很多修生去輔仁大學讀書，那時候有些問題。

教區早期的時候，聖神修院神學部人才不足，徐主教曾送修生去輔仁大學讀神學。教區 70 年成立了自己的神學院，邀請了耶穌會、慈幼會、澳門教區與香港教區一起成立董事局，後來再邀請方濟會加入。教區自己辦神學院，便叫修生回來，但修生在輔仁大學讀得很開心，不想回來，教區要他們回來，他們回來之後很多就離開了。就有這樣的情形。

簽證也許是一個原因³，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教區已有神學院，沒有理由再在別處讀書，應該回來讀，才能支持自己的神學院。要不然你請了些教授，沒有學生也沒用。

我在修院做事的時候，就覺得應該讀一些打理青年的課程，讀一些 counselling [輔導] 的東西，所以 1976-77 年那時候去了加拿大渥太華 Saint Paul University 讀 counselling 的課程。為了準備自己，也先去了菲律賓一個耶穌會辦的機構，讀了三個月的暑期課程才去加拿大。

每個人的性格都不一樣，人們可以接受、可以拒絕，可以贊成、也可以反對，所以對人的工作是最難的。做修院院長的時候，還要兼做學院，要確定有各科的教授，哲學的、神學的、禮儀的，這些要齊備才可以，這有少少困難。修生方面，甚麼性格也有，要自己留意他們的

³ 周景勳神父在本研究中的訪問中有解釋簽證的問題。他當時也在台灣讀書。

人品，還有健康也很重要，我們經常強調有學問沒健康是做不了事的，所以我們要他們注意自己的健康，注意自己的學問。有學問有健康，但人品不好的話，又是有問題，所以要三者全有。我們更加要他們是虔誠的信徒，這些都是要注意的。

姚崇傑神父

- 1973-80 聖神修院神師
 1985-89 聖神修院神師
 1990-93 聖神修院神師
 1993-99 聖神修院院長

姚神父曾在華南總修院攻讀神哲學，自晉鐸以來，在聖神修院工作長達二十年的光陰，現在仍居於該處，是修院的老住客之一！

我回來香港是1970年。70-73年在黃大仙做本堂，然後73-80年便來修院做神師，幫一位老神父——明之剛神父。他是神師，我負責幫助他。過了兩三年，他調到西環做本堂神父，我便做了神師。

80-84年我到西環聖母玫瑰堂做本堂，85年再入修院做神師，直至89年。之後放了一年假，我到了羅馬讀書，1990年回來，至93年繼續做神師。93-99年有六年做院長。

1974-80年那時候院長是曾慶文神父，他也是神哲學院的校長〔76-84〕，我主要負責修院。當時一邊是修院，另一邊是學院，兩邊是不同的，他在那裡兩年慢慢加入中國哲學。我做修生的年代也有讀，是一位老先生教的，不像後來那麼著重。以往是一個神父教倫理「一脚踢」⁴。現在不是了，一個教倫理，一個教《聖經》，一個教哲學。

梵二之後，修院風格上已不同了，已經沒有小修院了。我們神師在暑假大多數要負責安排修生的牧民。先修班那一年，我特別要照料他們。他們那一年要上課，包括靈修、修院的生活，下學期去安老院服務。其他讀哲學的，便要去探監獄，我們稱為愛德服務，為弱小傷殘服務。探醫院、老人院，都要出去。到了神學，就去堂區。往昔是沒有的，就是這些不同。

我們以前做修生是讀書、守規矩，不會外出。現在一樣要讀書，但有堂區牧民、社會服務，範圍擴闊了。第二是，不單止要服務，修生回來後神師要跟進，即是要聽他們報告。一年有一兩次跟堂區神父討論他們的表現。後來是每個月都要跟他們談，每個月一兩次要看他們在

⁴ 一個人負責所有事情。

外面遇到甚麼事情，去幫助他們，不僅是他們的困難，還有他們的性格成長，討論以後做神父遇到這些情況要怎樣去處理。你幫助他們的人格和靈性的成長，不單止是做人的修養問題，還要對天主。

以前在修院讀書，神師會詢問你有否問題，又或者會問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你說多少，他們便聽多少。現在是要看一看修生為什麼沒精神，便要抓住他們來聊天，看他們有沒有心事。一個修院只有一個神師，要工作的話可以有很多工作做。院長管行政，神師是管內心的。首先你要取得修生的信任，他們才會說。他們說時你要用心聽。這樣才能幫到他們。

姚神父最初當神師都要一段時間摸索，才能幫助修生。

八十年代之後進來的修生都有一顆心想做神父，會學習，願意面對困難，如果真的不成便會離開，仍然比較單純一點。但那時我剛進來，沒有甚麼經驗，在幫他們的時候其實更多是幫助自己。有時我知道他們的問題是個問題，但不知道為何會這樣。這是我的問題。我有時候也沒有辦法，幫不了他們，自己也不開心。我由73年進來，到84年出去，之前真不知道我有問題。他們與我聊，我也只可以與他們聊，真的未必幫到他們。

由85到90年，我的技巧多了，明白的事情又多些。是祂幫助我的信仰，讓我的信仰堅定起來。八十年代大公會議之後，香港有甚麼培育講座、聖經講座，一有機會我便去聽、去參加研討會。幸好上級不是有很大的要求。到九十年代，自己又慢慢在信仰上想通了，我在天主那裡，在信仰裡，噢，原來是這樣。這樣可以幫到別人，一旦幫到別人，我就又明白多了。

當時很辛苦，主教又不讓我離開。現在回想起來，89年有一個星期的培訓給教區的神父、修院的神師。我們第一次去菲律賓，每個人都不開心，我們沒有受過甚麼訓練，主教仍要我們去。現在才明白，如果早一點有這些訓練就好了。

現在我感謝胡主教，因為他逼我，我沒有辦法，只好逼向天主。我也感謝天主，如果我受訓練在先，讀了書再進來修院，我會覺得自己沒有問題，是你們修生的問題，你不照著做，我也沒有辦法。但我沒有受訓練，我真不知道你有的是甚麼問題，逼我在信仰上成長。哦，原

來是這樣，在靈性上，你也要帶他們去信仰那方向，是靈性，不是心理學。

修生遇到問題，姚神父盡力引導，並提醒他們要保持平常心，因為不是所有問題都能解決的。

他們出去實習，碰到很多教友，很多事情，這個神父，那個神父，一定會有衝擊，而且是情感上的衝擊。他們會懷疑：「我是不是真的有聖召？」他們在外邊的問題，我就要利用一些方法幫他們：「神父教友的問題你是解決不了的。你聽完之後不要嘗試去解決。不要讓它影響你，因為你解決不了，會變得不甘心。你走哪一條路，去到哪裡，都會有人的問題，你要怎樣在人的問題裡不影響自己，而且幫助你去信賴天主？」這樣幫助他們在整個事情中自己開悟。

另外與修生他們交往的時候，要學會接納他們，就是用天主的愛來接納他們，把他們慢慢帶回來。你沒有力量去改變他人。你要接受他人，要謙遜，帶他們到天主那裡，不是你幫他們去解決問題。現在就是用這個態度去幫助他們。以前我不知道他們究竟是有甚麼問題。他的問題就是我的問題。現在就是，原來問題就是這裡、那裡。怎樣帶他們到天主那裡。自己看不到問題的話也會生氣。現在就明白，當自己也沒有力量，就求天主帶他們到天主那裡。我是過來人。以前是學了很多東西，態度很躁動，現在就是給他們時間。要陪伴他們。

隨著香港社會越見發展，聖召的數目反而減少了。

香港經濟起飛有影響，但又不是影響太大。八十年代還不是很嚴重，九十年代便比較明顯。我做院長的時候，有段時間只剩下四個修生。我們不是很努力去找聖召。後來我帶修生於主日到堂區，每個月有三四十個青年來聖召營。這些到聖召營的人到九十年代之後就少了，我估計經濟是有影響的。現在問青年都不願意做神父。神職也是俗化了。

梵二之後，我個人看信仰的培育還是不太深入。一方面我們太過強調服務，適得其反。有人覺得做神父很辛苦：「我做教友還比較自由，我不用做神父也可以服務教會。」服務如果不是出於信仰，信仰內涵少了，便看不到服務的意義。

因為成立了神哲學院，承擔了修院以往學術上的培訓，修院更專注於修生的靈性培育。

由湯主教、林焯煒神父到我都是聖神修院的院長，也擔任學院的校長，一人帶領兩個部門。在羅馬註冊的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教區承認聖神修院，所以叫做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內部沒分開。現在就分開了，從教區來看，兩者是獨立的，經濟上則是一個，但各自做預算案。

不論在堂區或修院，姚神父經過多年才體味到權力的意思。

說到領袖便牽涉一個「權」字。我也要廿多年才能明白。這真的是心的問題而不是職責的問題。人們或會想到：「你做院長與做本堂有甚麼不同？」我在修院就是做院長，教修生他們要忍耐，在外邊要如何面對教友。如果他不聽話，我就叫他離開。我跟修生說的那一套說話，自己要活出來。做本堂就不是了，你向教友訓誡幾句，他就跑到另一個堂區，所以要很有耐心，要像耶穌一般。

關俊棠神父

- 1970-73 聖神修院小修院培訓導師
 1977-80 聖神修院牧民主任
 1980-85 聖神修院院長

關俊棠神父晉鐸多年來，一直專注培育與教學，為修院增添了不少新元素。

我做了五十年神父，只有兩年在聖伯多祿堂做副本堂，之後一直做培育工作與教學。我教倫理神學，還有做培訓工作，早期是小修生，然後是大修生，接著教倫理神學，最後就做婚姻輔導。但婚姻輔導並不是教會指派的，這是我自己感到有興趣，覺得家庭很重要，是自己找來做的。

然而，起初在小修院工作，也曾引發內部矛盾。

做小修院負責人時，我有個經驗，一直覺得是正確的，但最後我有些少失敗。是甚麼呢？第一，我是打理小修院的神父中，第一個會與修生，即和中學生一起打球、洗廁所、燒樹葉等，我很覺得我要與他們一起。第二，我很喜歡訓練他們刻苦耐勞，因為我覺得青年人如果不這樣鍛鍊，日後面對生命會不夠堅韌。但我的訓練很有趣，我不講太多話，直接做。

我們一樣有行山，但我不選擇那些易行的山，我揀那些很難行的，還要不是跟正途的，由此看到修生的「質地」⁵，有些很 okay，有那種冒險精神，不害怕；大部分都是很怕行這種路，心裡想：「神父，你明明有好路不走，偏要走這些路。」他們覺得我很固執、很獨裁。我後來解釋給他們聽：「如果我老是叫大家做事要堅韌，口講而已，但如果你自己領悟到是更好的。」這是我的方式。

我也特意不在神父飯堂吃飯，走出去與修生一起吃。但就是在那幾年我發現有些不妥，原來神父跟修士的伙食是不一樣的。我們神父有自己的飯廳，修士的在外面，修士會看到拿出來給我們的飯菜，全都很棒，但他們那些就真的差很多。像我們有蒸魚，肉質比修生吃的好。

⁵ 素質。

還有一點很有趣，是我做院長之後才叫停的，原來我們用的廁紙都不一樣。其實不單是聖神修院，這是所有修院長久以來的做法。神父們很反對一視同仁，他們說：「我們神父辛苦一點，應該要吃好一些。」我的看法就不同，我們雖然是辛苦，但他們也辛苦啊，特別是年輕人發育時期，也要吃好一点才有精力。

還有，以前打球後去洗澡也是要守靜默，不能講話。為甚麼不能談天？他們要你洗快一點，不要享受，也不要多看自己的身體。因為天主教在梵二前對身體是很顧忌的，對男女的身體都是。但我又覺得：打球後興高采烈，談一下天又有甚麼問題？那我又容許他們，無所謂。這樣就被當時的神父批評，說我有點縱容學生。

到我第二年中時候，修院每星期都會開會，我經常被人批評。那時我升神父不久，還是個小伙子，在那裡做慣訓練的神父，又或者是那些教授，很多都比我年長，甚至有老人家，有這麼多經驗，如果他們都認為我有些過份，我心裡便有些膽怯，不敢大膽覺得自己一定對，有些退縮，便開始有少許「扮嘢」⁶，要收緊來做。因此在第二年底，第三年初時，有個學生很頑皮，但很大膽。他說：「神父，以前，我們當你是大哥哥，現在我們看你是院長。」我那時其實心裡很難過，很傷心啊！這是我的小修院經驗。滿了三年我又再去讀書，讀博士班。

小修生當中，有些升大修院，但很多都離開了，他們只是來讀書而已。我們家訪的時候，有個小修生的媽媽說：「神父，多謝你啊，你好好教導他，讓他讀好書回來打工幫家裡。」他媽媽直接講明白，把修院當作是寄宿學校，不過有神父打理、管理，一定會好。後來他畢業出來，也是好人來的。

由牧民主任到修院院長，關神父都投放了大量心思，為修院帶來新氣象。

回來就做大修院，初期我不是做院長，是做牧民主任。那個年代，我很喜歡他們多外出去接觸不同的事物，有些是他們自己揀選，有些是我們指派，我覺得那個是 okay 的。但做了幾年之後，胡樞機請我做院長。這是天大的「搞笑」，因為不知道是不是兩年前，「金禧事件」，我反對教區的做法，直接到胡樞機面前勸他：「下去吧，下去

⁶ 裝蒜。

吧，下面這班學生，見一下她們吧。」但他那時候害怕，不是很願意。那我又與神父聯名發公開信，在報紙上不同意教區的做法，也不同意教育局這樣殺校。我其實已經有些「黑底」⁷，竟然會找我做院長，可能是因為其他神父推薦吧。

我做大修院的時候，有一件事後來回想起來覺得很獨特。我在接任之前，親自採訪了大概一百一十人，有男女老少，有不同崗位的人，有普通教友、修女，一般嬸嬸也有；有些是專業的，亦有些是神父。我的問題是：「你希望五年後出現的是怎樣的一位司鐸？」⁸我覺得這很重要，我們一直都是看著教會訓導手冊去做培育，那也是正確的，不過跟社會有甚麼關係呢？現在社會一直在變遷，五到十年後的變化已經很大。

我沒跟其他人說過這事，也沒在我的書裡面提過，我覺得有些破天荒。我覺得如果神父是眾人之僕，那我們應該要知道我們的「主人」需要怎樣的僕人吧！我訪問了，心裡有個定向，所以後來就設計了「四大綱領」，包括臨在與非臨在的培育。培育不一定要「下下都跟到足」⁹，有時候也要讓修生自己出去闖闖，經驗一下。所以我有兩三年左右，鼓勵修生暑假時出外，去一些落後地方經驗一下。

所謂的四大綱領，包括團體培育、靈修生活、學術訓練及牧民體驗，至今仍是修院培育的框架。現有的修院介紹單張中，除了團體培育改稱人格培養，其他沒變。關神父闡述他當時和現在對四個方面的想法：

我記得那時候，我第一時間要所有修士、還有新加入的，去見耶穌會徐志忠神父。他是心理學家，我要他們去他那裡做測試。完成後，我會跟每個修士談測試的內容，讓他們看看自己的情況，希望他們了解到自己的強項和弱點，有少少因材施教的感覺，讓他們多加注意自己某個方面，我也會多加留意。還有，我說明——是徐神父教我的——

⁷ 不良紀錄。

⁸ 據關神父1981年11月20日撰寫的〈修院培育的回顧與前瞻〉，該訪問圍繞四個重點：除了文中的問題，另外三個問題是：1. 修院訓練中最重要的是那一環？為甚麼？2. 香港在普世及中國教會前有她特殊使命嗎？3. 甚麼是司鐸候選人的基本品質？見《公教報》，1981年「聖誕特刊」。

⁹ 照顧周全。

這些報告三年後就會銷毀。他說理論上，一個人三年就會有大改變，留下這些記錄放在檔案裡面不好，好像一輩子都要背負它。

另一項是，我請了當時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兩位很資深的女輔導員到修院跟我們談感情生活和性。修士都已成年，有些曾工作過，但不代表他們懂得怎樣去處理感情生活。不懂的，所以他們才問我能不能多看美麗的女孩子幾眼。

跟著是認識自己，我記不起有沒有提供這些機會，今天的我當然覺得認識自己很重要。我一直認為，一個人成長，必須要兩隻腳一起走，一隻是健康的人格基礎，另一隻是靈性生活、信仰生活，要一起走才行。要不然，只有不錯的靈性生活，會怪怪的，沒有人情味。你做牧者對自己的了解都不足，哪有能力去了解別人？

人格培育應該包括對自己的認識，這牽涉很多方面，自我形象、了解認識自己、欣賞自己、接受自己，這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個神父對自己很含糊，其實是很辛苦的，因為教友很期待在你身上得到一些東西，他們以為你很行，神父又會覺得教友覺得我很行，我不能不行，有時有些事情以為自己可以做到，卻是不行，就會出事。

至於價值觀，如果我們只是單向的價值觀就很麻煩，但教會的培育很多時都是希望如此，教會訓導就是唯一正確的，這沒錯，但不是唯一和全面。社會有不同需要的時候，我們要怎樣將這個正確的東西，怎樣去回應這些需要呢？我們要擺脫那種非黑即白，二元對立的態度才行，不能有你無我，這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有海納百川的思維與胸襟，你有這種價值觀才能幫到教友、幫到人，這是第三點。

第四就是有效的溝通，我們很多時的溝通都是單向的，有人來問神父一些問題，想得到解決，你是在教人，但你教之前有沒有聽清楚別人的問題、需要的是甚麼呢？神父不應該只是聽告解。聽告解只是他們在講自己的不是，但你有沒有自己看到、有沒有幫到教友看到，這個不是的背後是甚麼東西呢？這跟溝通很有關係，還有神父的溝通，其實，一來可能單向，二來可能很隱閉，我們不是很懂得怎樣打開自己，告訴別人，我也有感情、也有需要，也有見不得光的東西。不夠膽，因為我們的身分，跟教友不能講，跟兄弟呢？很奇怪，跟兄弟開會討論 project、嘻嘻哈哈就沒問題，但入到去裡面內在的時候，我們神父坐在一起是多數不談話的。

第五很重要的，就是愛的能力。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愛與被愛，但不僅教友，神父也是，我們不是每個人都懂得去愛。愛是要去學的，而這一點，在修院期間是學不到的。

最後就是靈修了，這是很重要的，不用多講。修會有自己很獨特的靈修傳統，這是我們教區神父沒有的，但沒有之中也有一種幸運，我們可以向不同的靈修傳統學習。如果你的靈修接近聖方濟的就學方濟靈修，接近依納爵就學依納爵靈修，有些可能喜歡默觀，就可以去學大嶼山〔隱修院〕那些。

我自己就很喜歡修生視野闊一些，不單是哲學神學，中國文化也要知道一點。我走了之後沒有再繼續，有點抱歉地說，變相有些不中不西。外國文化又不深厚，中國文化又不深厚，怎樣吸引人做神父呢？

為落實綱領的牧民體驗，修生們去過泰國難民營、印度加爾各答、尼泊爾等地，看看第三世界的情況，體驗受苦的人的生活。

那是個很好的牧民機會，很難得的，你想去也不容易去得到。我記得第一年是我帶領，第二年是梁達材神父帶隊，第三年是閻德龍神父。這好像是我做院長之後第二年才開始辦的，我沒做院長，變相就沒有了這件事情。

在教區內的牧民實習一直都有，逢星期六就出去做牧民工作，有些派去堂區，有些就去了做醫院牧靈。例如林祖明神父很有愛心，他那時去了明愛醫院為嚴重弱智人士服務。我覺得不需要等到某一個階段，甚至說第一年就可以去做醫院牧靈，順道學 CPE〔臨床牧靈課程〕，第二年可以調動，可以繼續去醫院牧靈，也可以是另一個人去。我認為在整個神父培訓過程之中，這是必須在未升神父前經驗的，是一種人格成長。

與此同時，我也鼓勵同學們學一樣自己喜歡的興趣，你喜歡甚麼，我就付錢讓你去讀，讀神學以外的東西，像畫畫、音樂。就算有同學想學修理汽車，我都會讓他去學，每星期有一段時間跟師父，有些學武術也可以，那個年代有一段時間挺不錯的。

我還想過轉型，心中有個打算，覺得修生應該在神學第二、第三年去堂區生活，就算是神學第一年也無所謂，起碼有兩年，跟本堂、副本堂一起生活，與此同時服務堂區教友，但白天要回來修院上課，上

完課就回堂區。學習在修院裡，住又在那裡，這樣太舒服了。還有，在堂區可以每天很具體地看到不同事物，還能發現自己最喜歡的是甚麼，及看到教友的需要，才能連結到自己讀的神學跟你將來要服務的職務之間的關係。然後到神學第四年，即準備升神父那年，就要回修院住，好好地重新準備自己升神父。總之不是每星期去一天堂區，眾人都把你當成寶，不斷受人追捧歡迎，不知不覺間把自己搬上「神枱」，我不想神父變成這樣。

滿肚大計的關神父，即使教區想他留任，他的培訓很能鼓舞修生，卻因一些故事沒有續約。

因為神師是外國人，始終對修士的了解不能很深入。那時有四十個修士，我每晚輪流跟他們談，大概個多月又談一次，與他們很深入地談天，甚麼都談，談團體生活、靈修、感情生活、讀書怎樣。最不幸的是，他們跟我談完之後就不找神師，不覺得找神師很重要，神師就有點被忽視的感覺，很不開心，我就被神師投訴。那時我太年輕，不懂得處理。

他們可以跟我談感情生活。我記得有些修士曾問我，有時外出見到美麗的女孩子，也會想多看幾眼，行不行？我說：「如果你見到美女只想多看兩眼便看吧，但多看兩眼之後要記住，首先要祈禱，多謝天主創造這麼美麗的女子，然後要求天主，讓她遇到一個比自己更好的男生，然後便快點離開。」

關神父希望在教學中加入中國元素。他在書局偶遇一位先生，原在北京做圖書館管理員，又想到修士們的中文一般，想請這位有份量的先生來教書。怎料這事卻成為他離開修院的導火線。

這也是我後來不續約的原因。因為我與神父同事相處得不好，我那時也年輕，也有我的傲氣，不像現在較為圓融與包容，有時我的措施做法有些太硬淨，沒有尊重他們的感受。

那時真的有很多「牙齒印」¹⁰，真糟糕，但我也是活該。我想自己真的有些傲慢、獨裁，覺得我對修士的認識比其他神父多。第二，我覺得自己的審美眼光比他們好，那時修院飯廳很陰沉殘舊，我就去翻

¹⁰ 比喻人與人之間的恩怨和過節。

新，過程中我沒有請教過他們，沒有問他們的意見，自把自為。所以做好之後，人們很喜歡，修士也讚好看，但神父們沒有一個稱讚。

第三就是人家要求一個私人休息室我不肯，沒有體會別人的感受。有一兩位外籍神父很想我在修院二樓闢一個房間做神父休息室，有些舒服的梳化、電視機，小吧枱放些飲品食物，大家在房間裡工作累了，可以過去休息。這事本來沒甚麼大不了，不過我那時年輕，又覺得沒有必要，因為樓下神父飯廳已經應有盡有，要談天到一樓也可以嘛，當然沒有在樓上這麼方便。另外，那時我很傻，但覺得自己傻得有道理。我們是與修士一起生活，如果我們要看電視，應該與他們一起看，過程中可體會到不同修士的反應，從而更認識他們。有些修士看新聞專題會興致勃勃，那你就知道他的脾性，有些挖苦別人、有些很專心，我覺得可以觀察到這些反應，不是很好嗎？我就說不需要啦，就傷了他們的心。

我還做了一件事令同事不滿，但我覺得是正確的。我們聖神修院路口的更亭建好之後一直沒有人住，很浪費。我便想，既然教書先生住在西貢，不如提供更亭這個地方給他住，他就教我們的同學普通話、中史、中文，挺好啊！我的修士沒問題，但其他的神父覺得有問題，因為他是從北京來的。他們立即聯想：「咦，是不是派來臥底的？」連修院外面的神父有些也這樣覺得。後來胡主教問我：「阿關你搞甚麼？你不怕嗎？大學圖書館管理員來的啊，你卻請來做天主教修道院的老師，是臥底的話怎麼辦？」他也有些害怕。

約一年後，那位老師住在天津的太太和剛小學畢業的兒子也成功申請來港一家團聚。我爭取到他一家人住在修院。不過就有人不開心，有很多閒言閒語，我又被召去教區，說這樣不行，違反教區牧民指引。我就想這怎麼可能違反呢？一查就查出來，在神父宿舍的同一屋簷下，是不可以有女性的，講得很清楚。但那是路口的更亭，離宿舍很遠，要上一條斜路才到，並不是同一屋簷下。而且他們是一個家庭，所以又讓我過了關。

關神父 85 年到羅馬準備完成博士論文，兩年後回港，除了在修院教授倫理神學外，很多時候返大陸修院教書，直至當時神學部主任神父因中風而離職，才由關神父接手，並且開始籌劃專為教友而設的夜間神學課程。

這裡有一段辛酸史，很淒慘的。原來我那些教授絕大部分都反對讓教友讀神學，覺得沒有這必要。

我先與學院的董事會提出，他們說：「只要你們教授認為 okay 就可以了」。我便滿心歡喜地回去開會，誰知第一次開會，三分之二的教授都說沒有必要，三分之一是沉默的。只有一個 Maryknoll 神父 Fr. Malone¹¹ 支持我，他說：「Thomas，你的計劃很好！」我不服氣，便說不如做民調看看有沒有人想讀。那時遇到一個我教過的商人朋友，他資助我、支持我請人做民調，結果就做了一個很大的民調，在堂區裡面派了一萬一千份問卷，收回大概八千份，多厲害啊！

問卷現在已找不到了，我記得應該不超過十條題目。那八千份收回的問卷裡，有九成被訪者贊成，有五成說：「如果你們開設課程，我會考慮。」我把這個結果拿去教授會議，教授們看到沒辦法，人家說想讀，董事會又點了頭，便勉強通過了。但有些教授說明他們不願意教，不要預他們的份，結果就開始了夜神課程，到現在廿幾年了，所以有些教授從來沒有教夜神，不過不多。

那時我最初的信念是：如果神學要本地化，首先一定要普及化，否則神學永遠都只是掌握在神父或者少數有機會讀神學的修女的手裡，成為他們的專利。我覺得這樣便做不到神學本地化，神學的思維是不會闊的。因為如此一來，永遠都是從神職人員的角度去看事物。

現時在外間做輔導培育工作的關神父，主要開辦三個課程：「認識自己」、為四十五至六十五歲人士開設的「中年之旅」，以及為六十五歲以上人士開設的「熟齡之旅」。

我覺得這幾個課程包括了整個人的成長，亦因為我都已經過七十歲了，所以夠膽開「熟齡之旅」。至於「認識自己」，我花了很多心思，這裡面有我的影子，把我在成長當中知道的，希望往後也是朝這個方向幫助身邊的人、有興趣認識自己的人。我唯獨有一個遺憾，整整廿五年來，我在外面做這方向的培育工作，也想貢獻給教

¹¹ 馬毅華神父 (Fr. Edward Malone, MM, 1925-2009)，美國瑪利諾會會士，1952 年晉鐸，1972 年來港前曾是瑪利諾會神學院院長，來港後便在聖神修院任教，兼任亞洲主教團協會副秘書長。〈馬毅華神父〉，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頁：〈<https://bit.ly/3gFpXDG>〉，[27-5-2021]。

會，但苦於沒有渠道。我在中文大學開班，但他們未必會來，其實有很多神父要上這些課，不過，他們可能會覺得：「我為甚麼要跟你上課？你又不是很守規矩。」正因為我出了規，我才覺得在當中體會了很多事情。

因為我不聽話，我立了個不好的榜樣，修院從未請過我回去。我回去也只是教神學而已，是宗教學部的。因為我白天要上班去不了，後來就轉了全職教倫理神學，是為教友的，修院這個團體就從來沒請過我。我也明白，也不生氣，因為我不聽話嘛。我現在也有時聽到，我弟弟細關會說：「大哥，後生的有些不太喜歡你。」我問：「為甚麼？」他說：「因為他們質疑為甚麼你可以不聽話，我們就要聽話？」

所謂「出規」是指不跟隨教區指令。曾經有一段時期，尤其在梵二後，有極小部分教區神父做自己的工作，而非擔任本堂神父的牧職，引來教會內部的爭議。

陳、湯兩位樞機都有找我談。其實他們也要為我的特殊情況給教廷一個交待：為甚麼會有一個教區神父自己在外住、自己找工作做？即使教區內也有極少數神父也是自己選擇自己的工作，但他們都住在堂區裡，而我就連睡覺的床也搬了出來！起初樞機他們可能擔心，怕我抵不住誘惑，後來見到還可以，變成「老餅」¹²都沒事，就不太擔心。

我想我這廿多年所做的工作，其實也是神職的工作，也是牧養的事，只不過我的對象不單是教友，外面有很多人也需要心靈的栽培、需要人格的成長。而且我有一個矛盾，你叫我住在聖堂，又說可以不需要我幫聖堂做任何事，但如果我看到兄弟在樓下忙得不可開交，我沒有理由在樓上只顧做自己的事，我見到一定會去幫忙，一幫忙就參與了堂區事務了。第二，如果我住在堂區，我相信很多教友都會來找我。

還有第三，團體生活，我曾經體驗過一個堂區，搬去一段短時間，那裡只有一個神父獨居。早上彌撒後匆忙吃過早餐，便各做各的事，中午多不會一起用膳，而晚飯那位神父弟兄總有教友請吃飯，我一個人就要自己照顧自己的晚膳。那為甚麼我要搬到堂區？說到危險，他一

¹² 潮流用語指年紀大的人。

個人住也危險啊。不也是沒有團體生活？我並不抗拒團體生活，並且真的有找過，但找過幾個堂區都 full house [人滿]。

從以上的回憶和在五十年代章節的記述，關神父由一個接受陶成者，轉身成為修院的培育者，以至後來成為在外間服務的輔導者，可看出他在思想和性格上的轉變。在修生階段，他因乖巧聽命而獲派去羅馬，但他認為那是「未成熟的乖，真的是一種很古板、服從式的乖」。

我有說過，如果你認識三十歲前的關俊棠，跟三十歲後的他是兩回事來的。三十歲之後的關俊棠不是很乖，但是越來越健康，這是很深的體會，以至這廿多年來在社會上照顧不同的人的靈性需要及育人工作，離開教區的派遣及自選的生活模式，都是自己經過四十天的退省，不是因為我不喜歡某些人，不是因為我被人們怎麼了，完全沒有這一回事，我還是很感激教區的神長及兄弟們，但這種結構就是不適合我。

林祖明神父

1998-2015 在聖神修院擔任培育工作
 2009-2015 聖神修院院長
 2018- 安排修生的牧民工作

林 神父在修院默默地工作，不經不覺也有十多年，現在仍是修院培育團四位成員之一。

現在夏主教¹³做院長，我有幫忙安排修生的牧民工作，本來已離開了修院培育工作，現在又踏了一隻腳進去。可謂我整個人的青春都在修院那裡渡過，這個說法不算誇張，但未到湯樞機¹⁴那個地步。

教區會就神父的需要或教區的需要，讓神父進修。2000年，我就到羅馬進修一年，因為那時我入修院做神師工作，剛好在羅馬有一個靈修課程配合我的需要，所以教區便派我去。

做修院的培育是非常有意義的，但不是很多人想做。真是召叫中的召叫，因為做培育者相似「無羊之牧」，不是沒有，而是只有幾位；可謂「一入侯門深似海」。修院生活較為單調；本來是個自自由由的堂區神父，現在要再回修院，過有紀律的生活。這為我們神父實在是不容易的，成為另類的關顧者。

還有，培育工作也不是我們訓練的本行。我們是受訓在堂區做牧民的神父，不是為培育而受訓，所以做培育需要有相關的訓練，因為只有堂區經驗怎樣能足夠呢？

教會培訓的方向是清楚的：聖召是甚麼東西、教區神父應該有怎樣的訓練，guideline〔指引〕裡都寫得很清楚，但怎樣去implement〔實踐〕呢？這就真的像照顧孩子一般，要經常臨在。難聽一點，真的要監視他們。食飯時間也要看著他們，有時人的舉手投足，不是他們特意做出來讓你看，而是平常生活，這就是做培育者要做的事情，很有趣的。責任因此很大——因為是院長向教會推薦，說他確有資格——但真正認識一個人是很困難的。

¹³ 夏志誠輔理主教。

¹⁴ 湯漢樞機自晉鐸以來，一直都在修院生活，超過五十年之久。

修院培育不是灌輸式的，而是需要修生的主動，好像是給他們一枝漁桿，他們需要自己去學，去經歷和體驗；所以是因人而異，不是教甚麼，而是過程之中那個人要有開放性，對於眼前的事情不是硬生生的一套，雖然有人是這樣而且升了神父，我覺得未必是壞事。但如果一個人本身能夠給自己一些機會去學習，不是只靠那七年，將來一直去學習，如果有這樣的能力，繼續爭取成長的空間與機會，這就夠了。這一點是最重要的，因為第七年升神父時，他們只是初哥。

還有，聖召是不易分辨的，有時候也會看漏眼。雖然可能整天坐在修院，好像有種沒有做過甚麼「實質事情」似的。修生不是經常找你，但你也得臨在。如果他們來找你，你剛好不在，就會覺得你常外出。

我在修院做培育的時候，也有派修生出去做體驗，有去柬埔寨、非洲，亦有的去過加拿大、愛爾蘭進修英語，真的要看每個人不同的需要。相信在培育上，他們有多種經驗是好的。

體驗的成效與得著就視乎個人。有些真的很有成效，會成為今天他們牧民裡面的關注，影響到他們的牧職。例如有修生到過柬埔寨，他跟那邊的傳教士有聯繫，便會帶他堂區的教友去那邊做 exposure [體驗]。他有這樣的經驗，在牧民時，他又讓教友有這樣的傳教士體驗。

我們也試過送一個修生去澳洲。因為我們覺得他在香港不太合適，覺得那邊有足夠的資源可以幫幫他，他後來在那邊升了神父。簡單來說，就是他需要多一些支援，無論是指導，還是陪同、心理上的成長，香港是缺乏這樣的資源，澳洲那邊替他度身訂造培訓計劃，如此便為教會保留了一個聖召。所以有時候要借助外面的資源來協助，但重要的是天主召叫了他。



曾在修院服務的部份神師及院長：
林焯煒神父 (01)、姚崇傑神父 (02, 中)、
唐多明神父 (03)、明之剛神父 (04) 以及
田義神父 (05, 前排中)。

本地女修會的培育

本研究除了從神父的培育（紀錄華南總修院及聖神修院三十至八十年代的歷史）來展示教會和社會的發展外，亦藉著耶穌寶血女修會（寶血會）幾代初學師的口述歷史，對比本港教區神父與修女培育之間的差別。這幾位不同年代的初學師，有著師生的關係，故更能從她們作為培育者和受教者的緊扣角色，顯示女修會在培育方針、模式等方面的發展及改變。

寶血會前身是意大利嘉諾撒仁愛女修會的第三會，1863年已有首位國籍修女發願。1922年，剛恆毅樞機（Cardinal Celso Constantini）遵循教宗本篤十五世的通諭，本著教會本地化的精神在香港成立華南總修院，培育國籍司鐸。同年本地地牧區首長師多敏主教（Bishop Dominico Pozzoni）亦基於同樣精神，協助第三會的傳教姑娘脫離嘉諾撒會獨立，成為香港首個國籍女修會，定名為「中華耶穌寶血女修會」或簡稱「寶血女修會」。對比聖神修院作為教區神父的主要培育機構，本研究選取寶血會作為研究對象，較其他國際女修會或華人女修會更具可比性。

香港本地修女與神父的培育究竟有何區別？我們或許借用陳志明神父在本研究的訪問中的一個簡單對比：

如果是神父的話，我們的目標很清楚，就是做神父。教會有一定的要求，要有人格成長、有靈性方面、牧民方面和學術方面四個範疇。修女培育的話，一定要看她們修會會祖的精神，要有她們的培育師、初學師。我們大修院一定要著重牧民那方面。我們主要是服務，她們著重團體生活。因為我們不是修會，我們著重服務，堂區才是我們的團體。所以我們神父有 333¹ 這個活動，有一份維繫，但只是聯誼性，反而更重要的，是每個人與主教的關係。如果按照教會所講，他就是我們的父親。我們有 333 這種聚會，但基本上關係著重的就是主教，然後就是我們自己的團體——堂區。

按陳神父理解，教區神父與修會的培育重點有所不同，教區神父培育重點在牧民服務，修會則著重團體生活。這並不表示修會不重視服務，只是反映團體生活並不是教區神父的優先。修女基本培育便是學習修會精神和修道生活，這需要由專任的初學師負責。為服務的培育是較後期的。修會精神是建基於修會會祖的精神及其所開創的服務。因此如果要瞭解寶血會的培育安排和發展，便要先看修會的沿起和會祖精神。

¹ 為教區神職班舉辦的活動，每月第三個星期三下午三點舉行，簡稱為 333。

一·寶血女修會創立的歷史

中華耶穌寶血女修會是香港教區內唯一一個土生土長於本地創立的國籍女修會，她的誕生與中國人的命運緊密相連，她的存在是為了答覆中國人的需要，她的被召是為中國同胞傳揚福音。寶血會之成立，追溯其始末，與香港教區之發展及傳教需要息息相關。寶血會原是嘉諾撒仁愛女修會的第三會，前輩修女和教會為回應社會和教會的需要，使這團體逐步走上獨立之路，並呈現她們獨特的神恩和使命。

寶血會是在一個動盪的時代中孕育，1841年鴉片戰爭中國敗北，1月25日英軍（愛爾蘭天主教徒）駐港。4月22日羅馬教廷正式頒下法令，宣布香港為「監牧區」，任命瑞士籍若瑟神父（Fr. Theodorus Joset）為首任宗座監牧。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割讓予英國。1860年簽訂《北京條約》，又將九龍半島南部割讓予英國，並准許外國傳教士在各省建造房屋、租買田地。天主教藉著這不平等條約，得以在香港落地生根。天意莫測，有誰料到，在上天的眷顧和祝福中，恩人的襄助及前輩修女的努力耕耘下，這株幼苗——寶血會，就在中國南方的香港這個小島上逐漸茁壯成長。

1·初次召叫——第三會「寶血會」

1860年，嘉諾撒仁愛女修會首批六位意大利籍修女應邀來港服務，由於不諳本地語言和風俗，未能開展為本地人服務。翌年，兩位中國女青年（譚瑪達肋納及譚亞納）進入嘉諾撒會，於1861年8月1日正式進行入會儀式，1862年11月11日穿會衣進入初學，1863年12月25日宣發初願，成為嘉諾撒會第三會——「寶血會」的首批成員。她們熱誠地協助該會，特別為華人婦孺服務，傳揚福音喜訊，擔任中文學校的義務老師等，足跡除遍及廣東沿岸外，更深入內陸至湖北省的漢口。她們的工作和表樣吸引不少中國女青年陸續加入第三會「寶血會」，這正是耶穌寶血女修會新生命的萌芽。

第三會「中華寶血會姑娘」分享了嘉諾撒仁愛會修女的仁愛精神，成為她們傳教上的好助手，展開了各項社會服務，如協助興辦中文學校、孤兒院、診所、教授要理、探訪家庭及醫院病人，走到偏僻的鄉間傳教等。隨著社會上的需求，當時入會的中國女青年沒有接受系統性的培育，只是學習《會規》，聽訓話，遵循修院的日常生活時間表，幫助修女完成工作。經過培訓的初學生在發願後便立即派往傳教區從事牧靈工作，那裡很需要她們的服務。當時，第一位入會的譚瑪達肋納負責第三會的大小事務，包括培育初學生及分配她們的工作，因為她能與意大利修女溝通，並將她們的命令傳遞給其他中國女青年。²

² 《耶穌寶血女修會會規》，頁17-20，頁21-22。

那時，第三會成員居住在意大利修女的修院範圍內的一所小房子，她們穿著黑色會衣，戴上較緊的黑色帽子，發願後戴上聖牌。在服飾上，與意大利修女的棕色會衣，有精緻綳褶的帽子和所佩戴的聖牌均有差異，第三會的服飾較為簡單樸素。

2· 再次召叫——成立耶穌寶血女修會

1919年教宗本篤十五頒布《夫至大》(Maximum illud) 通諭，提倡本地教會應有本地神職，推動教會本地化。香港教區首長師主教按通諭精神，1922年奉教廷之命，協助「寶血會」脫離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正式獨立，成為香港教會首個國籍女修會。獨立之初，修會共有修女三十六位，初學修女七位。師主教委任譚加辣修女為首任總會長——尊稱「會祖」，故香港教區徐誠斌主教喜愛暱稱寶血會為「教區長女」。與此同時，此通諭發出不久，1922年剛恆毅樞機出任駐華宗座代表，協助香港籌建華南總修院以培育國籍司鐸。

3· 寶血會的神恩

梵二大公會議強調神恩在教會內的重要性，在梵二文憲中，有數次提及修會應忠於創會的神恩而生活。³ 梵二前，各修會很少提及自己修會的神恩，故此各修會便開始研究自己修會獨特的神恩。寶血會也不例外，經過數次的會員大會研討後，對修會神恩有了共識：「犧牲、修和、與弱小者同行」。

寶血會的神恩是從修會會祖及前輩修女的生活模式、靈修生活和使徒服務中蘊釀出來的。回想會祖及前輩修女於1922年，在師主教的協助下，從嘉諾撒修會獨立出來時，只帶著小堂裡的祭台，那時真的是一無所有：沒有外援，沒有會院，生活非常艱難和窮困。

「她們要偕同基督，自作祭品，誠然，沒有犧牲、那有祭獻？

她們本身就是愛的犧牲，她們的生命就是連續不斷的祭獻。

從這一天起，她們就以血淚、表率，給自己的修會奠定了堅固的基石。

同時也給後代的姊妹們編織了一面精神的錦繡旗幟，上面繡著：『犧牲』二字。她們明白，她們的生命已與基督結合，永為祭品。」

(《會祖簡史》，頁22-24)

³ 《修會生活革新法令》，#2

創會初期所遇到的困難非筆墨可形容，會祖和前輩修女仰望她們心靈和精神上的支柱和力量——十字架上的基督和這個祭台，明白和體會到要偕同基督，自作祭品，她們本身就是愛的犧牲，她們的生命就是連續不斷的祭獻。她們就是以血淚和表率為初創的修會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她們的精神一代又一代傳給後輩修女，所以寶血女修會特別強調十字架上基督愛的犧牲和修和，並與弱小者同行。

初期修會是在十字架的影子下開始了新生命：修會獨立後，面對生活上的艱難，會祖修女親自下廚，教修女製造各種糕餅，以換取生活費；又上山砍柴或檢樹枝，去沙灘拾扁螺，以減輕修會的負擔。年中的大瞻禮，佳餚只是半隻鹹蛋，幾條青菜。她們住陋室，吃粗飯，穿破舊補綴的衣服，但在會祖修女賢明的領導下，修女們欣然忍受一切逆境，全心委順主旨，熱愛自己的聖召，熱衷福傳使命。那時物質匱乏，但精神高昂。

修會初創時，生活非常艱難，連住屋也有問題，幸賴師主教和數位神長襄助，借出西灣河聖十字徑幾間小屋，作為暫時的會院及學校之用，但屋宇過於破舊，年久失修，住了兩個月，就坍塌了。後來遷往筲箕灣，才解決了住宿問題。直到1929年修會才正式有自己的第一所會院（母院）。母院坐落在九龍深水埗區，直到今日，那裡仍是香港最貧窮、最草根的一區，寶血會修女當時默默為區內貧苦大眾服務，為他們提供教育（義學）、醫療（贈醫施藥）、社會服務（收養棄嬰和孤兒），下鄉傳教（早期：海豐、惠州、寶安、西貢、鹽田梓等地），與草根階層一起經歷生活的甘苦。由於前輩修女在嘉諾撒修會時與外籍修女並肩工作，汲取辦學、照護孤兒等經驗，修會獨立後，她們立刻開始辦學，在二十至四十年代，先後在香港各區開設十多間學校，後因戰亂而停辦，存留至今只餘德貞女子中學。

會祖修女和前輩修女經歷非常艱辛的創會期，她們以生活、靈修和使徒服務，孕育和實踐修會的神恩和使命——「犧牲、修和、與弱小者同行」。

二·修女入會後的培育

每個年代因應社會的需要和修會的發展而有不同培育的重點。本章訪問了寶血女修會四個年代的修女，分別代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在修會內接受培育的經驗，同時又以初學導師的身分，闡述修女培育在梵二前後至現今的各種發展和轉變。至於寶血會培育的重地，不得不提北角中安台。寶血會初學院有頗長的時間就是設在中安台，旁邊是寶血女子中學。初學師會在學校經常出現，接觸學生，因此聖召果實累累。

1·五十年代的培育



代表人物：嚴雪嫻修女，於 1948 年入會。

1956-73 年任初學導師。

被眾修女稱為「阿 Sir」的嚴修女出生於一個扎根於澳門的天主教家族，父親因工作到港，自己也在香港出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約十一二歲時走難回澳門，和平後才回港。

我們走難不是很害怕，也不是很困難，但在澳門時候無法讀書。家姐和我便經常去聖堂，去拜耶穌，然後望彌撒。早上很少人，很安靜，只有一兩個士兵，我們走路也不害怕。當時我們認識了幾個女青年教友。她們也一樣很喜歡去祈禱，參加教會的禮儀。四個人有些來往，其他人就說：「你們這四個人都是會做修女的。」後來她們也做了修女，一個是彭修女。另一個是梁修女。

她們四人最終也確實先後做了寶血會的修女，梁修女更是嚴修女的初學師。其他人為區別嚴修女和她姊姊（嚴碧嫻），稱她姊姊為「大嚴修女」。

我姊姊在香港又認識了一些修女，我們就跟著她認識那些修女，又去探訪寶血會在深水埗的會院。修女們很客氣的，縫衣的陳修女會給我們倒茶，招呼我們。其實我們也不算特別熟那些修女，不過一定是修女出來招呼我們這些年輕女孩子，與我們談天，在客廳吃些茶點，像普通朋友般。

我姊姊回到香港之後，就開始很想入寶血會。我媽沒反對，那時我媽也生病，沒多久就病逝了，剩下爸爸、我們和弟弟。後來我姊姊先加

入了寶血會，我遲她一年，讀完初中就立刻進去做小修生。最終我們四個都入了寶血會。

嚴修女回憶她在五十年代初接受的初學培育，主要是實務的培訓。初學師教導她們做家務、煮飯、清潔地方，園務工作、做蠟燭、祭衣和打麵餅等。另外，耶穌會梁偉道神父則教導她們要理和簡單的三願生活、講道等；另一位較年青的神父則負責教初學生練唱拉丁歌，以準備彌撒用的歌曲。當時，每位初學生均分配一個「本份」，有些負責園務工作、另一些負責打掃和清潔地方及打麵餅等；做大蠟燭則需要全體初學生一起做的。嚴修女的本份就是「負責繪畫及設計祭衣、祭帶、祭台布的圖案，繪畫耶穌聖心及聖母聖心的畫像，這些製成品除了自用，也是送禮用的；有一次神父更邀請我設計一間聖堂的天花圖案。」在嚴修女的回憶中，她在初學階段完成了很多幅畫作。修女們都是全心服從長上的派遣，無論是派遣哪個本份，都會全力以赴。五十年代正值戰後物質匱乏，修會艱苦奮鬥為貧苦大眾服務的歲月裡，培育重點在於日常生活中學習修會精神，準備日後在不同崗位服務。

2 · 六十年代的培育



鄭瑞薇修女，於 1960 年入會。

1977-91 任初學師。

鄭修女的初學導師就是嚴修女，她之所以加入修會，就是因為嚴修女的好榜樣。嚴修女就像磁石一樣，修會內有二十多人都是經由她陶成而成為修女。鄭修女因著當時寶血會修女的榜樣和鼓勵，勇敢面對家人起初的反對，加入修會。

我從小三開始在寶血會的小學讀書。嚴修女當時入寶血會學校教畫畫、《聖經》。小六的時候，因為我學道理的時候不是很專心，常常想著去玩乒乓波，暑假的時候，嚴修女便一對一的教我道理。我又天天去聖猶達堂聽薄暮彌撒，聖堂關門我才走。學完道理之後不能領洗，因為家人不准。我初三的時候偷偷領洗。我記得彭修女很嚴的，但對著我們很和善。當年會長呂燃金校長很痛惜我們，就像知道我們會進入修會，對我們很親切。

我是二十歲入會。修會知道我想入修院，但又知道我父母不准，畢業後便讓我去跑馬地的寶血小學工作，那一年就是準備我入修院。

在學校教書的時候，有一點錢就買一個桶，有一點錢就買一個行李箱，放在衣櫃上面，以為沒有人看到。我每天都會跪下念經，由小學到中學，家人也知道。他們心中有數，因為我領洗也是偷偷的。但入修院就很難這樣了。爸爸是很嚴厲的人。隔鄰堂區何達華神父很鼓勵我入修院，他教我寫信，預好星期六上午收到。爸爸看到那信猛力拍枱。他的秘書問他發生甚麼事。爸爸把信「掙」⁴ 給她看，怎知秘書是基督徒。她說：「我們基督教很少修道的，是福氣來的。」我爸爸沒想到修道是福氣。

當日下午，他約了姐姐、媽媽外出，商量我入修院之事。我害怕得去找嚴修女，留了在學校，不敢回家。當晚回家便躲在「碌架床」下舖，想像著爸爸進來阻止我進修院，怎知道沒有動靜。第二天是主日，當我睜開雙眼，赫然看到爸爸。他對我說：「你去啦！」然後就哭著出了房間。我當天沒有去彌撒，衝了去中安台，告訴姆姆，爸爸允許我入修院。後來才知道媽媽說，如果我嫁人的話，嫁到的丈夫可能是壞的，也可能是好的，機會一半一半，但如果入修院就一定是好。

我7月2日寶血會瞻禮翌日聖母往見聖婦那天進修院。那天早上，我要坐的士去修院，我住春秧街，那裡有電車總站，我嫵嫵直情站在電車路上，不准電車開動。不知他們後來怎樣。我當時的勇氣不知從哪裡來，連死都不能把我嚇倒。

鄭修女在初學院接受的培育主要內容有三願與團體生活、會規等。她說任何時代的培育都以三願與團體生活、會規為基礎。當時十分重視靜默，每天設定靜默的時間，若初學師不說：「讚美耶穌寶血！」誰也不能開口說話。晚飯後大家一起散心大半個小時。當時也很注重做補贖，她說：

上課時，姊妹輪流跪下說自己的短處，例如我今天在守靜默時與姊妹說了話……晚飯時，做補贖時會在飯廳中間跪下，我們做得很自然，那時覺得自己是需要做補贖的。

⁴ 粵語，是用力地扔、丟的意思。

其他時間會做手工、蠟燭、祭台布，打麵餅等，這些都是由助理初學師黃修女跟進。她很了解初學生的生活，會在日常生活中提示大家，例如說話要謙遜些，當時很著重克己和謙遜。黃修女負責跟進初學生日常生活，初學師嚴修女則每天都見姊妹，

原則上我們每人每月一次要見初學師，是跪下來見的，有甚麼事問准，也要跪下，那時不會戰戰兢兢，因為知道是要這樣做，不會抗拒，反而很樂意去做。平日，每人都負責一個本份，例如為聖堂、一樓、二樓、客飯廳、睡房等清潔和打掃。大瞻禮時有大餐吃，可能是一隻雞脾，聖誕節就全體做壁報、搭馬槽，寫五線譜和練歌，過年時就整糕餅，很生活化的。

那時，初學修女大概每兩個月就會出外郊遊、行山，通常會帶備油鑊，上山煮食。祈禱方面就是彌撒、念日課、念玫瑰經、朝拜聖體和默想，很注重各樣的熱心敬禮。當時很少鼓勵個人祈禱，重視集體性。初學的培育是要初學生犧牲個人，投入團體，為耶穌和教會而活。個人要完全投入團體生活規則，不能適應的便要離開。

這是鄭修女在六十年代接受的初學培育。



蘇衍慧修女，1960年入會。

1973-1977年任初學師

蘇修女與鄭修女同期進入修會。她小時候經歷日本佔領，並因戰後社會窮困，隨家人移居廣州，怎料又到國共內戰，晚上睡覺也要穿著鞋，準備隨時走難。她一家最終於1946年回流香港。小時候的蘇修女，對修女的最早印象是來自幼稚園的外籍修女。

每天早上工人帶我去幼稚園，我走到半路便一定哭，因為我不願上學，害怕那些修女。因為她們又高大，穿的衣服又硬板。

她初中三時選了寶血女子中學繼續升學，與寶血會結緣。

因為那時它是津貼，學費才九元多。起初不是叫寶血，叫德貞第二女子中學。我轉去讀了一年，就說修會有錢買到北角中安台，所以高一時就轉了去中安台。

蘇修女在高二開始學道理，因為蘇家不是天主教家庭，嚴雪嫻修女吩咐一位來自世代教友家庭的同學引領她，從而打好了蘇修女的信仰基礎。但這仍未開啟她的召叫，她與其他同學一樣，想像將來會結婚生子。

但我又見到好榜樣，例如呂燃金校長與嚴修女，她們那時真的很苦，又要面對教育，又要擴展學校，又不會公開籌款。呂燃金年年都宣布學校開賣物會，但我發現校長講道理時會流眼淚，感覺真的很辛苦。大概到廿一、廿二歲，我在福德教書的時候，起了一個思想，結不結婚應該要有一個真正的抉擇，所以我就祈禱。

蘇修女的母親因癌症，在她進修院前兩年已離世，否則她也下不了決心。至於蘇父，神師建議入會前兩周才告訴他，結果其父那兩周沒與她說過一句話。即使如此，在蘇修女臨走前，蘇父還寫了平安紙，把她工作時的家用全送回給她。不過，他仍派嬸嬸查探蘇修女是否對家裡不滿，甚至以為她失戀。

我揀了8月15日聖母升天瞻禮入修院。前一晚，他問我：「你已經想清楚了？」我說：「是啊！」他問：「決定好了？」我說：「是啊！」然後他說了幾句話，我記得很入心。他說：「為我是很大犧牲的了，因為媽媽兩年前已不在了，二哥在大陸又走不得，只有工人與大哥在，既然你也決定好了，我希望你（後面這兩句我真的沒想到他會這樣說）我希望你有始有終，做一個好修女。」

蘇修女由兄長提著行李箱，陪同到中安台，卻巧遇比她早一點點加入修會的同學鄭瑞薇。此前，彼此都不知道對方會加入修會。

蘇修女回憶初學生活艱苦，但大家就是在這環境下學習靈修和德行。

起初聽聞入修會很艱苦，但我入到來之後不覺得有甚麼。我想很多修會起初也很艱苦，也不單止我們。那時過大瞻禮，有半隻鹹蛋吃已經很開心了，又要上山斬柴。我入修會時，粉嶺那邊還未大改裝，即現在老人院對出空地是養豬的，我六幾年發願時還在養豬。

初學生修女的培育離不開三願與團體生活、會規等基礎，主要是初學師負責講授的。此外，當時也有邀請神父為她們講解《聖經》。

初學師就一定是講修會的精神，修會存在的宗徒事業，還有修會存在的背景，認識修會歷史，以及靈修方面的東西。此外，還有日常生活的禮貌、倫理的東西。初學受訓的時候，濟利祿神父每天早上獻彌撒，跟我們上課講《聖經》，在禮儀、《聖經》方面打基礎。如果教區有甚麼課程也會帶我們去聽，日常生活也要學習團體生活。

總括來說，梵二前的培育強調團體的服從，犧牲個人自由，達至一致性，不突顯個人特質，甚至可說，個人是淹沒在團體內。禮儀方面，著重公共祈禱、熱心敬禮、靈修、祈禱方法（念經）、靈修語言（死於自我……）劃一化的培訓。所以，培育重點是傳統的靈修培育、修德行、培育初學生學習死於自我、以十字架上的基督為效法的榜樣和在生活中接受培育和鍛鍊。

3 · 七十年代的培育



代表人物：高冠群修女，於 1969 年入會。

1991-2006 任初學師。

高修女也是由於受她接觸到的修女的榜樣所吸引，萌生修道的念頭。

我是中二領洗，是嚴碧嫻〔大嚴修女〕教道理。鄭修女是我班主任。我怎麼會被吸引呢？我家是對著學校的，相隔一條馬路，我常常喜歡倚在窗邊，看著學生及修女走下來，有時會有幾個修生一起，一班人嘻嘻哈哈，看起來很開心，覺得這一群人很有趣。大嚴修女在學校講故事，我很喜歡她，常常跟著她。我也常常跟著一位高修女。當時個個修女都是個子矮小，黃珍珍就比較圓潤，終於有一個高大又漂亮，跟我一樣姓高的，所以我跟她改聖名叫高依搦斯。那時我加入了她管理的唱經班，未領洗已懂唱全部的拉丁聖歌。我領洗之後，鄭修女她們來了，終於有一些年輕活潑的修女。

高修女加入修會的念頭是在與修女交往中，受她們的影響，想成為修女的想法自然而然地在心裡滋長。時候到了，鄭修女一句說話，便水到渠成。

我很記得跟鄭修女在魚塘釣魚，她突然問我：「你是否想入修院？」我當時懵懵的回答：「是的」。然後全部修女就當作我會入修院，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四放學後就帶我們去修院朝拜聖體，跟著院長莫慶如修女會請我們留下吃飯，我們便會很開心，又和一些修生一起玩。

至於她入修院的經歷可說很戲劇性。她的家人十分反對她入修會。

我離家出走過兩次。父母反對嘛，電單車一直追蹤過去。劉賽眉修女剛入初學院的時候，她父母來找會長呂金燃修女，還跪下來求她要他們的小女兒。因為我是她領洗的代母，她在高三最後一年才領洗，半年後突然間跟我說入了修院。我說：「你入我也入吧。」怎知道她行，我卻不行。她爸爸跪會長，會長仍接受了。而呂燃金修女卻把我趕回去，因為我還未夠十八歲成年。我媽也有去跪，卻是說：「她才十七歲！如果你要收她，我就告妳拐帶未成年少女！」因為父母不是教友，家人覺得我被騙。修會害怕，就沒收我。

高修女在學校教書一年，但母親還是不准她修道，耶穌會的神師便介紹高修女到香港躲起來，是她第一次離家出走。

他真的是這樣介紹我，我才夠膽，收拾了幾件衣服就出發，坐大船回香港。我媽媽娘家其實在香港，而我是住在澳門。我自己要「走路」⁵，神師介紹我去善牧會，因為在善牧會工作可以住在那裡，跟著對我說，不用回家了，就不用跟家人交代。那位神父很大膽，不過很有聖德。

善牧會的修女很幫我，她們很想我入她們的修會，因為她們見我每天早上都會望彌撒。後來有一次，會長呂修女帶著一群修女去南朗醫院探修女，便順道往隔壁善牧會探我，那些修女打鐘叫我過去，這才知道我是屬於寶血會的。但是善牧會的修女還是對我很好。

高修女躲了兩年，其母仍沒改變心意，且找到了她。她便再次出走。這次，呂修女就把她收在寶血會粉嶺兒童村照顧小朋友。後來呂修女決定收她入會，家人為此更公開說要斷絕關係，三年初學也沒有探望過高修女。

到後來他們也是認我的，就是在我發願的時候。我不管怎樣，寄了一張卡回家，告訴家人我發願了。初學那三年，我看到別人都有家人來探，只有我沒有，也覺得很淒涼。他們連電話也沒有打給我。我寄那

⁵ 偷偷逃走的意思。

張卡，也不知道他們會不會來。那次我們發初願很隆重，1972年是修會五十周年，在聖方濟各堂初願跟會慶同時慶祝。我家就在界限街，聖堂離我家很近，我本來打定輸數他們不會來，怎知道後來有人跟我說：「你家裡有人來呀！」我嚇了一跳，誰來了？我探頭偷看，才知道我媽媽姐姐全都來了，還有一個老姑婆，那時她反對得很厲害。後來我媽跟我說：「我覺得你米已成炊了，見你這麼有毅力，我們也不再爭取了。」後來她不停跟我們的修女說：「你不要小看她，以為她很純品，腦裡面有很多『計仔』⁶的。」

高修女回憶第一年做備修生時，主要是團體生活的學習，因為導師有自己的全職工作，待晚上導師回來時便一起散心聚會，只有星期六、日可以上課及見她，平日其他時間都是祈禱及閱讀，日常生活是由一位年長的修女負責。當時備修生有八位，四位是香港的（後來先後相繼離開），另外四位是來自澳門的，高修女是其中一位。她說：

我們四位澳門的初學生很懵懂的，因為澳門的生活很悠閒，但來香港後感到生活很急忙，每事都要快，常感到急急忙忙的，我們需要學習適應生活。最深印象是我們胃口大，可能沒有甚麼重要的事要做，加上八個都是年輕人，一大罐餅乾在一次茶餐就吃完了。

第二年入初學，高修女是嚴修女最後一、兩批的初學生，那時已是梵二後，在培育課程上已有很多的改變。初學師每天上、下午與初學生上課，高修女說：

初學師上課，我不大入腦的，感覺內容好抽象，但多是講信仰的道理如耶穌聖心，為何要愛耶穌聖心等，還有三願，可能是自己吸收得慢。但有一樣為我很深刻的就是「座談」，那時因為是梵二後，梵二推行「交談」，當時每日都有一段時間要「談話」，每次「談話」是有話題的，大家圍繞這話題來「談話」，每次我都好怕，因為我們四個澳門的都不太懂講話，無法插入話題，但香港四位都是能言善辯，很懂得聊天，所以初學師常問為何我們不作聲。

另外，當時的初學師嚴修女也會請鄭志誠和陳振威等神父來初學院教禮儀及一些有關梵二的思想。「我們每星期一次往堅道參加教友神學班，為期一年，也從中吸收很多。至於在生活上的培育，為已有工作經驗的初學生，對於以前一些傳統則很難接受和理解，例如：打爛碟後要捧著它跪在初學

⁶ 很多想法，計謀。

師前告罪等。總之在初學期，甚麼事都要問准許，即使如衛生紙等生活所需，常有點戰戰兢兢的感覺。」雖然如此，每當有瞻禮及修會慶日時，初學生們便要負責娛樂節目——編導話劇，表演給修女們觀看，讓大家從中學習分工合作及各展其才，雖然很忙，但能加強團體生活的歡樂氣氛。高修女認為三年的培育看似懵懂，事實上是為她打下堅固的基礎，明白甚麼是祈禱生活，奉獻和服從的意義，日後在聖召上遇到挑戰時能越過，也學習了在團體生活上付出和關注別人的需要；有助她日後當初學師時，能了解初學生在團體生活上的困難，鼓勵她們不怕發問，以開放的心接受培育。

總括來說，六七十年代初學院的生活日程安排得密密麻麻，完全沒有個人空間可言，目的是讓初學生沒有閒暇，因傳統上認為有空閒時間，魔鬼便會入侵，擾亂心神，使人陷於誘惑。但亦可見梵二帶來的改變。由個人完全淹沒在團體中，到開始關注初學者的個人想法和感受。對修會生活和教義不再只強調順服接受，不能質疑看來不合情理的部分。對話成了主要的培育取向。

4· 八十年代的培育



代表人物：雷月明修女，於 1984 年入會。

2006 至今任初學師。

雷月明修女少時也是德貞中學的學生，放小息的時候就會按鐘找鄭修女聊天。或許隨著時代進步，社會對修會的認識和接觸，雖然未必深入，但到了八十年代已有所不同，就像雷修女，家人雖有不解，但遇到的阻力就相對輕微。

我做初學生的時候，鄭修女做初學師。我爸爸起初也是反對我入修會，他問我：「有甚麼好做不去做，要去做修女？」他說，在街市看到修女乞討飯菜，他會覺得為甚麼你要這樣做？他們不明白。但我面對的反對不是很強烈，沒其他修女這麼厲害。因為以前真的有修女在街市向小販乞求飯菜，問他們今天有沒有賣剩的菜。

雷修女的初學師是鄭瑞薇修女，那時在初學院的生活仍保留一些傳統模式，但沒有以往嚴格。她說：

入會後，我記得初學師對我說，每星期可打電話回家一次，過時過節可回家看父母，每月第一個星期日，家人可來初學院探望。未正式上

課前，就開始學做本份，當時我是負責三樓全部及樓梯的打掃和清潔，每天要用上半個小時以上才完成。雖然這些本份在家裡沒有機會做，做起來也很吃力，但對我是一個很好的鍛鍊，並培養我的責任感和歸屬感。

雷修女很快便適應了初學院的生活，當時有兩位初學生，四位望會生（她是其中一位，後來其中兩位望會生因健康和個人理由先後離開）。初學的培育與以往有很多的分別，除了日常上課如三願及團體生活、修會神恩、會章、修女手冊外，每星期有兩晚到堅道教區中心上教理班，星期日到堂區教兒童及青少年慕道班，暑假參加兩個月密集式的社會分析課程。每隔兩三個月會到長洲思維靜院避靜數天。培育方式也較開放，讓她們能在各方面學習和體驗，以擴闊心靈的視野。

八十年代的初學師特別關注初學生人格成熟和靈修的培育，每兩個星期見初學師一次，每天需要有個人的祈禱時間。平日生活除了基本功（彌撒、默想、早、晚禱，朝拜聖體，念玫瑰經、各樣的九日敬禮、省察等），加上初學生一起讀《聖經》、做運動（打太極）、各自做本份（家務），偶然做蠟燭、打麵餅，每晚有散心時間，每月一次外出郊遊或行山，生活忙碌而充實。

為雷修女初學時期最深刻的印象是：

每兩星期見初學師一次，初學師把我以往或童年時未曾處理的情緒或事件都拉出來，把妨礙我吸收天主恩寵的障礙都慢慢清理和處理，我感到這是我初學最大的得著，心裡沒有障礙，自然能吸收天主的恩寵和所學習的課程。另外，每天都有個人祈禱時間，與主建立密切的關係，為我日後的修道生活是十分重要的。

雷修女現時回想起初學師恩威並重的教導，對她日後作為初學師時有很大的幫助和提示，對初學生需要用心培育，給予她們成長的空間，容許她們在錯誤中學習，以包容和接納的態度陪伴她們。

到八十年代初學培育已有規模。生活中學習修道生活的精神，固然是重點，但當中人格成長更是基礎。認識自我和認識信仰是一個銅幣的兩面。人格成長和信仰成長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如教理班，社會分析等知性的培育也加強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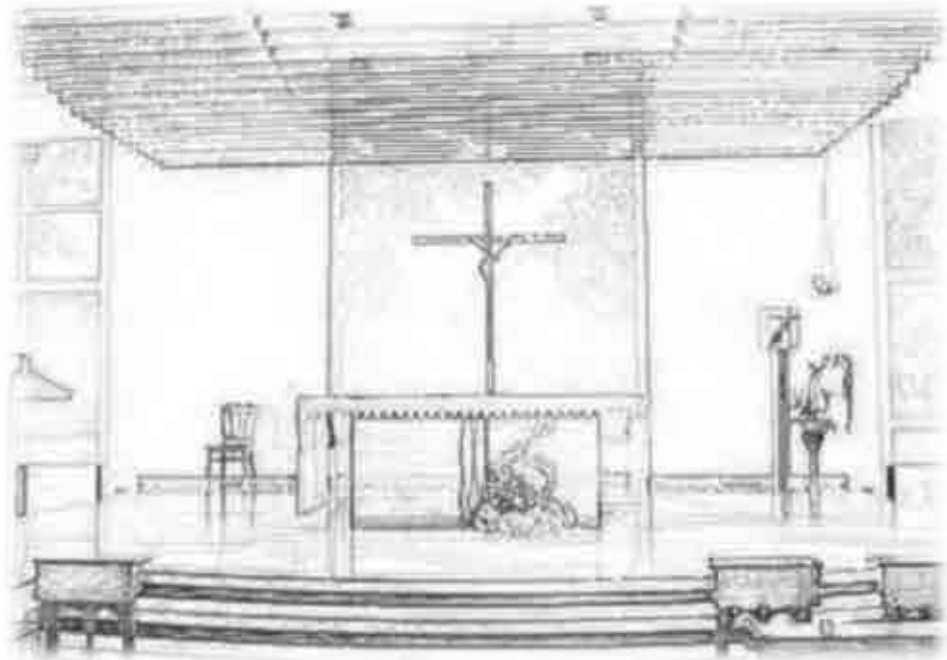
5· 修女初願後的培育

修女發初願後，初期只有初願的培育（發初願後的第一年），接著便離開初學院，被派往其他會院居住，並接受修會派遣給她的工作。初願修女每月一次見暫願導師，由於生活模式和環境改變，初願修女會向暫願導師訴說她們的生活和工作，

大多是談論團體生活上的問題。相信是七十年代後期才有整個暫願期（六年）的暫願導師跟進。由於當時暫願修女者眾，這些年青的修女除了定期見暫願導師外，她們自己也組織聚會，彼此分享生活和工作上的得失和喜樂，在奉獻生活上互相支持和鼓勵。

六十至七十年代間，當時的呂燃金修女和莫慶如修女等修會長上很重視培育工作，她們會按每位年青修女的性向和所長，也看修會事業的發展和需要，派遣她們接受專業的培訓如讀醫護、師範、社工、神學教義等課程，長上派遣她們在香港、台灣或往海外攻讀這些專業課程。八十至九十年代，則大部分暫願修女均有機會往台灣輔仁大學接受教義神學的培訓。

後來修會委任三位修女（包括輔導期導師、初學導師和暫願導師）組成培育團，以負責各階段的培育，即入會前一年、初學前期、初學期及暫願期的工作，以銜接她們的培育方向。



三·如何培育初入會的修女

在前半章分享個人接受培育經驗的幾位修女，亦以初學師的身分繼續分享她們面對的種種挑戰！

1·六十年代的初學師

嚴雪嫻修女 1956-73 年任初學導師

嚴修女任初學導師近二十年，修會現時大部分的修女可以說都是由她培育出來；那年代入會者眾，她負責培育梵二前、後的初學生。

梵二前的培育，她上課時會教初學生三願和會規。那年代培育的特徵，除了上課、最重要是見初學生，每天不停地一個接一個地接見，了解她們的心聲，心中的懊惱，嚴修女會在靈修上指導她們，教導她們修聖德、克己、謙遜、學習十字架上的基督，不計較，願意犧牲。嚴修女說：

不過我剛做初學師的時候，真的不知怎樣做。初學師這個名字要做甚麼呢？我第一件事就要幫她們愛天主，因為修道這條路就是追隨天主。隨後的日子，我真的很認真的見她們。所以如果遇上吃飯時間，初學生仍然講著的時候，我不敢截停她們，一定給她們訴心事。我覺得由我擔任初學師開始到完結，見初學生是很重要的事。我不會因為忙而不見她們，要給她們的印象是我很重視她們。這個為我很大幫助，遇到姊妹有困難的時候，會很信任我。她願意講，我就聽。我是陪伴初學生走修道的路，要明白初學生內在的問題，要她們自己說出來，所以我當初學師這段時間，沒甚麼時間寫東西，沒甚麼備課。總是知道她們要見我，我就要給她時間，她們就會覺得疏導了內心的結。我的時間表就是這樣。

那時初學院的時間表非常充實，沒有空閒可言，初學生有固定的祈禱時間，還要練歌，做手工、做祭衣、蠟燭、打麵餅等。遇到慶祝會祖、會長或院長瞻禮，初學院會表演話劇，內容要自己編排，服飾、化妝、燈光等設計，都是由嚴修女及初學生負責策劃。這些話劇都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在當時是初學生的蘇衍慧修女記憶中：「香港教區基督君王節瞻禮，現在叫傳教節，在政府大球場，掛有一大幅海報，曾有一年是叫我們初學院做，我們便一起動工，鋪在地下畫畫設計。圖要很大……我們在初學院全部打通，鋪在地上，大家總動員，很開心。」這些都是初學生在接受培育時的片段。

梵二後，教會和修會因梵二的新思想受著很大的衝擊，當時有很多神父、修女離開鐸職和修會，寶血會也不例外。嚴修女在梵二後培育初學生，需要跟上教會的步伐，開始為初學生講解梵二的文件，這為她增添不少壓力：

梵二後培育初學生，我感到有些困難，因為梵二後頒布的文件，我自己也不太懂，但要教初學生，三十多位初學生坐好等我教書，我按住書櫃看，真的不知從何入手，只好求耶穌和聖母的幫助，幸好也能完成使命。

那時要講梵二的四大憲章。我便到書櫃找資料，看東看西也覺得不妥，心裡直叫：『天主，你救救我吧，真的很困難啊！』因為那是憲章，我自己又未受過很多教育。梵二的東西都是新的，教育又變了很多，那時要講給初學生聽，我也不知道從何入手，唯有拿本書來自己研究。那時真的很大壓力，很困難，很困難。

同樣，初學生也未必能掌握箇中意義，這是一段動盪的過渡期。嚴修女的初學生鄭瑞薇修女回憶說：「嚴修女當初學師的時候有一樣事情很特別。她一定有自己的時間去拜苦路，有自己祈禱的時間，這很感動我們初學生。總之，她不用和我們一起的時候，就一定去祈禱、拜苦路，到現在也一樣。」嚴修女解釋說：

這個可能是習慣。我自己做初學師，實在要做甚麼呢？有甚麼基本的東西要讓你明白？如果講到神修、學問，我真的沒有。我只是敬拜聖體的時候，她們跟著我。我怎樣做，她們無形中就跟著我。我做初學師的時候心裡總是覺得沒甚麼，只是全身投入初學生的需要當中。我對神學，深奧一些的實在不懂說，只會拿著一大本筆記要講的東西，要說神貧、貞潔那些，但不是有很大底蘊的能力。

嚴修女雖然沒有接受過做培育師的訓練，她就是這樣身體力行陪伴初學生，讓初學生在她的生活見證中學習。這可說是以生命感染生命的楷模。

2·七十至八十年代的初學師

蘇衍慧修女，1973-77 任初學導師一職

蘇修女在嚴修女之後接任初學師。雖然擔任初學師只有四年時間，卻也培育了寶血會 2021 年 8 月剛落任的會長鄺麗娟修女。

我做初學師之後，入修會兼發了願的修生就有鄺修女，還有謝桂英修女，她現在幫老人家。她在澳門聖德蘭小學幫胡修女打理廿幾年，到

現在我們還在幫澳門一間教區學校。還有一個就是讀過師範的楊美蓮，以前教寶血小學，已退了休。

伴隨著梵二的改革，七十年代初的初學已不止是基礎培育，《聖經》、禮儀和神學也是學習範圍。但要找講課老師在嚴修女年代並不容易。蘇修女說：

嚴修女那時根本想讀也沒得讀，香港教區都未有神學院。後來就找外面的神父固定地來教，最重要是禮儀與《聖經》。我做初學生時就有濟利祿神父，我做初學師那時已經多了很多神父可以請來講課，像慈幼會的張默石。瑪利諾會區成賢，他很熟悉靈修，可以幫這些初學生，帶她們做祈禱。又有恩保德、徐志忠，還有梁達材、鄭生來。聖母聖心會田恆利神父，我們很熟，很多時請他來培訓初學生對禮儀的認識。有時請專人來教一些關於社會、心理輔導，關於每類不同東西都有接觸。

蘇修女和嚴修女都沒有接受過做初學師的培育，但靠著個人的德行和靈修，在共同生活中，以生命感染初學生，讓她們領會當寶血會修女的品質。蘇修女在 77 年被選為總會長，因此便要交棒給鄭瑞薇修女。

鄭瑞薇修女，1977-91 任初學導師一職

跟她的前任初學師不同，鄭修女做初學師前，在 76 年有機會到芝加哥羅耀拉大學修讀了一年的培育課程裝備自己。當時，初學院平均每年共有五位初學生及望會生，要維繫她們之間的關係不是易事。鄭修女上課的內容也是著重三願與團體生活、會規、靈修。每月她會見初學生兩次，一次是初學師主動，另一次是初學生主動寫紙約見。每日彌撒後靜坐默想，打太極刀，早餐後做家務，分別與初學生及望會生上課。每個星期有座談會作《聖經》分享，大家很開心地分享。那時初學院有一位助理初學師，幫忙負責培訓初學生做家務、學習煮食。有一位長者修女住在初學院，有臨在和陪伴的功效。當時，鄭修女也會請一些神長來為初學生上課，如陳維統神父、胡健挺神父來講《聖經》；也有告解神師定期來初學院聽告解。每月一次出外郊遊，鄭修女著重初學生的個人祈禱，培養她們有自律精神，更讓她們與主建立密切的關係。一般來說，鄭修女與初學生的相處沒有困難，初學生也很受教。而她這些年來的感想是：

培育與教育是兩回事。教育有好明確年期，例如中一至中三。培育是另一回事，所以我常常有一棵植物放在我眼前，提醒自己不能揠苗助長，讓我知道培育人要用心思，不能強求。

3 · 跨越千禧年的初學師

高冠群修女，1992-2005 年任初學導師

高修女是接續鄭修女的培育工作，那時修會聖召已遞減，三四年才有一位女青年入會，高修女任初學師時共有四位女青年入會。高修女感到初學師與初學生一對一相處是很困難的，加上每位初學生性格及背景不同，有年紀較大及工作經驗豐富，也有年輕且教友年資淺等，需要時間彼此磨合，同時在課程編排上也需要因材施教，度身訂造。由於三年的培育都是一對一的關係，高修女想到初學生需要一種「外在的出路」，因此，她給初學生出外讀醫院牧靈課程，讓她們更深認識和了解自己，清除一些內心的障礙；一個月一次往大嶼山神樂院跟莊宗澤神父學習祈禱，以加深與天主的關係。平日通常上課是整個上午，一般上課內容也是三願及奉獻生活、會規、修會精神及祈禱靈修等，目的是鞏固其跟隨主的基礎；下午則是個人閱讀聖書及《聖經》，個人祈禱時間。由於在上課期間除講解課程內容外，也有與初學生深入交談的時間，特別是有關她們在團體生活上所遇到的問題及困難，作出提示及鼓勵，故沒有規定見導師時間；高修女認為：「團體生活，真是一所學校，我們做導師也是用團體生活來教她們，讓她們學習如何放下自己及與人溝通。」此外，也讓她們到聖神修院修讀《聖經》課程，及參加人格靈修課程，每星期六負責買餸煮飯，也會安排出外郊遊活動，總之只有一位初學生時，按個別的需要而靈活調整課程教授的方式，讓她們學習在開放的氣氛下度有紀律的生活。

高修女回想她做培育導師時，心中常提醒自己需要向聖神開放，每天祈求聖神帶領，將初學生交託給天主，因為培育工作是人心的陶成，而改變人心的是天主，不是自己的力量能做到。

4 · 千禧年代的初學師

雷月明修女，2006 年至今任初學導師

雷修女是接續高修女的初學導師職務，修會的聖召更為稀少，差不多數年才有一位女青年加入。自雷修女接任後，先後有三位女青入會，她們已有工作經驗，且具備自己的專業。雷修女覺得做培育工作需要投放時間和心神：

與初學生相處不感困難，但重要的是我需要整個人的心神臨在，除了上課外，在生活中更能發現她們待人處事的態度和動機，我會把握這些機會培育她們，為她們日後的好處及藉此加深她們與主的關係，我會懇切提示她們，其中有初學生起初不大習慣我在這些小事上那麼認

真提示她，待她發願後，調往另一會院生活，生活上遇到同樣的問題時，她才明白當時在初學的時候我為何提示她。

雷修女認為初學的培育很重要，是日後修道生活的基礎。

雷修女培育初學生，每星期有三天上午上課，內容包括：修會歷史與神恩、三願及團體生活、教會靈修傳統、十字架靈修和奉獻生活等。由於是初學師與初學生一對一的上課，故能更深入討論。每星期讓初學生有一天往聖神修院修讀《聖經》課程，星期三活動日，可出外郊遊或做活動，星期六做園務或家務，也按個人的情況和需要，修讀教理班課程或人格與靈修課程。暑假每位初學生均接受醫院牧靈的培訓，以加深自我認識和了解。

祈禱方面，除公共祈禱神業外（每日默想、彌撒、早晚課、午間禱、念玫瑰、朝拜聖體，夜禱及省察，每周五拜苦路、周一座談會），雷修女很重視初學生的個人祈禱，默觀十字架上的基督，看著基督的苦像，對初學生有何啟示和感受，這些都是初學生默想個人的十字架靈修，以不斷加深與天主的關係，讓基督成為她心中最重的優次，在日後的生活和使徒服務中，能活現出來。此外，每個月按初學生的需要往長洲思維靜院或大嶼山神樂院避靜。

每兩個星期雷修女會見初學生一次，了解初學生的內心情況和進度，也盡量幫助她們疏導和處理內在困擾的情緒和事件，引導她們以主為中心，漸漸釐清自己跟隨基督的方向和動機，同時不斷淨化，學習捨棄不屬於天主的事物，專心侍主。雷修女說：「我感到培育初學生是天主交給我的使命，感到困難的是未能全心全意專注於培育的工作，因身兼修會其他的職務，偶然也會分散我的心神，這是我感到無奈的！」

初學生經過初學前期及初學期第一年的培育後，踏入初學期第二年時，她們會接受半年生活和使徒服務的體驗，一般會安排她們到別的會院居住，體驗團體生活，學習與姊妹相處，同時亦會派她們到會屬的機構做牧民實習，如在學校的牧民工作，接觸學生等，或到其他機構如醫院的牧靈探訪、仁愛會的慈善服務等。初學生完成這半年的實習和體驗後，回到初學院便進入半年潛修期，潛修期專注於加深祈禱和反思，主要是讓她經過繁忙的體驗和實習後，善用這段時間收斂心神，回歸心靈深處，有足夠的心靈空間整合她實習時所獲取的經驗，每星期有一天的靜獨日，讓她在靜獨中與主相遇，藉深入的反思、內省和整合，使在初學期所學習和體驗的一切，能整合於信仰中。為準備心神宣發初願，初學生會在思維靜院做一個月的神操，讓她對天主懷著信德和勇氣，回應天主的召叫。

雷修女常銘記並感謝天主將祂所愛的初學生交在她手中培育，她定會盡心承擔天主交託的使命，並常為初學生及自己祈禱，求天主保守培育的工作。

四·見證時代轉變

從五位修女的經驗分享，可看到初學院由五十年代至近代的轉變。初學師得助於專業培訓，有了技巧上的進步；但同時間，因時代演進，初學生學歷提高，並且有了社會經驗，在調教上比以往更具挑戰性。

九十多歲的嚴雪嫻修女明顯觀察到這些轉變：

當然有所不同。現在的初學生，聰明、有學問、有眼光、可以應付很多事情，能夠分辨事情，甚至自己都不懂的，你就會知道她們比自己能幹很多，自己差很遠，但我做她們的上司，幸運的是大家都能相處到，她們沒有為難我，否則我都不知怎樣應付。為我自己並不感到很大的困難，她既然是初學生，遇到困難都會說給我聽，我就這樣接受她們。若然初學生很能幹，我就以我「不能幹的方式」去教導她。試過有初學生說：「我不成功，都是因為你是初學師說我不行。」我是因為她當時的表現、態度下的判斷，我只是做回我的本份。我是有份參與討論，表達我的報告。我不會，也沒有能力把你拉下來。我沒有這個權力不給她發願。現在她對我相當好，不過她在他人面前也說因為我而當不成修女。我覺得我教導你不是跟你「比武」，如果初學生表現過分，我會提出她們的錯處。這種情況是會出現的，因為早期的初學生讀書不多，後來的初學生，差不多都是高中、大學畢業，修會方面都需要人才。

千禧年代初學師雷月明修女表示：

其實梵二之後有一個很重大改變。梵二有一本《修會革新生活法令》，是所有奉獻生活的人想怎樣革新自己。由以往制度性，轉為神恩性，開始著重每個修會內裡的特別神恩。每個修會都是獨特的，有不同神恩，例如寶血會與嘉諾撒修會是不一樣的。梵二之後比較著重這樣。例如我們修會每四年開一次大會，在會中我們會進行檢討，面對現在世代，我們怎樣革新自己的生活。即使講培育，嚴修女的時代是以她的時代的方法去培育，而且是數十人一起。我們現在很大的困難是一對一，好像現今家庭對獨生子女一樣，一方面是沒有了團體的刺激，雖然教學的內容是一樣，三願、會章等等，但教的方法和怎樣去培育她，要因人而異。她可能已經三十多歲，一個很成熟的人，當她入修院後，我要在她身上教一套比較自由、當中又要維持以往傳統的培育。真的要按她的性格，她生活出來的獨特性來教。但為我們來

說，一對一是絕大困難。我們連初學前期都兼顧，而初學共三年。本來是分兩部分，但現在因為人少，一般都合併一起做。連續三年都是對著同一個人。

九十年代初學師高冠群修女指出：

我和雷修女都是一樣，就是一對一的問題，無論生活及學習均缺乏同輩互動的機會，特別是一些思想較開放自由的初學生，需要按她們的思維而度身訂造一套培育的方式。隨機應變，思考不同的方法，以祈讓她們更深入了解奉獻生活的意義；幸好我們之前有接受專業培育。嚴修女她們雖沒有這種機會，但憑著她對天主的信賴，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初學生，證明陶冶人靈的能力是來自天主，我們只是陶工而已。

五·結語

回應陳志明神父對比教區神父和一般修會培育的分別，寶血女修會的培育與教區神父實在有不少相同之處。寶血會與別的修會不同的是它原是嘉諾撒仁愛女修會的第三會，它的出現是因著當時實際牧靈服務需要懂中文的修女，是服務先行，及後逐漸形成修會靈修精神。而且寶血會是教區國籍女修會，主要是服務本地教會，所以修女的培育會考慮修會服務的需要，如醫護、教育、神學或社會工作。這些都與教區神父相似。雖則如此，修女與教區神父的培育實在不同。配合修會服務的培育大多是在完成初學之後才展開。修女初學期是學習三願、團體生活和修會精神，靈修培育和度修道生活更是日常之重。這是修道人的基礎培育，而教區神父的培育在這部分便顯得很不一樣了。



01

01 北角中安台初學院



02

02 初學生上課



03

03 初學生話劇劇照：楊門女將

04 寶血會筭筆灣會院

05 初學師為基督君王節繪圖

06 初學生發願

07 帶油鑊去旅行

04



05



06

07



總論

要重塑華南總修院 / 聖神修院這兩個培育神父的搖籃，我們應先簡單回顧一下天主教會對神父培育的整體歷史。在初期教會，天主教並沒有修院這回事，而是像《聖經》裡的描述一樣，門徒跟隨耶穌基督那樣的師徒制。到了教父年代，隨著西方興起隱修主義，神父培育受隱修形式所影響。修道人每天除了固定的勞動，還會閱讀和抄寫《聖經》、閱讀關於隱修和教父的讀物。在中世紀初期，對修道人的要求由文法、修辭及辯證法三藝 (*trivium*)，變為包括了算術、幾何、天文及音樂的四藝 (*quadrivium*)。這兩種程度的教育，成為了學習神哲學的門檻。到了八世紀末，法蘭克國王查理曼 (Charlemagne) 下旨要求神職人員懂得讀寫及有充分知識去履行職務。文法學校 (reading school) 便順應而生，作為測試神職人員及主教能力的場所。時至中世紀末，神職人員道德滑落，一般認為主要導因是教會沒有正式的司鐸培育機構。即使是第五屆拉特朗大公會議 (1512-17) 都未能帶來實質的改革。1536 年，教宗保祿三世 (Pope Paul III) 任命一個委員會去研究神職人員改革問題。該委員會的報告雖很中肯，但未觸及為司鐸的靈修和學術培育而成立相關機構的需要。

這情況一直至脫利騰大公會議 (1545-63) 清晰地提出對神職人員的改革，提升他們質素的建議，並且得到教宗尤里烏斯三世 (Pope Julius III) 的同意。在此期間，由耶穌會開辦的羅馬學院於 1551 年成立，至 1565 年已有近千名學生接受神哲學的培育。羅馬學院可謂首間神職訓練學院。聖依納爵為修院訂立的規章，亦為後期羅馬的其他修院採用。故可說，修院的設置已初具模式。¹ 1563 年，教宗比約四世 (Pope Pius IV) 繼續餘下的脫利騰大公會議，通過了關於「為神職人員建立神學院並在其中進行教育的方法」的決議，重點包括每間主教座堂和都主教堂均應設有自己的修院；小型或窮困的教會轄區可聯合一起成立地區性的修院；進入修院的候選人應年滿十二歲，有讀寫能力和合適的品格；窮人的兒子應予以優先錄取；學術的培育應適合候選人的年齡和能力；教授的課程包括文法、人文科學、誦唱、教會算術、《聖經》、信理、倫理和牧民神學等；靈修培育包括神職衣著、剪髮禮、每天輔彌撒、每月辦告解，以及在神師准許下領聖體；教授人才需要有碩士學位，對專研科目要有教會認可的授業資格 (licentiate) 或博士學位等等。²

¹ “History of Priestly Formation,” Seminary of Christ the King website: <<https://bit.ly/3iXdr46>>, [20-6-2021].

² General Council of Trent: Twenty-Third Session, Decree on Reformation, Chapter 18: Method of establishing Seminaries for Clerics, and of educating the same therein, <<https://bit.ly/3iTxxnF>>, [20-6-2021].

由於脫利騰大公會議亦推動教會行政中央化，這使得普世教會之後的修院培育相當一致。³

從以上的簡史及大公會議的決議內容，可以看出華南總修院的運作，承接了教會近四百年的培育傳統。華南總修院於 1931 年成立，最初決議是為廣東及福建兩省設立的區域修院，至建成之時加入廣西省，合共十六個教區、代牧區及監牧區。教廷傳信部將之交由愛爾蘭耶穌會士管理，跟隨普世教會當代對修院培育的固有模式，以拉丁文為神哲學的教學語言，主要是訓練他們成為服務堂區的神父。修院的主要管理者包括負責修院事務和修生靈性成長的神長。院長 (Rector) 是由教區主教委任，掌管修院一切大小事務，直接向主教負責。其下可設有副院長 (Vice Rector)，協助處理修院行政事務，但此職位並非必然。至於神師 (Spiritual Director) 則負責培育修生的神修，故需要德高望重，非常著重神修的神長。他每天早上引導修生做默想、定期接見修生、聽告解、指導他們如何度正確的神修生活等。總修院的設立是回應中國主教會議落實本地化的號召。然而，其建成的年代，香港仍是宗座代牧區，由來自意大利的宗座外方傳教會託管，堂區主任司鐸均為外籍傳教士，是故國籍神父只能充當副手，對國籍修生的培育，看重的是他們將來能否成為負責開彌撒及牧養教友等禮儀性牧民工作的「好神父」。

然而，這種副手式「好神父」的培育，隨著香港本地社會的發展，修院作為社會一員，卻無可避免地要跟隨社會前進的步伐轉變，培育一些與社會相契合的牧者，牧養好教會交託的信眾。縱觀五十年代因中國支持北韓，被聯合國合實施禁運，香港的經濟遇上了前所未有的機遇，由轉口港轉而發展製造業。香港在六七十年代人口激增，加上 1949 年後內地人移居香港帶來的資本和技術，令香港經濟蓬勃發展。在不同範疇上都有不少新事物湧現，豐富了本地的物質和精神文明。這段時期受訪的神父修讀的學科和牧民訓練，較以往的廣泛，而且漸漸趨向系統化，尤以聖神修院 1964 年由香港教區營運以後更為顯著。梵二後教會要求突破以往的傳統，探索發展新路向，提升修生的學術水平；教區神父完成神學課程而獲得學術上的認可是前所未見的，這可視為修院為修生準備與急速發展的社會接軌的重要一步。至於牧民訓練更可看出修院管理者的心思。由早年封閉式的培育環境，漸漸趨向提早步出修院、走進社會，接觸社會不同階層的人，他們都是未來鐸職中可能會遇到的。有部分修生更有機會離開香港這個舒適圈，到異國體驗，從而更認識自己，有助於他們未來的職務。

³ “History of Priestly Formation,” Seminary of Christ the King website: <<https://bit.ly/3cXrYZE>>, [20-6-2021].

設立總修院的來龍去脈已有不少著述，基於本書是口述歷史紀錄，而三十年代已沒有可訪問的對象，只能引用文獻史料，如年慶特刊作敘事性的簡介；亦因為沒有在世者可求證，簡單如總修院首年的修生人數，也有幾個版本，即使同一年年慶特刊內也有兩個不同的數字，只能依賴兩幀相片作為佐證，去推斷哪一個版本更為可信。

在華南總修院時代的管理者及修生，當然不知道自己已處身於修院固有傳統的尾聲。在本研究中，神父的口述歷史訪問以第一身的經歷為我們重繪了總修院一幕一幕的畫面，這個傳統一直持續至六十年代初期，直至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62-65）之前。不過，他們的遭遇還同時受社會政治環境的左右。踏進四十年代，我們看到總修院面對戰爭及日佔時期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戰火中，修院的運作幾乎沒有中斷過，在物資匱乏的情況下，仍然保守著修生的培育。修生也配合地各盡己能，省吃省喝，齊心地支撐修院的生活，經過差不多三年多的時間，直至日軍停止配給糧食，修院糧盡，被迫把修生撤退到澳門修院寄讀，繼續培育。正正因為這年代的修生經過戰亂的艱苦生活，鍛鍊出他們刻苦耐勞的堅忍精神，唯經歷過戰火的神父已寥寥可數，在世的數位神父大多因身體狀況不宜接受訪問。隨著時間流逝，更顯出是次研究的迫切性。

到了五十年代，修生們才剛剛恢復正常的修院生活，瞬間又要面對因中國政權更迭而從大陸各地湧進的大量修生。這年代受訪的十位神父當中，逾半都是從內地逃難而來，本地修生只有兩人。政局動盪使內地教區難以應付來港修生的學習費用，經費的擔子便落在教廷傳信部身上，需要在世界各地尋求「恩人」協助。然而，修生由幾十人驟增至逾百人，即使是膳食和分批上課的安排，為修院管理者也是挑戰。修生人數眾多對修院長上的另一挑戰是，他們只能從生活規律和紀律去判斷修生是否適合做神父，欠缺了對其人格和個性的深層了解。人才濟濟的環境，卻讓修生和教會受益。雖然懂得拉丁文仍然是能否做神父的關鍵指標，此時的華南總修院，修生間交流的通用語言已由粵語變成普通話，儼如一所全國大修院。他們互相學習及包融來自大江南北的文化，尤其是語言方面，即使畢業後未能回內地教區，也能以所學方言，到其他國家和地區，甚或留在香港服務，使總修院在五十年代培養出來的大批牧者，在教廷的協助和安排下，遍布世界各地，在二十世紀下半葉華人天主教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香港教會來說，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修生，既壯大了本地教會的神職班，亦帶來了多元的成分。他們更可以牧養從自己家鄉逃難而來的教友，穩定難民的心神。這一批人物中，以原籍潮汕的神父最為明顯。據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的牧民統計資料，1953年的教友人口是 54,116 人，到 1959 年已增加至 146,464 人。領洗人數，在 1954 年以後每年以

10,000 人遞增，1959 年更達 14,955 人。從神父的訪談中，提及教會在這時期開展救濟及社會工作。即使修院是封閉式教育，修生當時已有機會向附近的貧民派發救濟品，並探訪附近的漁民子弟，為他們及學校的學生講解要理。可看到修院作為教會的一分子對服務社會的承擔。

六十年代可說是本地教會充滿變幻的一個年代，也是這座矗立在香港仔半島上的天主教修院的分水嶺。華南總修院在這年代的前半段仍然運作，至 1964 年移交給香港教區管理。這段時間在修生人數方面，因為大小修院被置於同一院址，可說是修院的全盛時期，可受訪人數眾多，歷史事件也是最為豐富且複雜的一章，有利於本研究以多角度來審視這年代的修生培育及修院發展。在差不多同時期，香港教會受到幾件重大事件的考驗：首先是華南總修院 / 聖神修院的交接，其次是 1965 年梵二會議結束，教會改革已成定局，緊接而來的是發生在這塊英國殖民地上的「六七暴動」。

在六十年代初，本地教會相隔二十年之後，首次派出三批共六名小修生到羅馬修讀神哲學。與之對比，「六七暴動」爆發後，修院送修生往羅馬攻讀的動機顯然不同，因為經歷過五十年代內地政局引發的動盪，在被認為政治相對穩定的香港發生的這場暴亂，增添了修院的顧慮，故送修生遠離香港這片存有未知危機的地方，成績不是考慮重點。這些留羅學子部分已有工作經驗，可視為大修院從過往依靠小修院儲備神父人才，轉為「成人聖召」的萌芽；而且能否掌握拉丁文已非升神父的決定性條件。他們往後在彼邦受益於國際化的學習環境，學術氣氛自由，主動組織討論，開闊了自身的眼界。

這些特點在六十年代中後期派去那一批多達十人的留羅修生中尤為明顯。他們目睹梵二改革呼聲在普世教會心臟——梵蒂岡——帶來的漩渦，形成他們了獨特的修道經驗，對將來的牧職亦有自己的見解。不僅在外人眼裡，在教會神職班內也有聲音認為，他們有點像脫韁之馬，有自己的「事業」，不符合教區以堂區團體為本的精神。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他們都得到教區主教的同意，或起碼得到默許。另外，或許讓人意外的是，雖然說留羅修生是處於梵二風眼之中，但因為他們仍在求學階段，梵二會議的成果讓他們對新舊學說兼收並蓄，故此他們受到的衝擊，反而未及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對香港修院的震動來得強烈，這或許是梵二官方文憲的翻譯及傳播普及需時，延遲了風暴降臨在思想更為保守的華人地區。

落實本地化是梵二的其中一個要項。此時，華南總修院由於已沒有內地前來的修生，歷史任務落幕，業權及管理權於 1964 年移交香港教區。⁴ 香港教區要獨力承擔培育本地神職人員責任的同時，亦要為自己摸索新路向，並且曾出現過偏差。修院院長雖是修院的掌舵人，對於實踐梵二革新的定位，仍然未能充分掌握，例如給予修生自由，過多或過少同樣招至不滿，成為新舊模式的夾心人。修院原來封閉性的體制，在實驗的階段，為改變與外界脫節的話病，細微不至修生回家的次數，又或小修院中學部改到外面學校上課的方式，幾乎每年都作出調整，使修生適應困難。更嚴重的是梵二對思想上的衝擊，動搖了不少聖召，不僅是在學修生，對於梵二前已接受了整套舊有觀念的神父、修女更難接受和適應，紛紛離開修道行列。不過，梵二無疑為修院培育帶來了新思維，梵二前著重個人神修雖是好事，但視世俗為危險和威脅，甚至視女性為「鯊魚」和「鱷魚」，受訪神父中亦有坦言神長叮囑修生的眼睛要遠離女教友免生誘惑，這對修生將來成為神父在堂區服務和接觸男男女女的世俗人士，並非正確的教育觀念。

時間不能切割，梵二的變動沒有止於六十年代。在七十年代中，受訪人數同樣眾多，綜合他們的口述脈絡可觀察到，修院管理層的變化代表神職本地化業已落實。實際上，在六十年代後期，香港出現首位華人主教——徐誠斌，雖然他只是沒有繼承權的輔理主教，由於白英奇主教對本地神職的開放態度，使神職本地化的趨勢逐漸成形。1969 年，徐主教接任正權主教，其影響力的真正發揮，要數在翌年召開的教區會議。會議文獻其中一章關於〈司鐸生活〉，對「司鐸與本港教區的發展」建議成立修院教育委員會，負責修院的培育，並針對神修生活、知識生活、牧靈生活及社會生活徵求外界人士意見。⁵ 隨著「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於 1970 年成立，並爭取羅馬在學術上的認可，以及七十年代末的所謂培育「四大綱領」，現代的司鐸培育框架基本成形。神哲學院亦推動把學習神哲學的機會開放給平信徒。

與此同時，聖神修院逐步停辦小修院，年長一點且有社會經驗的成人聖召，此時已成為修院生員的來源，並且因他們在思想上較為成熟，對自己選擇的獻身之路更為堅定。此外，神哲學院的成立使得修生的培育出現了清晰分野，學術上歸神哲學院管理，靈修生活仍是由修院照料。他們的學科亦有別於往昔，加入了心理

⁴ 兩間修院過渡的細節，在本研究的另一出版物《華南總修院 / 聖神修院的人事物》記述。

⁵ 香港教區司鐸代表會議：《香港教區會議文憲》（香港：香港教區司鐸代表會議，1974），頁 279-299。

學等現代社會科學。神哲學院董事會加入耶穌會、慈幼會和方濟會⁶ 這些國際大修會，以及澳門教區，合力提供教授人才及集中修生培育，由耶穌會單一的教授變得多元化，這些本地化的發展顯然影響了後來的司鐸培育。受訪神父都對這階段引入醫院牧靈的實習特別難忘，因為這經驗豐富了他們對貧病生死的看法，除了幫助個人成長之餘，也為將來牧民工作有更好的準備。除了修院持續為修生安排社會性的牧民實習，受訪神父的記述同時展現他們通過參與天主教大專聯會、社會運動等，強化在社會的臨在，並與社會尤其是基層市民連繫起來。

八十年代作為本研究收官階段的年代，修院的院長和神師不只是國籍上的本地化，甚至本身就是經由華南總修院 / 聖神修院培育出身。他們在培育方面更為系統，尤其牧民訓練與社會的需要更加互為結合，為修生在將來的鐸職上有更適切的準備和發揮，甚至有海外實習機會，拓闊視野。華人神學家的增加，使得講授語言由英文進而改用中文，讓修生更易理解和掌握。修院生活方面，受訪者的回憶片段多是愉快的，可見修院培育與社會開放的風氣同步伐發展，相比早期五六十年代更為自由，不再是閉門造車。最後，經過七十年代社會經濟平穩而快速發展的時期，八十年代的香港又再次面對重大政治問題——九七回歸。除了修生之間的討論，修院亦請來專家以講座形式從不同角度為修生作前瞻分析。而且，教區設有進修小組，讓修生晉鐸成為神父後，為教會他日可能面對的轉變作好準備。

整體而言，除了每個年代各自的特點，我們看到的修院培育還有如下現象：總修院成立的三十三年面對外部巨大變化，修生的背景又如斯不同，修院雖然營運上有著不少的挑戰，但仍能保持穩定，可能與當時非常強調聽命有關。當時的修院管理嚴格，不只是行為上，連思想上亦然，報刊內容經審查，信件需由長上開啟，並無私隱可言，自學其他外語被視為有野心，隨時可被踢出院門。梵二之後三十年，修院需跟隨教會的步伐，適應社會的轉變，加之修生普遍年紀較長，已沒有往昔的審查制度，又給予修生適量自由回家探親，以符合華人的倫理親情，並且尊重私隱，由通舖大房改為獨立房間。在六七十年代的訪問中，修生當時以學生身分參與天主教大專聯會，作為與基督徒學生另一種形式的聯繫，不與社會事務脫節。

本研究將受訪神父為四類：在華南總修院接受培育者；從小修院轉入本地大修院（華南總修院 / 聖神修院）接受培育者；有本地小修院或大修院背景，但在羅馬接受培育者；在聖神修院接受培育者。其中一個目的是想了解他們接受不同的培

⁶ 方濟會於 1985 年才加入。

育，會否影響他們的修道和成長歷程，以至待人處事的方式和看法。在受訪神父當中，有些神父確實有表達對其他類別神父的觀感。入讀過小修院的神父會認為直接進入大修院的同學，接受培育時會有成長時形成的定見和生活態度，對團體未必重視；反之，屬於成人聖召的神父則覺得小修院的同學是「地頭蟲」，對修院環境和團體生活適應比較快。出國留學者均覺得開闊了眼界，大修院比小修院自由，但羅馬比在本地大修院則更加自由開放。此外，有受訪神父檢視他們以往在小修院的經歷。有進過小修院的神父認為，修院的群體生活有頗大的樂趣，但人的成長需要家庭培育，小修院這種離開家庭、遠離父母的制度有商榷餘地。

雖然說天主教修院培育都有固定模式，全球適用且不論新舊。然而，我們發現「例外」的處理手法貫穿各個年代，尤以早年為甚。可能是因為培育是對人的工作，對個別修生的聖召評估之下而作出的彈性變動。例如五六十年代在學術上有很多特事特辦的安排，可能環境因素縮短學習年期，如余福綿神父被安排在小修院修讀哲學，以節省一年的學習時間。又如駱鏗祥等神父在入修院前與另外兩位同伴住在培聖學校的校監宿舍，預先體驗修道生活；而羅國輝神父則因家庭因素，修道第一年獲准走讀，不用住在修院。

另外，在研究時段內，白英奇主教早期在海豐一帶傳教，至 1952 年被驅逐回香港後，因粵語及英語不太靈光，一般教友其實對其認識不深。⁷ 徐誠斌及李宏基兩位主教相繼早逝，他們任期短暫，可留下的個人點滴有限，而胡振中樞機可能受金禧事件的衝擊，相對沉默，不願面對傳媒，他們雖然身為香港教區的掌舵人，令人遺憾的是，現存除了有一本關於白主教的傳記，要認識這些教區領頭羊，只能靠其生前發表的文告、講道、重大教務決定，以及一些論文。如今本研究部分受訪者的憶述可視為上述神長的歷史補充，讓外界能從官方文件以外的途徑，側面地對他們有更多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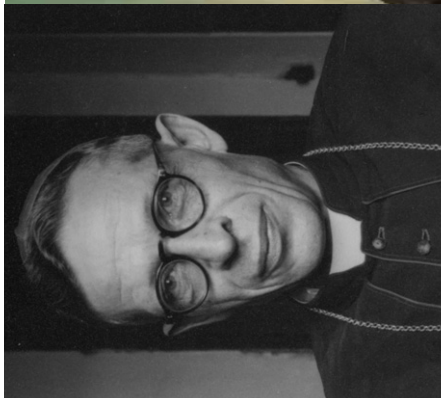
我們非常感謝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理事會在審批本研究的申請時，提出與修女會培育作比較的絕佳建議。我們最終選定中華耶穌寶血女修會，是因為她們是教區首個國籍女修會。教區神職班與男女修會和傳教會很不同，在於修會和傳教會從靈修開始，以其會祖皈依的經驗為依歸。教區神職班和寶血會則是服務先行，前者在堂區團體中服務。寶血會從嘉諾撒會第三會身分獨立出來之前，是幫助這個意大利女修會服務華人，雖然她們也有靈性生活，但同樣是服務行先，未入會便派工作。此外，梵二要求對教會更新，不止對神職班有衝擊，對修女會也引起震

⁷ 廣東省海豐一帶當時屬於香港代牧區。參基德多：《白英奇主教傳》（香港：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92）。

盪。正面來看，它為修女會和男修院提供了一個反思舊模式的契機，寶血會開始探索當年會祖的立會精神，即修會現在強調的神恩——「犧牲、修和、與弱小者同行」，並依照它去專注於服務、教育、醫療等工作。至於修院，教區神父早年從修院出來後的工作地點就是堂區，懂得開彌撒施行聖事，行善去幫助和救濟窮人，使教友熱心便足夠，他們沒有一套靈修系統，故定位不容易。但隨著梵二變革得到落實，教區修院和神哲學院運作日趨成熟，在八十年代可看到基本框架延續至今。

這個研究帶我們回顧了過去，也要為我們前瞻未來，才不失歷史的意義。正如前言中提到，李宏基主教曾說：「修院是教區的心臟。」位於香港仔的這個「心臟」在過去九十年來一直不停地跳動及運行，在不同的時代都在回應教會的需要，並在社會當下的環境而演進。新冠肺炎刻下仍然肆虐全球，迫令人們改變以往既定的思考及行事模式。人們以往的生活完全被顛覆，並由一種「新常態」的生活取代，世界正邁向嶄新的局面。主日彌撒是教會的日常，因避免人群聚集，防範受病毒感染的壓力，實體的感恩祭曾一度停頓，觸發聖神修院及不同堂區嘗試以社交媒體直播彌撒及晚禱，聽道似乎已不受地域的限制，聖事及靈修的生活不至於完全停頓下來，修生都親身參與了以新傳播方式來傳教、宣講福音。2020年10月3日慶祝聖神修院九十周年 /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五十周年的啟動禮也以這種形式呈現。這是一時的權宜之計？還是時代的徵兆，為教會未來發展啟發新方向？環視現今聖召漸少，而社會各階層運用社交媒體比比皆是，教會可以藉著網媒為傳福音給力嗎？修院的培育在這股線上力量有看到甚麼契機嗎？負責修院培育的牧者擁有切合時代需要的特點嗎？本研究雖然暫時未能確切回應這些提問，但新時代確已臨近，只待我們一起親身見證！

我們的主教



1934



1944



1952 劉蘊遜 麥耀初 李宏基 胡振中



1956 陶成章

我們的神父

1957 楊慶松 李毓明 陳子殷



1960 溫以政



1959 魏希信 汪中璋



1962 曾慶霖



1963 曾慶文



1965
姚崇傑



1966
湯漢



1964
尹雅白 (左二)



1964
蔡明通

1968 江潤坤 余福綿



1969
康建璋
李國雄
文耀龍
盧子榮



1967 林焯焯

1970 夏其龍 鄭生來 關俊榮



1971 劉玉亭 譚坤 徐錦堯 駱鏗祥



1973 劉德光



1972 梁達材 (右一)



1979 曾偉雄 關俊棠 陳志明 羅國輝 閻德龍

1981
伍國寶



1983
林祖明

1980 蔡詩亞 周景勳 劉富根



1984 麥景鴻 孫英峰



1986 蔡惠民



1988 李志源 陳德雄



1987 陳國輝



鳴謝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提供

第 14, 68, 320, 321 頁圖片

©天主教香港教區版權特許編號 HKCDA-062/2021，經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准許複印

CLIC Ltd 提供

第 1, 2 頁圖片

香港培聖會提供

第 14 頁圖片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提供

第 235, 236, 238, 261 頁圖片

潘惠敏博士提供

第 6 頁圖片

寶血女修會提供

第 302, 310, 311 頁圖片

以及馮勝利先生和參與本研究的諸位神父提供的圖片。

封面照片：[asianfiercetiger@flickr](https://www.flickr.com/photos/asianfiercetiger/)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叢書主編

林榮鈞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譚偉倫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學術顧問團

夏其龍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譚永亮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

勞伯燾教授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

古偉瀛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Prof. Philip CHMIELEWSKI, SJ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USA)

Prof. Leo D. LEFEBURE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Prof. Peter C. PHAN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Prof. Nicolas STANDAERT, SJ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Belgium)

Prof. Gerard Kevin WHELAN, SJ (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 Rome)

General Editors of the Series

Dr. LAM, Anselm Wing Kwa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 TAM, Wai Lu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dvisory Committee

Dr. HA, Louis E. Kelo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r. TAVEIRNE, Patrick, CIC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 Philip CHMIELEWSKI, SJ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USA)

Prof. KU, Weiyo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of. LEFEBURE, Leo D.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Prof. LO, William, S.J. (Holy Spirit Seminary College of Theology & Philosophy)

Prof. PHAN, Peter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Prof. STANDAERT, Nicolas, SJ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Belgium)

Prof. Gerard Kevin WHELAN, SJ (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 Rome)

香港中文大學 天主教研究中心
重塑香港天主教會領袖之搖籃

編著： 林榮鈞、張小蘭及黃家欣

出版：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電話：(852) 3943 4277
傳真：(852) 3942 0995

網址： www.cuhk.edu.hk/crs/catholic

電郵： catholic@cuhk.edu.hk

承印： 4a Colour Design
(香港葵涌金龍工業中心第四座六樓 C 室)
二零二一年八月初版

ISBN： 978-988-79920-7-3

Cradles of the Leader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Hong Kong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uthors: Anselm Lam, Lucia Cheung and Gladys Wong

Publisher: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 (852) 3943 4277

Fax: (852) 3942 0995

Website: www.cuhk.edu.hk/crs/catholic/

Email: catholic@cuhk.edu.hk

Printer: 4a Colour Design
(Flat C, 6/F, Block 4, Golden Dragon Industrial Centre,
Kwai Chung, Hong Kong)

First Edition: August 2021

ISBN: 978-988-79920-7-3